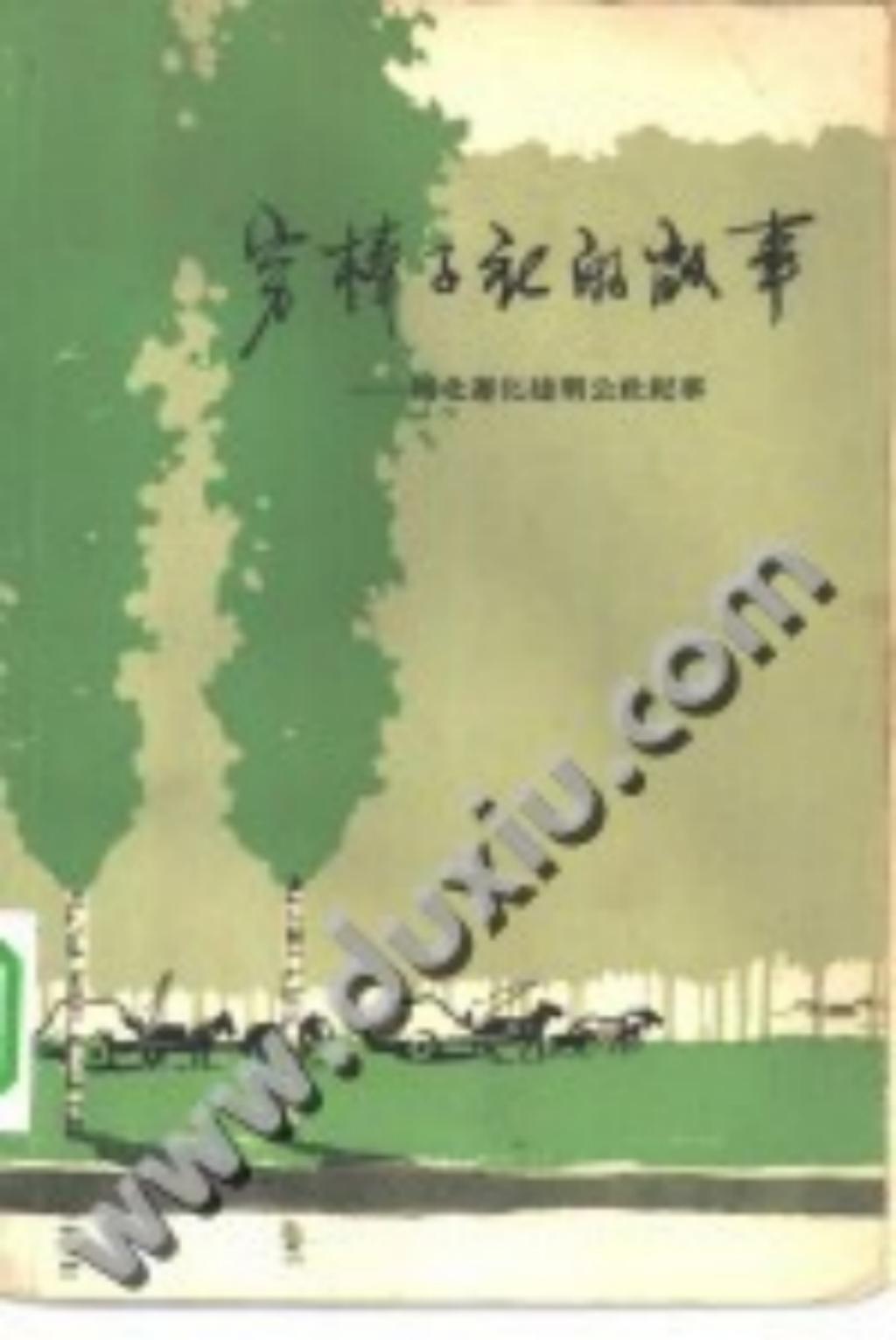


方樟子紀風諺事

明公私紀風諺事



穷裤子社的故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书号 1809 字數 268,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5 插頁 1

1966年2月北京第1版 1966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印数 60001—155000 册

定价(2)0.96 元

序　　言

《建明公社記事》编写小组

一

“穷棒子”的故事，是改天换地的故事。

“穷棒子”的历史，是改天换地的历史。

二

从三条驴腿办社起，到有水库有汽车的人民公社，这是党和群众的伟大创造。这一创造过程，也是一个艰巨的斗争过程，主要是阶级斗争的过程。我们以此为一条红线，编写了这本书。

参加编写的同志，有的和西铺大队贫下中农在一起住过很长时间，交过知心朋友，参加过这里的工作。有的是县委干部。多数同志和群众一同劳动过。注意“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我们这样作，因为最好的调查

研究，是参加工作参加斗争。不过时间短一些，我们做的还很不够。

三

编写公社史和真人真事的故事，必须注意我们时代的历史真实。这种真实性，它要求对革命事业有利，并不是要求有闻必录。编写者了解情况愈多愈好，愈细愈好，以便于分析和抓住主要的环节来写。不应当简单化，不应当草率从事，不应当捕风捉影和只听少数人的反映。

一部公社史，(这里以西铺大队为重点)，它包括一个地区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等重大内容，它包括对历史和人物的评价，有时还包括对当地风俗、山水、乡土的记载，所以不能任意虚构，弄得张冠李戴，事件混淆不清。

这本书的详细提纲，曾在西铺大队党支部和“二十三户”的会议上宣读过，会后听到一些很好的意见。省、地、县和公社的某些党委同志，对这本书的编写工作也很关心，研究过书的内容。提纲作过几次修改。某些文章写成以后，在一部分群众当中，念过一次。这些方面，都加强了文章的真实性。我们感到，编写这样的书，没有党委的直接领导和关心是编不好的。

四

西鋪大队社員王生的儿子，他編过好几首贊美人民公社的新民歌，其中有这么两句：

建明公社是枝花，
党来亲自栽培它。

我們应当滿腔热情地歌頌劳动模范的故事。我們更应当歌頌党的领导，群众的智慧。劳动模范的成长，本来就是和党的领导、群众的智慧分不开的。人民公社是中国广大群众必走之路，也是我們党领导的成果。由于編写者，只有少数同志亲身参加过这个地区的工作，如何具体地生动地表現这个地区的历史，我們所做到的，恐怕只是第一步。

五

公社史的写作体裁，有故事体，有列传体，等。这本书是两者兼而有之。这当然是一种尝试。这本书是按公社史的要求来編写的，目前它并不叫作公社史，叫做記事，打算等书出版了之后，經過一段时间的考驗，再征求一些意見，再修訂，再改正，使之逐步完善。重点的公社史，更应当这样来作。

中国作家协会今年很提倡报告文学的写作。在报告文学創作活动中，编写“五史”，是实践党和毛主席文艺方針的战斗任务之一，又是一个新的創作历程，这不只是几年时间以內的事，是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內的事。有許多問題，值得我們繼續研究。

我們热誠地希望，在这个伟大时代中写的公社史，能留作革命长征路上的几棵树木，历史长河里的几朵浪花。

1963年11月末

目 次

序言 《建明公社記事》编写小组 (1)

第一部分 新打柴記

两个战友	丁 羽	(3)
长城烽火	丁 羽	(17)
枪和土地	丁 羽	(35)
三条驴腿	陈青山	(54)
打柴創業	陈青山	(73)
較量較量	李滿天	(89)
区委书记	古 草	(112)
穷棒子精神	陈青山	(131)
幸福哪来?	張 朴	(144)
再上柴山	刘 哲	(153)

第二部分 二十三戶

二十三戶小史	張庆田	(167)
王生家史	張 朴	(191)

- 王荣家史 古草 (243)
戴存家史 葛文 (286)
佟印家史 刘真 (3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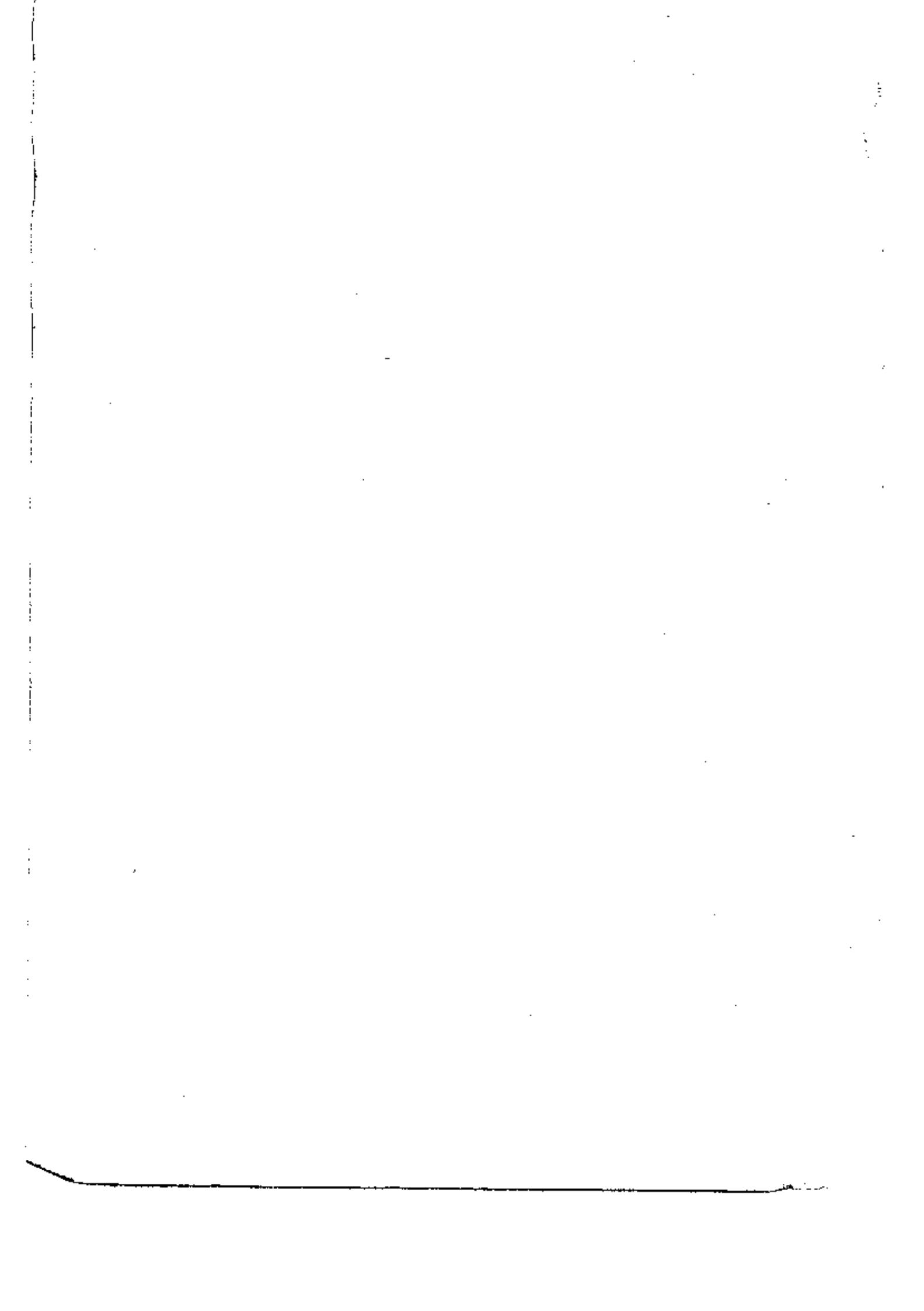
第三部分 王家大院

- 分家 东木 (323)
二巡警父子 幼江 (334)
贼六子 陈青山 (355)
“狼崽子” 幼江 (384)

第四部分 建明社颂

- 建明湖 田间 (407)
“老打头” 刘哲 (414)
美好的青春 张庆田 (423)
开花结果 葛文 (431)
山村读书声 长正 (439)
老管家 司行 (448)
新“伙计” 东木 (455)
老羊倌 任彦芳 (466)

第一部分
新打柴記



两个战友

丁 羽

出遵化东门三十多里，山山岭岭就逐渐连接起来。烟筒山、长峪山、景忠山，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山头，摩肩擦背把大地挤成了一小块又一小块。山多土薄是这个地区的特点。

这一带零零落落散布着成十个村子。大的一两百户，小的几十户。长峪山下有个较大的村子，叫四十里铺，东头叫东铺，西头叫西铺，合起来共两百几十户人家。

王国藩和杜奎两家都在西铺，紧住斜对门。两人从小一起长大，拾柴禾，挑野菜，谁也离不开谁，好得象亲兄弟。国藩自幼死了父亲只和老娘过活，他上无兄，下无弟，自个儿顶住门户。杜奎哥儿四个，三个哥哥在外为人帮工，他年纪虽小，也支撑了家务。

艰难的日子过去一年又是一年，到了一九三二年两人一个十五一个十六了，长得浓眉大眼，宽肩膀，高身杆。杜奎大一岁，比国藩也壮实些。

那天，两人脚前脚后从南山挑下两担柴来，走到半坡，杜奎說：“歇歇吧，我餓得前心貼后背上啦。”国藩也放下柴担，說：“歇歇就歇歇，我眼晴瞅东西也有点瞅不准啦。”

杜奎一边用破褂子擦汗，一边鎖着眉头說：“你知道王功大爷今早餓死的事嗎？”国藩說：“我媽說啦，媽还哭了一早晨。咳，这年头，咱穷人可要想点法子。”“有啥法子，还不是死路一条！”“不能这样說，路是人走的，王功大爷的路，咱們可不能走！”

早先，王功在本村地主賊六子家当长工，后来年紀大了，干活不灵便了，就被赶了出来。他为人厚实，肚里有气也不往嘴上出，忍着泪拿起棍子去要飯。年前腊月里，紛紛揚揚下着鵝毛雪，眼看一家五口冻餓难耐，他身不由己地走到賊六子家門口，想要点热粥喝。門一开，賊六子的閨女貼出半个臉蛋，嘟起嘴說：“老鬼，你又來啦，咱家養你一輩子不成！”砰一声，关上門。王功气炸了心肺，从此再也不登王家大院。到了春天，实在沒有活路，老两口痛哭了一場，把九岁的閨女童养給人家，五岁的儿子送給了馬棚峪一家亲戚，两岁的小閨女卖了三斗玉米，枕头里的粃子也抖出来摻野菜吃了。吃过几天，还是糧断米絕，鍋清灶冷，老头子連餓加病，終于在今天早晨咽了气。

国藩和杜奎歇了一陣，又挑起柴担繼續赶路。山下沙河套西头那一片黃土地上，麦子已长出沉甸甸的穗子，迎风摆弄，多么喜人的收获季节就要到来。可是，这哪有

窮人們的份！這里那裡，全是王家大院財主們的地呀！

猛然間，聽得“砰砰”兩聲槍響。只見王家大院兩個護衛的無賴，從土坎上象餓狼般撲了過去，一會兒就趕上並抓住了一個蓬頭赤足的小孩。小孩頑強地掙扎着，哇哇直叫。

杜奎說：“走，咱倆快去瞧瞧！”國藩說：“好！”兩人就快步趕了上去。

“這麥穗我是路上拾的，不是地里掐的。不信，你瞧！”小孩哭着摔過去一束枯萎了的麥穗。很明顯，新掐下的決不是這個樣子。

“他媽的，我們亲眼看見，你還強辯！”

“誰強辯？你們才是強辯！”

這時，鄰近鋤地的莊稼人，圍上來了。

“弄槍動火這是玩兒的！”一個老農民說。

“哼！財主家的威風，大秋后的螞蟻，長不了。吃這一套！”一個青年農民憤憤地說。

“算啦，算啦，為小事，動大氣，犯不着。”一個怕事的農民說。

“什麼算啦，算啦，這樣的事也能含糊嗎？無端開槍打人算不算犯法？”杜奎放下柴担，兩手叉在腰里插話了。

正在這時，王家大院的狗腿子范泰不知怎的钻出來了。范泰在窮人面前，專愛要他那兩片嘴唇皮子。窮人被債逼得走投無路了，他就說：“咳，留着這兩間破草房幹啥，干脆賣了還債，俗話說，無債一身輕嘛。”窮人被租子

逼得火燒眉毛了，他就說：“嗨，捏住嗓子眼兒，一天省它半升三合，不是就出來了嗎？有道是儉是聚寶盆呀！”可是今天他看到一伙人這樣橫眉豎眼瞪着自己，鋤頭扁担全握緊在手里，早泄氣了，只得順坡下駛地表示：“好，好，看在鄉親們的面上，算啦，算啦！”說完，趕忙催護青的無賴走了。

杜奎的氣可沒有消，他吐了口唾沫，憤憤地說：“哼！你算了，我們可不算了呢！”

不久，四十里鋪暴發了一次向王家地主的自发鬥爭，窮苦農民也算出了一口氣。

王家地主是當地的首富，如何起的家，說來話長。只知道他們祖輩有句傳家秘言：“人無橫財不發”。傳到“賊六子”手里，他又添補上一句：“不殺窮人不富”。這賊六子排行第六，當面要人們稱呼他六爺或者六先生，背地里人們都叫賊六子，他有四個侄兒叫王維平、王維清、王維田、王維藩，也都各自成家立戶。其中要算王維平最虎口狼牙。賊六子两只賊眼一映一個鬼主意，大斗大秤進，小斗小秤出，剔牙挖碎，半个銅子兒也要擡到手才睡得着。王維平嫌這樣太小氣，干脆窮人借米借錢，先扣三個月的利息，還有個名稱，叫做“出門三聲炮”。

那時因為上年發了一場大水，窮人家家戶戶鬧災荒。山坡里的野菜、草根、樹皮都吃光了，賣兒賣女、逃荒要飯的，少說也有三四十家。王家大院却趁火打劫，春借一斗，秋還二斗，還得有土地房屋做抵押；好地一亩出一石

玉米，坏地一亩才六斗玉米。只消半年时光，王家叔侄一气吃进了五六十亩。

穷人们肚里无食，身上无衣，住的茅草房，七倒八歪，风扫地，月当灯。王家大院灰楚楚一长溜瓦房，他们还嫌不够阔气，大兴土木又盖起护院炮楼来了。

盖到一半，有个姓韦的石匠被石头砸了脚，一两天工夫，右小腿肿得象根粗木桩，躺在贼六子家磨房里，痛得直咬牙。这韦石匠很有一身手艺，凿个凤凰就象能闪翅，打个狮子真如能滚球。他为人平和，和村里老小都合得来。有个叫范永祿的小伙子，平常重义气，来看望了几回，见他伤势不轻，劝他说：“老韦，你在这里要湯沒湯，要水沒水，算清账，我们送你回家去将养吧！”

韦石匠听了，就扶根棍儿去找贼六子，刚把话提了个头儿，贼六子就眨眨眼皮说：“那怎么行！高楼平地起，你把我石工耽误了，泥水匠、木匠不是也跟着耽误了吗？”

韦石匠说：“你有钱，不会另找人？”

“另找人？”贼六子吊着眼珠说，“现要现找，化双倍的钱，怕都找不回来呢！”意思很明显，要走，工钱要赖账啦。

正交涉，王维平背着手踱进来。韦石匠转面恳求说：“少爷，请你说一句，把我的账清一清，我想回家去养伤。”

王维平瞪起蛤蟆眼说：“什么？清账？说得好听！你他妈自己不小心砸了腿，耽误了工程，我们还要和你算账呢！”

韦石匠虽然性子温顺，也听不得歪理，不由上了火，

“这是我的血汗，你們給，我要；你們不給，我也得要！”

狗腿范泰忽地钻出来，拍着韦石匠的肩头說：“好說，好說，該給的錢少不了，不該給的也拿不走。”他不由分說，把韦石匠仍旧推回磨房里。

范永祿一向火暴性子，听韦石匠这样从头一說，气炸了，回去立时圆眼一睜，对村里人嚷开了：“賊六子狼心狗肺，真不是人养的！韦石匠拚死拚活，无日无夜的給他盖炮樓，如今伤筋害骨啦，連工錢他都不給！”

他从东头嚷到西头，从前街嚷到后街。

有些要飯的提起要飯棍說：“走，咱們帮韦石匠要錢去！”

有些鋤地的丢下鋤头說：“走，咱們和狗日的賊六子評評理去！”

王国藩年紀雖輕，一向有心計。他对范永祿說：“大叔，咱們癟着肚子，王家大院却修盖炮樓。他家的糧食滿仓库，为啥不去吃它几天？荒年吃大戶，老人們早就这么說过啦。”

人們正在火头上，国藩塞进一把干草，哪有不着的！不少人立时嚷着附和：“对，吃大戶，要工錢！”

“对，魚帮水，水帮魚，斗死总比餓死强！”

杜奎更是好样儿的。他大吆大喝，挨門挨戶地去动员：“走，带上碗，拿上瓢，到王家大院喝粥去！”

一帮年青人縮袖捋臂地出来了；老头儿、老婆子、大

媳妇、小闺女，也都跌跌撞撞，捧瓢端碗地出来了。

范永祿揮起胳膊，大吼一声，一馬當先，帶領人們直奔王家大院而去。

象火星撒上草垛，一霎時燒紅了半邊天。

窮苦農民在王家大院里橫沖直闖，揚眉吐氣，第一次顯示了威力。廚房里一滿鍋小米干飯，早被搶吃一空，盆摔了，鍋砸了。拳頭揮動，喊聲震天。

王維平弟兄幾個吓得不敢露面，護院的無賴逃跑無踪，只有賊六子和范泰兩人被堵在正房里。賊六子臉白得象張紙，光睞眼睛，沒了主意，堆起笑臉裝出一副可伶相說：“鄉親們，我光景雖比你們強些，可也為難呀，這樣吧，韦石匠的工錢我們給他，另外，再拿出一石玉米來讓大家煮粥喝。”吓得象團爛泥的范泰，也哆哆嗦嗦，鼓動兩片嘴皮接着說：“好說，好說，大家不是近鄰，就是遠親，六爺還眼看你們餓死不成！六爺親口說啦，一石玉米確實不少哇，摻點野菜煮成粥，還不喝個三頓五頓……”

“一石玉米不行！”許多人喊着。

“還要給韦石匠發養傷費！”范永祿等人也補了一句。

在眾人的威力下，賊六子睞着眼皮，從一石增到一石半，增到兩石，增到兩石半，最後增到三石。養傷費也答應發五元。這時，他唉聲叹氣裝窮了：“咳，這樣咱家自己也緊巴緊了！”

那年月，大家都缺乏鬥爭經驗。有些老头婦女，看見賊六子裝出的這副可伶相，心軟了。范永祿等人也拿不

出旁的办法。斗争就这样搁浅了。

当天，范永祿等人从王家大院挑出三担玉米，放在西铺王老三的豆腐房里煮粥，一人一瓢的分着喝了。过一天，范永祿等人又帮韦石匠算清了账，领上养伤费，送他回家去了。

这一次斗争，虽然没有动摇了王家大院的根基，可是在黑夜里发出火星，已经算不小的胜利了。

二

转眼过去几年，国藩和杜奎已经二十出头，吃糠咽菜，受冻挨饿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也长成了两条汉子。

黑暗的年月，又压上阴惨的乌云。日本鬼子侵占了东北，又染指冀东。遵化城里搞起了汉奸伪政权。贼六子这些地主，自己不出面，推出个爪牙来当了伪保长，今日要粮，明日派款，七捐八税都压在庄稼人头上。穷苦农民更是过不下去。

不久，爆发了抗日战争，接着，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大胜仗，又接着，建立了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零零星星地传到又穷又偏僻的四十里铺村。过年春天，冀东一带也有了八路军的活动。泡在苦水里过日子的庄稼人，日候夜盼地望着光明的到来。

一天，国藩和杜奎下地回来，两人悄悄地谈论开了。国藩说：“老奎，听说长城边上有八路军便衣队活动呢，几

时能到咱们这儿来就好啦！”杜奎說：“真的嗎？”國藩說：“好些人都這樣說，还能假啦！”杜奎說：“那咱们找他們去！”國藩說：“那怕不容易，听说他們和庄稼人一般打扮，长就一双飞毛腿，三五百里說到就到，人家头上又沒刻字，你知道誰是？”杜奎說：“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只要果真有，还愁找不到！”國藩一想，也有道理，就点头說：“好，咱们去試一試。”

第二天，两人带了点干粮，悄悄地出发了。一路上紧打听慢打听，来到柳河峪附近时，果然打問出苗头来了。听人說昨天便衣队来到这个村，把一家大地主的五支大枪起了出来，現在正給村里人們讲抗日救国道理哩。杜奎正好在柳河峪有一家亲戚，两人高兴极了，就脚不沾地直奔柳河峪。

到了杜奎亲戚家，杜奎一听說真有八路軍，急着要見面。这家亲戚就帶他們去找，果然找到了便衣队曹队长。

曹队长問明了兩人的情况，又笑着問：“你們村的地主有枪嗎？”

杜奎生怕曹队长不去他們村，有意掺点假水，搶先回答：“有，我們村有个大地主叫賊六子，叔侄四家，少說也有十来支枪。”

國藩明知杜奎說走了嘴，可是望曹队长他們去的心太切，就隨声唱影地加了一句：“有两支还是新买的，西洋貨。”

曹队长想了想說：“你們在這裡住一宿，明天咱們一塊兒去。”

杜奎盼不得見了云就下雨，他黑眼珠一轉，又編出几句來：“我們村里謠言正盛哩，明天去，說不定他們把槍支插起來啦。”

曹队长又想了想，笑着点点头：“好，小伙子，咱們准备一下就動身。”

天下着毛毛細雨，队伍翻山越嶺，飛快前进。兩地相距仅二十来里，傍晚时分，國藩和杜奎兩人把便衣隊三十多人領進了西鋪村。这一下，村里轰动起来了。人們早就听说这个队伍不打人，不罵人，不拿一針一綫，都挤上街头來瞧熱鬧。國藩和杜奎找上偽保長，直扑王家大院。

賊六子叔侄四人，这几天正心惊肉跳，却沒料到變得这么快。黑虎虎一群人压进王家大院，賊六子首先吓慌了。曹队长先向他們交代了抗日救國的政策，接着要他們主动交出槍支。賊六子点头哈腰，一連声的是，是是，提到槍，話頭就轉了：“寒舍实在沒有什麼槍，有兩支破家伙，也叫幾個護院的背跑啦。咳，這樣吧，队长遠來，請先在寒舍吃點便飯……”

狗腿范泰也接上說：“好說，好說，队长和弟兄們遠道而來，歇息歇息再說，看，渾身都淋濕啦，我，我这就去打點酒，備點菜，讓队长和弟兄們吃了暖和暖和。”他也不管別人理不理，顛顛屁股就出去了。

曹队长又耐心地向賊六子叔侄交代了一番政策。賊

六子还是老話一句：“两支破家伙叫护院的背跑啦……現在不知枪在哪里，人在何方。”

正在这时，杜奎一人背了两支快枪进来了，后面几个便衣队押着两个护院的。原来这两个家伙一看来了这么多便衣队，想逃，門口出不去，墙高跳不了，只好钻进牛圈的玉米秆堆里打哆嗦。杜奎在曹队长和賊六子磨唇費舌的时候，暗下招呼几个队员搜索到牛圈，一声吼叫，那两个家伙就“媽呀，媽呀”，乖乖送出枪来。

曹队长接过枪，笑了笑說：“这两支枪可一点也不破呀！你們放老实点吧，別的枪在啥地方？”国藩也插口說，“你們各家不是都有护身枪嗎？快交了吧！拿出来打日本鬼子，这算你們爱国。”

賊六子哑口无言。王維平还矢口不认：“咱們王家就只这两支枪，哪里有什么护院的、护身的，你知道个啥！”

曹队长見他們把話都說絕了，也就板起臉孔說：“既然你們这样不識好歹，我們也就不客气啦。”

这里正在說話，范泰已經出去通風报信，要各家地主快插枪。

王維平的媳妇抱起枪，放进板柜，一想不稳妥，又赶快拿出来填进坑洞，嫌不严实，又急忙拉出来塞进灶门，灶門淺，枪柄露在外面，又慌着抽出来。她里屋轉到外屋，外屋窜进里屋，就是找不到个严密的地方。最后，她抖开一条被子，把枪睡在被窝里。队员們进屋一掀被子，枪到手了。

王維清和王維藩兩人媳婦，平时是冤家对头，事到临急，顾不得宿仇旧怨，一个說：“嬌，枪放在哪儿好？”一个說：“哟，我也沒了主意！”最后两人抱了枪，爭着搶着地窜进后院猪圈，先塞在椽空閒，仰头一瞅不妙，又急急拿下来墳在猪圈底，上面厚厚地堆了一层草。回来一个站在东房口，一个站在西房口，斜眉搭眼地望着后院猪圈。國藩領着几个队员在家里翻，翻不出来。看了她們的眼色神情，一猜度，心里有了底，走到后院猪圈，弯身一瞧，老母猪把草拱开一个窟窿，一支枪身已經露在外面。

賊六子的老闆女是个有名的刁钻貨，一向又詭又激。她窜进一間隐密的冷屋，想把枪塞进狭小的炕洞。杜奎帶人来搜枪，有个燒火的老太婆朝冷屋一咧嘴。杜奎砰一脚踢开门，那老闆女回身一看，知道藏不住了，立刻說：“唷，你們來得正好，我正把枪挖出来，打算送去呢！”

六支枪齐崭崭地往堂屋一摆，賊六子叔侄都怔住了。

当晚，便衣队就宿在村里。第二天，又在四十里鋪进行抗日救国的宣傳。高长順等四五个年青人生纏硬求地要跟他們走，曹队长也同意了。

傍黑，曹队长又把賊六子和伪保长两人找去說：“我們队伍今晚要轉移，想筹两百元經費，眼下庄稼人很是困难，就請王家府上借一借，怎么样？”賊六子一听，惊得出身冷汗。往外拿錢，比割肉还痛。他当时推脫：“咳，队长，不瞞你說，我們王家其实是个空架子，不要說一百二百，就是一二十也一时拿不出来呀。老話說亏众不亏

一，抗日救国是大事，理应众人尽心，让村里大家均摊均摊吧！”

賊六子这一說，伪保长身上可冒汗了。上一回收戶口捐，就是賊六子的賊主意叫均摊，害得村里人都罵他。眼下除了王家地主，誰家还有余錢？他眼瞅着曹队长，囁嚅地說：“咳，眼下庄稼人們是湊不起来呀！”

曹队长說：“对哇，抗日救国，人人有責，有力出力，有錢出錢，窮人們出了不少力啦，你們有錢人不拿点抗日經費，能算中国人嗎？”

賊六子看着推不脫，又想滑过去：“咱家的事人多嘴杂，我一人难以作主，得回去再商量商量！”

曹队长立时制止住他說：“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是当家人，这点小事就在你一人决定啦！”

賊六子推不脫，滑不过，就又拿出他的老办法來，哭穷叫苦，先答应了个三十元，后来又挤到三十五、四十元、四十五、五十元。他哭天搶地地說：“再也沒一点办法啦，就是拿錐子錐、鞭子抽、刀子割也沒法儿啦。”

曹队长心里象明鏡似的，早已看穿了这伙地主的花招。他根据事先了解的情况，故意松了一口說：“五十就五十，那么你家那一头新买的大驥子，部队上驮个东西啥的要用，得借一借。”

这一下，賊六子可傻了眼。那头驥子是二百四十元买的，再加上五十元，将近三百元，不是多出一半了吗？他又是酸，又是苦，又是辣，不知是啥滋味。只得乖乖地

拿出两百元錢。

便衣队走后第二天，王家叔侄吵嚷开了。四个侄儿破口大罵；賊六子眉头打疙瘩，背起手，象老驴轉磨地在屋里轉个不停；范泰縮在屋角，象只猫头鷹。

他們明显地感到，时勢变了，穷苦农民要起来了，抗日的烽火将会越燒越旺，老黃历已經瞧不得了。

王維平撩起长衫，一拍大腿說：“一不做，二不休，山沟沟里是翻不起大浪的。上遵化，那边有咱至亲好友，咱們和这批穷小子走着瞧。”

当天中午，王維平、王維清、王維田、王維藩四兄弟，果然套起車，搬上箱籠細軟，帶上妻小，吆吆喝喝地搬到遵化去了。

当天晚上，賊六子也套起車，搬上箱籠細軟，帶上妻小，偷偷摸摸地溜到遵化去了。

长城烽火

丁 羽

一

王家地主走了，庄稼人們起来了。革命的火种撒下，很快就燃燒起来，成立农会，組織民兵。国藩和杜奎二人对于抗日工作，很是积极。

冀东一带抗日斗争的日益展开，成了插在敌人背上的另一把尖刀。日本鬼子想进行残酷报复，这一年就来了个大“扫蕩”。

黃鴉鴉的日本鬼子夹杂着灰溜溜的伪治安軍，东冲西闖，杀人放火。那一天，闖进了四十里鋪。村里人逃进南山和北山，民兵在山头上監視敌人。过了三天，还不見敌人撤走。民兵出去打探了几回，国藩和杜奎也到山崗上瞭了几次，看不清鬼子啥动静。杜奎說：“咱們进村瞧瞧去！”国藩說：“要去，得化装化装。”杜奎說：“不用。鬼子抓的那一批民伕，不都是和咱一样的庄稼人嗎？”国藩一想說：“好，咱这就去。”两人向領導說明，領導也同意了，并囑咐他們小心行事。趁着黃昏月色，两人紧了紧腰身，掖上两顆手榴彈，外面套件破袄，摸进了村里。

村里猪腸狗肚，到处都是，怪味恶臭，直钻鼻子，只三天工夫，簡直变成了鬼的世界。两人躡手躡脚，摸进国藩家院子，一进门，就吓了一跳，脚边横着个血淋淋的长角怪物，細一瞅，原来是个割下不久的牛头。屋里掌着灯，从外面看得清有十来个伪軍，有的躺在炕上，“心肝呀”、“妹子呀”的哼着不入耳的小調；有的“天呀”、“地呀”的正推着牌九。国藩拉拉杜奎的衣襟，出了国藩的院子，又摸进斜对面杜奎家院子。杜奎一脚踩到这群狼羔拉的野糞上，正要罵一句，国藩捂住他的嘴，扯着他的衣襟又出来了。不远是杜生开的大車店，因为門口有三棵大槐树，人們叫它三槐店。两人正閉氣凝神地走着，猛听得一声喝叫：

“八格牙魯，什么的干活？”

两人吃惊不小。国藩立时鎮定住回答：“取柴燒水的干活。”

一个日本鬼子端着带刺刀的枪，叫他們一个一个的过去，上下仔細打量过后，揮手叫他們“开路”。两人壮着胆往前走，經过大槐树一抬头，只見树杈上吊着几顆不知名的死难烈士的人头。两人心里象被鋼針扎着似的难受。他們不敢久留，匆忙繞到三槐店院后，翻院墙进去。院里正拴着五六匹毛驴，赶驴的都在屋里鬼混，駄子都未卸下。两人摸了摸，在一个驴駄子上摸到了一大捆硬梆梆的物件。杜奎悄声說：“大概是枪！”国藩也低声应了句：“有点象！”两人迅速动手卸下駄子，抬到院墙根。杜奎先

翻过墙，接过去驮子，国藩也跟着翻出院墙。这时，听得屋里哇里哇啦走出一帮人来，杜奎说：“国藩，你先把它扛走，在村西黄土岗等我，我来断后……”国藩最知杜奎脾气，二话没说，弯腰扛起驮子，便往村外突。杜奎拉出手榴弹的弦，竖耳听着，估计国藩已经出村，他也迅急跑出村子。

在村西黄土岗，两人碰了头。杜奎又扛着驮子爬上一个岗，放下驮子说：“不怕啦，咱们瞧瞧里头是啥东西！”解开绳，剥去外面的油布，又撕开一层包装纸，嘿！上面是一大捆电线，下面是个长方扁平的木箱，那木箱漆得铮亮，在月光下直打闪。杜奎说：“啥玩艺儿？打开瞧瞧！”东摸西摸，触到一个小铁疙瘩，一摁，木箱啪地掀开了，里面却黑糊糊，真不知是啥玩艺儿。杜奎伸手一摸，五个手指头乌黑乌黑的，放在鼻前一闻，一股火油味，在腿上一按，齐刷刷落下五个黑印。杜奎烦恼地说：“啥鬼八怪，咱们砸了它！”国藩说：“别砸！交到区上去，说不定是啥宝贝呢！”

第二天，鬼子撤走了。两人把木箱和电线送到区上。赵区长一看木箱，笑着说：“好！好！你们干得好！鬼子送来了一架东京出品的油印机，连收条也没要你们的！”

日本鬼子的“扫荡”失败了，汉奸特务的活动却非常猖狂。斗争也更加艰苦了。

一天，三槐店的杜生匆匆地找到杜奎说：“刚才我店里住进四个客人，身份证上写明是做木材生意的。一进

店就橫眉豎眼要這要那。我洗臉水拿遲了一點，一個留分頭的家伙，差点搊我兩耳光。他們硬要我派人趕集給他們割肉包餃子吃。做生意人哪有這樣霸气的？還有一個留八字胡的家伙屁股后面還突出一疙瘩，象是槍……”

一聽說是槍，杜奎腳底象抹上了油。他稍一思索說：“你快回去把他們糊住！要吃餃子，好辦，包！反正小子們也是吃不成的。”

杜奎迅速找到了國藩。兩人互相商量了一下，就找來了王鳳祥、張志民、溫自泉三人。王鳳祥外號王大膽，打鬼子一向天不怕，地不怕。張志民說話有點結巴，但兩個拳頭象鋼打鐵鑄。溫自泉個子不大，是有名的機靈鬼。

杜奎如此這般和他們說了一遍，就都相跟着去了。

到了三槐店，三人先埋伏一邊，國藩和杜奎悄悄溜到了窗下。從窟窿眼里朝里一看，只見這四個客人全都是身穿大褂商人打扮。那個留八字胡的家伙年紀最大，約三十上下；其餘的全只二十出頭。那個留分頭的家伙鼻上還架着副茶鏡。他們有的躺在炕上悠閑地噴着煙圈；有的蹠起二郎腿，嘴里哼着刺耳的小曲。再一細瞅，那個留八字胡的家伙，屁股后面果然突出一疙瘩，用一只手按着，眼睛滴滑亂轉，滿身流氣。杜奎低声說了句：“嗯，可能是……”掀起門帘，一邁腿就進去了。國藩在外面緊張地注視着動靜，考慮對策。

“查身分證！”杜奎高聲說。

這伙人全都一楞。那個留分頭的家伙，很不耐煩地

說：“剛才查過了，怎麼又查？”

“這你不用管，快拿出來！”杜奎几乎是命令。

這伙人只得又一個一個慢吞吞地拿出了身分證。杜奎逐一看了看說：“這不中，要檢查你們身上！”這時，他已經走近那個留八字胡的家伙了。

那個“八字胡”，心知不妙，假裝解扣子，一轉身亮出了盒子槍。杜奎早有準備，眼明手快，撲了過去。“八字胡”靈活地一閃身，杜奎却撲了空。正當“八字胡”拿着槍對着杜奎要扣動扳機的一剎那間，杜奎的一只鐵手已鉗住了他拿槍的手，緊接着，用另一只手在他臉上狠狠搗了一拳。“八字胡”就軟癱了。那個留分頭的，從後面扑來，被杜奎一個後蹬，蹬翻在地。

“別動，動就開槍！”窗戶眼里忽然伸進了兩支烏油油的家伙。

“別動，動就看刀！”王鳳祥手舞大刀片子，几步跨了進去。

這一下，這四個家伙全都驚呆了。緊跟着，溫自泉手里拿着兩根粗麻繩也跨了進去。杜奎等就把他們逐一綑了起來。

正當國藩和杜奎把這四個家伙往區上押時，外屋的鍋開了，滿鍋餃子擠擠擦擦，翻來滾去。“小分頭”扁着嘴，抽搐了幾下，這回想吃也吃不成了。

趙區長自是高興，大大嘉獎了他們一番。後來查明這伙人是屬於敵唐山某特務機關領導的，來頭不小。

春天又来了，虽然是战火纷飞，但是满山的桃李仍然繁花怒放。

在一个红日初涌的早晨，国藩和杜奎如约赶到了南山沟一片茂密的林子里。一会儿，打扮得象一个大掌柜的冀东区党委苏林燕同志也赶来了。三人坐在一棵挺拔的大松树下悄悄的说到了正题。

苏林燕同志首先表扬了他们在对敌斗争中的勇敢坚决；接着又开导他们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中的作用。这时，正好满天云飞霞动，老苏意味深长地说：

“你们都看吧，头顶的白云，刚才还是一堆一堆象鱼鳞，现在呢，一条一条已拉成马尾了。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因为高空有一股狂风在吹。我们革命者就应该象这股狂风，把一切黑云浓雾都吹散。你们不要看眼下日本鬼子还这么横行霸气，其实也只不过是一小片黑云。只要我们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一起，天天拿这股狂风吹它，迟早也是要散的。”

老苏要两人谈谈意见。国藩说：“没有什么意见，听党的话，扛起扁担跟党走到天尽头就是！”杜奎说：“我也是这样。”

就在这一天，这一对出生入死的青年伙伴，庄严宣誓，由苏林燕同志代表党组织，接受他们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二

两人入了党，肩上的担子比以前重了，工作比以前也更积极了。

这时候，民兵队伍已經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党的領導下，四十里鋪、白馬峪、接官厅、大于家沟、上下汪市庄、靠山庄等相邻村庄的三十多个骨干民兵，組織成了一个游击队，杜奎担任指导員。国藩則在前些时候已当了村的办事員。为了便于隐蔽在群众当中，大家都化了名，活动也是不固定的。

隔不多久，日本鬼子在四十里鋪也安上了据点，东西两头修起崗楼，分駐着五十多个伪治安軍。村子里大烟館、賭場、酒館、窑子都开起来，烏烟瘴气，乱七八糟，簡直成了鬼的世界。

却說伪治安軍里有个叫李大个子的机枪班长，原也是穷苦农民出身，当了伪軍以后，受着习染，抽大烟、濫賭錢，不学点好。但是他也受了日本鬼子的欺負，心里也是怪憋屈的，有时几杯酒下肚，不免发泄几句不满的言辞。我們党特意挑选出来，打进敌人内部，支应敌人的維持会长十同，看在眼里，記在心里，就跟他厮混起来，越混越熟，一两个月之后，两人成了好朋友。

一天，李大个子背着机枪，踏进十同的家就喊：“大哥，真把人气炸啦，他媽的王三麻子是个什么貨，还不是

做了活烏龟，换来个小队长，这会儿倒教训起老子来，說啥思想有問題啦。我真咽不下这口气。他們要把我調到三屯營去，他媽的，調就調，老子才不怕呢！”十同一听，口中不言，先端出酒来，劝他喝几杯消消气，然后火上添油地搔了几句，想把他的火燒旺，鼓动他携枪反正。誰知这家伙却是草鸡，三杯酒下肚，气也真的消下去了，反而掉下眼泪想起媳妇来。十同只好改变主意，借故出来，找国藩和杜奎两人去商量。杜奎一听說有一挺机枪，就高兴地说：“咱们把它扛走！”国藩說：“扛走也要想个法子，这么老大的东西，显眼着呢！”十同想了想說：“我先去把他灌醉，咱们天黑再行事！”說完，返身回家，添酒加菜，一个勁儿劝李大个子喝酒。直到天黑下来，那家伙被灌得两眼血红，胡言乱语，发开了酒瘋。

十同說：“老李，在炕上躺一会儿再回去吧！”李大个子觉得天旋地轉，舌头也有点僵硬，結里結巴地嘟念，“躺一会……就躺一会！咱哥俩……算是前生有緣，今世……今世結伴……”一歪身躺在炕上，把机枪横倒，垫在枕头下面。

不大会儿，李大个子就打起了呼噜。十同摸着他的头臉說：“看你，这样垫着多不舒服。来，不够高再放个枕头。”說着，把机枪順手抽出来，另加个枕头。李大个子烂醉如泥，什么也不觉得了。

国藩和杜奎早在对面屋里等着。机枪一到手，两人就急忙用破麻布和麻绳綑扎起来，一会儿改装过了。十

同眼盯着兩人，輕声而又严肃地說：“这物件來之不易，你們一定把它送到上級手里！今晚東崗樓戒备松些，你們从东面突出去！”國藩問：“这里呢？”十同說：“这里我来对付，我有办法对付这只蠢猪！”

兩人出了門，街上已經冷冰淡水沒有什麼行人。國藩說：“咱俩拉开点，万一出了事，我頂住，你扛上机枪快跑！”杜奎說：“你前面走，可也留着神！”兩人拉开約三十步光景。这时一弯眉月挂在天边，影影绰绰，啥也看不真。村周围都是一丈多深的封鎖沟，只有崗樓下面的一条道通向村外。快到東崗樓前面，只听一个灰鬼子吆喝，“站住！口令！”

“老百姓。”國藩壯着胆大声回答。

“举手过来！”

國藩舉起了手，慢吞吞地走过去。灰鬼子正待盤問檢查，杜奎不声不响，一支箭似的迅速穿了过去。等到灰鬼子发现，端起枪吆喝时，杜奎早跑出去老远。“砰、砰”两声枪响，划破黑夜的天空，却沒有損傷杜奎的一根毫毛。

冲过了崗樓，再走出三四里地，已經是抗日人民的自由天地。杜奎放下机枪，在一个土崗上坐定，等候國藩上来。等了一个多钟头，不見一点踪影，崗樓边上手电筒乱晃，村头的狗一声接一声地乱吠。杜奎心想，“糟啦，國藩八成被捕啦！”他心头象刀割，喉头象绳勒，难受极了，轉而一想：“天塌啦，也要頂住！不管怎样，肩上的机枪也得

交到上級党手里！”想到这里，身上不觉来了力量，扛上机枪，撒开大步，连夜赶了二十多里，来到区上，还只半夜多点。赵区长几个人开会刚散，还没睡觉，一听说杜奎扛出一挺机枪，不用提多高兴了。正好咱部队上的张连长也在区上，他眉开眼笑地说：“好！好！鬼子真是越来越爽快，这回连机枪都送来啦！”区小队的李队长更是逗乐：“每回打仗，鬼子总是咯咯叫，这回咱们也给他个叫咯咯。”

赵区长听完杜奎的汇报，眉头锁起了疙瘩，他很为国藩的安全担忧。随后想到十同一定会从中周旋，国藩也一定会随机应变，事情一定会向好的一方发展，眉头才舒展开了。但是凭着多年的斗争经验，任何时候都应该做好两种准备，既想到好的一面，也要考虑到坏的一面，就对杜奎说：“你明天设法回村去，先到邻舍家打问打问，再到十同那里去探听探听，如果有什么意外，赶快突出村来报告。”

这时公鸡已叫过两遍了，眼看就要天亮，杜奎心里挂牵着国藩，他只向赵区长说了句“我走了”，就又撒开大步往回赶。

回头再说十同把机枪交给国藩和杜奎带走，挨过了一个钟头，就把李大个子轰起来说：“不好啦，刚才来了两个八路，把机枪扛走啦！”李大个子吓出了一身冷汗，酒劲儿早跑了。他张大一对血红的眼睛说：“大哥，别开玩笑啦！”十同认真地说：“谁和你开玩笑，不是我苦苦求情，你也早去见阎王爷啦。不信你看……”说着摔给他一张字

条。李大个子哆哆嗦嗦地说：“大哥，你知道我不識字。”十同就拿起来念给他听：

拿走机枪，
留你一命；
要再作恶，
决不留情！

八路軍兩歲七

李大个子听了这几句言辞，渾身筛糠似的跪在地上说：“大哥，你救救我吧，丢了枪，回去可沒命啦！”

十同放慢声調說：“咳！咱們都是脑袋挂在褲腰带上过日子，过了今天誰能料到还有明天！”說到这里，又叹了一口气：“也是咱哥俩相好一場，是禍是福我一个人担着吧。你知道今晚的口令嗎？”

李大个子急忙說：“知道，知道。”

“知道就好。”十同接下去說：“我給你找根粗木棍背上，假装是机枪，騙过崗哨，連夜开小差逃命去吧！”

李大个子不知就里，反叩头如搗蒜，千恩万謝地說：“大哥，我李某人只要逃得活命，往后一定重报你！”

就这样，李大个子趁半夜开小差跑了。

第二天清早，东岡樓里做飯的老張匆匆忙忙跑来对十同說：“坏啦，坏啦！國藩被抓住啦！”原来老張是十同的內線，他借口买菜，专意出来报告这消息的。十同听了，大吃一惊，忙問：“怎么样啦？說了啥沒有？”老張說：

“他总是那一句話：‘我媽病啦，我是連夜去請大夫的。’別的啥也沒說。這會兒還吊着呢。”十同放下心來，說：“這就好办。你先回去照看一下國藩！”

吃过早飯，十同封了五十塊銀洋，差人送給東閣樓的王三麻子。那王三麻子見錢眼紅，從國藩身上又搞不出什么口供，就做個順手“人情”，把國藩放了出來。

杜奎在村外煩等了一上午，快吃中飯時才進了村，先到西頭王三嬸家串門。三嬸象往常一樣的只是訴說苦情，沒提別的，杜奎才放了一半心。下午瞅機會去找十同，知道國藩已經被放出來，事情也已平息，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從十同家出來，故意繞了幾個彎，閃身進了國藩家門口。國藩媳妇坐在炕沿上，眼睛哭得紅桃似的，站起來迎着杜奎說：“四叔，坐吧，孩他爸身上給打得哪有一塊好肉呀！”說着，眼淚扑簌簌直掉。國藩媽身子有病，有氣無力地說：“你兄弟這回是，咳！是拣回來的一條命呀！”杜奎素性剛硬，見國藩身受重創，也不覺鼻酸掉淚。國藩傷勢雖重，神志倒是清楚，他招呼杜奎坐下說：“機槍送到了嗎？趙區長他們好吧？”杜奎說：“機槍送到啦，趙區長他們不用提多高興呀。”說着，掀開國藩蓋的被子一瞅，只見渾身上下血漬一片連一片，他又是一陣心酸，咬咬牙說：“國藩，傷在皮肉，不太要緊，我想法買點洋藥給你調治調治就好啦！”國藩說：“不要緊，他們扎我、打我、灌我、吓我，我都挨過來啦！”杜奎說：“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這個仇，咱遲早得報了它！”

杜奎这人，有話藏不住下句，有事过不得半晌。当晚，他就約了王凤祥等几个民兵，摸到东崗楼前面埋了个大地雷。埋好不久，剛好有个伪軍班长在窑子里喝了花酒，在賭場里又贏了錢，一路上哎哎唷、哎哎唷地哼着小曲回来，剛哼到“小寡妇哭五更”的第三遍时，“轰隆”一声踩响了地雷，臭骨烂肉被炸成了好几块。杜奎心头的气恨才消了点。

第二天，杜奎到遵化城去替國藩买药。回来走过靠山庄前那段沙河套子时，太阳已扭到西山顶了。猛見迎面过来一股灰溜溜的伪軍，約摸三四十人。杜奎急忙閃进玉米地里。直等伪軍从路上过去，他正想钻出来，瞥見前面有个伪軍，倒背着枪，双手提着褲子在赶路，看样子是拉屎掉了队。他朝前一望，离村头崗楼一里地內沒有人影；往后一瞅，那股伪軍已經拉开一两百步远近，心想正好机会。立时拉出手榴彈，一步从玉米地里窜出来，低声吼了一句：“站住！放下枪！”那个灰鬼子万万也沒有料到，大天白日，又在村边，忽然从地下会钻出个八路軍来，双手提褲，哪来得及使枪，叫喊又怕手榴彈立时冒烟，被杜奎的虎势豹胆嚇住，只有哆哆嗦嗦地举起手来。杜奎一把夺过枪来，背在身上，用手一指說：“向左轉走！”灰鬼子喪魂失魄，任凭杜奎摆布，乖乖地被押到区上去了。

区里把这支枪奖給杜奎。赵区长握住他的手說：“宝刀配勇士，这支枪是配跟你的，希望看到你更大的成績！”

杜奎自是高兴，急忙回村，給国藩敷了药，并把經過

情况向国藩讲述了。国藩听了，也是一番高兴，身上的伤好象好了一大半。

三

腊尽春来，轉眼又是一年。敌人屡次失败，变得更加瘋狂，更加殘暴。在艰苦的战斗中，我們的主力部队越来越坚强，民兵武装也越来越壮大，加上各个抗日根据地的互相支援，互相配合，冀东区的形势也逐渐好转。攻碉打堡，胜利消息频傳。

国藩和杜奎在富馬寨参加了一个重要會議，心头就象盘上了喜鹊窝。国藩說：“嗨，这回敲双城子，我看准是葱头大蒜连根拔啦！”杜奎說：“說的是。可就是沒咱的份，怪憋气呀！”国藩瞅着杜奎，笑了笑說：“看怎么說。楊团长不是讲得很清楚嗎，打双城子好比砸敌人的头；在四十里鋪附近打伏击，好比砍敌人的腰；咱们在接官厅后山誘敌阻援，就好比切敌人的尾，同样都是光荣任务呀！”这些道理，杜奎其实也懂得，剛才的話，只是口头說說罢了。

回到地点，杜奎馬上召集民兵进行动员：“你們都想打大仗、揍鬼子、繳好枪嗎？”大家七嘴八舌地说願意，有的还学八路軍的样子举起了拳头。杜奎揮了揮手，接下去說：“打大仗，就得象个打大仗的样子，吊儿郎当可不中。听清楚啦，后天半夜带足干粮喝够水，在南山集合。这是軍事秘密，那怕是在老婆孩子跟前，也不能露一声半

句。……注意啦，軍事行动，要絕對服从命令听指揮，不叫打，半个手榴彈也不能往出扔；喊声冲，哪怕枪林火网也要跟鬼子抗。……好啦，就这样，今天我請客……”把随身带来的一包花生米抖出来。

国藩見杜奎动员得过于简单，就又把从上級那里听来的有关当前形势的話，补充了几句。具体作战計劃，他却是只字未露。

行动的那一天来了，半夜集合。大清早，国藩和杜奎已經把三十多个民兵，在接官厅后山上埋伏停当。太阳露了头，又一步步升高。大道上可显得格外荒凉寂靜。国藩悄悄对杜奎說：“咱包司令在双城子的这出戏，想必已經唱上啦！”这一說，又引起杜奎的牢騷，他揚起两片黑眉毛說：“人家是热茶热飯，咱这是冷湯涼水，差远啦！”沒等国藩开口，他自己又嘿地笑了声，說：“花且黑头，还不一样都是唱戏，咱們的也快唱上啦！”

就在这个时候，双城子那边果然热闹上了。今天赶集的人特別多，菜担、柴担、山貨摊、杂貨摊摆得滿街都是。跟着一頂花轎也进街了，前面是旗牌鼓号，后面是笙箫吹打。迎亲送嫁的长袍馬褂，紅綢綠緞，很是排場闊气。

吹吹打打，这花轎豁閃豁閃直往伪軍駐的崗楼前走来。原来双城子有两个大崗樓，一个里驻着一中队伪軍，一个里驻着一小队日本鬼子，小队长叫池田，因为长相很象猪头，人們就叫他猪头队长。眼看花轎快到伪軍駐的崗楼前了。那伙灰鬼子可乐坏啦，一个个大背着枪，死皮

賴臉地挤上来看新娘，搶着想在新娘臉上捏一把，身上摸几下。誰知剛掀开轎帘，格格格，轎里突然扫出一梭机枪，挤在花轎周圍的灰鬼子們还未明白过来，就被扫得呼天喊地，哭爹叫娘。

机枪一响，集立刻炸了。不少人从菜筐里、从柴禾里、从貨車上一下子掀出了枪，齐向崗樓扑去。这一百多个灰鬼子来不及抵抗，被打死的打死，被繳槍的繳槍，不消半个钟头，就被消灭的干干淨淨了。另一个崗樓里的日本鬼子却有了准备，他們凭着火力强、炮楼坚，顽死抵抗。猪头队长抱起電話机，一个勁儿向駐在三屯營的老上級荒井上尉求救。

三屯營是日本鬼子的战略据点，一向駐有重兵。現时除去一个中队的日本鬼子外，还有一个伪区团。荒井上尉接到猪头队长的電話，十分恐慌，生怕中了八路軍的調虎离山計，不敢亲自出馬，慌忙派伪区团长帶領三百伪軍出援。

三屯營离接官厅后山只四五里路，伪軍的兵馬一出动，杜奎派出去的民兵哨就望到了。陣地上立刻緊張騷动起来。杜奎不住喊叫：“埋伏好，不能暴露！准备好手榴彈，沒有命令，誰也不能投！”有些民兵却好奇心盛，一会儿探出个头，一会儿伸出只手，把國藩和杜奎急得什么似的。

敌人越来越近了，五百步、四百步、三百步，最后只有一二百步远了，警戒尖兵都已晃过去，眼看着这伙灰鬼子

就到眼前，杜奎虎地立了起来，大喊声“打！”随着扔出一颗手榴弹。紧接着，几十颗手榴弹一齐飞了出去，轰隆隆一阵爆炸，灰鬼子七歪八倒，全乱了套，一个个抱脑袋掀屁股，慌慌乱乱地往回窜。

伪区团长这只凶狼，凭着这几年来和八路军作战的經驗，知道眼前只不过是一小股民兵的骚扰，正好是拣小便宜、向日本鬼子报效的好机会。他红着眼，立在马镫上，挥起盒子枪，对着往后逃跑的伪军吆喝：“站住！站住！”几个还在抱头逃跑的，被他几枪毙在当路上了。

趁着敌人混乱，杜奎喝了声“转移”，就带领民兵顺山间小路往西撤去。伪区团长搭起望远镜一看，哈哈大笑：“好！看你们这群崽子往哪儿逃！”一面指挥追击，一面命令迫击炮手瞄准开炮。

国藩和杜奎带着民兵正往西跑，猛然间，轰一声，前面不远处响了一发炮弹；大家正发愣，轰一声，后边一发炮弹又炸了。杜奎当即喊了声：“疏散隐蔽，继续前进！”国藩跑过去想拉一个队员蹲倒，不想一脚踏空，轱辘碌从陡坡上滚下来，看看滚到半山腰，幸好被一棵小松树卡住了。杜奎出身冷汗，急忙抓住几棵小树溜下去，拉起国藩一看，衣服被扯烂了，身上碰伤了好几处，嘴上也血糊糊的。国藩用手指着嘴上一抹，抹下了半片上颚，还粘着四五颗牙齿。他一声没吭，就手往自己嘴上按，按住了，闭起嘴，又跟着杜奎顺山坡往前走。

民兵前面跑得快，伪军后边追得紧。赶了十多里路，

眼看快到四十里鋪了。猛然間，四山枪声齐响，杀声震天，枪弹、手榴弹猛雨般落进灰鬼子密集的队伍里。伪区团长叫声不好，知道决非小股民兵，而是中了埋伏，落入八路军的口袋阵了。他浑身发抖，立即调转马头，指挥伪军顺来路往回突圍。

杜奎带领的民兵也立时调过头来，一个个小老虎似的，跟随八路军战士拼命往下压，想尽快封严这个口袋，来一个瓮底捉鳖。民兵里有个叫小柱的，从小放羊出身，两只脚掌象牛皮一样。昨夜行军，他嫌爬山费鞋，把两只破鞋脱下来和手榴弹并排掖在腰里。今早在接官厅一打响，人家都抽出手榴弹向灰鬼子掷去，他呢，慌急慌忙却把一只破鞋扔了出去。杜奎瞪了他一眼说：“你这不是扯蛋吗？”他一瞅，也失笑了，脸红到后耳根。这会儿，他那一手放羊掷石子的本领可全有用武之地了。手榴弹一个一个地被扔出去，又远又准，在敌人群里开了花。

这一次伏击打援，围歼了一百多个伪军，缴获了大批战利品，杜奎带领的民兵，也缴获了六支步枪和不少子弹。

伪区团长带领着他那残余的亡命鬼子，狼狈逃归三屯营去了。

援军一被打退，我们的队伍立即会攻双城子，当天就把日本鬼子的岗楼拿下来了，三十多个日本鬼子全部被歼灭。

这一仗，真象在日本鬼子头上打了一闷棍。不久，四十里铺据点里的敌人也被迫退了。

枪 和 土 地

丁 羽

經過了艰苦的斗争，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鬼子終於被打敗了，隨着又打退了國民黨反動軍隊的進攻。一九四七年初，不斷傳來消息，要實行土地改革了。這裏的人民從苦海里爬出來，又將得到世代想望的土地，真是歡欣鼓舞，喜笑顏開。不幸在人們的头上又翻起了一片烏雲。

這片烏雲是以杜志為首的反革命集團翻起的。經過很是曲折複雜。

杜志的年歲和杜奎相仿，身體也是棒棒實實的。抗日戰爭快結束時，他對抗日工作也積極過一陣子，因此在一九四四年鑽進了共產黨內，不久還擔任了村支部組織委員。這人個人野心不小，總好出人頭地，干了點工作，就腳不沾地，眼睛插在頭頂上。杜奎不客氣批評了几句，他就懷恨在心。這點毛病，被村里大佛教頭子高鳳桐和富裕中農王悅看在了眼里。他們甜言蜜語，投其所好，着实給杜志灌了幾碗迷魂湯，一會兒說他象條龍，國藩和杜

奎万难相比；一会儿又說他天庭饱满，字宇方圆，是难得的福相。这样一日长二日短，杜志也就跟着大佛教厮混起来。

这大佛教是有来头的。原来抗战胜利以后，卖国贼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使下，一面调兵遣将向解放区猖狂进攻，搶夺人民胜利果实；一面派出大小魔怪，潜入解放区进行破坏活动。这些魔怪，有的装成善士，有的化成美女，暗里张开血盆大口专意吃人害人。大佛教这个反动会道門，也是許多魔怪里的一个。它直接受敌唐山軍統特务刘鴻勋指使。

大佛教又在西鋪暗里鬧騰起来，引起了国藩和杜奎的警惕，一件旧事立即在心里翻腾。

那一年，村里时疫流行，大人闹伤寒，小孩闹麻疹，人心正慌。大佛教鬧开了。什么“老母撇下大法船，不渡无缘渡有緣……亲拉亲，友拉友，苦海捞人一样般”；还有什么“化票子，秧根基，后天地位有你的。你不化，我不提，你往东来我往西；往西得道成真果，往东大海淹死你”！等等騙人的鬼話，悄悄从这个人的耳朵根，傳到那个人的耳朵根。

一天，杜奎对国藩說：“大烟鬼高凤桐家里，天天晚上有人走动，准不干好事。咱们今晚去鬧个水落石出。”国藩說：“好！”那晚，杜奎果然带了几个民兵去查夜。

更深人靜以后，月色明光鋒亮。杜奎先在墙外侧耳一听，隐隐有小鼓和木魚的声音传出；爬上墙头往里一

瞧，只見有个老道正身披法衣，手舞法劍，一面胡言亂語，一面和一批道徒跪在当地叩头求告。被哄騙來的群眾，也就跟着叩起頭來。老道站起來裝腔作勢又舞了一陣子劍，然後開言道：“我盤古普渡眾生，善解眾難；入我道，买我盤，超升云端；入我道，挂我盤，血災可免……”

接着高風桐站出來，又裝神又扮鬼地說开了價錢：“買一個盤是九十九元錢，超升天界；買半個盤是五十塊錢，站在半云層。買了盤就是入了道，可以有福同享，有馬同騎。一時買不了盤，也可以先化五塊錢挂個名，能暫免一死……”

老道這麼一吓一哄，有的人也真願上當。民兵小柱的娘，那晚也去了。她是連買咸鹽的錢都沒有的，但又生怕自己的獨根苦苗遭災，就央求說：“我眼下一個錢也沒有，欠一欠中不中？”高風桐厲聲說：“死老婆子，這是什麼地方？你竟敢胡扯蛋！敬神，敬神，只有心敬才能感神。神靈的錢也能欠嗎？”這一說小柱的娘急的沒法。

高風桐不再理會她了，拿出一只小口袋來開始收錢。眼看收了三五個盤。杜奎怕再不下手要晚了，趕緊下來和候着的民兵悄悄說了幾句，就把人分成兩撥，一撥到前門叫門，一撥到後門堵口。

猛听得大門上敲得“砰砰”响，“查夜、查夜”的喊声震耳朵。這群黑夜老鼠，立即象聽見貓叫一樣，惊炸了。那個法力無邊的老道，更是惊恐，慌慌忙忙的脫法衣，拆坛場。王悅顫着聲說：“別亂，打后門走！”吱呀一声拉开門

領先想溜。

“站住！”杜奎說，“你們干啥？老實說吧！”

“我們串個門，大家拉拉也不行？”王悅詭辯。

“串門擺坛場干啥？”杜奎隨着又指那個老道士問，“這是誰？”

自称能入地升天的老道，这时却定住身一样站在当地，結里結巴話也說不出口，哆哆嗦嗦腿也打顫。

“他是我的朋友，姓徐，从遷西來收柴賬的。”高鳳桐代答。

“收柴賬還用戴道士帽，穿道士靴？”杜奎迫得很緊。

原来徐老道一時心慌，只脫了法衣，却忘了脫道帽道靴。馬腳一露，高鳳桐再想狡辯也沒了言詞，手里還拎着口袋，只是发毛。杜奎一把奪過口袋，倒出鈔票，大喝了一句：“這是干啥！”

賊證具在，高鳳桐不得不說出實話。剛才買了“盤”的人，也后悔不迭，把錢都拿了回去。杜奎瞪着眼教育老道和高鳳桐說：“下一回再這樣裝神弄鬼，哄騙錢財，要處理你們！”從這回以後，這批人果然老實一些。

如今連杜志也迷住了，兩人怎不着急！開始，兩人還想找杜志好好談一談，要他趕緊回头。誰知話不投機半句多，杜志這家伙惡聲粗氣地說：“你們管得這樣寬干什么？是紅是黑，我自己清楚！”

杜奎氣得八丈高。國藩說：“咱們說不了他，找領導去。”當時還未建鄉，直接歸區領導，兩人就一五一十把情

况汇报了。杜志因此吃了一頓批評，对国藩和杜奎怀恨更深了。

一天，杜奎侦察到，杜志赶了一挂車送一个老道模样的人物上唐山了。那人鹰勾鼻子，老鼠眼睛，象哪儿见过似的。他心里一捉摸，一点不錯，就是那次在高风桐家打过交手的徐老道。这个魔鬼每次来都把村子里闹得乌烟瘴气，如今杜志亲自送他上唐山，还有不搞什么阴谋的？

杜志一回家，国藩和杜奎就去找他。杜奎把火气压了又压地問：“杜志，你車上坐的什么人？”

“問这干啥？是我迂西的表舅子！”

“不对吧，我认得这个人！”

“认得又怎的，大天白日走步路你都要管嗎？”杜志說着挽袖捋臂耍起蛮来。

杜奎当然不吃这一套，也跟着拉开架势。国藩一看，这样硬干不大妥当，大家都是党员，在党内会上总能弄得清楚，就劝說：“杜志，咱们自己人得說老实話。你今天的态度就不对，仔細想想，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把党的恩情全撇在脑脖后！”

两人憋着一肚子气离开了。他們全都沒有想到，杜志这时已經不是什么共产党员，而是叛党投敌的唐山飞驥队特务了。那徐老道当然不单是什么老道，他上次秘密来，已和杜志挂上鉤，杜志已供給了一些情报。这次又来，就是給杜志送来唐山特务組織发的二担多大米錢的奖金，并且鼓动他亲自去唐山接头。杜志这个无耻的叛

徒，尝到了“甜头”，心早黑了，这次去唐山，就把我八路軍堅壁在松朋營一帶的三屋子軍裝和別的軍需品，全報告給敵人。这些东西，后来全部損失，杜志却因此又得到了四担多大米錢的獎金。

从这回以后，村里的情況越來越複雜混亂了。一股妖風邪氣。謠言傳得很多，什么“三月三，黑羅劫，狼哭鬼叫，天旋地塌，七七四十九天不見日头月亮”；什么“月兒戴草帽，南山穿灰袍，三月兵馬亂，五月血災到”；又說什么“門口挂桃符，炕頭插柳枝，腋下吊紅布，可以逢凶化吉”。當時村里的支部書記是吳鳳孝，這人粘粘糊糊，立場不够穩。謠言一多，他已經六神無主，有時自己也迷神信鬼，炕頭插起柳枝，腋下吊起紅布來。國藩和杜奎對他提過幾次意見，他都躲躲閃閃不作明確答復。每次開黨的會議，都是一上來就吵架，杜志等人的氣焰越來越囂張了。

剛好這時候，外地工作迫切需要人，領導上把國藩和杜奎調離了本村。這一來，杜志等人就竊取掌握了村里的大權。

二

杜志上任不久，鄰近有些村莊已經進行土地改革了。這個叛徒和他的小集團，故意轉移目標，把鬥爭矛頭集中到國藩和杜奎身上。他們抓住國藩和杜奎在複雜艱苦的

抗日战争时期，有些工作做得比較粗糙生硬的缺点，任意加以夸大。一会儿說他們耽誤了多少多少工作，一会儿說他們貪污了多少多少公款。真凭实据却拿不出一件。为了进一步愚弄群众，欺騙上級，他們还以大佛教道徒为骨干，煽动村里群众，联名到县里去告状。群众不願意去，他們就威胁說：“不去就是‘擋路石’，要罰六十斤小米！”歪風邪氣，籠罩全村，渣渣滓滓全飄上来了。

看到这种情形，过去在党领导下战斗过来的穷苦农民，怎能不气憤呢！不少正直的人出来抱不平。戴寬借着赶集，有好几次偷偷把村里的消息报告給国藩和杜奎。杜志知道了这件事，咬咬牙說：“这是老干部的‘電綫杆子’，非砍掉不可！”就叫人把戴寬捆起来，着实揍了一頓。戴寬却昂起头說：“揍吧，舌头长在我口里，說不說是我的权利。我知道你这小子就是不存好心！”溫自奎气得罵街，杜志当晚找上門去說：“你不要这样不識时，土地还没到手呢！再不老实些，有你的苦吃！”溫自奎却是硬气，拍拍胸脯說：“你爱怎么的就怎么的好啦！我不怕！你淨干亏心事，就不看看人家沒有功劳，也有苦劳嘛！”

不久，来了一个工作組，帮助土地改革工作。

杜志等人开始心惊肉跳坐臥不宁。但是沒有几天，高凤桐就得意忘形地对杜志說：“不怕，咱們說啥，他們信啥。訪貧問苦，訪來問去跑不了是咱們手下的一伙人，还能不給国藩和杜奎小鞋穿！”杜志听了，和他們一伙人秘密商議，要假意表現积极，騙取工作組的信任。杜志又找

个机会，向工作组何组长说：“国藩和杜奎是拦路大石头，不搬他两人，群众不答应！”何组长却给杜志碰个钉子：“咱们当前的任务是斗争地主，不是打击老干部。”

在工作组帮助下，斗地主分土地的热潮，逐渐掀起来了。贫农团成立起来了，团长是杜恩，人民法庭的法官是王荣和杜风。逃往遵化的王家地主王维藩、王维田举家被押了回来。（贼六子和王维平、王维清再次潜逃，不知下落，留待以后算账。）过去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改善群众生活，党在这里领导群众，进行过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斗争，地主阶级的威风已不比过去，现在一回忆诉苦，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象枯草坡上投进烈火，顷刻烧红了半边天。他们一方面划分成分分土地，一方面开庭审判斗争两个地主。

这一天，审判大会开始了。

台上面坐着贫农团的委员们，一个个昂头挺胸，扬眉吐气。下面立着地主王维藩和王维田，头低垂着贴到胸脯。广场上坐着黑压压的群众，有的擦拳磨掌，有的铁绷着脸，有的在小声议论：

“两条腿的数野鸡，四条腿的数狐狸，黑心地主要数贼六子最狡猾了。可惜让他漏了网！”

“不怕，加把劲打垮‘刮民党’，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天下。‘狐狸’‘野鸡’还不是一样手到擒来！”

“狗生狗子，狼养狼崽，这两个家伙不要看他眼下装出一副可怜相，先前也一样虎口狼牙哪！”

只听啪的一声，法官王荣击起了醒堂木。一说诉苦开始，受害人一个一个跳上台去。王家大院几代的剥削账是算不清的。有的诉说自己早先如何借了王家几十块钱，高利盘剥，总也还不清，后来几亩坡地被霸去，两间破草房又给抢去，逼得妻离子散。有的诉说自己的老爹如何给王家扛了半辈子长活，后来生了病，就被逼从长工房里赶出来，风雪天在半路上活活给冻死了。也有的妻子哭喊着要为丈夫报仇，儿女嘶喊着要为父母伸冤。口号声喊得象打雷一样。

王维藩和王维田象两只落入阱里的狼，缩成一团。

又是啪的一声，法官王荣又击起了醒堂木。他要王维藩和王维田低头认罪，交出土地和剥削财。

王维藩叩头如捣蒜，连称：“有罪，有罪！”

王维田翻起死鱼眼睛，连叫：“宽恕，宽恕！”

但是他们却一点也不认赔剥削账，一个说：“在遵化已经化得净光，哪里还有分文！”一个说：“做生意亏本很大，只有一屁股的债！”

“不老实，吊起来！”“打死这俩狗日的！”群众的吼声山摇地动。

在群众的威力下，王维藩和王维田不得不抖抖索索，说出了几个埋藏剥削财的地点。

开过会，大家就分头去挖掘。有好几处却是空的，只挖到两处，共银洋四十元，衣服一缸。

正当大家准备乘胜追击的当儿，杜志他们却暗里放

出冷冰冰的話語：“這簡直是‘干炸’，人家早已傾家遷移，在本村還哪有浮財！”

老貧農王榮早先要過飯，受盡地主剝削，對地主階級的仇恨很深。但他一向又好打小算盤。聽到“干炸”的謠言，心里一合計，可不是，四十元錢和一缸衣服，全村貧苦戶均摊，每戶一块錢半个袖子都攤不上，有多大油水！他首先就消極了，貧農團其他成員有的也都不上勁了。跟地主的鬥爭就这样半生不熟，不了了之。分配土地倒進行得比較迅速，每人平均分了一亩多地。

乘這機會，杜志他們又傳出了這樣的老話：“國藩和杜奎是擋路大石头，非搬掉不可！”有時工作組的同志從街上走過，那一撮人還故意哄哄鬧鬧，交頭接耳。他們想盡各種辦法，包圍蒙蔽工作組。工作組何組長誤以為這是群眾對國藩和杜奎有意見，應該當面對質，分清是非。

老何一發話，杜志抓住雞毛當令箭，急急忙忙布置了打击國藩和杜奎的準備工作。

國藩和杜奎還以為是工作調動，高高兴興地回到村來。誰知前腳剛進門，後腳就被杜志派來的一伙人圍上了。他們吵吵嚷嚷要國藩和杜奎出來說話。國藩和杜奎認為自己身正不怕影斜，就大大方方地走出來。誰知這伙人動手就捆。杜奎一看勢頭不对，喝了聲：“你們干什么？”隨着就拉開了架勢。杜奎的力氣是有名的，那伙人不覺後退几步。但畢竟雙拳難敵四手，終被捆走了。

這天晚上，杜志的小集團開起了秘密會議。他的左

右丞相高凤桐和王悦坐在两边。按照杜志的打算，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两人弄死算了，但他知道关系重大，不願自己开这个口，他的左右丞相呢，也是各怀鬼胎，都想撇鬼上吊，吊起不管。于是你推给我，我推给你，推来推去，不得結果。最后大烟鬼高凤桐想出了个借刀杀人的絕招。他說：“工作組對貧农团的話是怎說怎听，明天咱們要貧农团的法庭开庭审判。会上，咱們把国藩和杜奎的打人、貪污等罪状全往外端。国藩和杜奎一定要辯。一辯两下就会鬧。一鬧，咱們的人就上前撲。拣致命的地方来两下，即使当时不死，也活不过三日五日去。人多势众，誰能知道是哪个下的手……”“哈哈哈”，他自己先得意地笑了。

“哈哈哈”，三头狼同时都笑了。

杜志当晚就去找人民法庭的法官王荣，先是大叔长大叔短地捧了一頓，接着告訴他打算明天开庭审判国藩和杜奎，要他主持。王荣一向十分精明，尽管有时为自己打点小算盘，但他对国藩和杜奎的为人是了解的。要审判国藩和杜奎，他心里自然不願意。当着杜志的面，假意应允；杜志一走，他就掂斤掂两的思摸，万一鬧出事来，你杜志倒是沒事人，我王荣可先把脖子放在刀刃上呢！第二天，他就哼哼唧唧躺在炕上装起病来。法官一病，这个庭自然开不成了。

国藩和杜奎被关的那間小屋，窗上都釘上了铁条，十足象个囚籠。一天早晨，当几絲阳光从窗縫中漏出来时，

杜奎又气愤地罵道：“媽的，这是些啥貨色！捆我們就這麼緊，手腳都給捆麻了。立場，還有屁的立場？”一会儿又悄悄对国藩說：“我想好了一條道。前几天进来时，我瞧見外屋的架子上有把鎊菜刀。你只要能把我腿上的绳子弄得松些，我就能摸出去把它搞到手。咱們割斷绳子，冲出去和他們拚了算啦。”国藩想了想說：“不好，不好，眼下不单是他們几个人的問題，不少群众也受他們蒙騙被他們唬住了。硬拚不是好主意。”杜奎說：“那就听你的，可是要快想法儿，這批家伙早晚会下毒手的。”国藩說：“這樣的事情，上級怎能不管！再說村里还有工作組，諒他們也不敢行凶下毒手。早晚真相总会大白的，你我要緊的是挺住！”杜奎才沒話了。

果然，沒过两天，杜志这个小集团还在密商毒害国藩和杜奎的办法时，县委派民运部曹部长到西鋪來了。

曹部长到村以后，正和何組長說着話，忽然外面吵吵嚷嚷进来一批人。有的嘴裡不干不淨，直罵国藩和杜奎；有的更是要蛮，喊叫槍毙，枪毙……。

曹部长实在惊讶，但他还是鎮靜地問：“你們都具体說說，国藩和杜奎究竟有些啥罪狀？”

这批人是大烟鬼高凤桐临时支使来的。里面尽是大佛教道徒和流氓无賴，哪有什么头脑。經曹部长一問，便問住了。

一个道徒硬着头皮說：“国藩和杜奎打日本鬼子时，派担架什么的，常好瞪眼，要是不去，他們还要打人，这不

是欺負人嗎！”

另一个道徒怯懦地补充：“还有派公粮征軍鞋什么的，咱村总比別村多，这不是存心吃里扒外嗎？”

曹部长拿起笔来，一宗一宗地記下了，接着又严肃地問：“还有别的罪狀嗎？”

杜志在旁又急又气，只是干瞪眼，象这样說下去，不是自己反告了自己的狀嗎？可一时又想不出办法制止。又一个道徒，更不知好歹地补充了句：“还有，打日本鬼子时，王国藩和杜奎常在村头村尾埋地雷，这不是有意糟害人嗎？”

曹部长听到这里，一拍桌子說：“就凭这样的所謂罪狀，要捆人、押人、枪毙人嗎？真是岂有此理！陷害人！”

这一下，杜志傻眼了。他所驅使的这批笨蛋，搬起石头倒砸了自己的脚。

“人先放出来再說！”曹部长命令道。

請願的道徒，一看气势不对，一个个溜了。

杜志只好把国藩和杜奎放了出来。

第二天，在曹部长主持下，党内开了一个會議。这时杜志的真面目还没有暴露，领导上还认为这是干部内部的糾紛，对他严重的違法亂紀、两面三刀的反革命罪行也就認識不够。会上除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評以外，还给了他一个警告处分。另外，也批評了村支部的軟弱和缺乏原則性。

三

轉眼到了一九四八年五月初。國藩和杜奎不在村里，工作組也早已离开了，杜志这些坏家伙为所欲为，村里的黑云盖得更严了。謠言怪語就象成群的黑老鴟，天天張开翅膀飞东飞西。地主、富农、流氓、大烟鬼、大佛教头子等等社会渣滓，全飘了起来，有的还串門上戶，来回走动。这时，國藩和杜奎正回家来，看到这种情形，心象刀絞一样痛。两人在一起談論，杜奎說：“怎么有些人都上南山沟去，你也拣粪他也拣粪，五黃六月丢下地里活計，去拣几个驴粪蛋干啥？这些王八蛋一定在南山沟搞啥鬼勾当！”國藩沉痛地說：“我也在这样想。咱们前些日子消极了是不对的。村里的事情党员不管，誰管？咱们入党时，不是表示过願意扛起扁担跟党走到天尽头嗎？現在中途放下，算啥名堂，还是要干！”杜奎說：“你这话算是說到我心里啦，咱们明天也上南山沟！”

第二天，趁着清晨雾气，两人借着砍柴也上南山了。这里每一块岩石，杜奎都是踢蹬惯了的。两人拣了个合适的林子，一面砍柴一面留心了望。約摸七八点钟，見一个人探头探脑上来了，看样子象是屈富。等到走近了，伏在路边的杜奎一下站起来，迎上去說：“屈富，你上山干啥？”屈富心虛胆怯地說：“我，我找个人！不，我，我也想砍点柴！”杜奎連嗯吞都不让他打一个，立即追紧問道：

“砍柴为什么不带扁担、绳子、镰刀？嘿，你还当我不知道嗎？走，咱们到林子里說話！”屈富想反抗，但一看杜奎手里那把白亮亮的镰刀，手脚早軟了，只好听从着走进林子里。

屈富原是个被騙入了大佛教的胆小人，經過国藩和杜奎說理教育，对他做了好一阵工作，他才抖抖索索說开了实話。

原来前些日子，由杜志主持开了个圆桌會議，共十八个人，阴谋参加大佛教头子張作春、徐老道等人策划的暴动。日期定在五月十五。看西南方火起，就是訊号。說是有佛爷保佑，刀枪不入。先杀老干部，再杀无用的老头、小孩。这会儿打仗用的鈞連枪，包头的黃布，跑路的双臉鞋都已經分头准备好了。

国藩和杜奎又問他哪十八个人，屈富也一个一个說出来，并且說：“这个头，当然是杜志。但他不願挂这个名，就用張紙在中間画上太极图，四周分成十八小格，每格填上一个人名字，这样誰都是头，誰也都不是头了，这就是圆桌會議！現在他們正在三道沟子开会哩，我是被派出来放哨的……”

国藩和杜奎見他都坦白了，就安慰他說：“你回去啥都別說，还象往常一样。你的問題，我們将来一定帮你解决。”

屈富走后，两人飞快下山，把这个情况向区里报告了。区里又连忙向县上报告。县里已經接到好几次类似

的報告，就立即通知公安部队，加強調查工作，积极准备扑灭这次叛乱。

誰知这批特务匪徒嗅到了我人民群众和政府的警觉，突然提前两天，于五月十三日半夜发动了叛乱。叛乱的中心在离四十里鋪約十二三里的高各庄。

自称“皇上”的匪首張作春穿起了龙袍，“娘娘”宋金賢象核桃皮一样的老臉上填滿了鉛粉，两个特大的金耳环晃晃悠悠。軍师徐老道开始念咒作法。小屋里烛光搖曳，一片阴森。

紅筆先生捧上了“生死簿”，上面开列的是积极工作的干部和貧农团負責人的名单。这伙妄想地主阶级重新复辟的匪徒，把他們的刻骨仇恨，全倾泻在这張名单上了。“皇上”用鸡爪一样的手指，拿起“御笔”重重的在上面勾了一紅道，算是“宣判”。随着，軍师的老鼠眼睛里，立即射出了吃人的凶光：“杀！杀‘恶人’就是‘行善’，我老祖法力无边，凡善男信女，刀枪不入。子时‘起义’，寅时祭旗，天明总攻……”

下面跪着的一批腰纏黃布，脚穿双臉鞋的道徒骨干，連連叩头称是。

随着嘩的一声，这伙匪徒手执鋼刀、鋤刀、鈎連槍，窜出小屋，紛紛向指定的对象圍攻去了。

那一天黎明，西南方忽然冲天火起。杜志这个无耻的叛徒，立刻心情緊張起来。他是又高兴又混乱。高兴的是他們的人动手了，要是和反扑到石門的国民党军队

一会合，天不是马上就变了嗎？混乱的是叛乱忽然提前，自己又沒有接到通知，一定发生了什么特別的事故。村子里这几天忽然出現了陌生的面孔，象在背后探索自己的行动；国藩和杜奎又突然双双外出，弄不清什么原因。这样反过来复过去一考慮，他觉得还是不过早暴露的好。他一面派人飞快去打探，一面秘密召集他的小集团會議。誰知在这样紧要关头，他那左右丞相的方寸也乱了，一会儿說下手好，一会儿又說不下手好。正在迟疑不决，打探的人回來了。他唾沫四溅地讲述叛乱的情况：

“嘿，咱們的人下手了。今早五更天捆来高各庄貧农团主任两口子，那女的还是妇女主任，在山沟里一块儿砍了祭的旗。現在房子都燒了二三百間，人也砍了二三百口了。他媽的，有些人硬是不怕死，不願跟咱們走。有个妇女抱着小孩象豹子般向咱們撞來。咱們立即在她身上撻了七八个血窟窿，夺过小孩，你一条腿我一条腿，一扯成了两半……哈哈哈，人家說咱們杀人眼紅，成了紅眼队了。哈哈哈……”这个无耻的家伙，把他們殘暴的血腥屠杀，当作一件有趣的新聞来描写。

这一下，大烟鬼高凤桐勁头上来了，他主張馬上动手；王悅可还有点三心两意。杜志呢，眉头鎖起疙瘩，他是在考慮：国藩和杜奎已經跑了，杀了旁的人有点不解气，再說，万一鬧不成，那就……三个人商量来商量去还是商量不出个結果。

那边，这伙叛乱的匪徒，燒毀了高各庄、大安乐庄等

大小十多个村子后，威胁着一批落后的群众，向西北方向疾进，企图绕道奔袭遵化。在牛家岭，遭到了我人民解放军某连的狙击。

开始时，我军还只是朝天开枪，配合喊话，要这伙匪徒迷途知返。谁知这样一来，反给阴险毒辣的徐老道钻了空子，满以为他那老祖的法力真个能避枪御弹，就嗾使一批反动骨干不要命的向我军扑来。三五个正在喊话的战士全被砍翻。不得已，我军只得开枪正面射击，匪徒们才纷纷应声倒地。双方就在牛家岭对峙起来。这时，邻近各村的民兵，也都纷纷奉命参战，迅速把这伙匪徒团团围住。

匪徒们占据了五道庙，还想图作最后挣扎。“皇上”的龙袍已扯得七零八碎，“娘娘”的粉脸已塗满硝烟，金耳环蔽蔽颤抖；大臣们个个丧魂落魄。只有军师徐老道再次披头散发，拈香念咒，要手下一批残余的骨干上前卖命。

快中午时，杜志派去打探的人又回来了。这回，一进门头搭拉着，十分沮丧：

“坏了，坏了，咱们完蛋了，在牛家岭被解放军包围住，机枪象爆豆子一样。上去一对，倒下一双。他妈的，什么刀枪不入，佛爷保佑，全是骗人的鬼话。徐老道已经上吊呜呼了，‘皇上’、‘娘娘’、‘大臣’，全都被俘了。他妈的，我可不上这个当了……”

这个消息就像一声闷雷，打得魔鬼们赶紧又披上画皮。王锐跳下炕穿起鞋就想溜；高凤桐瞪起死鱼眼睛失

去了主意。杜志惊惶失措地说：“赶快把准备好的刀枪、黄布这些东西埋藏起来，谁也不准暴露，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准暴露！大家快回去！”

杜志等自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瞒过人民和政府的眼睛。他们又打错了主意。国藩和杜奎协同公安人员早已把这伙人的一举一动都调查清了。经过研究，隔了几天，终于依法把杜志和高凤桐两人逮捕，而且毫不费力地从他们家里抄出了埋藏的钢刀和黄布等东西。赃证俱在，再无话说，杜志等不得不低下头来。

后来，从这次叛乱匪首之一徐老道的案子里，终于查出了杜志的老根——老牌的敌飞驑队派遣特务。

处决了这次叛乱匪首张作春、宋金贤、娄满义、王万宗等七人以后，经过上级批准，杜志这个无耻的叛徒，也被押回四十里铺，经过公审，当众枪决了。

头顶的乌云终于驱散了，路上的绊脚石终于踢开了。四十里铺的人民终于擦亮了眼睛，分清了谁是谁非，在党的领导下重新迈上康庄大道。国藩和杜奎再次担任了村里的干部。国藩是村长，杜奎是治保主任。

三条驴腿

陈青山

一九五二年，四十里鋪一帶雨水調順，岁丰年收。

秋收后的一天傍晚，王国藩和杜奎等正在村西头閑談，貧农王林走过來說：“你們都听说了嗎，咱区在东小寨和王老庄办的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年鬧了个大丰收，比咱庄的互助組可强多啦。”

王林这一嚷嚷，立即引来了一堆人。大家紛紛議論农业社的长短。說长的认为既然人家办好了，咱们要办，也一定能办好，人多力量大嘛。說短的认为亲兄弟还闹分家呐，这許多人合在一起，哪有个好。

国藩和杜奎两人悄悄地念叨。杜奎說：“依我看，这是一条正道。土改才三四年，咱村不少人家卖地出屋，挡都挡不住。新发戶却买地造房，胃口越来越大。你沒听白馬峪几家富裕戶說：‘再过几年，把四十里鋪那些穷小子的炕头也要买过来！’口气多大！多气人！看来只有大家把土地合在一起，集体劳动，互濟互助，才能一块儿走富裕的路。”国藩說：“农业社比互助組强，这是肯定的。

区委在一次讲话里明明白白地说过，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当前的互助合作运动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临时互助组，一种是常年互助组，还有一种是合作社。就像爬阶梯一样，一步比一步高，一级比一级好。”

杜奎立忙说：“那咱们为什么不爬得高些呢？”

国藩说：“嘿，事情没那么容易。东小寨和王老庄试办的结果虽也证明这一点，但拿咱村来说，能一下办得起来吗？”

杜奎说：“这不是明摆的嘛，咱村有些互助组只挂个空名，闲的时候互助，忙的时候倒单干；就是好点的互助组，问题也不少，齐工找米，找来找去，还不是有驴工牛工的人占便宜，穷苦人照样没办法吗？现在群众既然也有这样的要求，为什么办不起来？”

国藩说：“好，那咱们和支部书记吴凤孝说说，召开个党员会研究研究看怎么样？”

在党会上，国藩和杜奎把意见一谈，大家举手都赞成，而且当场表示愿意参加。会后又串连了十多户群众，共二十七八户，写了申请书，推定国藩和杜奎到区里去联系。

区里考虑到农业社还在试办阶段，经验不够丰富，开始时不大同意。后来看到国藩和杜奎等决心大，劲头足，也就批准了。

国藩高高兴兴地拿了批准书回到村里。当晚又召开了党员会。可是一上来却是个冷场，悶了约有半顿饭的

工夫，也不見有人开头。杜奎又启发了一次，溫化之才开口說：

“一个共产党员嘛，任何工作都应当带头，办社当然更應該做群众的模范。不过要讲家庭願意呀，我办不到。我那个老婆算沒治，我說了半天，她也沒吐活口。只好等一年再說。唉！这有啥法哩！”

大伙一看他打了退堂鼓，立刻把目光轉到国藩和杜奎身上，看他俩怎样办。国藩自然感到很惊讶，但他当时沒表示态度；杜奎可沉不住气了：

“你不是說家庭沒問題了吗？怎么这阵又这样說？一个共产党员干工作还得全依老婆，她認識不清，你可以帮助她嘛，难道……”

“可她死活不干，我也不能总生气呀，”老溫分辯說，“再說这入社也不是非一个日子不可，我等一年还不中嗎？”

他俩这一頂嘴不要緊，討論的問題却因此都僵住了。接着好几个人发言，也都是吞吞吐吐，搖擺不定。国藩見这样情形，就暗示支书吳鳳孝掌握一下会場，吳鳳孝哼了一声說：

“既然溫化之提出家庭不願意，我看咱們都回家商量商量可以不？”

他这一說，有的人果然拍拍屁股就要走了。

国藩一看他这样主持會議，心里凉了半截，又沒有旁的办法，只好让大家散了。

屋里只剩下国藩杜奎他俩。国藩虽然心里不痛快，但没表露出来，杜奎却脸朝北墙直生闷气。国藩拿出从县委拿来的那张办社批准书，“啪”一下放在炕上说：

“这回完了，闹了个猫咬尿泡——空欢喜，大家都不入社，我只好把这批准书再送回去啦。”

“怎么？”杜奎急转身上，“送回去？不能！上级批准啦，谁爱入不入，都不入光咱俩也得办社。”

“好，我当主任你当社员。”国藩逗了他一句，又说，“你总犯这爱上火的老毛病，不论啥工作，越到节骨眼上，越得沉住气。”

“真气人呀，上次会上说的很好，这阵又不算了。一个共产党员这样，人家非党员该怎么办？”

“我倒有个药方？”

“什么药方？”

“区委批准咱们办社时，赵书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再指示，合作化道路是几千年来未走过的道路，不仅有先进和落后的斗争，而且有严重的阶级斗争，一定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拿咱们这儿来说，西铺是一个情况很复杂的村子，你们办社一定要注意这两点，要坚决依靠贫雇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能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你想，这不就是药方？”

“对呀，这倒说得在理，那咱们就这么办。”

“这次群众报名的有多少户？”

“十来户哇。”

“都是誰家？”

“有王林，有王榮、王生哥倆，還有邵慶林、邵慶昌弟兄，還有……”王國藩点点头，說：

“这就看出来了，这几个不是要過飯的就是扛过长活的，是农村真正的无产阶级——貧雇农。老溫虽然是党员，又是轉业軍人，可他家經濟成分已在上升，小日子过得火紅，再加上他老婆自私心重，紧盯住王悅他們几戶的大牲口大車不放，对于入社怎么会痛快呢？吳風孝虽然过去也受过苦，是地道庄稼人，但这个‘老好人’的搖擺勁你我在杜志事件中还看得不够嗎？后来他虽然也作过沉痛的檢討，但是思想意識的彻底轉变，不是三日兩日的事。你說这些原因对不对？”

杜奎立时眉眼中閃出了笑紋，說：“对，有道理，我看咱就找这些过去要飯的和扛长活的戶。”

“对，咱就这么办，真心想入社的咱就动员，对于二心不定的人先不用拉扯他。这回我在區委会，趙書記和李書記就想到了这点，他們說：‘穷棒子嘛，有的是穷志气，要办社就非團結他們不可。’”

“对对……”杜奎极力贊成。

正在这时，党员梁近田和吳秀英脚前脚后回轉来了。

杜奎問：“你們不是走了嗎，怎又回来？”梁近田說：“我考虑过了，我是党员要坚决听党的話，入社！”吳秀英說：“我也考虑过了，我是党员，丈夫还在朝鮮打美國鬼子，我听党的話，入社！”

國藩說：“好、好！來！咱們就一起來研究一下怎麼辦社的事。”

二

四人分頭進行了幾天工作。已經串連了二十來戶入社的人，才知道這次風波一方面固然是有些人自己動搖，另一方面也是由於王悅他們挑撥才引起的。王悅這個家伙，原來是杜志反革命集團中的一個角色，杜志、高鳳桐一被捕，他立即當眾哭哭啼啼的檢討，說自己被騙，要痛改前非。黨和人民當時看他已認了錯，同時犯罪情节也輕些，因此寬大了他。誰知經過這幾年，他並未悔改，這回糾集了一批富裕中農，在暗地里使壞。他憑着家里有幾頭好牲口，一会儿說要和這個合伙搞互助，一会儿又說要和那個合伙搞互助。這兩天正在緊拉老貧農王榮，企圖挖掉農業社的牆腳。

杜奎知道了這情況，就對國藩說：“我去找王榮，把他拉住，別讓他上當。”國藩說：“好！”杜奎因此就找到了王榮，先問：“大哥，你入社的主意拿定了嗎？”

王榮哼了一聲沒言語，杜奎又追問了幾聲，他才吞吞吐吐的說：“這……這入社么，我打算明年再說。”

杜奎立時覺得很心煩，差一點又要發火，但一想到前天黨員們研究時提出要耐心動員的話，才緩和了下口氣又問：

“你不入社，还想入互助組不？”

“互助組么，好了就入。”

“社若比互助組好呢？”

“那——就入社。”

杜奎抓住這話頭，接着說：“大哥，入社的好處你也聽過了，你說共產黨哪個政策給過你亏吃，為啥你對入社拉心拉肝的？”

王榮抬頭看了看杜奎的臉，覺得這話挺硬，低頭又沉了半袋煙的工夫，才說：“這農業社的好處我都聽了，可我就是今年不入。”

杜奎雖然性子暴，但心眼很活，他稍一考慮就提高嗓門：“告訴你，農業社比互助組有優先權，你明白不明白？”

“啥叫優先權？”

“比方說，明年假使閹了災，收成不好，政府發救濟糧的時候，就先發給農業社，剩下才是互助組，再剩下才是單干戶，這就叫做優先權。”杜奎看王榮對這個辦法很注意，便繼續說：“過去那年月咱村哪年不領救濟糧？就拿你說吧，領的還少嗎？你若是不入社……嗯，你考慮考慮吧。”

王榮這幾天對入社的宣傳聽的真不少，總沒有听進去。杜奎這個“優先權”的說法，却一下就打中了他的病根子。這救濟糧對四十里鋪村的很多人都有極深的印象。前幾年差不多每逢春冬政府都要進行救濟，只是近二年隨着互助組的發展，生產提高了，救濟才逐漸減少

了。前几次发救济粮的时候，王荣都是重点。所以他立时就七上八下的打起了主意。想想入社再想想救济粮，想想救济粮又想想入社，直想得满臉通紅，才慢吞吞地說：

“我还是——入社。”說完扭过臉狠勁的裝起烟来。

杜奎見王榮入社的心情很不自然，就又和顏悅色的解釋說：“大哥，話又說回来，入社的优先权不光是救济粮的問題，真若受了災，人們生活沒办法，不入社的政府也一样救濟。剛才我說入社的优先权主要是生产方面。比方說供銷社来了大驥大馬，或是胶皮大車，当然也先卖給农业社，因为我們农业社是集体所有，人多力量大；互助組是个人所有，就是給他大胶皮車，誰家买的起？”

王榮老汉是个很有經驗的庄稼人，他最知道大牲口好車对生产的作用，听了杜奎后尾这段解釋，入社的心情才算定了，咧着大嘴一乐，点了点头。杜奎也长出了一口气，站起来告辭走开了。他一气找到國藩，把經過情形一五一十說了，剛說完“优先权”，國藩愣了下，說：“可不能这样办呀，这叫强迫命令啊！”

“嗨！你先別急，我还有下回分解呢！”接着就又把如何解釋的話也說了。两人不由相对大笑起来。笑声剛止，黨員梁近田进来了，他先汇报了下各戶入社的情况，末了說：“我看差不多了，共二十來戶，咱就成立吧。”

國藩看了看杜奎：“怎么样，明天咱就成立？”他們三个人都同意了。

三

第二天晚上，天气很好，冰盘般的月亮悄悄的爬上了长峪山顶。国藩和杜奎等党员在街上悄声细语的商量怎样开好今晚的会。有人担心说：“别人都好办，就怕王荣不到场。”杜奎说：“咱们按门挨户找，还怕他不来？”国藩考虑了一下说：“我看这样吧，咱们就到王荣家里去开会！”

几个人都愣住了。有的说：“就他思想有问题，为啥偏到他家去开呢？”还有的说：“在他眼皮底下开会有多别扭。”国藩却笑笑说：

“若在别处开，他可能真不参加；若到他家去开，不但他到场，他们一家人都等于参加了会。使他一家人都看到大伙入社的火热劲头，不比光讲入社的大道理强得多？王悦他们正在他身上打主意，他正骑在墙头上，心往两边晃，用大伙的火热劲头把他拽过来不就妥了嗎？”

人们都表示同意，立即分头找人去了。

工夫不大，王荣的东屋里就挤了个满满腾腾。炕头那个好地方自然是妇女，老头们也按旧规坐在炕沿上。其余的人大部分蹲在地上。炕西头放着王荣他家吃饭用的桌子，桌上放盏煤油灯，灯火还没个豆粒大，被风吹的只晃悠。杜奎小心谨慎的端起灯，查看了下人数说：

“差不离到齐了，四十三个人，二十一户，开会吧。”

國藩一面答應，一面端詳開會的人們。他轉圈把大伙都仔細看过之后，又往炕头上一瞧，正和王榮老伴打了个照面。她沉着臉翻了兩眼，又把臉扭过去了。國藩故意說：“大嬸，頭次在你們家開社員會，給大伙燒點水喝好不好？”

王榮老伴皺了皺鼻子，說：“天挺黑，燈不亮，黑糊糊的沒法燒！”

國藩說：“大嬸不要忙，等把社办好，將來給你按上電燈。”

“電燈？我沒那份命！”

國藩又說：“命，隨思想走，思想好了命就好哇。”逗的滿屋人哈哈大笑起來。

大家一笑，自然就想起了王榮。杜奎用燈屋里屋外的找了找，才發現王榮在外堂屋摸黑蹲着，就說：

“大哥，你是房東，快請到屋裡。”

王榮老漢本來就有点情緒，立時沒好氣的說：“你們不知道這屋窄，還偏在這開會，真是……我在这挺好！”

杜奎也樂着說：“哎喲，大哥不用着急，等社辦好了給你蓋新房。”

“新房？我沒那份福！”

杜奎也學着剛才國藩的說法：“福，也隨着思想走，思想好了福就好。”這下惹的人們又大笑了一陣。最後還是國藩宣布開會，才算靜了下來。

國藩首先把成立農業社的大體意思講了講，接着說：

“根據上級指示的精神，辦農業社必須強調自願的原則，不但入社自願，就是看社不好，秋後還可退出，決不強迫。我們只有把社的生產搞好了，使社員的收入逐漸增加了，才能吸引廣大農民走這條道路……”說到這，他有意針對王榮的思想補了幾句：“有的人到現在還二心不定，這說明他對入社還不清楚，剛才我不說了麼，你看社不好，秋後還可以退……”

王榮在外堂屋聽屋裡講話是有些困難，但末後這句他聽真了，站起來往前挪了兩步，用肩膀撞了撞旁邊一位老人，忙問：“國藩說秋後可以出社，是真的嗎？”

這位老人只是點了點頭，沒理睬他。王林老漢一旁插嘴說：“別說秋後，就下去三年我也不出社。這些年我就窮，辦社還能辦出兩個窮來？”王榮一聽他話中帶刺，就小聲說：“我問問都不中嗎？”

國藩一聽他倆嘀咕起來，就順便讓大伙都議論議論。這一來，大家都大聲說開了。有的說這，有的說那，不過大體的意思還都是決心辦社。國藩一看有門，忙叫大伙安靜下來，說：

“咱們按過去的老辦法——喊個口號就算表決，同意不？”大伙都說同意。他於是大聲喊：“大伙對入社同意嗎？”

“同意！”聲音象打雷一樣。這樣農業社就算正式成立了。

國藩掏出筆記本叫大家報一下土地和牲口農具。這

下，又沒人吱声了，沉了半天，一位老头挤上前来，說：“这二十多家的家底不都在你俩心里裝着嗎？往本上一写不就得了吗？”

王荣生怕有的隐瞒了啥的，忙抬头說：“还是各戶報一報吧，叫大伙都听听誰有多少？”

大家采納了这个意見，就报起来了。报一分地国藩往本上記一分，一边記，一边算。报完了，国藩宣布土地总数是二百三十亩，因为各戶都沒有大农具，就开始登記牲口。进行到这項，又沒人言声了。国藩低头看了看大伙，不由一乐，自言自語地說：“唉！难怪不发言哪，哪一戶有整个牲口的！”又說：

“大伙可能认为自家的牲口少，沒法报，这不碍事，有多少，报多少嘛，大伙湊在一起，不就多了嗎？”

被他这么一說，哄的乐了一陣。接着佟春說：“我們六家伙养一头驴。”

杜春說：“我們是四家伙养的。”

范玉林說：“我們那驴股多，是八家。”

杜亮說：“我們那瘦驴是五家的。”国藩认为报完了，便放下笔，想算一下总数，剛一低头，見溫自礼一旁只撓脑袋，一想他还有驴股，忙問：“溫自礼，你不是也有驴股嗎？”

“我那驴股比別人的多，我該几分之几哩？”

“唉！你也按剛才人家那样报嘛，为啥还要来个百分比呢？”

溫自礼說：“我那驴是十二家養的，十二天該我使喚一天，這叫百分之几的股？……”

結果他還是來了個百分比。屋裡屋外嘩的大笑起來。有人一邊拍打着他，一邊說：“你真是越不識數越往賬眼上钻。”國藩拍額算了下，說：“你們五家這驴股加在一起，還不夠一個整驴，這個賬我也算不上來了。”

人們一聽，又鬨騰了一陣，幾位不愛鬧的老頭，心急的說：“你別跟溫自礼學，按咱們算驴腿的老辦法算得啦。”

國藩又算了算說：“若按驴腿……是三条多一點！”

杜奎說：“哎！多麻煩，前勾後抹，就算三条驴腿吧。”

三条驴腿，人們都覺得挺新鮮，今天都提起了精神，紛紛議論起來。只有王榮老漢，低着头，“叭嗒叭嗒”抽着烟，說：“哼，就這個社呀！還不如原先我們那互助組哩，我們那是兩頭牛兩頭驴。”

杜奎一聽，趕緊接上說：“大哥，你再那中農組里占得了啥便宜？还不是用人工換點牲口用。咱們雖然驴腿少，可是人腿不少哇。‘眾人一條心黃土變成金’，生產一樣能夠搞好。”人們覺得杜奎說得有理，王榮老漢也沒的話說了。

接着，國藩叫大家安靜下來說：“一個社要有領導，現在咱們開始選正副主任。”邵慶林和邵慶昌兩個老頭几乎同時說：“還選啥，就是國藩和杜奎兩人最合適。”

人們嘩啦一陣掌声，都同意他倆。結果是國藩的主

任，杜奎的副主任，又选了妇女副主任吳秀英。人們鼓掌欢迎，他們三人坐到了桌子跟前。热闹过后，国藩說：“主任好歹的算选出来了，按人家东小寨社的章程，还得选一名会計，希望大家象剛才那样热烈痛快的选！”

他要求痛快，結果还是不痛快。沉的时候不短了，还是一位老头先开口問：“这会計都是管啥的？啥样条件合适？”接着又有个人問：“从打日本鬼子那时候起，咱村选过沒数的干部，就是会計这个詞沒听说过。叫人咋个提法？”

国藩猛然意識到自己交代的不清，不由失笑了，就补充說：“对，对，怪我沒和大伙說明白，这会計就是专管社的賬目錢財的，大家就按这个条件提吧！”

“管賬不是叫先生么？怎么叫‘快計’？”又一个人問。

杜奎說：“你說的那是老一套，新事得按新办法，会計这是新詞。”

国藩說：“先生也好，会計也好，反正管理賬目錢財，得有文化，就按这个条件选吧！”

会計的作用，大家弄明白了，可是一听说要选个有文化的人，又把大家难坏了。这二十一戶里，誰有文化呢？每个人从小孩知事的时候起，就天天忙着卖命糊嘴，哪来的时间念书！就算有时间，又哪来的錢上学呀！大家扳过来，数过去，想了半天，也沒想出个合适的人来。

正在为难，国藩忽然提議說：“大伙看佟启怎么样？”

人們好奇怪，佟启还没有入社，怎么能当社的会計

呢？大家正惊疑不定，国藩笑着解釋說：

“我早就想到這個問題了，因此，昨天我已經同他提過了這事，今晚，因為他家裡有病人沒顧上來參加會。大家若同意的話，我們就去找他來。”

人們一聽都表示歡迎。不大会佟啟就被找來了。一進門人們先鼓了一陣掌。佟啟紅着精瘦的小臉坐在桌子對面，腼腆地說：

“我干不了，大伙還不知道我只念過兩冬半書，哪能拿起筆來了呢！”

“矮子里拔將軍，拔來拔去還不就是你！”

“干得了，念過兩冬半書，在咱們這裡還不就是個秀才！”

“行，干吧，小伙子，誰不知道你有一股鉆勁！”

大家七嘴八舌都說佟啟這行，那行。佟啟見推辭不了一，只得搬出實際困難：

“大伙光看我認幾個字不中，我不会寫洋字碼，怎麼能寫會計賬呢？”

“你都會寫啥樣字碼呀？”幾個老头問。

“那是老式蘇州碼！”佟啟啞着嘴說，“人家會計賬得橫寫，老蘇州碼可不能橫寫呀！”

杜奎着急地說：“我們三條驴腿能種地，老蘇州碼就不能寫賬？你先甭愁橫寫豎寫，反正好心不如淡墨，寫個啥樣算啥樣。”

大伙也都你一言我一語的鼓勵佟啟，直到他勉強

强的任了职，才散了。

四

社成立的第二天，他們就鼓起勁來搞生產。國藩和杜奎分頭帶領着人們上了南山坡，躉石头，擋墳基，整理梯田。隊伍拉出一長溜，村里全震動了。

北風天，陰坡排滿冰凌，干活的人們却熱得出汗。國藩正敞开短褂刨地，猛抬頭，見遠處移過來一個小黑點。

小黑點逐漸變大，走近來，原來是村里的孤兒戴存。他黃瘦黃瘦的，身上穿着一件破襟斷袖的單衣，蓬着頭，赤着腳。國藩一看見他，立刻就想起他那淒慘的遭遇。土改那年，他家分了十多畝地，和別人一樣過上了翻身喜悅的日子。誰知第二年夏天，他父親先傳染上疫病死了；隔了三個月，他母親又去世了。留下他和四個妹妹。那時節，各家各戶都是單干着，窮叔伯們誰有力量能幫助這一大群孤兒孤女過日子呢！他含着眼淚賣了地，當了房，還了舊債，埋葬了雙親；含着眼淚送大妹妹去當童養媳；含着眼淚把三個小妹妹全送了人。他自己也就成了流浪兒。這中間，國藩和杜奎他們雖然幫過不少忙，但也只能解解一時眼前之急，顧不了他長年生活。後來他流浪到遵化城里，給一家飯館里當了小堂倌。不久，主家嫌他瘦小，挑不動水，還常打碎碗盆，把他辭退了。他生活無門，又流浪回來了。

戴存走到跟前，国藩問了問他最近的情况，他骨嚙着圓眼珠問：“大叔，你們這是干啥？”

“我們剛成立了农业社，大伙一起干活儿。”

戴存迟迟疑疑地又問：“我能加入嗎？”

“我說能。可是這樣的事情得大伙討論。”

“大叔你說能就中。大伙儿一起干活就是痛快！”說着他也在一旁搬起石头来。国藩叫他歇歇，他都不听。可是干了一会儿又不見了。

休息的时候，王生坐在一棵老楊树下抽烟。只听樹上索索一陣响，飄下几根枯枝来。他一惊：今天的老鴉也怪，叼了枯枝倒送給我来了。又是索索索一陣响，忽然一大把枯枝潑头蓋臉打下来。他立即跳了起来，手搭凉篷往上瞧。眼睛不好，只模模糊糊看見一个小孩在樹上爬。“誰呀？”“我！”听声音是孤兒戴存。

“小戴，快下來吧，你這是干啥？”

“二叔！樹上有个大喜鵲窩，我把它拆下來，好生火！”

“快下來吧，這不是玩的！”厚道怕事的王生心头怦怦跳。

“不怕的，二叔，我这就下來！”說下來，其实还是不下來。这个纵慣了野性的孤兒，把脚勾在一个斜出去的樺杈上，喊了句：“二叔，你看！”忽然双手一張，整个身子就悬空倒挂起来。樺杈不太粗，上下直晃悠，身子也跟着晃悠。

“唷！”王生吓得惊叫起来，“下来，下来！……”

“不怕的！”孤儿还是不忙不慌，只見他一个轉身，象猴子般輕捷地抓住了树干，然后“哎溜”一声，从树上滑下地来。

“二叔，剛才那个倒挂叫‘金鈎挂玉’，那个哎溜，叫‘长虫脱皮’，你知道嗎？”

王生早已吓出一身冷汗，連說：“知道，知道，我知道你早晚要脱层皮。”

这时国藩走过来，听说了这件事，把戴存着实教育了一頓。可是这个孤儿，又象听又不象听，弯弯腰拣他的枯树枝去了。

中午，国藩把戴存領到自己家里吃了飯，又給他找来一件破棉衣和一双鞋，还亲自給他的鞋上釘上鞋带。

晚飯后，他就召集社員开会，討論戴存入社問題。大部分社員都同意。他們說：“咱們組織起來就是为了大家富裕，这样一个孤儿，农业社不帮助誰帮助！”也有个别社員說：“咱們穷，要过饭，可是至少还有几亩薄地呀！这个孤儿有啥呢！”有不想收留的意思。最后經過国藩和杜奎的說服，个别社員也轉变了态度，大家一致表示，穷帮穷，水帮水，一定要帮助这个孤儿成家立业。

接着，有人反映情况說：“現在村里有些人正在說咱們农业社的坏話。什么‘这群領救濟粮和寒衣的骨干凑在一起，早晚得穷散架了！’‘渾水里的泥鳅，反正变不了龙！’”

杜奎气虎虎地说：“你们不用提名，我也知道说这些话的是谁。下午我从街口过，王悦那个老狐狸故意冲我的脊背说：‘穷棒子社就是办上三年，生产要是赶上他了，他把眼珠子抠下来用脚踩个泡。’”

“他有几个眼珠子？”国藩说，“他说这些话倒不怕，就是咱们眼下困难多，需要想法一个一个地解决。只要把社办好了，这些怪话自然没有人听它了。”

散了会，几名党员留下来，一面分析情况，一面想具体办法。杜奎最后提议说：“我看咱这社在村里办不啦。”

大家被他说愣了，都不知这话是啥意思。

国藩一乐说：“难道办社还能搬到外村去打游击？”

他又把大家都说笑了。杜奎也乐着解释：“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把人们组织起来去打柴。根据过去的經驗，人们一进山就和部队一样，不但听不见村里一些闲言碎语，还能集中教育。打上个把月的柴，不但增加了收入，还能把大家的思想提高了。只要咱们思想提高了，钱也有了，他们说啥也不怕。”

大家立时兴奋的喊了几个“好”。接着又研究了动员和准备工作，第三天清晨，杜奎就领着十八名好劳力进山去了。

打柴創業

陳青山

人們上山打柴那天，正趕上刮挺硬挺硬的西北風。路旁的枯枝呼呼直擺，山上的落叶沙沙亂飛。人們的破棉衣被北風一吹，挖骨的冷，很多人捂着耳朵避着風向，里趨外趨的走着。杜奎雖然凍的拱着肩直吸冷氣，但他看大家走的這樣慢，便想：離打柴的王寺峪還有四十多里，象這樣慢磨，趕黑怎能到？再說有人正笑話我們窮棒子社，遇上他們顯得多不帶勁哪……想到這，就挺起了腰板，緊了緊行李袋子，揮手鼓動說：“大伙精神點，越快走越不冷！”又向幾個小伙子使了個眼神：“誰先到給誰熱炕頭……”說完，甩開兩條長腿，跑到了大家的最前面。

大家被他这么一鼓動，果然活躍起來了。好動的小伙子們你一言我一語的互相追趕起來。老头們被這群歡蹦亂跳的年青人一帶，也就不得不加快脚步。大家这么一鬨騰，就誰也不覺得冷了。沒走上十里路，每个人的前額上都滲出了汗珠，眉毛上和胡子上也凍結成一層厚厚的白霜，乍看好象一支老头隊。就这样，晌午剛歪，趕到了王寺峪。

他們到這裡來打柴，是杜奎通過他姐姐家聯繫好的。一進院，杜奎便宣布：“吳秀英要給大伙做飯和縫補衣服，就和我姐姐住一個屋，剩下咱們十八個男人，往四個屋分住着。”

人們因為剛才緊趕慢趕出了一身汗，乍一停下來，周身發冷，都巴不得到屋裡暖和暖和，聽杜奎一宣布，很多人抄起扁擔往外就走。王生他們幾個老头却站着不動。杜奎以為他們想就地住這個院，正想給他們去安置，王生說話了：“十八個人共四床被，住四個屋中嗎？我們這沒被的跟誰呀？”這一點被，杜奎心裏一下明白過來，歉意地笑着喊：“大家站住，回來重新分配房子。”

杜奎辦事一向周到，沒想到這回却疏忽了。二十三戶社員家里，哪家不是全家伙蓋一床被子。這四床被子，還是臨來時緊倒騰慢倒騰才倒騰出來的呢！他又笑了笑，高聲對大家說：“咱們一共四條被子，住四個屋不行，住兩個屋吧，擠着點暖和，大伙說中不中？”“中！咱們打了柴，把炕燒得熱乎乎的，還頂被子蓋呢！”大伙沒駁回都同意了。

杜奎立時分出九個人上了西院，杜奎他們九個就住在他姐姐家的西屋裡。大家把帶來的糧食集中起來，放在杜奎他們的屋裡。社副主任吳秀英當下就去做飯，杜奎等人趁這個空間去拜訪村上的干部。大家鬧騰得很晚才吃了中午飯，飯後料理了一下雜務，天就黑了。睡覺的時候，麻煩出來了。杜奎他們這屋的炕過于窄小，剛躺下

六个人就挤满了。杜奎愁的满屋乱转，端起煤油灯炕上炕下乱照，仍是无计可施。忽然他瞅见北墙上挂的捆柴绳子，不由乐了，回头说：“有办法，来，来，大家只管躺，保准睡得开！”大伙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没打问，又挨个儿往下躺，刚躺下两个人，他又大喊：“不中，得一个头东一个头西错开来躺。”

大伙嘿的一声笑了，很多人知道，这个办法并不新奇。又一顺一倒地往下躺，躺到第七个人的时候，又挤严了。人们一边嚷着不行，一边翻身就要起来。

杜奎忙叫大家稳住，他噌的一下蹿上炕来，晃着膀子挤了个空，背靠墙坐下，两脚蹬住边上的人猛劲一蹬，便蹬出个空来，扭头向没躺下的人喊：“来，来，快躺下。”这个人嘿嘿的乐着躺下了。他等大家都躺好了，再把两条被子盖好，自己才找个空儿躺下，并凑趣的问大家：“你们知道这叫啥办法吗？”

大家虽然觉得很挤，但总算安心的躺下了，也就都想说个笑话。再加杜奎这么一问，立刻都开口了。有的说这，有的说那。杜奎总说不是。最后他告诉大家：“这叫杀车！”大家哗的一声笑了起来。庄稼人谁都知道“杀车”是怎么回事，这是用车拉东西时把东西捆紧的办法。这一晚，大家就这么杀着车睡了。

第二天，杜奎很早起来，问大家冷不冷，几个老头哼了两声，说：“冷倒是不冷，就是你这‘杀车’受不了。”

杜奎问：“怎么受不了？”

老头們說：“我們不是玉黍秸在車上拉家去燒，我們還得上山打柴呀！”“我們不怕，”佟春他們几个年青人醒來說，“再給我們蹬上两个也沒關係。”

杜奎怕老头們生氣，忙把話接過來：“這個意見很好，今晚你們老年人都到西院去，那邊炕大些，我們這屋多來兩個年青體壯的中不中？”他這樣和大伙一商量，老头們也就沒意見了。當天晚上，他就把人員進行了調整，八名老头都調到西院，杜奎這院住了十名體壯不怕“殺車”的青年人。大家就這樣每晚“殺”着車睡覺。

雖然每晚挤得不行，但大家的心境很寬。每天起早進山，晚上回來，每人最少能打三挑柴，誰也不喊累。就是那些柴樹打着不順手，不是苦柳就是麻藜，枝尖刺硬，一不小心就把手扎破，沒幾天工夫，就有好多人受了傷。但大家的干勁大，不在乎。最難辦的還是衣服和鞋袜，被樹枝一挂，更不象樣了。有的棉祆上窟窿挨窟窿，有的棉褲光剩下了棉花套。鞋子本來就烂，現在更是前張嘴後開口，帮和底開始分家，套都套不住。吳秀英除了做飯，每天晚上給大家補衣縫鞋。不幾天，麻線和布頭全用光了。沒有辦法，大家只好猛勁打柴，抵抗寒冷。衣服還好說，鞋子破了，有些人的腳被樹茬碰破，扭着柴不敢快走，真是發愁。

一天，大家在山坡上休息，有個青年吞吞吐吐的說：“四叔，咱們啥時賣柴回家？”他這一提頭，好多社員都眼睜睜等待回答。這一下，杜奎為難了。他想了想，說：“咱

們臨來時不是說柴拉到家再賣嗎？現在中途改變計劃怕不好。眼前的困難還是想法克服一下吧……”

“你光說克服，克服，腳可受不了哇！”兩個青年人不滿的插了兩句。其他人看樣子也要開口。

杜奎故意瞧了瞧自己的破鞋，說：“腳往樹茬上碰，的確不好受，不過只要把牙一咬，也沒有啥大不了的事。抗日那年頭，被日本鬼子追掉鞋，光着腳丫子跑山梁還不是常事？那年頭跑都能跑，這年頭為什麼走都不能走呢！”接着，他就講起抗日鬥爭的英雄故事來了。一股革命的激情涌進了青年人的心裏，大家又鼓起勇氣，歡欢喜喜的砍起柴來。這時邵慶林正在杜奎的左面砍柴，杜奎問道：“老叔，你經驗多，縫補破鞋有旁的辦法沒有？”邵慶林說：“我也正在思謀這件事，山上葛藤到處有，依我看，用葛藤綁綁捆捆，也能對付。”杜奎聽了，滿心歡喜，繞到山溝里割下幾枝，在自己破鞋上捆綁着試了試，果然滿對勁。他於是大聲嚷起來：“喂，小伙子們，土地爺給咱們送藤鞋來啦！你們看！”說完蹣起了自己的右腳。

“好哇！”大家全哄鬧起來了。

有些人立即也去找來葛藤在自己的破鞋上捆綁起來；有些人還別出心裁的用葛藤綁棉衣、綁帽子。葛藤這時在他們的手裏，妙用無窮。

這樣又堅持了十多天，打了三十多萬斤柴，垛在沙河套上，象几座小山。王寺峪村過往的人們都驚動了，紛紛夸贊：“成立農業社，真是力量大。”

为了要和国藩商量卖柴等事，这天清早，杜奎洒开大步离开王寺峪，不到晌午就赶到了家。

他向国藩汇报了山上打柴的經過，国藩也对他談了談家里生产的情况。两人計議了一陣，最后国藩說：“柴还是就地卖掉吧，这么多要往回运实在沒有力量。社員們如果能支持得下，还是再多打几天，去一趟不容易呀！咱们眼巴巴盼着拿这一笔錢創基立业呢！补鞋的布和鞋掌，还是得想法买一点，‘藤鞋’‘草鞋’腊月寒天毕竟不中呀！社員們冻坏了不是玩的！在家里的怎么困难也好說。我这就去湊点錢，你路过三屯营順便买好带去。”

杜奎回家吃过晌午飯，就又往回趕，經過三屯营买了一些布头和鞋掌，傍黑又赶到了王寺峪。

大家都圍上来問長問短。杜奎一面說話，一面刷拉一下抖开了一包东西，里面尽是补鞋用的麻綫、布头、碎皮。

“这下可好了！”大家几乎同时舒了一口气。

“大嫂子，今晚劳駕补补我的两只‘破簸箕’！”

“兄弟媳妇，把我的也捎带上！”

吳秀英大包大攬的說：“都不用急，我今晚豁出不睡觉，也要把你們这些破玩艺儿都补上。”

尽管女主任这么积极，杜奎可知道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他就分派邵庆林等几个有經驗的老汉帮忙，拾綴了大半夜才拾綴完毕。

第二天，大家穿上修补好的鞋袜和衣服，有說有笑的

又上山了。杜奎一面跟大家一块打柴，一面抓机会张罗卖柴。这样又过了五六天。一天清早，忽然纷纷扬扬漫天飞起大雪来。村里村外变得白茫茫一片。山沟里看不见路，大片的松林都蒙上了厚厚的雪，苦柳林和麻藜丛也被雪埋上了多半截。年根岁尾，这么大雪天谁还上山呢！就连山鸟也都飞到阳坡去觅食，不再满山遍谷乱飞了。只有穷棒子社的打柴队照常进了山。他们踏着没膝盖的大雪，用镰刀撅拉着坚持又打了一天柴。第二天，雪盖得更严了，杜奎他们才决定停止打柴，收拾回家。把几笔柴账一合计，共卖了四百三十元。

王荣老汉算个人经济小账一向精明。杜奎他们还在一笔一笔加那柴钱，王荣坐在一旁，闭着眼睛，早已一笔一笔分算好了。自己估摸能分到多少钱，这笔钱该买些啥东西，到哪里去买。当杜奎把钱包起来要收藏时，他眼珠一转，思摸着把自己的那份钱先拿到手，装在自己腰包里，才更妥当。于是凑上前去，瞅了瞅杜奎说：“我眼下有急用，借点钱中不中？”

王荣这点毛病，杜奎是一清二楚的，这时见他说得这样认真，以为真的有急用，就问：“出了什么事吗？”

王荣迟迟疑疑地说：“我路过三屯营，想买点过年的東西。”

这一说，许多人沉不住气了：“老奎，钱是大伙的，抓紧呀！”

杜奎也知道不能开此先例，就顺水推舟地说：“对，我

一定把緊！誰借也不中！”

王榮眨了眨眼，不滿意地說：“錢是花的，不是拿着玩的，借點怕什麼！”

杜奎說：“你沒聽見嗎，錢是大伙兒的，若是我個人的，你借多少都中。這可不行！”王榮碰了个釘子，只好暫時收起借錢的心。

這時，邵慶林老漢也湊上來了，他說：“不回家我倒沒困難，一回家我就難住了。你們看我身上的這件破袄能進庄嗎？”

這幾天，杜奎因為忙着張羅賣柴，對社員們的衣着沒來得及注意。聽邵慶林一說，上下一打量，可不是，破棉袄的大襟都沒了，褲子上好几處露了肉。他撓了撓頭，心想：這可有啥法呢！又一看自己身上，說：“不要緊，我這個棉袄破得好些，給你，咱倆換着穿。”

“不中，這不是瞎鬧嗎？”旁邊的人都叫起來，“他穿着難看你穿着就好看嗎？你到家還要東跑西顛的，要換我們和他換。”

邵慶林見大家這樣熱情，感動得連聲推辭。杜春說：“大家都別愁了，我有法，明天上路時，把我的棉被給他圍上還不中！”

人們嘩嘩地大笑起來，都說：“這個辦法好，保險不露肉，還暖和。”“對，這和棉袍差不多……”大家正連聲說笑，幾個小伙子忙抱起被子給邵慶林老漢試裝。圍上以後，杜奎又從門外找了根綁鞋的葛藤往腰里一扎，也真象

是一件奇寬特大的新衣。人們又是一陣哄堂大笑。杜奎說：“明天到家的時候，你单独从后門進去，免得給王悅他們留下話柄。”大家又扯了一陣閒談才散。

第二天，他們就告別王寺峪的老鄉回家了。

打柴的人回家，村里全轰动了。人們紛紛議論：“人家是有志氣，一家伙从山上搞下四百多元錢，真是組織起來力量大呀！”只有王悅等少數人，原來指望打柴白闖一場，窮棒子社早日散攤的，現在見是這樣，就象當頭吃了一悶棍。王悅走出走進，搭拉着頭，又在起他更歹毒的念頭。

國藩和杜奎等人吃过飯就聚在一起商量怎麼處理這筆錢的事。

國藩說：“聽說你們要回來，我昨天到區委匯報了下情況，提出這筆錢該怎麼處理好。趙書記說：‘眼下快過年了，各戶這麼困難，按說應該分點錢。不過你們社連一個牲口一輛車都沒有，明年開春怎麼種地？還是和大家商量一下，說清楚難過的日子好過的年的道理，咬咬牙別分錢，留下買車買牲口中不中？’”

黨員吳秀英和梁近田等人說：“這個意見倒好，不過能商量妥嗎？王榮一個人就難辦。”

杜奎說：“事情沒辦，不能先往難處想。我們把道理講清楚，也許不費啥事，誰還不知道難過的日子好過的年。”

國藩想了想，說：“這樣吧，今晚咱們再到王榮家里去

开会，你們都把意見准备准备，爭取做到不分錢！”

听说这是一次分钱的会，人们来的比成立社那次还要多。把王荣家的屋门都挤得“咯吱咯吱”乱响。王荣和他老伴却一点没有烦厌的意思。他老伴还破例的搬过炕桌放在炕当中，回身又从柜里取出自己省抽的大叶子烟，又拉过她那用旧报纸糊的烟筐籠，把烟叶用手捻碎，笑面和和的让：“谁会抽烟只管拿，伸手算一份啊！”又忙着找洋火去了。

满屋子人都觉得王荣老伴今天态度特别，上次象刮西北风，这次象送东南风。大家都挤眉弄眼的互相示意。会抽烟的，也老实不客气地伸手到烟筐籠里抓烟。烟抽着了，会也开始了。厚厚的几叠钱票子，堆在炕桌上。

杜奎先把打柴的经过简单说了一遍，国藩接着就开腔：“咱们社成立一个多月了，大家都很努力。打柴的上山打了二十多天，挣回了四百三十元钱；在家生产的，也是垒墙基，起冻粪，一股劲的干。现在眼看快要过一年了……”他有意把“过年”两字拉得很长，想看看王荣等人的表情。只见王荣歪着脖，正聚精会神等着听下文。国藩却把话锋一转说：“按理这钱应该分了过个好年。可是过了年，咱们就得准备春耕，社里只有三条驴腿，车套都没有，怎么送粪种地呢！常言说‘难过的日子好过的年’，所以我想这柴钱还是不分，买个牲口买个车的……”

“你说啥，不分？”王荣等不及再听下去就插嘴，“好几

年啦，我家过年都沒吃着餃子，今年辛辛苦苦上山打柴，有了点錢还不分？因为入社还不过年？……”

“对，还是分了过年，生产明年再說……”好几个人同意王荣的意見。

会場被王荣他們一炸哄，就乱了。炕上炕下的人都站了起来，外堂屋的人往里屋涌，立刻把国藩和杜奎两人圍了个風雨不透。数不清的脑袋，伸向了放錢的桌子。国藩他俩也站起来边揮手边給大家解釋。杜奎粗中有細，一看王荣他們很多眼睛，紧盯着桌上的錢票子，而且越盯越往前湊，只差伸手搶了，他于是用手肘在国藩的脊梁上猛勁拱了一下。国藩立即就意識到了。他一把将錢票抓起来往衣袋里一装，說：“要分，今天晚上也分不成。有的勞力强有的勞力軟；有的勞力多有的勞力少；有的打柴時間长有的打柴時間短。也得討論分算一下呀！如果都照人头分劈，那合理嗎？”接着又有意將了王荣一軍，“老荣，如果你也同意照人头劈，咱們今晚就分。”

這一說，王荣怔住了。他吊着眼珠一計算，就計算出这样分对自己不利，一下站起来：“对，这笔帳是得好好算算。我家三个勞力，都强；有的家只一个勞力，还弱；怎么能平均劈呢！算清了，明晚分也一样！”

国藩和杜奎这个“緩兵之計”，作用可真不少。会后，兩人趁空又进行了研究，决定明天上午分开兩組酝酿，把贊成不分錢的骨干分插在里面进行启发和誘导。

在小組討論会上，气氛就变过来了。国藩掌握的这

個組，由於反復的解釋和黨員的帶頭，到晌午前多數人的思想就通了；杜奎掌握的那個組里，王榮幾個人還是堅持要分，討論還沒結果。下午，兩個組接着又討論。國藩這組先散，他來找杜奎交換情況，一進門，只見王榮老漢沉着臉問：“國藩，這錢假使不买牲口和車，要討論到啥時候，年前討論完了哇？”

滿屋人都被他說笑了，連國藩和杜奎也笑了。國藩說：“好，咱們晚飯後就進行表決吧，少數服从多數好啦。”

人們又到王榮那東屋開會。杜奎這回沒有和國藩坐在一起，他和幾名黨員坐在王榮跟前。國藩在炕上先介紹了兩組討論情況，接着就請大家發表意見。黨員和積極分子們先提出了不分錢的理由，不少人立時贊同。王榮他們幾個願意分錢的低着頭不吭聲。國藩見多數人同意不分錢，就說：“那么大伙說說，都买些啥呢？”

話剛開个頭，杜奎就插斷了：“先別忙，我看有的人心態不明，這樣決定了，會後還會有意見。咱們索性正規一點，舉手通過。”國藩說：“好，同意不分錢的一——舉手！”大家唰的一下，都舉起來了。杜奎連忙把燈端到王榮跟前，和藹地說：“大哥，你仔細數數，舉手的占少數的話，咱們就分錢。”

王榮老漢真的扭着臉轉圈數了數，又皺起了眉头，低声說：“真怪呀，原來有那麼多人願意分錢，怎麼一轉眼又都變了呢！”事情也真湊巧，不知哪個湊樂沒够的小伙子舉着兩手，叫他看見了。他一拍大腿說：“怪不得舉手的

人多，这里面还有假呀！”

結果又鬧了一陣哄亂，只好又舉了第二遍，王榮才服了。

這事正式決定以後，就討論买东西的問題。這回王榮第一个發言了：“我願意買車，有錢了總使扁担還中？”

邵慶林說：“我願意買牛，又能耕地又能攢糞。”

邵慶昌說：“咱們山區少不了駒，買駒比買什麼都要緊！”

佟印和戴存兩個年青人不耐煩了，齊聲說：“怎麼誰愛啥就要買啥呢！這樣的話，我們願意買羊！”

杜奎聽到這兒，也大聲說：“咱們這不是‘變戲法’，要啥來啥！統共就那麼四百三十元錢，能買這老些東西？……”

國藩怕在這些小事上又搞得翻車，忙攔阻說：“算啦，算啦，都依大伙，完了咱們再細細斟酌。”這才散會了。

第二天一早，國藩和杜奎就帶了錢到遵化去趕集。

這天午飯後，壞分子王悅又蹲在門口晒太陽。晒太陽是做個樣子，其實是招惹一批人進行挑撥。前兩天，他針對王榮老漢私心重的毛病，慫恿他“肉到口，錢到手”，弄得王榮顛三倒四一口咬定要分錢。誰知這一計失敗了。國藩和杜奎今天又去趕集買牲口買車，他心里象貓抓一樣，又惦算壞主意。剛好這時王榮也在街口露面，他招呼說：“老榮，過來抽袋烟。”王榮就湊上去了。

“這回你們社要大發了啊！”王悅假意恭維。

“发什么，八字還沒見一撇，誰知道将来是啥样！”王榮說。

“老实說，再发上三发，也还不如我們的互助組呢！”接着就把他們那个名为互助、其实单干的組的家底，大吹了一通。老王榮听得心里痒痒的，觉得穷棒子社实在太寒愴了。

瞅着老王榮二心不定的神情，王悅詭秘地說：“你估計他們今天能买回啥嗎？哼，不用想。买来买去这点錢还不是大部分买进了他們自己的……”下面“腰包”二字，是冲着王榮耳朵根說的。老王榮的心一下就跳到喉嚨眼上了。

冬天日子短，說話太阳就压山了。这时，忽然傳來了一群“哔哔”的叫声。一群小孩象風一样卷过来：“快去看呀，农业社里买了一大群羊，还有老黃牛，大黑驥哩！”王榮听了，似信非信，她脚底象抹上了油，拍拍屁股急忙往社院走去。

社院里已經圍了一大群人，二十三戶的人几乎都来了。

戴存、佟印用手挨个摸老綿羊身上的絨毛，还把自己的臉蛋，貼到老綿羊噴着热气的嘴边，簡直就想亲嘴。两个小伙子实在愛得不行，數了數，共十九只。

邵庆林几步窜到老黃牛跟前，扳开它的嘴一瞧，搖搖头說：“太老了，簡直和我的年岁差不多！”

国藩在旁笑着說：“老牛耕地有經驗嘛！”

邵庆昌也几步窜到大黑驴身旁，左瞧右瞧，摇摇头說：“怎么这样瘦，简直和我沒两样！”

杜奎也在旁笑着說：“喂得好点，明春就上膘了！”

只有王荣惊疑地站在一边，他沒有看到他心愛的車。

国藩早注意到老王荣的神情，走上前說：“老荣，我們今天跑了三个車行，都看了，不是价錢高，就是木料湿，全不合适。我們定做了一辆，要开年正月半才能去拿。”这一下，王荣才沒有話了。

其实，国藩和杜奎两人今天真是煞費了苦心。他們先买了羊，又买了驴、牛和一些杂七杂八的小农具，一点錢数，总共剩下了五十块錢。赶到車鋪里一問，大車的价錢不是一百八十元就是一百六十元，相差实在太远。后来找到后街一家車行里，看到一辆車轆有点殘了的車，标价是一百二十四元。国藩搖搖头說：“还是买不到！”杜奎說，“不怕，先定下来，开春我再带人去打几天柴，不是就有錢了，再取也不晚。”两人就这样預付了五十块錢，算定购了这辆车。来回路上，两人只吃了点从家里帶上的玉米餅子，一分錢也沒舍得零化。

开了年，杜奎果然又带一小部分人进山打柴，到月半回来。这次打柴得来的錢，拿一部分去把那辆定购的車赶回来，剩下的一部分三元二元的分給了社員。社員自是高兴。

这一天后半晌，老王荣正在路边上張望，果然看見国藩和杜奎赶了一辆车回来了，車上还象裝着点啥东西。他

几步就迎上去，嘻嘻笑着跳上了車。“咯吱”一声，車轆响了一下，他沒有介意；車到了社院前，往下卸从路上順便裝來的沙子时，他一使勁，車轆“咯吱咯吱”連声响了。王榮仔細一瞧，臉色就變了：“这也叫車嗎？”

杜奎馬上頂他：“这不叫車，叫啥呢？”

國藩笑起來說：“老榮，你會上提出要買車的時候，光說的數量，沒有說出質量呀！”他見王榮還是沉着臉，又接着說：“不怕的，百樣事情起頭難，今年丰收了，咱們再想法買辆新的。”

听到滿院子車、駒、牛、羊的叫鬧聲，听到國藩和杜奎俩爽朗的笑声，王榮臉上也終于有了點笑模樣。

較量較量

李滿天

清明节前三天，下了一場透雨，后山一派青綠，山坡上的果树也长上了花苞。正是种地的好时节，可是社里还没有种籽呢，粮食对对付付的吃过冬来，誰家还能餓着肚皮留种籽。王榮說：“这回可該政府想法儿了吧！”国藩还是那句話：“社剛办起来，八字還沒見一撇呢，就向政府伸手，往后还怎么办！”其实国藩自己心里也沒底，就开社員会研究，商量来商量去，还是按着上次各戶分头找旧材料盖羊圈的办法，自己动手，二十三戶分头去找去借。

第三天，孤兒小戴存从表哥家借了两瓢紅高粱种籽，回来已經天黑了。老远望見村口影影糊糊的有人走动，赶到跟前一看，是国藩和杜奎二人。国藩問戴存：“怎么这晚才回来？”

戴存沒有回答，却把嘴一噘，嘟嘟囔囔地說：“真把人的肚皮气炸啦！”

“什么事把你这么气的？”

戴存一口气往下說：“半道上听人念叨，王悅那家伙光看咱們的笑話，还要和咱們社比勁呢，咱們种啥庄稼他

种啥，吹大牛說要把咱們社踩到他脚下去。”

杜奎說：“这牛皮他在当街吹了好几天啦，你还当新聞來說呢！”

戴存說：“他还說什么臭要飯的、穷棒子社，要沒有摘星星的本事，就別想趕过他去。”

杜奎接上說：“他也沒有摘月亮的本事吧！”

戴存把眼皮一睷：“你們听了就不气？”

国藩嘆地一笑，說：“气啥？我还在心里謝他呢。”

听了这话，不但戴存惊怪地大睷起眼，杜奎也是心怀不滿。他忿忿地說：“謝他？我恨不得揪住他的后脊梁，往当街摔他个响泡呢！”戴存說：“到啥时候啦，你还淨說笑話！”

国藩这才不紧不慢地說：“不是笑話。过去日本鬼子和蔣匪軍那多凶，杀人燒房子，想鎮住咱們，到底吓住咱們了沒有？”

杜奎粗声粗气地說：“吓住咱們？它越发凶，咱仇恨越大，到底都被咱們打敗啦。”

戴存不耐煩地說：“咱是說王悅那家伙呢，你們又扯到啥上去啦！”

国藩說：“这就回到你那題上来啦。你說，咱們鬧这个穷棒子社，困难不困难？”

“这还用說。”

“如今王悅要和咱們比勁，他吹那么大牛皮，咱們敢和他比不敢？比过他比不过？”

听国藩这么一说，两个人都恍然大悟，咧开嘴乐了。

国藩接着又说：“他一比劲，真把你的肚皮气炸啦，那才正好趁了他的心願。他說咱們沒有摘星星的本事，咱們立下凌云志，真敢摘星星，这还不該謝謝他嗎！”

国藩口里这么说，心里还是免不了有点愁烦。这二十三戶，除去佟启还将就点，其他二十二戶全是穷得当当响的，闹好了沒說的，万一有个什么差錯，慢說关涉合作化大事，先影响这二十三戶的飯碗呀！他怎能不愁呢？他想趁这工夫，給大家多鼓鼓勁，把地种好。就对杜奎說：“天还不太晚，咱找上大伙再念叨念叨怎么样？”

杜奎点头同意，就去找人。国藩領着戴存回家吃了飯，也上社里去了。

大家先嘮了几句閑談，国藩就开口說：“看来王悅和咱們社对头是做定了，大伙要說敢跟他比，咱就比；要說不能比，咱就认輸算啦。”

当时沉悶起来。杜奎急得蹦起來說：“掉腦袋的事都干过来啦，如今又要不了命，出不了血，有啥不敢的！”

跟着众人七嘴八舌的才議論开了，有的說：“咱早憋着一口气和他比呢。”有的說：“光听那蠟蛬叫还不种庄稼啦。”只有王榮和王生弟兄俩光是抽烟，不言語。国藩瞅着炕里坐的王生說：“二哥，你說咱們能比嗎？”

王生一手托着干瘦的腮帮，一手撑着烟袋說：“比，还有不能比的，我就是想咱这二十三戶才合三条駢腿，虽说又买来一头牛一头駢，可是又老又瘦；人家王悅一戶就是

一头大驴，两头大牛，这上面是差着点。”

杜奎又站起来大声說：“你光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風。”

王生又不言語了。國藩就又开導說：“二哥这番考慮也是的。比如过去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日本鬼子和蔣匪軍的武器就是比咱們强嘛。可是还得考慮另一方面，那結果怎么样呢？”

王生接着說：“你不用給我打比方啦，这我也思摸啦，他一戶一头驴，两头牛，咱二十三戶才合三条驴腿，加上一头老牛，一头瘦驴，可干活的人呢，他老婆是不下地的，他和他能干活兒的两个儿子总共也只三个人，咱二十三戶合起来又有多少干活的！”

杜奎又跳又笑地說：“你这才說对啦，要看到人的力量呀。”

說得大家都笑了。剩下王榮老漢還沒表示态度，國藩就問：“大哥，你看呢？”

王榮从炕里往炕沿上挪了挪，磕了烟灰，把烟袋紧攥在手里，随后慢声慢气地說：“帳是該这么算，不过……”揚臉瞅瞅國藩，又低下头含含糊糊地說：“聽說他糞积的不少，人家又是富裕戶，咱們缺这少那的，是够嗆呀！”

別人還沒开口，王生往前一挪，冲他哥哥說：“他手头寬裕这不假，可剛才不說了嗎，咱們人比他多呀，大伙都长着手哪，慢說有三条驴腿加两头牲口，沒这个，咱使鎬刨也不比他种的差。”

众人都贊成王生的意見。国藩見王生說的帶勁，也自高兴，又問王荣說，“大哥，你看二哥說的在理吧！”

王荣却不正面答复，他把烟袋在手里繞个圈說：“我看还是抓紧种地要紧，咱们分两撥，一撥人到村西种谷子，一撥人去西大梁种玉米，管他王悅比勁不比勁，咱们先早早把庄稼种起再說。”

国藩立时称贊說：“大哥这意見滿好，明天老奎領几个人去村西种谷子，你領人去种玉米，怎么样？”

大家都沒意見，当晚計議定了。

第二天清早，天上还挂着稀疏的星星，社員們就吃完了早饭，太阳剛一露头，下地的人們已經出了村。王荣肩上背着盛种籽的口袋，王生跟着毛驴；国藩也去了，他肩上扛着犁，犁上搭着套；其他几人有的扛着鋤，有的背着筐，說說笑笑奔西大梁走來。山坡沟坎上新出土的野草，放出陣陣清香味，各种不同顏色的小鳥，在淡綠淡綠的树枝上飞动鳴叫，好一片清新美丽的山野春景。来到地头上，王荣、王生这些老汉先坐下抽袋烟，年青人却不安坐，不是拣起石子打鳥，就是学着猴子爬树。王荣老汉抽完烟，站起来，象个領头人的样子說：“別光歇着啦，干吧！”众人立时套上毛驴，取出种籽，王生老汉和毛驴搭着拉犁，国藩扶犁，王荣后面撒种，其他几人有的撥粪，有的刨坎平地。

种过两趟，小戴存的話来了：“奇怪奇怪真奇怪，为啥不見王悅套犁种地来！”

听了这话，王荣不由朝上边的地块瞅了一眼，那正是王悦的五亩地，和社里这六亩地埂连埂壠顺壠的挨在一起。他心里叨咕：这王悦真的为啥不来呢！莫非说和社比劲是他吹空气儿的？心里这么想，口里却说：“人家敢许上别处种去啦。”

戴存又说：“他太阳晒屁股，做梦种地呢。”

王荣忽然呀了一声说：“别說啦，那不人家來啦！”

众人顺沟口一望，果然看見有三个人晃晃荡荡顺沟底上来，王悦大小子扛着犁；二小子牵着毛驴；王悦背着种籽口袋，一手还扬着个红缨鞭子，吆吆喝喝，咋咋唬唬的满神气。他抬头一望，才望見大梁上有好几个人，就催小子，掏毛驴、紧赶慢赶地上了大梁。

小戴存見他們三人走近，故意把头揚得高高的；国藩只顾耕地；王生眼睛不得勁，什么也看不大清；王荣倒是要打个招呼，見別人这样，他也不好开口。那王悦却把种籽口袋撂在地头上，直起腰，搭了話：“嗬！你們来人不少呀！”

小戴存斜了一眼，立时回答：“我們有人嘛，你想來還來不了呢。”

王悦挨了碰，把牙一咬，在两个儿子身上使气，連催带嚷地套起毛驴，也紧忙慢忙地种起来。

国藩看在眼里，口中不言，吆喝毛驴。那毛驴竖起耳朵，紧走着往前拉。犁头过处，軟軟糊糊的湿土往两边分开。种到半趟，正和王悦打个对过，王悦那头大驴的耳

朵紧挨国藩肩膀擦过去。王悦把嘴一呲，冲着国藩皮笑肉不笑地说：“王主任耩的真棒呀！”国藩回答了一句：“差不多了！”

王悦嗓子眼里象塞了块东西，想骂句什么也骂不出来，他心里又是恨，又是恼。这家伙，紫红脸上镀一臉淺麻子，水蛇腰，薄嘴唇，能言善语。早先地主气盛的时候，就爱巴结权贵，替王家大院收租跑腿，溜须点残喝。封建势力被打倒了，杜志他们搞反革命活动，他是骨干。人民政府平息了“红眼队”叛乱，取缔反动会道门，他假装悔改，骗得政府的宽大处理。可是在他身上杜志的阴魂依旧不散，对党，对社会主义充满了刻骨的仇恨。

这回成立农业社时，他讽刺、挑撥、打击、破坏，能施的鬼法都施了，农业社不但没有垮下去，还置买了驴、牛、大车，精满气盛地站起来了。王悦哪能就此罢休，他另变一套，存心和社比赛，妄想把社比垮。凡是挨着社的地，社里种啥庄稼，他也跟着种啥庄稼，同样的地块，同样的庄稼，那才能显出谁高谁低来。人们看着他王悦把社给比下去了，那还有谁再有劲去入他们那穷棒子社？穷棒子社不垮也得垮了。这一来，不但出了口气，他放债雇工的路子也就活了，单干发财的道儿上也没有什么阻挡了。因此，社里在这几种玉米，他也在他的地里种上玉米；社里在蔡家沟种了六亩谷子，他也在紧挨着的六亩地里种了谷子；社里在大岭沟栽了三亩白薯，他也在紧挨着的二亩地里栽上白薯。

社里的苗出土了，王悅地里的苗也出土了；社里的苗齐齐崭崭的往上长，王悅地里的苗也齐齐崭崭的往上长；社里耪了三遍，王悅也耪了两遍。这事不但轰动了西鋪和東鋪，也惊动了周圍村庄的人們。村里下地的人們，或是路过，或是繞儿步远，总要到这里来看两眼。外村的人們，就专门跑来当热闹看，看了回去又添枝添叶地当新聞讲；若是遇上几个人，禁不住就地边議論一番。有的說：“从現时来看，苗棵长得一般高，全是油黑崭綠，分不出上下高低。”有的說：“現时苗棵的长形和色气是沒有两样，可是一眼看高，一眼看低，日子还长着呢，好戏还在后头哪。”这么一說，有的人就說：“是呀，王悅人家要是买了豆餅或化肥描一下（注：描粪是这里的土語，即追肥），那就显出两样来哪。”有的人立刻反对：“人家社里那么多人手，要是认真耪起来，他王悅可抓瞎啦。”有的人又反驳：“王悅人家有的是錢，到时候覓几个短工，不也赶前啦。”有的人說：“他覓短工也覓不了社里这么多人手呀。”別看言多語杂，向着社的人們光担心社里輸了，一心希望社里庄稼长好；向着王悅的人，只盼望王悅得胜，生怕他被社里比垮了，失去他們这一棵隐身草。正是：有的好明有的暗，各人心思不一般。这且按下不表。

到了夏至时节，杜奎从地里回来，風風雨雨听到人們的議論，就找到国藩說：“那玉米都长多半人高啦，还难分上下，老这么着，咱比不下他去，可不象話；万一有个啥，可更丢人。”

國藩說：“丟人事小，合作化道路事大，二十三戶飯碗事大。”

杜奎在桌上砸了一拳，說：“是啊，咱非得想法兒趕過他去不可！”

“王悅罵咱們是窮棒子社，咱們想法兒，也只能想穷法兒。”

杜奎着急地說：“穷法富法，總得想法兒！”

兩人皺着眉头想了一會，國藩正要說話，杜奎跳起來說：“有啦有啦，咱們有十九只羊，把羊糞撒到玉米地里，那就……”國藩接上說：“你和我正是一个心眼兒。”杜奎說：“那咱就動手干吧！”國藩說：“且慢，區委不是常對咱們講嗎，和王悅較量的事，實際上是一場階級鬥爭，勝負關係重大，凡事要跟群眾商量。咱兩人想出法兒來啦，也得開會和大伙商量商量再辦。”

當夜召集了二十三戶社員，國藩把要趕過王悅的話一提，正待講几句鼓動話，王生老漢就插口說：“咱們那羊糞也攢的不少啦，撒到玉米地里，還愁趕不過他王悅！”幾個人同聲嚷道：“俺們也正是這個主意。”

國藩向杜奎看了一眼，杜奎心眼里火燒水滾似的高興，把拳头高高一舉，大声吆喝：“咱們明兒天不明就動手，中不中？”

“中！”众人應聲喝叫，連宿鳥都驚得飛叫起來。

第二天天不明，王悅還在做夢，夢見他那玉米長得一丈多高；社里的玉米還不到一尺，相比之下，象個高山跟

小崗。他正乐得呲开大嘴笑，忽然被人声狗叫惊醒了。立时从炕上爬起来，顾不得穿衣裳，披件大袄，急步走到街門，就門縫里往外一望，月光下，社里那条小毛驴拉着铁輪大車，咕辘辘走过街道。后边，一人一副挑子，閼閼嚷嚷的相跟着。他揉揉眼睛，細看筐里挑的啥，却看不清，就輕輕打开門，躡手躡脚地跟在后边一瞅，又急忙返回家来，对睡在炕上的老婆和儿子吆喝：“快起！快起！还死猪一样的挺着哪！”老婆儿子惊得虎一下坐起来。老婆問：“啥事这么急毛喊叫的？”王悅跳着脚叫：“穷棒子們給庄稼捕羊糞哪！”接着象螞蟻掉进热鍋似的在地下乱轉。轉了儿圈，又猛地站住，嘿嘿笑着說：“哼！他們有羊糞，咱也有，还有那牛糞猪糞呢。”就立即催逼两个儿子，牵出大驴，从羊圈里起出糞，裝好筐，驴馱人挑，也向西大梁趕去。

这时小麦发黃，野草竟长，气候轉热，山坡上的树木茂茂騰騰。王悅一路只是掏牲口，催儿子放快脚步。走到半沟，社里挑糞的人們已經返回来了，正打个对过。小伙子們都拿眼瞅着王悅一家子。王悅两个儿子搭拉着脑袋，王悅却向大伙儿睃了一眼，把腰一直，故意迈几个大步，那担子在他肩头上軟溜軟溜的閃。正自得意，听得后边小伙子們嘻嘻地笑，笑声中还夹杂着一些細碎的言談，却听不清說的什么。王悅恨恨地低声嘟囔：“穷棒子們笑吧，将来叫你們哭都哭不出好声音来！”他的恨气还未消，铁輪大車咕辘辘地下來了。王悅又是一个煩恼：穷棒子們有一辆大車，他却沒有。又听得王榮老汉跟他說話：“你

們也來啦！”他很想罵一句，沒有罵出口，只回答了一声：“拉不下！”擦着大車过去了。走了几步，放下担子，回过头来，抹了把汗，嘿嘿的对后边的大小子說：“穷棒子們高兴吧，他們那大車是一百六十块买来的，看秋后打不下粮食，吊起肚子餓着，咱掏一百块，那大車就成咱家的啦！”說完，又催儿子：“快走！快走！那大車是咱家的啦！”好象那大車真成了他家的一样，大嘴咧得合不住。

走到地头一看，又是一个煩惱襲苦他的心头，嘴立时拉得老长。原来社里今天是男女老少总动员，男人們挑粪，妇女們描粪，男人們把粪挑到地头上，妇女們就装上筐，提到地里去描，粪到就描，全施到庄稼棵上去了。他家里干活的統共就三人，按一家來說，是不算少，比起社里二十三戶，那就可怜巴巴的啦。吹笛顾不了捏眼，捏眼顾不了吹笛。他吊着眼珠子盘算：今天这一天能把粪鼓搗到地里来，就算不錯啦，明天起个大早，三个人一天怎么也描起了。穷棒子們穷忙活，今天也未必能描完。盘算定当，就把手一揮，說：“走！”大小子睞着眼問：“咱們不描呀？”王悅瞇着眼說：“你想图心閑呀！走，挑去！”三个人赶着毛驴，挑着空筐下了坡。

大小子受了王悅的訓斥，心里不是味道，干活沒了勁；二小子也是不够麻利。王悅光是心急，俩小子不上勁，他肚子气得一鼓一鼓的，真想呼鸡喝狗地訓教一顿，轉念一想，又忍下去了。一边扭着粪筐紧步走，給俩小子做样子；一边甜言蜜語地叨念：“今天咱們早挑完早歇工，

晚挑完晚歇工，早挑完了，烙大餅，炒鸡蛋，来顿好的。”这么一說，那两个儿子果然来了勁。打起了点精神。

下地干活的人們，有的止住步，有的停下活，都滿有兴趣的瞅热闹。这是一場比賽，以二十三戶农业社为一方，以王悅一家子单干为一方，双方的比賽很是激烈。王悅要在人們面前显能，晃当着脑袋，甩搭着一只手，拔开大步喳喳地往前走，还一个勁儿吆喝两个儿子。社里的小伙子們更不示弱，挑着粪筐，一个赛一个，有的喊加油，有的喊快跑，煞是欢腾。

挑了两趟，王悅自己先有点吃不住勁了，两条腿被什么东西拖着似的迈不开，心里发急，身子却不給他来勁，連吆喝儿子的声嗓，也不似先前那么粗了。

到了后半晌，眼瞅着社里的羊粪就要挑清了，王悅的还剩不少呢。他发个狠，把每只筐都裝得滿滿实实的，两个儿子呲牙咧嘴，毛驴的腰身弯成个曲綫，王悅自己也被压得喘不出气来。赶到吃力使气地挑上大梁，社里已經挑完粪，男人們歇了一气，帮着女人們描最后一趟粪。王悅他們急忙倒了粪，返回身還沒走进村，社里男男女女，說說唱唱、打打鬧鬧地收工回来了。王悅心里发毛，顾不得催儿子，自己紧跑几步，到家里撂下筐就裝粪。他原来計算，再滿滿实实的来一趟，就算成功了。誰想还是完了，人困馬乏，慢說儿子和毛驴都受不了，他自己这时也够草鸡的了。无奈何，只得淺裝少担，就这样，那毛驴你使鞭子抽，也不給快走；两个儿子走几步，歇一歇，吆喝也

是白搭；王悅自己也是一步一挪，两步一蹭，好不容易扭到地头，天已經大黑了。下了大梁，出了沟，进了村，有些人家已經吃上晚飯了。

王悅瞅了瞅剩的糞，把糞筐一撂，象跟誰使氣地說：“今天就算完成啦！”

两个儿子象得了大赦似的，把毛驴牵进圈，往槽里倒了草，返身回屋。見他娘煮的稀粥，二小子就嚷着說：“娘，赶快烙餅，烙了餅还炒鸡蛋呢！”站在門口了着天空的王悅轉身猛喝：“烙餅炒鸡蛋，吃鸡巴蛋吧！”儿子沒有好气，正要頂老子一句，几道闪电划破黑空，“咯嘣”一声脆响，又是唿隆隆一陣悶雷。接着狂風呼号，刮得沙飞土揚，刮得树折叶落。西北天上黑鍋底似的黑云，如一块大幕幔压了过来。大小子埋怨說：“我說把糞描上，这……”王悅更是气粗，大声喝叫：“还費那淡話，白天晴得好好的，誰知道，老天爷也跟咱作对！”說話中間，“咯嘣”又一声响雷，風过处，雨点唰唰的落了下来。王悅对着黑空，差点叫出声来：“老天爷，你留点情吧！”老天爷却不順王悅的心意，瓢潑似的大雨，直下了一个多钟头。

王悅咒天罵地，一夜折腾的沒睡觉。

第二天，屋里还渾黑，他就起来了。一口气跑到西大梁，一瞅，地边的糞堆被雨水冲得一干二淨，因为他的地靠上头，社里的地靠下头，糞都流进社里的地里去了。积水坑里，还飘浮着一些糞渣，他撈了两把，又生气的把手一甩，直起腰，斜着眼瞅社里那六亩玉米。那玉米昨天剛

描了粪，夜間得了雨，又冲进了王悅的粪堆，揚头昂脑，象故意傲王悅。王悅使勁把头一甩，視線又轉到自己的庄稼，自己的那些玉米好象飯到口边又被人夺走，垂头丧气的在怨恨他。他一跺脚也怨声恨气地說：“凭他們穷棒子人多，哼！过了初一还有十五呢，粪冲走了也不怕，明天去城里买肥田粉，看他穷棒子們还有啥招儿！”

这工夫，国藩和杜奎两人也往西大梁来看地。雨后的山野，又是一番景象，山是特別青，树是格外綠，花是異常艳，空气是那么清爽，庄稼是那么茂盛。国藩抬头一望說：“地头上站的那是誰？”杜奎仔細一瞅說：“嗨！是王悅那鬼呀！”

王悅一眼瞥見他們兩人，低声罵了一句，急忙往斜坡一溜，拣着山路溜跑了。

国藩和杜奎走到地头上，杜奎笑了声說：“王悅是看他的粪堆来啦，他的粪真多，全描到咱們地里来啦。”

国藩唔了声說：“这才是头一出戏，精彩的还在后头呢。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王悅是不会就此罢休的，他果然卖掉了两只羊，上了城里，买来七十多斤化肥，往他那五亩玉米地里描上了。

杜奎不服气地說：“他描肥田粉，咱也去买来描。”国藩說：“人們肚子都餓着沒的吃，使啥买呀！”“那咱就让他看咱的笑話？”“不，咱还是来咱的穷办法，他使肥田粉，咱耪，常言說：鋤头底下出水，一遍一遍，多耪几遍，准比他差不了。”杜奎听了，当然贊成，就发动大伙，出发耪地。

王悅兒子見社里耪玉米，跑去對王悅說：“人家耪地啦，咱也耪吧！”王悅嘿嘿笑着說：“讓他窮棒子們空折騰去吧，咱不。咱那玉米吃了肥田粉，你看着它給咱長吧！”

這回他却料錯了。肥田粉使多了，又連晒幾天，玉米苗不但沒見長反而焦黃上來了。王悅這才着了急，也下地去耪。一家三個勞動力却是耪不過來。社里耪過了兩遍，他一遍還沒耪完，別的地塊里的莊稼又不能全撂了不管。他百計無奈，最後一拍大腿，吩咐兒子：“去雇幾個短工來！”兒子去了半天，搭拉着腦袋、噘着嘴，一個人回來了。王悅問：“短工呢？”兒子說：“雇不着。”王悅罵兒子“窩囊廢”，兒子不服氣地說：“你自己去試一試看！”“老子就不信全東西鋪連個短工也雇不着！”他自己去了半天，回來腦袋搭拉得更低，嘴噘得更高。沒別的話可說，只是咒罵：“他媽的！把窮棒子社不閹垮，咱這日子真算沒法過啦！”原來早先扛長活，打短工的，差不多都在二十三戶里，如今組織成社，誰還來再給他干這個？剩下那些中農戶，正當農活緊的時候，自家的都忙活不過來，任你出大價，他們也不願扔下自己的活兒去替別人打短。

王悅發了半天火，又在這二十三戶的農業社身上打起主意來。他一計不成，又生一計。瞅個機會，對社里的鄧慶堂說：“你的光景怎麼樣？還有吃的嗎？”慶堂說：“早沒的吃啦。”“怎不想法兒？”“沒的法兒想呀！”王悅就裝出一副關心樣子說：“割荆條呀，一百斤荆條換三斤紅高粱，这不是到口的糧食呀！”

庆堂回来对社里人一說，杜奎說：“王悅这家伙又在使啥坏心眼儿吧！”王荣接上說：“三斤紅高粱，一百斤荆条，他一手給紅高粱，咱一手交荆条，怕啥？怎么也比餓着肚子强呀！”众人一听，倒也是的。就集合去南山割荆条。

王悅收买了几千斤荆条，心里暗喜，得意忘形，在当街对几家中农說：“他們割多少，咱們收多少，压綠肥使不了，晒干了，当柴禾燒也值得。叫他們积不了肥，又誤了庄稼营生，明年更过不了！”

这話被社里人听见了，回来一反映，杜奎气得呼呼地說：“看怎么样？我說他揣着坏心腸嘛，我去使扁担拍死他！”

国藩暗自叹口气，說：“咱算上了他一回当，吃一堑，长一智，往后割了荆条，自己压綠肥，貴賤不卖給他們啦。”

众人听了，也激起义愤，大长志气，割荆条，压綠肥，干得挺欢。这么干了七、八天，人們肚子里少东西，身子弱，到底頂不住了。

那工夫，实在是說不上的艰难呀，二十三戶里，大多数的戶早就斷了頓，只是靠挖馬莧菜来过活。那一天，王生老汉来找国藩，半吞半吐地說：“国藩，我……想歇几天，中不中？”国藩知道他的难处，还是亲切地問他为啥，問了几遍，王生才說：“不說你也清楚，咱这二十三戶，有多一半子人家揭不开鍋，我家里也是两天沒啥吃的啦，淨

一把子張口的物件，怎办呢，我是想着出去找点吃的。”国藩說：“二哥，青黃不接，你到哪去借呀！”“不是去借，我想把过去的營生拾起来，要点飯吃。”

国藩一听，差点掉下泪来，前些时候，互助互济，国藩拿出点玉米，杜奎連小猪也卖了。这几天，国藩自己也是沒啥可吃，光是喝点莧菜湯，身上倒是胖起来了，却沒一点气力。这还不大要紧，最可气的是王悅那家伙。社員們挖馬莧菜，他赶着駢打道边过，駢把嘴伸进盛馬莧菜的籠筐里，社員們掏駢，王悅斜着眼，鼻子里笑着說：“你別掏，我的駢還沒那么賤，不吃你們那个。”想到这点，国藩就认真地說：“二哥，咱們人是穷，志可不穷呀。”王生說：“這話我記住啦，再穷，也是一个穷嘛，还能給咱再添上个穷婆！我这回出去要飯，不管到哪里，死活也不說是社員，不給咱社里丟名譽。”国藩含着泪說：“二哥，你千万不能出去，白薯已經結上块啦，实在沒法儿了，刨点白薯掺和着吃，也餓不死人呀！”王生也含着泪說：“咳，国藩你也是种地人，怎就不想想，吃青如同吃金，顾了眼前，往后日子还怎么过！”

这些国藩当然是明白的，可是到了这严重时刻，他怎能不忧心如焚呢。恰好在这工夫，如大旱喜雨似的来了解救。

原来区里已了解到这种情况，赵書記連夜赶到西鋪来，找到国藩和杜奎說：“你們生活这样困难，为啥不告訴区委一声呢！”国藩說：“我們可以对付。”“怎对付？”杜奎

沉吟了一会，說：“早先比這困難多了，还不是吃糠咽菜的過來啦。再說，白薯結了塊，實在過不去，刨點吃，怎也好對付。”趙書記看着他們兩人說：“吃青行嗎？”國藩說：“我們知道要減產，可是……”趙書記說：“減產可減大啦！你們農業社頭一年办，還有個王悅和你們較量，你們想，這勝敗關係多大！”

國藩和杜奎沉默不語，趙書記就笑着說：“你們為啥不貸點款？”國藩說：“我們不願先在脊梁上背上帳。”趙書記說：“你們這種精神是好的，可是也得實事求是。貸了款，買點糧食，分給社員們吃，有了勁，生產出來的不比這多呀！”隨後又說，“區委已確定派李書記到這兒來蹲點，幫助大家來克服困難，大家要發憤圖強，長志氣，把財切切實實办好，讓大伙看到它的優越性。”

第二天，信用社主任送來五十元錢，說：“趙書記說啦，讓你們量吃的。”

國藩和杜奎心里多么激动，就不用提了。他們當時就按實際困難情況每戶分了三兩元。社員看到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這樣關心他們，又有了吃的，情緒頓時高了許多，耪地、壓綠肥，又是一番熱鬧。

這时节，玉米長上了穗子，棒子尖挂上了花紅綫。王悅眼瞅着社里的玉米象小樹林似的越長越旺，油綠綠一大片；他的玉米却染上一層黃色，有的葉尖上還發了干，又是嫉恨，又是焦急。最可氣的是看熱鬧人們的神色，他們口中不言，眼里却在說話：“大局已定啦！”

大局已定嗎？他不願承认这个，也不会就此罢休的。那一天，路过地边，碰上社員溫自礼正割草，他瞅着庄稼，对溫自礼說：“你們干勁不小呀！”溫自礼唔了一声：“不小。”王悅又說：“庄稼不錯呀！”“唔，不錯。”王悅轉着眼珠呆了一会，又說：“不錯是不錯，你們还得要飯吃。”溫自礼奇怪地問：“那为啥？”王悅眯眼笑着不答应。溫自礼又問一句，他才慢吞吞地說：“我这是对你說呀，別人我还懒得告訴呢，你們不是貸來款嗎，你知道貸了多少？我不說你是不清楚，貸来了两千一百元呀，只給你們分了五十元，那两千零五十元，哼！都肥了他們黨員啦，这你們还不要飯怎办，這話是我對你說，你可千万别告訴別人！”

溫自礼听了這話，当时如果反映到社里，本会一說就明，也不至鬧出一場風波来。千不該，万不該，一时糊了心眼儿，听了蛇叫，当是鳥鳴，竟信以为真，撂下活計，唉声叹气，回得家来，还說給王榮。王榮也自糊塗，自己信了，又轉告別人。俗話說：“好話不出門，坏話一溜風”，不到一天工夫，好多社員都知道了，嘰嘰喳喳，胡猜乱想。溫自礼和王榮无缘无故地病了，其他社員也沒心思干活儿。只蒙着國藩和杜奎几人。

國藩和杜奎看見人們這般情緒，好生奇怪，問人們，却問不出啥来，那王榮只是一句气話：“怎着也是餓肚子，要飯。”杜奎发了急說：“怕餓肚子就得加紧生产，噘嘴生气，肚子能飽啦！”“肚子不飽，也不能当傻瓜！”“你这是啥話！”“啥話，你問溫自礼去！”杜奎急忙找到溫自礼，溫自

礼更是赌气不讲，经不住杜奎再三追问，他才把王悦那段鬼话倒了出来。杜奎一听，气得哭笑不得。“咳！你呀，算糊塗到家啦，人话不听，偏信那鬼话！”“不是真的？”“王悦是个啥家伙，你还不知道！他放出屁来，你就不闻一闻是香是臭！”

杜奎回来对国藩一叙说，国藩也生了会子气，接着又苦笑一声，说：“这事咱也有缺点，光顾了忙生产，要是早点把这些向大伙说清楚了，也不会闹出这事来。”又回头对会计佟启说：“今晚开个会，把帐目给大伙公布一下！”

晚上在社员会上，佟启不但把那五十元贷款交代清楚，还把社里其他一切财产和收支情况一宗一宗的报给大家听。报完了，国藩问大家还有啥疑问没有，众人说：“这就明白啦，还有啥可疑的！”有的说：“王悦那家伙为什么要放那屁，害的人好苦！”

国藩站起来，向大家看了一眼，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心爱护咱们，给了五十元的生活贷款，解决了咱们很大困难。王悦红里搅黑地说啥两千一百元，两千一，哪怕两万一，他说了，由他去承担，咱们农业社身上可没那些债。”停了停，又说：“可是明是鬼话，有的人为啥偏要信呢？人家时时刻刻在计算咱们，咱们自己倒迷了心眼，是非不清，好坏不分，净吃那暗亏。往后这类事还会有，只要咱们眼睛擦亮，心眼放明，他那啥鬼计妖法就都不灵啦。”

经过这一回事件，大家受到的教育着实不少。眼瞅

着社里和王悅的庄稼已經分出了高低，社員們劳动情緒特別高。到等秋收，不但社里和王悅比賽的那块玉米賽过了王悅，全部庄稼的产量都超过了王悅，社里每亩平均产量是二百五十四斤，超过了历年西鋪村的产量，王悅的产量差好几十斤。在这一番較量中，二十三戶的农业社取得了偉大的胜利，王悅是彻底失败了。

諷刺、挑撥、打击、破坏、較量，他使尽了一切坏法，那二十三戶的农业社，不但沒有象他妄想的垮了台，还获得了丰收，巩固下来，而且吸引了其他农民，扩大成八十三戶了。

一九五三年这一年，王悅和社較量是彻底失败了。

人們記得，他时常站在当街，赌咒发誓地向一些单干的中农說过的一句話：“穷棒子社，他們要能赶过我去，我把眼珠子摳下来踏个水泡！”这工夫，人們就說：“咱們看他王悅摳眼珠吧！”

王悅吹气尽管吹气，他当然不会摳下眼珠来的。可是不久，碰巧出了这么一件事。

离王悅家門口不远，当街有个铁匠炉，铁匠打制鐮刀，往里加鋼，正在斬截一节鋼。不少人圍着看热闹。王悅叼着烟袋走出来，歪戴着帽子，也走过来瞅热闹，剛站下三几分钟，忽然嗖的一声，被斬截断的一小片鋼飞过来，不偏不倚，正打在王悅的右眼上，只听他啊哟一声叫，弓下身子，用手捂住眼。众人莫名其妙，上前看时，王悅的右眼珠子已經象一顆死蛇蛋了。

人們不禁高兴地說：“不用他摳啦，那眼珠自個兒掉下來摔成泡啦！”

变成了一只眼的王悅，变得更凶恶了，他象一只被击伤的恶狼，呲牙咧嘴，妄图最后挣扎。他明显地感觉到过去的一套已經不行了，于是象变色蜥蜴似的又另变一种顏色，抓取农业社这个形式，和国藩杜奎他們的农业社再来一次較量。

一九五四年三月，有一天，王悅召集了十四戶中农，說：“咱們也鬧它个农业社吧！”那些人都惊讶地說：“你也要鬧农业社！”王悅叹了口气說：“今年不比去年啦，这年头，你們看不出来，你們要不入他們那个社，咱們就得自个儿成个社。”那些人說：“我們还想再看一年呢。”王悅說：“不用再看啦，往后帳也不好放啦，地也租不出去啦，活儿忙了雇个短工也雇不上啦，不鬧社是过不去啦。”王悅看見大家犹犹豫豫，二心不定，就嘿嘿笑地說：“我說个办法你們看怎么样，咱們的地、牲口誰的还是誰的，糞都往自己地里使，秋后打了粮食誰的也还是归誰的。”有人奇怪地說：“那，那不是假的嗎，人家农业社可不兴这么着。”王悅又嘿嘿地笑着說：“管它是真的假的，反正第一层，赶上时兴，可以向政府貸款；第二层，免得他們拘管咱們，照旧过咱們的日子。”

那些中农有的贊成，有的还犹犹豫豫，王悅就在外面大吹大擂，說他們也組織了一个农业社。

他們那个“社”有人提出：“你說社成立啦，可是沒得

到正式批准，这算数嗎？”王悅陰險地笑着：“这我早考慮到啦，咱們好比肉，还是肥肉，就是有肉无骨，这也不要緊，找个他們的黨員，頂个社長，还怕批不准！”“找誰呢？人家黨員差不多都入了社啦。”有人說：“既然这样，把國藩或杜奎弄过一个来，不就行啦。”王悅一听，心下暗暗叫苦，可是他嘿嘿一笑說：“那人家决不会来的。”“那怎办？”王悅又阴險地一笑，“我倒早想好啦，溫化之是个从部队上轉业回来的黨員，他家还没有入社，拉他进来，給他点甜头，他一干上，这还有啥問題。”說着，得意地咧开嘴笑了。

他得意的咧着嘴去找溫化之，溫化之真沒有拒絕，不但一口答应，还談得挺合拍。王悅更是得意了。一切都談就緒了，就叫溫化之到区里去申請批准。溫化之这回可是心中有底。自从李書記經常来这儿蹲点以后，曾找他談过几次話，使他認識到作为一个黨員在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上搖搖晃晃是不对的，对王悅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破坏，不問不管也是不对的。因此，他到了区里，并沒有办什么申請批准的手續，却把王悅的阴谋活動向区委一一汇报了。

历史上的罪惡，加上現行破坏活動，王悅就在这年五月十七日被逮捕判刑，劳动改造。

王悅和农业社的这一場复杂尖銳的較量，到此才告一段落。

区委書記

古 草

开完会，三星老高了，家家戶戶早已都睡了，国藩杜奎两个在当街又聊了一会，杜奎就去做出发的准备——明早带领八十三户社员去打柴；国藩就回社址，准备休息——他和李书记同住在这个小东厢屋里。

国藩推开门，屋里黑洞洞的，没有一个人。

他把两个行李铺好，就又出屋，看見饲养員，問：

“沒看見李書記到哪儿去？”

饲养員說：“剛才他还在这儿——”

“做啥着？”

“哈！李書記真細心負責，別人比不了啊！”饲养員一边給牲口添草，一边說，“天天夜里他把牲口槽一个个都給摸过来，生怕草料不合适，有杂东西。剛才他摸出一块土喀拉，不放心了，囑咐了我一会儿……”

国藩在牲口棚旁边站了会儿，听牲口咯吱咯吱吃的挺香。他望了望滿天的繁星，想起这一天繁忙的工作，該办的事李书记差不多都办完了，过会必回来。他也累了，

就先回屋，脱衣服躺下就着了。

当他睡过一觉，醒來的时候，只見一个大高个躡手躡脚的推門进来，摸索了一会，找了盒洋火，把小豆油灯点上。这时才看清楚：这个大高个有四五十岁，光头，长挂臉，尖下頰，大鼻子，臥蚕眉，双頰稍有連鬚，渾身上下瘦瘦的，穿着一身旧式的黑棉褲黑棉袄，两条腿和两只胳膊显得特別长。

这就是李書記。国藩翻了一个身，問：“这么晚到哪去着？”

李書記嗯了一声，說：“南院东圈那个母猪下小猪了。”

“下几个？”

“一窝下十八个。”

“啊……”

“黑夜下猪，总得有人照看，要不就会压死……”原来李書記照看“下猪”的去了。

“睡吧，李書記……”国藩又翻了一个身。

李書記却沒睡，他把灯端过去，拿出一張紙，一支笔，趴在小木桌上，在写什么。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李書記使劲費力地写了好一会儿子，才写滿了一頁。大概他感觉写的不够好，又从头到尾改了一下。可是，后来他又一看，大概还不滿意，就撕了，揉了一个球，扔了。接着，又拿出一張紙来，又写。国藩躺在炕上，掉过头来，說：

“李書記寫啥呢？太晚了，累了一天，睡覺吧。”

李書記還是聚精會神地在寫。他又寫滿了一張，看了看，大概必是還不對心事，改了改不行，又撕了，揉成一個球，丟了。接着，他又拿出一張白紙來，又寫……國藩已睡着了。

第二天，又是繁忙的生產，緊張的工作。杜奎帶領四、五十個人上山打柴去了，國藩留下和李書記一起督促往地里運糞，準備開春脫坯用的土，積肥，壓地，打喀拉……晚上一開會又是開得很晚——散了會，他照常摸摸牲口槽，檢查檢查草料（他強調牲口要吃好夜草），以及看看豬、羊、副業房……到半夜才回到小屋。回到屋，他還是不休息，還是照舊點上小豆油燈，拿出一張紙、一支筆，趴在那小木桌上，照舊的寫。寫，改，撕了，又寫，又是扔滿一地紙球。……這樣下去好多天。有天夜間，國藩問：

“李書記你三更半夜的總寫，到底寫啥呢？”

李書記這才說：

“嘿！縣委總說咱們這兒搞的好，總跟咱們要文字匯報；最近趙書記又捎信來說，區委決定提前開書記碰頭會，要把咱們這兒的經驗總結一下……”

“啊，原來是這樣。”

“我給你們總結了三頁半，題目是：‘自手起家，勤儉辦社，窮棒子精神’，你看看，哪兒不合适，再改。”

國藩聽說要總結他們的經驗，便趕緊伸手拿過一張，

就着小豆油灯看——見上面密密麻麻、歪歪斜斜，象小学一年級学生的作业：

白手起家 勤儉办社 穷棒子精神

國藩很兴奋。他把三頁半都看完以后高兴的說：“是这样……是这样……”心里想：“別看李書記沒文化，總結的可真好……”

李書記叫李繼增，遼化四區人，貧农家庭出身，从小就吃苦，沒上过学，十六岁时父亲死去，全家六口人靠他一人生活。八路軍开辟这个地区，他开始在村里活动，一九四〇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过办事員，村支书，一直到一九四八年才脫产出来，先在四区当組織干事、組織委員，到一九五三年三月才調到这儿，任鸡鳴村區（十區）区委副書記。調来不久，根据区委分工，他就扎入到西鋪这穷棒子社来了。

他来西鋪时，穷棒子社正是最困难的时候。他帮助國藩和杜奎出了不少主意，如：怎样又勤又儉、自力更生、貫彻省委指示；怎样團結大伙，实行民主办社，做好思想工作；怎样組織竞赛、評工記分、互助互濟、解决生产和生活問題……。二十三戶社員很快就发觉：这个李書記不但做事认真、懂得党的政策，而且耪地拔麦，挑水送糞，样样在行，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干起活来是头把手。

这年生活很苦，李書記都叫号飯。号到一家，一看是菜粥，蠅子嗡嗡嗡；号到一家，一看是菜粥，蠅子嗡嗡嗡；

國藩杜奎怕李書記吃不下去，有一天，國藩說：

“別号飯了。”

“咋啦？”

“單給你做點吧！”

“不用！”

接連三天，李書記說了三個“不用”，國藩也就不再張羅了。社員對李書記這種同甘共苦的精神，從心里佩服。

秋收——顯示出組織起來的優越性了。社員的實際收入比單干時增加了百分之六十；還積累了兩千四百元的公共財產。社外許多農民看到社的優越性，紛紛想要求入社。

繼增書記認為這是“扩社”的最好時候，就着手做這件工作。

但二十三戶社員不大同意，特別是王榮戴存出頭橫着，不叫吸收，理由是：“我們頭一年頂十年過；當初那樣困難，他們不但不幫助，反而諷刺、看笑話；現在弄好了，誰也不用想沾邊；二十三戶悶頭干它十年八年再說。”針對這思想，繼增書記就跟他們個別談話、說服教育，但咋說也不中；後來發覺這主要是國藩杜奎兩個不通，就又跟國藩杜奎談；來来回回做了好長時間工作，一直到縣委召開三級干部會議，貫徹總路線、批判关门主義為止。

扩社結束後，他就着手總結二十三戶辦社經驗。由於文化淺（脫產後才利用业余時間開始學習，慢慢認字），

他写材料很吃力。但他是个毅力很强的人，不在困难面前低头，熬过多少个夜晚，总结还是写了出来。

国藩把这总结看了两遍，杜奎回来后，国藩又给他念了一回，并在二十三户社员会上讨论了一次。这些虽都是他们大伙实际做的，但经李书记一总结，大伙都感到提高了。

二

这天早饭后，继增书记带着个布兜子，回到鸡鸣村区委会。他先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一个靠近菜园的很小的房间。屋子没生火炉，桌子上椅子上又有很多尘土，他呆了不到两分钟，就又出来，进了后院东屋。这屋子温度很高，火炉熊熊地燃烧着，铁壶里的水沸腾着，壶嘴里冒出来一股股的蒸气，继增的全身顿时暖和过来了。

“回来啦？”一个中等个儿、很壮实的男子，一面打招呼，一面正充满信心地拿着一把按钉，把一张图纸按在墙上。他年在三十左右，穿着一身普通干部服，挎着一棵三号手枪，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干部模样。这张图纸，标示出全区土地、人口、经济发展的情况，也标示出互助合作运动的规模。在这间不大的四壁已经布满了地图、照片、信兜、大枪的房间里，又挂上这张图纸，更显得严实了。“今天是鸡鸣村集，咱们的会得下午开了。”他又对继增说。这时他已把图纸按好，正从继增手里接过来一卷材料，西

鋪辦社經驗總結。

“啊，總結寫出來了？”

“恩。”

“西鋪二十三戶擴大以後，情況怎麼樣？”

“情況一直很好……”繼增坐在靠窗的辦公桌旁，補充着。

“國藩杜奎他們把今年的生產計劃和各項指標訂好了嗎？”

“定下來了。國藩領導一撥勞力在家中生產，積肥、送糞、摟石头、擋壩階；杜奎又帶領八十三戶社員到遷西打柴去了。”

他叫趙涌興，是鴻鳴村區的區委書記，本地人。他的經歷和繼增同志大體相同：貧農出身，一九四四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在村里當支書，一九四八年脫產出來，先在區里當宣傳委員，一九四九年到省委黨校學習回來後，任區委副書記、書記。當一九五二年春東小寨和王老莊開始試辦起兩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時候，他和其他的區干部一樣，對這件新的工作，是不懂因而也沒有領導的。每次下鄉，總是繞開社走，不敢接觸社里的問題。有一次東小寨農業社主任陳泰主動到區里來找他，請示投資問題如何解決，他不敢做肯定的答復，只籠統的說：“你回去跟社員群眾商量吧，大家同意怎麼辦就怎麼辦。”到一九五二年秋後，又新建了八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區干部不會領導社的問題，就一天比一天地更加明顯和突出了。這時，上

級党委正发出指示：要求书记动手，积极领导互助合作运动。为了贯彻上级指示，取得办社经验，涌兴首先带动大家学习党的互助合作政策，并背着行李卷，带着几个区干部，深入到洪鴨屯姜公忠农业生产合作社搞试点。

当时在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里，窝工现象比较普遍，他就先从“窝工”问题着手，和老农及社干部一起、座谈、找原因、想办法。最后，制定出一个四定（定工、定质、定数、定时）方案，并在四定的基础上，结合着推广山西省郭玉思农业社实行包产的經驗，及黑龙江省任国栋农业社推广新耕作制度的經驗。他在洪鴨屯一直搞了半个多月。在这期间，区委开会都到这里来开，通过会议，涌兴把洪鴨屯的經驗經常告訴大家，大家也把別处的問題及时向他反映。洪鴨屯成了总结經驗、交流工作方法的学习站。经过试点、总结、交流，不仅把洪鴨屯农业社的包工包产問題解决了，克服了窝工現象，推动了别的农业社；而且也丰富和锻炼了他們区干部。几个月后，当陈泰又到区里来找他，向他請示有关劳动管理問題的时候，他不再籠統的說些“回去跟群众去商量，群众說怎么办就怎么办”之类的話了，而是拿出了許多具体办法，帮助陈泰解决了许多具体問題，使东小寨村的农业合作社日益巩固，生产有很大提高。这样，领导被动的局面轉变了，区干部对于领导农业社的工作开始摸到了一些門路，他們由不懂到懂、由少数人会到多数人会、由区干部办社到群众办社。到一九五四年春，全区已发展到四十三个农业社。現在，

他除了抓好区委的一般工作外，正突出地集中研究农业社发展后所产生的一些新的問題……。他看过继增书记带来的西鋪經驗的总结后，心里非常高兴。他正要跟继增商量有关下午會議內容的一些問題时，有一个村干部掀門帘进来了。

“赵书记，我們村剛成立了一个貧农社，別人不清楚，你准知道：我們村最穷啊。要牲口沒牲口，要車沒車，要农具沒农具，——这空手叫我們咋搞啊？”进来的是閻家屯的社主任繆海山。他头一句話就把問題提出来了。

“你說咋办呢？”赵书记見繆海山那种严肃的神气，不觉笑了。

“依我說，国家得貸給我們点款……”繆海山坐在床鋪旁边那个杌子上，两只粗大的手揣着一碗冒热气的开水，一口一口的喝着，还不断的說，“社成立了，国家得支持，要不我們这社搞不了……”

“貸款？”

“嗯。”

“貸多少？”

“先貸二百！”

“哈，你这口气真不小啊！”赵书记說。继增在旁卷了棵烟，递给繆海山。

“确实有实际困难嘛。你們二位书记都在这呢，办社尽光嘴說不中啊，我們真一点底沒有，不貸款那不行啊！”

“你們應該学习西鋪的办法，”浦兴收敛了笑容，轉为

郑重的說，“西鋪原來也不比你們富啊，可是人家二十三戶去年搞的很好。”

“趙書記，你總說西鋪、西鋪，國家不定給西鋪多大支援呢，我們哪能比西鋪呢。”繆海山這時已暖和過來，他抽着煙，還在講着自己的理。

“有啥支援啊，人家主要靠自己，”涌興仍然鄭重的說，“一九五二年秋後他們剛一建社時，二十三戶全部財產就只有三条駒腿，其他要啥沒啥，社員連棉祆都穿不上，不用說投資。論困難，他們比你們還困難。可是他們並沒有依靠國家貸款，而是根據省委指示，聽了區委的話，自力更生，用自己雙手，到四十里開外的山上去打柴，賣錢添置生產資料，只一冬，他們就打了價值四百三十多塊的山柴，除解決一些社員的生活困難外，還添買了一頭牛、一頭駒、十九只羊、一辆花轎轎車、還有其他一些小型農具，足夠維持全年生產。只是在青黃不接、實在沒辦法時，國家才給他們五十元的生活貸款。”

說到這，涌興就順便把繼增書記拿來的那篇“總結”給繆海山念了一段。最後又接着說：

“國家現在正搞工業建設，处在困難時期，咱不能動不動就要求貸款。當初西鋪二十三戶缺這少那，人家可以到山上去取，你們閻家屯的貧雇農，為什麼不可以長志氣，也到山上去取呢。我看，你們就應該學習西鋪的這種精神，有困難自己克服。現在，你們社剛建立，八字還沒見一撇呢，就要求貸款，這對你們沒有好处。當然，必要

时，国家也会给你们支持，但从你们来说，不能有这依赖思想……”

“赵书记在屋吗？”

“谁呀？”

“我。”随着声音，从棉门帘里又探进来一个头。接着，这个戴着毡帽头、眉毛上胡子上都带冰碴的人就进来了，而且不只他一个，在他后边，又陆陆续续的进来好多——这些都是各村的干部。今天是鸡鸣村集，他们除去赶集以外，又顺便找赵书记请示工作来了。

和缪海山的说话被打断了。涌兴和这些后来的干部一一打过招呼，不用让，他们都各自找了坐位。大家高高兴兴挤满了一屋子。坐在里边的，除去于家沟的村长、梗子峪的支书、大安庄的治保主任外，其余都是新建社的社主任：强庄子的强玉清、斗岭子的刁贺、付家城的张保印、洪山口的王世举、廖各庄的赵瑞……他们请示的问题，除去治保主任和村长的民政工作，优抚工作等以外，其余大都是有关合作社的问题。而合作社的问题里，最多的又都是“没牲口、没车辆、要求贷点款”的问题。

涌兴原也是老村干部，他的性格又比较随和，所以，和各村干部的关系都是无拘无束。他的屋子不仅各村干部可以随意进来，全十区的每个农民和社员也都可以随意进来。他们在一起谈话，有公的，也有私的，“问题”“工作”都是在这样随时随地的交谈中解决的。

但今天，涌兴的态度却比以往有些严肃了。他的眼

睛总不断的盯着墙上新挂起的那張图纸，脑子里集中地在考虑着一件事……，对于这些“要求貸点款”的社干部，他一个一个的都把他們打发走，对繆海山說的那些話，他又郑重地向他們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傍晚午时，屋子里只剩下继增和他两个人。浦兴对继增說：

“从县委三級干部會議后，不到两个月時間，咱們全区就由原来的十一个社发展到四十三个社，几乎村村都有社了。这当然是件好事情。可是，随着社的发展，一个新的問題又出現了：社成立后，究竟應該怎么办？——許多干部思想还不明确。剛才来的这几个社主任就很明显。有些社稍有困难，就想貸款，單純依靠国家的思想很重。昨天叫办公室統計了一下：仅刁庄子、白馬峪、赵庄子等五个村，一次就要求貸款七百多元，要算上今天这些就更多。可是国家在一九五四年給咱們区全年的农貸数字还不到一百五十元。”

浦兴又把西鋪的总结拿出来，翻了一下，接着又說：“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再指出，勤儉經營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針。現在看，西鋪的經驗对我们越来越感到重要……”

“在这个問題上，西鋪二十三戶里开始也有思想斗争……”继增低着头，眯縫着眼，他說話和听別人說話都是很认真的。

“我現在考慮这么一个問題：农民是現實的，光讲道

理，思想問題不容易解决，我的意見是最好叫他們到西鋪去实际看一看——在建明社召开一个互助合作观摩現場会，把全区的社主任、支书、會計、社員代表都叫去，推广西鋪的經驗，豁着几天时间，把思想統一一下。你看怎么样？”

“行。”

湧興又說：“要开，咱們就要准备得充分一些。你看，除了勤儉办社以外，西鋪还有什么特点值得大家学习的？”

继增又低着头，眯縫着眼，想了半天說：“还有国藩杜奎他們的民主作风也好，有事常和大伙商量，这次上山打柴都是商量几次才定的。”

湧興說：“对，这点也很重要。”

“前些日子，他們几乎天天晚上在社址召开社員會，把問題、困难、家务財底摆給大家，发动大家討論、出主意、想办法。”

“这正符合地委和县委关于民主办社的指示。我看咱們这次現場会上，除了談他們的勤儉办社，还要介紹他們的民主办社。只有遇事和群众商量，傾听群众意見，才能發揮大家的积极性。你看行不行？”

“行。”

“开始我們少讲，主要叫国藩杜奎讲，叫二十三戶社員讲，叫大伙实际看，看完就分組討論，再組織大会发言，末了区委再拿出意見。”

“行。”继增都很同意。

两天后，在西铺就召开了互助合作观摩现场会。

在会议中间，各村干部亲眼看到和听到了二十三户社员在党的领导下，如何从三条驴腿起家，自力更生，勤俭创业，由穷变富的事迹；看到了他们依靠自己，克服困难，不向国家伸手，到山上去取的穷棒子精神；看到了就是依靠这种精神，在组织起来后，仅仅一年的时间，他们不仅有了车、马、牛、驴、猪、羊和各种农具，积累和扩大了公有财产，而且社员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谁不知道那尝尽旧社会一切疾苦、要过多年饭的王生，谁不知道那在旧社会走头无路、贫病交加、七口人仅盖一条被子的王荣，谁不知道那十四岁父母双亡、出房当地把三个妹妹送人、变成流浪乞讨的孤儿戴存……如今，他们都丰衣足食；家家都有了新被褥，个个都穿了新棉衣，囤里、缸里、盆里、罐里的粮食都直往外流；戴存不仅把房子赎回，把妹妹接回，而且在准备成亲。……看到这些景象，一二百个与会者都异常感动，有的甚至流下了眼泪。

通过这次会议，大伙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加强了办社的信心，也学到了办社的方法。西铺的经验在全区开花了。閻家屯的繆海山不再要求贷款；赵庄子、强庄子、斗岭子……各村原来提的要求都自动撤销；他们——支部书记和社主任都亲自带领社员去深山打柴。“缺柴缺米，到山上去取”，“缺驴缺马，到山上去拉”。勤俭之风、不依靠国家之风、自力更生之风盛行起来。只一冬，

全区就打了四百二十万斤柴。社比过去多了，贷款数字却比原来少了。一九五四年全区发放的农业贷款只四十多元，比一九五三年少十倍。在区委和周围兄弟社的鼓舞下，西铺的干劲更高，今后应该怎么办，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更明确了。

三

一九五六年初春的一个早晨，在西铺南山，在沟沟坎坎、高高低低的坡地梯田上，出现了一伙伙的劳动人群。人群比往日密，比往日多，比往日也干的欢、干的紧。他们穿着黑色的蓝色的衣服，挥动着胳膊，抡着大镐，搬着石块，抬着条筐。条筐一来一往，把大大小小石头从地当中送出来，送到一个陡壁处，又倒在山沟里。他们根据事先做好的规划，把可以清除的坝阶（在几块坡度不大的梯田上布满着很多零散的小坎阶的），清除了。这些象征着旧的私有制度留下的一道大界石，被打碎了。在他们的脚下，耕地一点点扩充，有的两块地合成一块地，有的四块地合成一块地。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坝阶一个个一块块减少了。他们从起大早吃过早饭到现在，还没休息。太阳从东方升起，又升高了，他们每个人的脑门上，冒出一层层的汗珠，镐刃迎着阳光，闪闪发亮。棉衣脱下来了，或者丢在一旁，或者摔在树枝上。他们有的光着膀子，有的只穿着一件单褂，在接近零度的气候里，并

不感到寒冷，而是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流着、流着一股巨大的热流……小褂很快又被汗水溻透了。

当日头老高、继增书记擦了擦汗、又和屈福万抬起一筐石头的时候，只听东边传来一声哨响，杜奎在喊着：

“休息半点钟！”

“嘩啦嘩……”一筐石头顺着山沟滚下去。

“休息半点钟！”

“嘩啦啦……”又是一筐。

人们听到杜奎第三次的喊声，才把鎬抛在一边，把筐放在跟前，男的和男的在一起，女的和女的在一起，各找地方坐下来。他们有的吸着烟，有的在高声谈论着。和往日不同，他们今天没有笑闹，谈论的是一些严肃的事。戴存今天也没上树，而是郑重的坐在大伙中间，听大伙谈论昨天晚上所没有谈论完的事。

“把这些坝阶拿下来，咱们种大倭瓜啊。”一个年青的农民提議着。

“才不种倭瓜呢。”另一个农民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倭瓜也种，但不占这些耕地，咱们刨鱼鳞坑，”将近六十岁的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年农民一边喝着水，一边說，“这些地咱们还是种粮食啊。”

“对，主要是种粮食，”队长屈福万也接过来，“咱们队通过倒坝阶、换坝阶、刨坝阶，一下就可扩充耕地三十多亩，加上其他三个队，全村就是一百好几十亩，要种粮食，起码可以多打五六万斤，这不是最好的‘实际行动’嘛。”

杜奎沒休息，也沒參加這議論，他光着脊梁，脖子上系着一條圍巾，扛着把鎬，穿過一條溝，從屈福万隊又到杜寶隊去了。

繼增書記坐在屈福万右边，他穿着個背心，披着個棉祆，卷着一棵烟，在吸着。他明白队长這“實際行動”的含意。自从地委周書記和县委曹書記來過一回，把他們的經驗總結去，《河北日報》和唐山《農民報》就大字標題，登出了遵化十區“書記動手、全黨辦社”，和西鋪村“勤儉辦社”的文章；緊接着，中央編選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又對這兩篇文章加了批語。當涌興他們倆分別在全區和全社範圍內層層開了好多个會，傳達這兩篇文章和中央的批語的時候，特別是傳達到：“……遵化縣的合作化運動中，有一個王國藩合作社，二十三戶貧農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稱為‘窮棒子社’。他們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時間內，‘從山上取來’了大批的生產資料，使得有些參觀的人感動得下淚。我看這就是我們整個國家的形象……”每一個社員、每一個黨員和每一個干部是受到了多大的鼓舞啊！而正在這時，西鋪村的初級社又決定和白馬峪、東鋪、大于家溝三個村合在一起，成立一個高級社。大家的情緒就更高了。“實際行動”就是表示他們對中央和各級黨委的回答，也表示他們對高級社的響應。

“我同意屈福万大哥說的，咱們還是得多種糧食，”婦女隊長也發表了意見，“杜寶那隊昨兒晚上都討論好了，人家不但要多種糧食，還計劃把一百多畝豆子谷子和雜

粮改种高产作物：棒子和白薯。”

“咱们队的生产计划和指标也应该重新做做。”

“就是。和尚坟那片地，咱们很可以改种棒子。一亩谷子最多只打二百上下斤，一亩棒子至少可以打四百。”

“毛主席表扬了咱建明社，全国也都知道了咱们，若不争取多打粮食不中啊。”

“去年咱们这儿粮食达到自给，没由国家供应；今年咱们非得由缺粮变成余粮才行，多了不敢说，起码交它国家几万斤——这才是最好的‘实际行动’。”

大伙你一言，我一语。正说到这里，一群黑的白的山羊、绵羊从半山腰里出现了，羊群蠕动着，随着地形起伏着。羊倌屈恩抽着响亮的鞭子，和羊群一起向这边拥过来。

“屈恩！”那个主张种大倭瓜的青年农民捂着嘴喊了。

“屈恩！”又一个农民喊着。

“到这歇会来！”

屈恩站住了，他听见了叫声，也用手捂着嘴，回答说：“不啊，我离不开羊，羊也离不开我啊！”

“你不是提过意见——放羊放够了吗？”大伙都知道二十三户之一的屈恩在前天还有换班思想，想调调工作。

“不啦！我要放一辈子啊……”随着回答，又是响亮的一鞭子，屈恩赶着羊群从小西沟又往庄户沟那边拐过去了。

羊群走远了。大伙从屈恩又谈到队里发展羊的问

題。繼增書記今天沒有多說話。他聽到社員們講的，看到大伙今天劳动的情緒，特別是屈恩在一天之內就有了这么大的变化，他心里有說不出的兴奋。他眯縫着眼，在心里想着、計劃着一些新的事：“把这些壠阶倒过、換过、刨过后，再跟國藩杜奎商量一下，組織大伙修一条水渠；清明节前后，再发动社員，大力突击一下植树造林。然后跟涌興商量一下区委在这里再召开一次現場会；糞價問題必須統一口徑，赶快落实下去，否則就要影响养猪；最重要的是干部和黨員的政治學習要健全起来，要國藩杜奎他們带头学习好；……”做為一个區委書記，他和涌興一样，想的很多很細很远，想到自己責任的重大。

半个钟头过去了。当一声哨响，杜奎出現时，繼增書記和大伙一样，复又起来，以更高的激情，投入到劳动的热潮里。

穷棒子精神

陈青山

高级化，财产多，不能再使毛驴车。

大囤流，小囤满，不能忘掉勤和俭。

上面两句话，反映了两种思想。一种是讲阔气、阔排场；一种是讲勤俭，不铺张。一九五五年冬，西铺、东铺、白馬峪、大于家沟四个村由初级社联合转为高级社，开始时，这两种思想，曾经有过一度激烈的斗争。

先是在社委会上，副主任高玉满首先发表了他的高见：“咱们社是全国知名的社。现在又高级化了，就应该有个高级化的样子。那些小毛驴和花轱辘车太不打眼啦。咱应该把小毛驴全卖了，买回大骡子大马；花轱辘车也卖了，换成胶轮车。这样，不但干活顶事，也衬得起咱们这个全国出名的社。”

高玉满一说完，好几个委员都发言支持他的意见。

只有副主任杜奎表示反对：“小毛驴和花轱辘车有它的用处，全卖了换成新的大的，怕不符合勤俭办社的精神吧！”

社主任王國藩靜靜地聽大家發言，看着爭論不休，他就說：“不管知名不知名，也不管初級社高級社，都得提高生產，不是為圖好看。再說，咱們高級社剛成立，八字還沒見一撇，就動手買大牲口大車，這符合不符合勤儉的原則？”

高玉滿側過臉來冲國藩一樂，又把臉轉向大家說：“勤儉是咱們建明社的傳統，當然不能忘掉，我認為把那些驴換成驃馬，幾個駱的料給一個驃或馬吃，這不是省料嗎？把幾個花帖轆車換成一輛膠輪車，幾個趕花帖轆車的人減到一個趕膠輪車，這不是省人嗎？難道這不符合勤儉原則？”說完回手把小烟袋鍋掏出來，插在烟口袋里使勁裝着煙，等待回答。

國藩瞅了瞅高玉滿，本想進一步說明自己的理由，但又一想：初級社是一村一社，干部和社員互相都了解；眼下四个村聯合組成高級社，彼此之間還不太清楚，急于反駁人家的意見有些不合适。再說，高玉滿原是白馬峪村初級社的主任，白馬峪是個富村，勤儉二字在他們心里還沒有根子，不如等大家把意見都發表出來，然后再一塊兒解決為好。這樣，把想好的話壓了回去，只說了句：“高玉滿又算了一筆賬，大伙討論一下吧。”高玉滿認為自己這個意見連國藩都沒回答上來，更加得意洋洋，滔滔不絕地又說了一陣。國藩聽他說完，不慌不忙地問道：

“老高，你說幾頭駝能換一头驃子？”

“嗯，按現在的牲口價，買一头驃子得賣七个駝吧。”

“車呢？”

高玉滿揚起胡茬密布的下頰，瞅着屋頂想了想：“就咱們社的這些車，三四輛換一輛膠輪吧。”

國藩說：“是呀，咱們社除了原有的大牲口大車以外，每個生產隊最多也不過八九頭駝、三四輛花帖轆車，若接你這個計劃把牲口和車都換了，每個生產隊不就變成一头驃馬、一輛膠輪車了嗎？這對生產有利嗎？”

“唉！你這不是活人叫尿憋死嗎？”高玉滿接着說，“咱們喊了多少天高級社好，高級社優越！究竟好在哪儿？優越在哪儿？只有使上大驃馬車才顯得提氣。”

國藩還是耐心地解釋說：“老高，你這個賬算了半天還是多花錢的賬。我們可要記住那句老話——過日子要從圓尖上省，不能從圓底上省。上級一再告訴咱們，一切要從需要與可能出發。區委的指示，也是要發揚勤儉辦社，自力更生的窮棒子精神。咱們高級社成立只这么几天，生產還沒搞，就花大批錢買驃馬和膠輪車，這不叫……”到嘴邊上的話，他又咽了回去，看了大伙一眼說：“大家想一想這麼辦合適嗎？”

大家聽國藩這一解釋，心里都明白了八九。有的說高玉滿想的太大，有的說他算的賬不对，也有的干脆說他有鋪張浪費思想。這個討論果然越來越激烈了。

討論到後來，大家的意見已逐漸一致，大多數人不贊成高玉滿這種讲排場的主張。會議本可結束。但是國藩又一想：買不買大牲口大車，不僅是個財產處理問題，更

是关系到勤儉和浪費的重大問題。通过这件具体事例，想法进一步提高大家的認識，不是更好嗎？他于是用商量的口气說：“咱們这个討論，如果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則，本来可以結束啦。可是这个問題，和咱社今后的生产有很大关系。生产队长們直接領導生产，究竟是买好还是不买好，他們比咱們更清楚。我想把队长們也找来一块儿商量一下。如果他們都不同意买，就沒有說的了；如果他們也同意买，咱們重新再研究。大家看这么办可以不？”各委員都点头同意。

一接到通知，队长們撂下饭碗就急忙來开会。十四个队的正副队长和管委会的全体委員，把社办公室挤了个满满腾腾。国藩他們几位主任为了主持會議方便，照旧坐在办公桌跟前。国藩先把上午管委会討論的情况作了一番介紹，特別談到买大牲口大車的問題时，他将高玉滿的主張和自己的意見不偏不倚的进行了說明。說完后他怕介紹的有遗漏或有偏差，扭头对高玉滿說：“老高，我有說的不全面和不恰当的地方，請你补充补充！”

高玉滿点头笑了笑，表示贊成国藩的介紹。国藩就向队长們說：

“你們不論对生产或对社員們的心情，比我們了解得多，你們还是多发表发表意見吧！”

沒等他說完，“轰”的一陣大笑。接着队长們就叨咕起来了。有的說：“这不是开玩笑嗎？咱們山地从古以来就有使毛驴的习惯。誰不知道咱这山坡子地送粪和收秋

都用毛驴駛，怎能把毛驴都卖掉呢？用七八个駒換一头驥子，干脆就別生產啦。”

有的說：“如果駝馬和膠輪車多的話，當然好，可是咱們社現時買得起嗎？”

十四隊隊長說得更具體：“就是買得起，也不能把毛駒和花帖轆車全卖掉哇。誰不知道我們隊山坡地多。聽說膠輪車拉東西是多，走平路可以，上坡下坡可費勁。走山地還不如花帖轆車好使哩！”他轉臉問有膠輪車的隊的隊長：“你們說是不是？”滿屋人都笑了。

隊長們對於勤儉和浪費的道理沒講多少，說的都是實際工作中的體驗，說服力却很強，管委会的干部們雖然也都是庄稼人，但開會多，談問題時，在方式和語氣要講究一些。這些隊長們可不講這個，都是直出直入，开门見山，對於高玉滿的批評確實有些火藥味。高玉滿也是從抗日時期就在村里負責的老干部。水里來火里去，經受了各種考驗。但由於工作條件不同，自己思想上又不夠警惕，滋長了好大喜功，讲究排場的毛病。眼下聽了這許多中肯的批評，等於吃了一服清涼解毒劑，心里大大震動了一下。老話說：“良藥苦口利于病”，他這個病，总算得到了醫治。加上他这个人平常胸怀開闊，不大計較個人面子這些小事，所以一旦认清了自己的毛病以後，倒也能愉快地接受別人的意見。他等大家說完以後，就站起來一揮手說：

“咳，問題是越爭論越明啊！聽大伙這樣一分析，我

認識到自己的主張既不符合實際，又不符合勤儉。地地道道是個鋪張浪費的計劃。同意大家對我的批評……現在我正式把那個講究排場的意見收回來。”

沒等他說完就啪啪地响起了一陣掌声，隨着掌声就是哄哄的議論聲。有的說管委會的工作認真，有的說高玉滿的自我批評精神好，一直議論到天黑才散。委員們隊長們因為這幾天工作很忙，一聽散會都急急忙忙地往回走。國藩因為今天這個會開得不錯，對今后勤儉辦社會起很大的作用，心裏很高興。對高玉滿的自我批評精神，也感到敬佩。但他還怕高玉滿心中嘀咕，想找他扯几句。高玉滿剛要上自行車，猛回头見國藩跟在後面，就又停住，對國藩說：

“我們村南那道泉水的工程是不是再向縣里請示一下，縣里既然答應給咱們勘測，就該快點派人動手，咱們明年開春好動工啊！”

國藩見他毫不介意，對工作依然這樣熱心，不由滿心高興，兩眼盯着他那忠厚而愉快的面孔，笑着說：

“老高，快回家吧，剛才你那報告挺累的啦。”

高玉滿嘴角扯起深深的笑紋，說：“你別逗了，什麼報告，我不知道那是檢討！”推起自行車走了几步，回头又冲國藩笑了笑，翹腿上車，“嗖”的一声飛走了。

第二年地一解凍，修泉的工程開始了。因為這工程在白馬峪村附近，又是高玉滿張羅的，管委會就責成他主管。高玉滿對這個工作果然很感興趣。每天領着測量員

滿山遍野的跑着測量，起初他除了給測量員介紹介紹地形，只是帮忙干点零碎活儿。几天后，他就象个內行人似的了。什么皮尺呀，水平仪呀，都敢摆弄摆弄，什么挖多寬多深呀，水的流量呀，也常插嘴算計算計。由于他对這項工程抓得紧，十几天就勘測完了。測量員臨走的这天，在泉旁和他交代說：

“高主任，开这道泉的工程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叫水順你們村南这道乾河沟往东流，这样做澆地少；一个是把水引过这条乾河沟，从你們村东头往西拐，一直繞到东鋪村头，能澆几个生产队的地。不过……”測量員用鉛筆敲打几下記錄本，揚頰对着眼前的乾河沟，“这个工程在咱們全县來說可算不小哇，要用水泥在河底修个暗洞，叫水从河南岸钻入暗洞，再从北岸钻出来，这叫引水过河。”

“怎么，水钻入地下还能够钻出来？”高玉滿惊奇地問。

“嗯，科学嘛！”測量員点点头，冲河沟揮舞了下記錄本，象对自己的設計十分滿意地說，“这工程从我毕业以后还是第一次遇到哪，你們若是能按质量完成的話，不但能澆地，还是一个很好的風景哪，水从暗洞中钻出来，由于压力大，和噴泉一样好看。你們建明社再来人参观，就非到这來看看不可，你說这不好嗎？”

高玉滿听了測量員这个美化的設計，不觉又引起了他那貪大好盛的心意，目光从測量員身上轉向四周劳动的人群，不由暗想：真要能修起这么个水渠，人們傍晚从

地里回来，洗洗手臉和衣服，青年男女在水泉邊游逛游逛多好啊！……正當他為這未來的美景入醉入迷的時候，忽然年前管委會上那碼事象布谷鳥一樣，不可，不可，叫開了。他回過頭來朝測量員問：

“按這個計劃，需要多少錢？”

“一千多元吧。”

“什麼？一千多——元？”

“高主任，這不算多，”測量員又加用一些名詞說，“……不光開渠、挖溝、修暗洞需要多少噸水泥，還需要鋼筋和木料等東西，再加上人工和運輸力，一千多元確實不多。”

“有比這個省錢的辦法嗎？”高玉滿沉思了一下，緩慢地問。

“唉！咱倆一起跑了這些天，你還不知道這是科學嗎？”測量員側過臉望了望太陽說：“對不起，我得趕快走啦，你們對這次工程有啥意見，往縣里打電話找我好啦。”

測量員說完就走了。高玉滿坐在河溝旁的土坎上，連抽了好幾袋烟，思考着這個工程的計劃，一直想到太陽落，下地的人們都往回走了，他才回家。一邊吃飯，一邊同年前買大牲口大車那碼事情比較。比來比去，比出了一條理由，他認為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上次自己提出的那個計劃，確實是根據不足，脫離實際；可是眼下這個水利工程計劃是測量員設計的，人家有充分的科學根據，說的又很全面。他覺得這回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提出

来和国藩主任商量了。主意已定，第二天早饭后他就奔社里来了。走进社院一看，一个木匠正在干活，旁边除了木匠家具，还有一些长短不齐的木杆子和厚薄不匀的板子，有的还是划了线和凿了眼的半成品。他正想往屋子里走，文教委员老王拿着尺子走了出来。两人打过招呼，他又打听国藩在不在，老王用尺子朝旁边那些板子一指说：

“你来的真不巧，国藩主任做木匠活刚走。”

“怎么，他干木匠活？”

老王说：“你不知道我们村要修篮球场了，国藩亲自帮着做篮球筐板哩，因为板子薄不合标准，他找板子去啦。”

高玉满一听他们村要做篮球架，可就想起年前那次会来了，于是说：“修篮球场跟生产有啥关系？”

老王说：“嘻！想不到你也这么说！你们当主任的这样不关心文化工作，叫我这文教委员怎当？现在是高级社了，总拿二十三户时候的眼光看问题还中？那时候找个会计都没有，现在哪村没有高小和中学毕业生？他们是有文化的年青人，和咱们不一样，每天有空打个篮球什么的可少不得呀！”

老王这个人乐观好胜的劲儿比高玉满还大。旧社会那时候，虽然村里很穷，过年过节唱戏或办会什么的，差不多都是他操持；办社这些年，村里开个什么会或操办业余剧团等事也是他领头，所以村里选上他当文教委员。一样的事情，叫他一说，准使你高兴。高玉满听他这一解

釋，自己那股貪大好盛的勁头更上来了，嘴角上扯着笑紋，兴奋地眨着眼睛。老王見他听得入了迷，故意逗他，用尺子朝北一指說：

“不但修籃球場，我还打算在社对过那楊樹行前边蓋个戏樓，从咱们社里挑选一批青年演員。往后庆丰收时，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光开会，咱们白天是籃球賽，晚上是大戏，叫周围各社的人們都到咱们建明社來看热闹……。”

“嘿，你这个文教委員气派可不小哇！可是你这些計劃國藩主任都同意了嗎？”高玉滿似信非信地問。

老王一乐，口气变慢地說：“嗯，这不过是我的打算，可沒敢和他說哪。光这个籃球架，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依我說应当从城里买副新的，既合規格又好看，可國藩說：‘咱社有木料又有木匠，自己做就行啦。’結果这些木料果然不合标准。”他猫腰拿起一块划了綫的板子說：“据青年人們說，籃球筐的遮板都得好松木，这楊木不中。可就是这楊木吧，也太薄啊！經我好說歹說，他才又找板子去了……”

他俩正說着，國藩扛着块木板来了。老王上前先用尺子量了量，說：“这还是不够标准呀！”

國藩把木板放在地上說：“走路多快的人，也得一步一步的走，絕不能一步就蹦很远。我們这些板虽然不合規格，可是总比沒有强。等生产提高了，再做标准的还不中嗎？”

老王臉色一紅，勉强地笑了笑，不言語了。这回輪

着高玉滿逗老王了：“王文教委員，你那蓋戲樓的計劃怎么样？”

“去你的吧！”老王冲高玉滿使了个眼神又說，“你不是找國藩有事嗎？”

國藩和高玉滿到了屋里，两人都抽着了烟，高玉滿便把修泉的計劃介紹了一遍，几天來學的那些名詞術語都用上了。最後說：

“這一千多元確實不少哇，我想用別的辦法代替，向村裏有經驗的老農打听，都說這道水自古以來就在那乾溝南邊，要使水流過這河沟可實在沒辦法。看起來科學技術可不簡單哪。”

國藩把抽盡了的煙灰往板凳上磕了磕，說：“是呀，科學我們不能反對，可是群眾里也有科學呀，咱們鄉間有好多病醫院治不好，可是村里有些老偏方一治就好，你說這不是科學嗎？”

高玉滿不自然地笑了笑，手擺弄着煙袋說：“這個我明白，不過這修泉的偏方到哪去找呢？”

國藩說：“偏方有哇，咱們縣君子口村袁士珍不是全國的勞模嗎？他在造林和引水上山等方面有很多創造，到他那里去找一找怎么样？”

“對，對！”高玉滿高興地站了起來，說，“你一說，我就想起了，去年在黨訓班學習時，領導上一再指出：只有虛心向別人學習，才能學會本領，解決困難。我怎麼又忘了呢！明天我就去好不好？”

國藩点了点头，高玉滿高高兴兴地走了。第三天午飯后，社里正开管委会，高玉滿回來了。大家剛站起來要打招呼，他就滿面帶笑的說开了：

“这回可有了办法啦。人家袁士珍把水引上山去，也沒有修地下暗洞，好多沟坎都是用渡槽把水引了过去。咱們这个工程我也和袁士珍說了，我俩商量了一番，修个桥式的大渡槽也能代替那地下暗洞，你們看怎么样？”

大家經過一番討論，都同意这个办法。并且让高玉滿繼續主管這項工作。同时还决定从各生产队抽調一些强劳动力投入這項工程。高玉滿領着这些人大干了十几天，工程就完成了。

这天傍黑就要放水了。王国藩、杜奎、于永水、張永清这四位主任帶領着全体委員都去參觀，他們到达时，四周男男女女早已把渡槽圍了个風雨不透，正在七嘴八舌称赞这个工程。國藩他們一看果然有点来头，那渡槽长有几丈，寬有三尺，桩和架是木头的，槽面是用石头和白灰砌成的，从南到北和鏡一样的平，和白瓷一样的白。人們正不絕口的夸贊，只听高玉滿在槽南头大声喊叫：

“大家注意，放水啦！”

國藩他們剛喊了声“好！”水“嘩”的一声順槽面流了过来。人們哄的一声欢腾起来。有的人挤到槽头洗手，有的人蹲在槽面上喝水，姑娘和小伙子們說笑着濺水玩。几位主任在旁一商議，國藩就大声向人們說：

“大家注意啦，叫高主任把这个工程的修建經過說說

中不中？”

“中！”人們大声拥护。高玉滿一手拄着铁鍬，一手擦了一下他那黑胡茬的嘴巴，說：“这工程原計劃在河沟下修一个水泥暗洞，成本是一千多元。經過國藩和我們研究以后，决定到袁士珍那里去參觀學習，回來才改變成修这个渡槽。渡槽的木料是咱們山坡上的树；槽面的石头也是咱們山上的石头。除去买了几百斤白灰以外，都是咱們自己家出的料。把那些料都算錢的話，共合五十多元，比原来計劃节省一千元。……”听到这里，大家的掌声象打雷一样。

熱鬧了好一陣，聚集的人群才逐漸走散了。几位主任和往常一样，一边走着，一边談工作，一直談到白馬峪村头。國藩看了看墨黑的天空，跟高玉滿打趣地說：

“老高，你剛才的这个報告，不能再算是檢討吧？”这回，高玉滿心懷暢快，嘿嘿地笑了。

幸 福 哪 来？

張 朴

穷山坡，石头多，
上山下山鞋磨破，
姑娘做双绣花鞋，
下山不想再上坡。

穷山坡，石头多，
石头怎比光棍多，
一間破屋半床被，
黑天白日是自个。

在旧社会，这里的姑娘，眼睛都是向下看的，穷苦的生活，艰难的岁月，逼迫得她們一心一意想嫁到山下面去，离开这些穷山沟，苦山崗。姑娘們出嫁的时候，娘家是陪送不起嫁妝的，只給做一双绣花鞋，穿着这双绣花鞋走下山去，就再也沒有回头的日子。

姑娘們长大了，一个个嫁到山下，这可苦了小伙子們。过去，在四十里鋪一輩子娶不上媳妇，終身打光棍的，并不在少数。可是，自从一九五二年成立了“穷棒子”

农业社以来，仅仅經過了四年的时间，穷山沟变成了富山沟，苦山崗变成了笑山崗，乱石道变成了平馬路，破茅屋变成了石瓦房，家家銀行里有存款，屋子里放着丰产粮。山上的姑娘再不想往山下嫁了，就连山下的姑娘也抬起头来，自动地找上山去。仅一九五六年一年，建明社就有二十一对結婚的。

地里粮食丰产，家里增添人口，人財两盛，真是天大的喜事，全村到处是笑声，老人孩子一齐乐。可是，就在这大喜的日子里，发生了一場小風波。

过去下地，集合钟沒响，小伙子們早在集合場里，說說笑笑打打鬧鬧，說一声下地，整齐得就象天上的雁群。自从結婚的多了，日子富裕了，下地就不那么整齐，总是成对成双的，有时集合钟敲过了，小两口才慢慢的走出来，到收工的时候，太阳剛剛压着山頂，小伙子們就沉不住气了，总是东張張西望望，看看自己的媳妇在哪个山坡上干活。新媳妇們也願意早点回去，梳洗梳洗打扮打扮。这样时间一长，上工的时间晚了，收工的时间早了，本来当天可以做完的活計，就拖到第二天，再加上搬山坡換地块，这样就耽悞不少的工夫。有的小伙子还常常曠工，队长批評他們，他們說：“仓里有粮，銀行里有錢，少干两天也受不了憋，忙什么？”有的小伙子还鬧吃鬧穿，抱怨生活不好，願意出門找个工作，說什么：“掙錢不掙錢，鬧身海潮藍。”老人們看到这些現象，摇头叹氣說：“人心沒足，他們可知道过去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可是又不願意开

口，觉得队长說他們还不听呢，自己何必再費唾沫。

这一天，邵庆昌的儿子邵海由地里回来，看見桌子上又摆的是玉米面餅子秫米粥，就把筷子一摔，說：

“老是玉米面餅子秫米粥，好象不吃这个心眼受不了似的，我又不是专吃玉米高粱的虫，就不許換換样，吃点白面梗米也死不了人。”

邵庆昌老汉一听這話生气的說：

“你小子想吃什么？想赴席沒人摆，想喝酒沒人买。过去皇上吃得好，那都是穷人的血汗，燒餅果子沾香油好吃，那得劳动去掙。玉米高粱这是庄稼人的上等粮食，你小子坐轎不知道腳磨地，这玉米高粱都是一把汗一把汗掙来的，你翅膀沒长全，倒挑起飯食来了。”

儿子也不肯让父亲，就你一句我一句地頂起来。鬧得一家子都沒吃飯。邵庆昌老汉赌气找到国藩和杜奎說：

“主任，你們得管管邵海这小子，他走路光挑着干岸站，忘了过去的河沟是怎么过来的，老子才几天不吃糠咽菜，他就摔筷子砸碗砸飯食。这日子没法过了。”

邵庆昌老汉的話還沒完，一个队长闖进门來說：

“主任！咱这活没法干了，队里屈風自打娶了媳妇，晚上看戏白天睡觉，不是赶集、就是串亲，你叫他干活，脑瓜子一搖三撥浪，咱这庄稼怎么种？”

其实这些現象国藩和杜奎都看到眼里，他們把两个人打发走后，就召开了一次支委会，会上大家把最近的情况一汇集、研究，就觉得上級党提出要加強年青一代的社

会主义教育，实在是非常迫切的。当场决定派国藩和杜奎对这班青年进行一次教育。

晚饭后，月亮从长峪山头露出脸来，集合钟响了，青年男女走进小学校。除了新结婚二十多对之外，还有没结婚的小伙子和姑娘们，一共不下六七十号人。大家说说笑笑，整个教室象翻了江。就在这个时候国藩和杜奎走进门来。杜奎说了声：“现在开会。”大家静下来。有的人还在小声议论着今天开会的内容，这个说一定是有突击任务，那个说，说不一定是派人到拖拉机站去学习……另一个说：“嗨，别说话啦，王主任要说话啦。”

国藩站在讲台上，扫视大家一眼，说：

“今天我们开一个学习会，我要问大家几个问题……”

一个小伙子又高兴又调皮的说：

“主任，你问吧，我们的学习坚持的可好啦，国内外大事，生产知识，保险有问必答。”

“不，”王国藩摇摇头，“我不问国内外大事、也不问生产知识，我要问问你们，我们今天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这一下把好多人问愣了，明明生活过得很好，怎么又问过得怎么样呢？也有些人好象心虚，他们低下头不吭一声。一个小伙子说：

“我们生活过得很幸福。”

有些人也附和着说：

“对，我们生活过得很幸福。”

“是呀，我們生活过得很幸福，”國藩重複着大家的話，“可是，我再問問你們，我們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大家觉得这个問題問得有点奇怪，一个小伙子笑嘻嘻的，好象这个問題不值得一答似的說：

“怎么来的，这誰不知道，劳动換來的唄！”

國藩的臉色变的严肃起来，他的話說得很慢，可是很有分量，

“劳动換來的？那么我来問你，你爷爷劳动了沒有？你爸爸劳动了沒有？为什么他們穷苦了一輩子，不用說过上幸福生活，連碗飽飯也吃不上？”

这一下可把小伙子問住了，整个教室鴉雀无声。

杜奎的火早就憋不住了，他嗖地一下跳上台去說：

“你爷爷給地主做了一輩子长活，死了連个棺材也买不起，用領破席卷了卷埋了；你爸也給地主当了一輩子牛馬，灾荒年落了个餓死，他們哪一点比你們劳动的差？他們天天比日头起的还早，比牛馬干的还多，为什么过不上幸福日子？你說呀！”

祖一輩，父一輩的穷苦生活，出現在大家眼前……大家低头沉思着，誰也不說一句話。

忽然，在教室后面傳来低低的嗚咽声，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外号叫二大肚子的王子林在哭。國藩知道他从小受苦，就說：

“王子林，你說說你小时候的生活。”

國藩这样一說王子林哭得更厉害了。國藩說，

“別哭，你說說嘛。”

王子林抹了两把泪，看了看大家說：

“你們知道，我的外号为什么叫二大肚子嗎？”

有几个小伙子哧哧地想笑，可是被整个的严肃空气給压住了。

王子林接着說：

“那一年鬧災荒，媽媽餓得生了病，她倒在炕上一点力气也沒有了，对爸說：‘你給我个窩窩吃吧，吃个窩窩我这病就好啦。’可是我們家連一口窩窩也沒有，急的爸在屋里打轉轉。好容易爸从別人家要了一个窩窩来，媽媽两手捧着窩窩，看見我們餓得那个样子，她流下泪来，舍不得咬一口窩窩。”

說到这他又哭起来，許多人都低下头。他又接着說：

“媽媽病不好，爸还得給地主去扛活，家里一点吃的也沒有，姐姐就到山坡挑野菜給我吃，越吃野菜我越觉得餓，胳膊腿瘦得象麻杆一样細，肚子越来越大，人們才給我起了个外号，叫二大肚子。”

說到这里許多人都落泪了。國藩接着說：

“過去的日子这么苦，可是現在的生活还有人不知足，摔筷子砸碗挑飯食，不願意吃玉米窩窩穀米粥。就說邵海吧，你知道你爸爸媽媽過去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你們原来是馬峰峪人，在那里实在沒法混了，你爸用一副挑子把你們挑出来，你們連个住处也沒有，你媽媽要飯吃，在半路上生的你。你問問你爸爸媽媽，他們过去見过白

面梗米什么样？他們在入社以前可吃过几頓餃子？你現在都嫌玉米面窝窝秫米粥不好吃。大家好好的想一想過去的日子吧。”

國藩的話聲剛落，許多人紛紛要求發言。王生的大兒子述說着他小時候，跟着爸爸要飯的苦處，住破廟，住山洞，蹲樹窟窿，狗咬人罵，挨餓受凍……

大家听了這些事實，都哭了起来。

國藩和杜奎覺得时机已到，又重新向大家問道：

“你們再仔細的想想，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到底是怎麼來的？”

剛才發言的那个小伙子，站起來慢慢的說：

“因為有共產黨的領導。”

“對，”國藩向前跨了一步，提高了聲音說，“是共產黨救了我們，共產黨領導我們成立了農業社，窮山崗才長出好庄稼，苦山沟才有了好日子，窮棒子們才變得象個人！可是你們想想，你們對得起黨嗎？”

杜奎剛才的火還沒有壓下去，沒等國藩說完，他就搶着說：

“你們哪一點對得起黨？黨叫我們過上好日子，窮棒子娶上了新媳婦，你們就什麼都忘了，上工晚，收工早，摔筷子砸碗挑飯食，還說我們這裡生活不好，要到外面找工作，小兩口整天價趕集走亲戚。雖說兩口子應當親熱熱，可也不能見了媳婦連工作生產都忘了。”

杜奎說到這裡停了停，國藩又接他上面的話茬說：

“党領導我們走合作化的道路，就為的是我們過好日子，過幸福的生活，小兩口親熱，感情好，這是好事，不能象我們那個時候，結婚几年，在街上還不敢和媳婦說話。”

有幾個人被說的笑了，旁邊的人趕緊制止他。國藩又接着說：

“想想過去，看看現在，生活越幸福，工作生產的勁頭就應當越大。再說，我們的生活還沒有達到真正幸福的地步，這幸福就象一座山，”他指着窗外遠遠的景忠山，“我們現在才剛剛登着山根下面的一塊石头，就滿足了，就懈勁了，那什麼時候才能爬到山頂上？什麼時候才能過上真正幸福生活？離共產主義還遠着哪，還得加把勁，使勁干！”

小伙子們被說得低頭不語。忽然屈風站起身來，羞愧的說：

“主任，過去我錯了。我覺得咱們的生活差不多了，該享享福啦，就把工作生產丟在了腦後。這不是我們兩都還在這呢，以後保證改過。”

國藩和杜奎見屈風檢查自己，就對大家說：

“屈風檢查了自己，你們大伙也說說，看近來的出工情況怎麼樣？”

“不好，不好……”聲音說得低沉而慚愧。

“那麼，我提議，”國藩說，“明天晚上，以團支部為核心，召開一個青年生產出工檢討會，大家說中不中？”

“中！”

杜奎又接着說：

“我提議，从后天起，請我們村受苦的老人，給我們講
講他們的历史，大家看中不中？”

“中！”

这两声中字，說得这样响亮，震得教室嗡嗡地直响，
声音在寂靜的深夜里，一直傳到长峪山谷中。

从此以后，每天晚上，青年們都集合在这个教室里，
听自己的長輩們讲他們過去的血泪史。每天清早，当集
合钟敲响的时候，男女青年社員們早已經带头走出村庄，
他們排得那么整齐，又歌又舞，歌声越响，生产进度也就
越快，庄稼长得也就越强。

再上柴山

刘哲

一九六二年，秋天过去，冬天开始了。

大地，又脱去了绿色的盛装，露出了它本来的面目，厚重、雄伟、辽阔。

公路两旁的梨树、栗树、橡树、杨树……象列队似的，拉开了一排排、一条条的哨兵线。

有六辆胶皮车，出了西铺村，沿着公路，朝着东方，朝着太阳，锵锵地跑着。车把式耍着清脆的鞭子，车铃放出叮叮当当的响声，马儿撒着欢，咴咴地叫着。

每辆车都坐着十多个人，他们都穿着崭新的棉衣，戴着棉帽，一个个闪着黑红黑红的面孔，笑着、闹着、唱着。他们屁股下面坐着一卷一卷的行李，行李下面是一袋一袋的粮食。镰刀、扁担、绳子横七竖八地插在空隙处。油、盐、大白菜装载在车尾巴上。

这是一支西铺大队的战斗队。他们刚刚结束了秋种、秋收、秋整，刚刚结束了庆祝建社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没有休息，就整顿人马，准备行装，在党支部的号召下，再上柴山，打柴练兵。

領隊的仍旧是大队长杜奎。他坐在头辆車的前边，目光炯炯地望着前方。十年，短短十年間的农业生产合作化，特別是最近三年間的人民公社化，給山村带来的巨大变化，在他心里也象拉开了一条哨兵綫。

过去是三条驴腿人扛糧；如今是牛馬成群拖拉机……

过去是蓬門草屋，風扫地月当灯；如今是高房瓦舍，电灯電話……

过去是山高土薄，愁澇愁旱；如今是水庫閃着銀光，梯田翻起稻浪……

但是，革命的路上永远是不平坦的。村支部最近一次会上，就研究了这样的問題：要加强对年青一代的教育。有些年青人，由于生活的改善，由于缺少艰苦的鍛炼，逐渐已經忘掉了过去的苦日子是怎样过来的。这次趁丰收以后，发起上山砍柴，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解决社員今冬明春的取暖做飯問題，另一方面也是要發揚老傳統，让这伙小青年也尝尝甘苦滋味。所以，六七十个劳力中青年人占了大部分。

杜奎想到这儿，回过头来看看身后几个小伙子，見他們正聚精会神地在一顛一簸的車上打百分。二队队长老王荣戴着狗皮帽，挤在一旁，正想得出神。

杜奎用手肘碰了一下，問：“大哥，你这回出来想点啥？”

“想点啥？还不是为了咱队里的事！”

“什么事？”

“今早出来时，咱队張金龙这小伙子老三老四地說，这回打来的柴，一定要各打各要，否則，他不干了。你想，这象話嗎？”

“各打各要？”杜奎立即眉毛一立，“你怎么回答呢？”

老王荣把狗皮帽往后一掀：“我說，那还行！要是各打各要，那些留在家里搞生产的怎么办呢？副业上的人怎么办呢？飼養員怎么办呢？咱得巩固集体呀！”

“对！”杜奎长出了一口气，“这回你算批評对了。不管什么事，咱们得首先想到集体，巩固集体。”

从这件事上，杜奎想到老王荣这几年来变化。尽管在有些事情上，他还是好打小算盘，但是集体的观念是强多了。比如秋收时，有一天晚上忽然下起了雨，队上新打的三四千块土坯碼在場上沒有苫头，队里的席又不够用。王荣就把自己家里的新炕席揭下来苫在坯垛上，还不够，又把新雨布拿来苫上。这就带动了好几戶社員，有的拿席，有的拿草帘，把坯苫好，沒有受到損失。可見老貧农毕竟是老貧农，他的心和党的心，和广大社員的心是貼在一起的。

“这回打柴，你是后勤，完成任务有信心嗎？”杜奎又給他出了个难题。

“嗨，怎会沒有信心！你看，咱們过去二十三戶打柴是怎么样的队伍？这回打柴可是怎么样的队伍！嘿嘿！”老王荣咧开嘴乐了。

他們正这样叨咕着，“嗖——”后面飞上了一辆自行车。車上坐着戴存。这个孤儿現在已經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他笑着打招呼道：“四叔，我先走一步了，咱們郭家峪見！”

“嗖——”后面又飞上了一輪自行车，車上坐着村团支部書記屈文。他左手把着車，右手揚起打招呼說：“四叔，咱們打头陣了！”

“嗖——嗖——”接連十多辆打柴队的自行车，象雁行般輕巧地掠过，消失在远方的山谷里。

轉眼打柴队进山已經三天了。头两天，打柴这个劳动，这伙青年还感到新鮮。天不高，他們唱着歌儿进山。尽管密密集集的柴林，連兔子也钻不进去，鐮刀一砍一蹦老高，可是他們手划破了不喊痛，柴捆子也是压了又压，紧了又紧，每挑总有一百五六十斤。到了第三天，情况就两样了。歌声消沉了，許多小伙子头搭拉着；柴捆子也变小了，走起路来两腿打晃。有个别的，还悄悄嘟囔：“大冷天，什么活不好干？扛柴！一担柴能值几个錢？不干也受不了憋！”这些現象，杜奎都看在了眼里。

这天晚上，他把青年們集合起来开会。

会前，“歌手們”歌不唱了，“扑克迷們”扑克也不玩了，一个个呆坐着，低头癟嘴，象斗敗了的公鸡。杜奎有意繞上去摸摸这个的肩头，扳开手看看那个的手掌心。只見大部分人肩头紅肿了，手掌心也血泡累血泡。說实

在的，他有点心疼他們。但是一个战士在困难面前能够这样斗志消沉嗎？这是万万不能够的。他于是亮开象洪钟一样的嗓音問：“怎么，一个个都蔫巴啦？”

有些人羞怯地一乐。

隨着，他提議說：“唱个歌不好嗎？”

团支书屈文首先响应：“对，咱们唱个歌，先唱《社会主义好》！”

雄壮的歌声起来了，許多人立即就显出了青年的朝气。

唱过了《社会主义好》，屈文又提議：“咱们再唱个《社員就是向阳花》。”

公社是棵长青藤，
社員都是藤上瓜，
瓜儿連着藤，
藤儿牵着瓜……

唱完歌，杜奎說：“現在开会，大伙都說說，是不是有点嗆不住了？”

有的說：“咋一来是不大习惯，过几天想必就好啦！”

有的說：“最高的山咱能过，这点苦就不能受？沒問題，就是让咱专业打柴也行！”

但也有少数人縮着不吭声。有个叫吳德光的，嘟起嘴，不知在生誰的气。

杜奎有意挑他說：“小吳，背后你是有意見的，这回也

當面說說是些啥想法？”

小吳把小分頭一擺，果然一點也不示弱：“說就說，怕啥！大冷天為什麼一定要上山喝西北風？人身是肉長的，又不是石头！家里活有的是，為什麼非來砍這一星半點柴？”

小吳話音剛落，矮胖子張金龍也敲起邊鼓：“說不苦那是瞎話，照我說早点回去算啦！”

這一挑，爭論就明了。會場立刻熱烈起來。

戴存說：“咱們是打柴鍛煉來了，不是享福來了。苦一點又怕什麼呢？三条驴腿創業的時候，不比這更苦嗎？”

屈文說：“咱們青年人老喊着要學習先輩的革命精神，這點苦都受不了，還革什麼命？”

小吳還是頑牛：“到啥時候說啥話，誰讓咱生在這個好時候呢！”

“生在好時候，就該躺倒光享受不勞動了？”

“都象你一樣，咱國家的邊遠地區還怎麼建設？”

會場上此時成了短兵相接。

“回家干別的活不是一樣勞動嗎？”

“你這是避重就輕，見困難就退縮！”

“衣服破了，你給我買嗎？”

“你這是胡鬧，打柴哪有不挂破衣服的！”

杜奎聽到這裡，再也忍不住了，他把手一揮，大聲說：“都靜下來，我也說几句。你們都是基干民兵。有了戰鬥

任务，是坚决克服困难，消灭敌人呢？还是撒腿往后跑，当逃兵呢？”话不多，可是打中了一些人的要害。好多人都低头不语了。

杜奎接着又把过去二十三户时上山打柴的情况说了说，目的是启发他们忆苦思甜。末了，他当场宣布：“这回打柴，咱们强调自愿。愿意留下的，咱们欢迎；坚持回去的，咱们也不强留！”

会后，吴德光等少数人，还是卷卷行李回去了，张金龙随大流留了下来。

这样又过了七八天。这中间杜奎接到通知，回去开会。他就把山上的工作临时交给五队队长杜宝负责。杜宝是西铺大队六个生产队里的一个老队长，一向以打硬仗著名。几年来风里雨里，水里火里，一直跑在社员们的前头。可是他不大会说话，有时工作方法也比较简单。

这时，沙河套上的柴堆，已经垛得象一座小山。原来瞧不起打柴的人，也动心了。他们想：“眼前柴价挺贵，要是各人打的都归自己，会是一笔不少的收入呀！”有些人就在背后嘀咕。

有一回，张金龙等挑着柴担下山时，杜宝一看就来气了：“小伙子，你今天没有吃饱饭还是咋的？柴担子不怕被老鹰叼走？”

“人家有力气的人不上山有啥法，我就只能挑这一点！”

“噢！”杜宝吼上了：“年纪轻轻，自私心就这么重哪！”

回去我准告訴你爹。”

“你不是咱們隊的，管不着！”

“同你說，不解決問題。”跟在張金龍后面一个小伙子也插言帮腔。

这一下，把杜寶氣炸了。他放下柴担想发作，但又一想：自己是領導，和社員打架不象話，只得把這口氣咽進了肚里，挑起柴担自管自趕路。

回到宿營地，剛好杜奎回來了。他一面擦汗，一面硬聲硬氣地說：“老奎，你回來可好了，這摊子事你挑起吧，我算沒有這個能耐！”

杜奎笑笑說：“怎麼啦？”

“怎麼？張金龍這小子今天沒把人肚子氣炸！”隨着把事情經過一五一十說了。

杜奎立時立起了眉毛，細細一捉摸，知道問題的核心還是打了柴歸誰所有。要是松口說，各打各要，無疑是可以鼓起少數人的積極性的。但是這樣做行嗎？首先這和大隊支部的決定，廣大社員的利益不相符。再說這樣的積極性能維持多久？發展下去將會是什麼樣子？無疑是既削弱了集體，又禍害了個人。他於是當天晚上又組織了一個小辯論會。辯論的題目是：集體打柴該歸誰？

爭論一開始就展开了。

張金龍等少數人說，咱們在山上死氣慄力，挨冷受凍，打了柴按理應該歸自己。家里人想要，也可以自己來嘛！

屈文、戴存等多數人說，咱們二十三戶穷棒子社由穷到富就是靠的集体。从前单干的时候，一家一户誰也沒有闹好过。这回咱們來打柴，队里給拿着油、菜，补助着粮食，打柴归个人不合理。

末了，杜奎亮开大嗓門，問那些主張各打各要的人說：“你們主張打来的柴應該归自己，人家飼養員不燒柴中不？放牧的不燒柴中不？彈花的不燒柴中不？仓库保管員不燒柴中不？榨油的不燒柴中不？米面加工的不燒柴中不？打铁的不燒柴中不？車輛修理的不燒柴中不？會計不燒柴中不？……还有其他副业生产的人不燒柴中不？要是这样，人家把牲畜、羊群、榨油、打铁等等都归自己中不？……”

这一連串簡短、急促的問話，一句句象小鋼錘一样敲在每个人的心坎上。敲得大伙眉飞色舞，非常解气；敲得張金龙等少数人，理屈詞穷，張口結舌。会場頓時一片鴉靜，只听到喘气的声音。

杜奎沉了沉，瞅瞅大伙，見張金龙等少数人低下头不說話了，知道已击中了要害。然后，他又和緩地劝大伙：“現在咱們一举一动，都得想到集体。咱們的每捆柴禾中有別人的一份，別人的劳动中也有咱們的一份。这叫做大伙为一人，一人為大伙。象有些人那样，只看到自己，看不到別人，只看到芝麻綠豆大的小利，看不到长远的大利，那叫自私自利，資本主义个人主义思想……”說到这里，他忽然提高聲音：“你們是要集体主义思想呢？

还是要个人主义思想？”下面异口同声地回答：“我們要集体主义思想！”这时，他才松了一口气，笑笑問：“要集体主义思想該怎么办呢？为什么有些人松松散散、疲疲沓沓，一天才割麻抓似的两小捆？那叫啥集体主义思想！”

張金龙慚愧地立起來說：“我过去想錯了，保证改过，你，你就看明天的吧！”接着別的人也表示了态度，一定要好好干。

接連几天，杜奎領头帶他們上山，火辣辣地干了一場。

正在这时，党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公報的精神下达了。杜奎對他們作了傳達，同时还和当地党支部一起組織學習討論。通过这次学习，大家的眼界寬闊了，都認識到发展集体經濟，坚持阶级斗争的重要。思想觉悟无形中提高了一步。許多青年紛紛表示：“我們要忆苦思甜，不忘阶级斗争，誓作紅色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我們要吃得苦，經得起風雨，把老建明社的革命紅旗扛到底！”……立时，山上出現了一个热烈的打柴竟賽高潮。

由于家里社員群众也学习了党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公報的精神，集体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开花結果了。中途回家的几个青年，檢討了自己的錯誤，也再次要求回山。他們同样受到了山上全体青年和社員們的欢迎。

轉眼一个月过去了。預定打柴的日子已經滿期。西鋪大队党支部考慮到山上的社員們都很累了，而家里又忙着要突击送糞，就写信来催他們回去。可是这伙青年

們一个个表示，要再多打一些时候，为集体多儲备一些柴火，累积一些資金。及至国藩第二次写信来催，才不得不整队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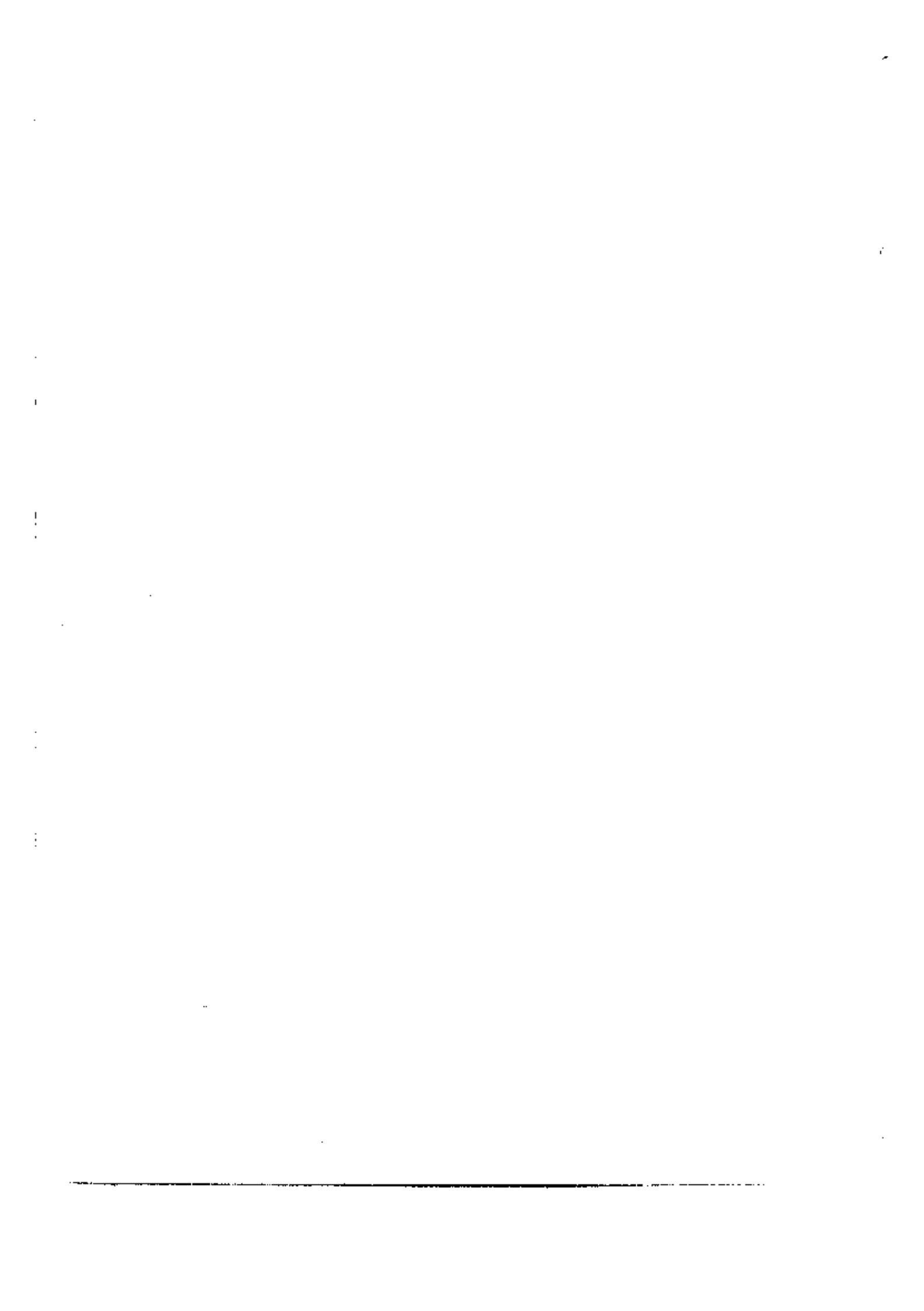
临走时，当地許多群众連夜为队员們准备饭食，清晨起来又把队员們送出好几里路远，才恋恋不舍地分別了。

在短短一个月里，他們共打了六十多万斤柴，练出了一支紅色的队伍。



第二部分

二十三戶



二十三戶小史

張 庆 田

遵化縣的合作化運動中，有一個王國藩合作社，二十三戶貧農只有三條駝腿，被人稱為“窮棒子社”。他們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時間內，“從山上取來”了大批的生產資料，使得有些參觀的人感動得下淚。我看這就是我們整個國家的形象。

——摘自《書記動手、全黨辦社》的按語

這二十三戶是什麼樣的人呢？讀過這篇文章按語的讀者，很可能想了解一下。這二十三戶的名單如下：

王國藩 杜奎 王生 王榮 王林 王金平 戴存
梁近田 邵慶林 邵慶昌 杜春 杜星 杜亮 杜
同 佟印 佟启 佟瑞芝 佟春 范玉林 吳秀英
溫自禮 田玉蓮 屈恩

解放以前，全村一百五十四戶，只有十五戶能維持生活。十五戶當中有四戶地主，三戶富農，八戶富裕中農。其餘，大部分跟人家扛活、做月、討吃、背“毛”（在金礦背

矿石)、开店以及走关东等等。

提到貧苦，这二十三戶貧苦农民当中，除去會計佟启以外，其他二十二戶，有的人要过飯，有的人扛过活、做过月，有的人給地主看过树，有的人在金矿給人家挖过金。王生一家子要过二十四年的飯，王荣也要过飯，戴存是一个孤儿，屈恩是个老羊倌。

就是这些人，曾經在县委、区委領導下，提高了阶级觉悟，組織起来，自力更生，发憤图强，勤儉办社，終于改变了西鋪地区一穷二白的面貌。这就是人們称道的“穷棒子精神”。

西鋪村前，千百年来都是一片沙石，沙多土薄。一九四九年以后，种上树了。这片防風林种得很好。短短的十年之内，綠树长得象綠色的长城一般；建明湖的水，弯弯曲曲，流到村子前面。初次来到这里的人，如果不知道往日的历史，很难体会这个地区的変化。在这里住得久的人，如果不想想过去的痛苦；封建势力(地主、富农和五花八門的会道門、“大佛教”等)的压榨、欺逼和滔天的罪行，也很难体会今天社会主义的偉大力量。

王生一家人，土改前住的一間破茅棚，是地主的一个馬棚。土改后給他分了瓦房，他还不肯搬去住，他不是不肯住瓦房，是怕孩子見人家吃好的，就嚷嚷，心里难受。他沒有搬家，直到他盖起了一座新房，住进了新房子里。新房的大門不是对着大街，而是对着西鋪。东西鋪之間，只他一戶，大門朝向西边。人們說，他这是为合作化为社

会主义作一个紀念。

可是，有人反对，散布迷信謠言，鼓动他拆毀这个大門，說是小門对着大門（对面是原来高級社的社址），不吉利。这也說明：牛鬼蛇神在这里并沒有絕迹，我們应当提高警惕。

我們从过去这里流傳的民謡，可以看到西鋪村的人民生活：

穷人身上两把刀，租子重和錢高；
眼前只有三条路，逃荒上吊坐監牢。

糠菜半年糧，租居破草房，
全家一条被，三代着一裝。

現在那就大不相同啦。他們除去口糧，每年賣給國家十多万斤余糧。初办社时是三条驴腿，現在公社里有了汽車，村里牛羊成群，果子滿林，新房成排，戶戶電燈。一九五六年以前，看見有人騎着自行車在當街走過，那要轰動全村：

“看洋驴去呀，看洋驴去呀！”

現在全村有自行車一百多輛。抗日戰爭期間，日本鬼子丟了一个鐵皮暖壺，游击組誤以為是個炸彈，看守了三天，現在這樣的“炸彈”有三百七十多個。此外，還有高中生九個、初中生十七個。

王生的媳妇和王生的儿子，是民校的学生，識字都在

一千字以上，他們母子倆都能編些新詞。王生住的新房子，白粉牆上貼着王庆宇（王生的二兒子）寫的一首新歌：

建明公社是鮮花，黨來親自栽培它，
三星高照出彩霞，花開美滿社員家。

前面說的二十三戶，他們共同組織初級社時，各有不同的經歷；在時代的風浪中，也還會有不同的變化。他們已經經歷了無數的考驗，但是新的考驗仍在等待着。

王國藩和杜奎，現在是大隊的主要幹部，《打柴記》中已經提到他們。王生、王榮、戴存，有單獨成篇的家史。老羊倌屈恩等人的生活經歷，另有較詳細的記載。“窮棒子社”在打柴創業時期，二十三戶中的一戶單屬吳秀英，隨着大伙一起上山打柴，是當時打柴隊伍中唯一的一個女勞動者。人們提起她來，真是要感動得落淚。不過她已經離開本村，早就跟着丈夫到四川去了。這些不在本村的戶，暫時成了這篇小史中的空白，留待日後追記。其他還有几戶，這裡根據訪問印象，將他們的主要特點，三言五語，略記一二，分別在小史中做個簡單的介紹。

看 树 的

——記梁近田

梁近田是個外來戶。

舊社會有句俗話：樹挪死，人挪活。窮人為了尋求活

路，只好搬来搬去。可是，在过去，路有千条，哪有穷人的路。天下虽大，哪有穷人的家。

梁近田的爷爷住在姚家峪，拉了饥荒，把房子出了。携儿带女流浪到遵化城南离城三里地的草甸去住。

草甸也容不下这一大家子穷人。他父亲又托他姨夫在四十里铺找了地主王维藩的一间半草房，离开了爷爷，叔叔领他们搬到四十里铺来住。

他们头顶着人家的天，脚踩着人家的地，房无一间，地无一塊。怎样生活呢？又托人说情搬到南山水家沟，给地主贼六子家看树。

人越穷，越添吃累。他有四个妹妹俩兄弟。老兄弟三岁的时候，母亲便死了。他十四岁上，便由爷爷介绍到遵化城南关，给人家扛长活。二十岁那年，家中借了地主几斗粮食，借一斗还斗三，越滚越多，实在还不起了，把十四岁的妹妹梁秀英嫁了，使了一些钱，才还了地主的米帳。

七七事变后，兵荒马乱。贼六子躲到遵化城里去了。南山的树木都被贼六子的当家子砍伐了。

一天，他父亲到城里去赶集。在大街上碰上了贼六子。

“来了？”

“嗯的。”

“到我家去吧！”

东家吩咐，哪敢不听。父亲来到地主家中。

“那树怎么样？”

“都叫人家放了！”

“那你是干啥的?”

“人家要放，我也挡不住!”

“那不中。那树我都出給宪兵队长了，你等着!”

一会儿，他就把宪兵队长找来了。那家伙挎着洋刀，穿着大皮鞋，立眉横眼地在屋子当中这么一立。

“你是看树的?”

“嗯的!”

“你把树都看到哪儿去了?”

“都叫人家放啦!”

“那不中。这树都出給我啦!”

他哪是什么要树的主，分明是賊六子請的打手。这家伙連踢帶打，把父亲打了个半死，扔到草甸子叔叔那里。第二天，叔叔才把他抬回到了南山。

父亲一場好哭：

“这要不是穷，誰給人家看树……做长工，做月工，挨这样的揍……”

一九四七年冬天，土改工作組来到西鋪。梁近田腰板挺起來了。他参加了貧农团当选了委員，吐出了多年的苦水。地主賊六子虽然跑了，本村的封建势力却被推翻了。他一家分了兩間房子三亩地。

爷爷、父亲所寻找的路，梁近田找到了。他于一九四七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八年轉正为正式共产党员。

革命的路越走越寬，当中也經過一番曲折。

有了房，有了地，沒有牲口、农具，缺少粪草、籽种，也是种不起。梁近田在这条路上也发生过动摇。他父亲死了，妹妹出了嫁。弟弟跟着叔叔去过日子。自己寻了个媳妇又离了婚，一个人越过越没来头，便想把房子地出了，到唐山去下煤窑。这时候，王国藩同志出来劝他了：

“你从老輩子就搬来搬去，搬到哪儿算一站？好好务作，也成个家，立个业。”

梁近田在王国藩劝导下参加了互助組。他們的互助組共有九戶。其中有一戶寡妇拉扯着三个孩子，日子过的也很凄惶。穷人向穷人。他帮助她家挑水、苦房；她給他縫縫綢綢。日子长了倒也有一番情意。

一九五三年，梁近田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社里担任了生产股长。这年他分了一千六百斤粮食，生活翻了一个过。

人往高处走，鳥往高处飞。那个寡妇在办社的第二年，也相跟入了社。二人的爱情，更深厚了。

瓜熟了就落蒂，有一个叫王凤仁的看准了这步棋。他悄悄地对梁近田說：

“你俩合一了算啦，她家缺劳力，你连个做飯的人也没有！”

窗户紙一撲就破。梁近田心里甜滋滋的。他跟王国藩同志一說。國藩同志說：

“中！”

“她让我招到她那儿去？”

“招到她那儿去，中啊！”

梁近田就搬到她那一間半草房里去了。

高級社，人民公社，更上一层樓。一九五七年，他两口子把劳动的积蓄支出来，在建明大街盖了三間新房。一明两暗，又寬敞又豁亮，隔着窗子可以望見房后的青山，天上的白云，后院的菜圃。靠东边的一間住着梁近田夫妇。西边一間住着儿子和过门不久的儿媳妇。东屋里墙上挂着有綫广播的小喇叭，桌上摆着暖瓶、水壺、大鏡子；西屋里地上放着自行車，炕上爬着小孙女。

他的大闺女已經高小毕了业，二闺女正要上高小。真是一幅美滿的幸福家庭图。

誰說世上沒有穷人的路？看，梁近田找到了互助合作通天路。普天下农民是一家，梁近田投入了人民公社大家庭。

邵氏弟兄

邵庆林和邵庆昌是叔伯兄弟。他俩一般大的岁数，邵庆林今年（一九六三年）六十六岁，邵庆昌去年死了，享年六十五岁。

串房檐

——記邵庆林

邵庆林是个大骨架子老汉。身材瘦瘦的，头发稀稀

的。胡子倒挺茂密。两鬚两腮挂着胡子，嘴上嘴下的胡子把嘴埋得严严的，只有說話时，才露出一張紅嘴。

你別看他骨架子大，說起話来却是低言細語的，一对深眼窩一动一动的，两眼直直的，象回味着过去的苦处。

“父亲、叔叔，长年給人家扛活、放羊。七七事变前，我們搬到南山桃树沟給东鋪村的地主看果树，看青場。七七事变后，抓壯丁的挺多，兵荒馬乱的，在山里不能住了，才搬到村里來串房檐。先到徐福挺家住了一年，后来又搬到地主王文屏的房子里住。王文屏的房子成了維持会，又把我們擡到后院里來住。直到平分时，才把这三間房子分給了我。还分給了我九亩地。

“有了房，有了地，才算有了家业。一家六口过日子。春种秋收，到了冬天割柴禾，夏天割垫脚。一天我正担着一担垫脚在王国藩門口过，他和王荣他們正吵着办社。我把扁担在那儿一放說：‘要成社，算我一份。要我不？’‘咋的不要，你回家去商量商量！’‘我还跟誰商量？我算入定了！’入了社，真是心滿意足哇！我沒給孩子們說嗎？这会儿，吃不愁，穿不愁。墙上挂着小喇叭，屋里放着自行車。老三小子还鬧了个高小毕业……一天比着一天强呀，人不知足还行？”

老人吸了一口烟，两个深眼窩不住地震动，两只眼睛閃着深邃的光芒，好象在向誰反問着。

貧农的遺囑

——記邵慶昌

邵慶昌死了。他臨閉眼前囑托他的老伴和孩子們說：“好好地出工。把社當成自己的家。要不是共產黨，要是不入社，咱沒有今天。”

他說出了一個農民要說的話。

邵慶昌是經邵慶林介紹才搬到四十里鋪給地主看房子的。東鋪地主王達清在西頭開了個駱駝店。他一直給看了十几年。

平分時，分了七畝地，三間房。一九五二年底和邵慶林一块入了社。現在他的大兒子邵海三十七歲，已經頂門立戶。二兒子邵坤十五歲，高小沒畢業，也主動參加了農業勞動。一個女兒已出了嫁。姥姥已經抱上了外孫。

現在他們的屋裏還擺着平分的大凳、小櫃，桌上放着平分的大花瓶，牆上又新安上了公社化後的小喇叭。我相信他的子女一定牢牢记住他父親的遺囑：

好好地出工，把社當成自己的家！

杜家兄弟

天上地下

——記杜春

杜春、杜星、杜亮是親兄弟。杜同和他們是堂兄弟。

我到杜春家去时，他才吃晚饭。太阳早落了，月亮藏在云彩里。院里的光线有点昏暗。也許是因为习惯，也許是为了节约，他們沒有开灯。只在院里放着一張小低桌，坐在矮凳上喝粥。

我一进院，他連忙招呼老伴拿烟笸，招呼孩子点火绳，当他知道我不会吸烟时，連連称赞說：“連烟都不吸，那你真省啊！”

从各方面看，他是一个省吃儉用的人。

他匆匆地吃了飯，裝了一鍋烟，在火绳上凑着火，慢慢地吸了一口，談話开始了：

“你做啥活計來着？”

“放羊羔来！”

“你过去放过羊嗎？”

“沒有，我呆了两年工啦！王主任看着我身子骨弱，为了照顾我，让我放羊羔。”

“你过去干过啥？”

“赶車！当过几年場头。”

“赶啥車？”

“赶花轎轆轤胶輪車。嘿，打一成立社我就赶車。他們打柴禾，我往回拉嘛！”

“你咋入的社？”

“那还不是一句話的事！他們組織到了十八戶，我听说了，找到了国藩要求入社。他說：‘你入中啊？可要跟家里商量好。’我說：‘我跟誰商量？我不光我自己入啊，

連我兄弟他們也要入啊！我們四戶加入了进来，变成了二十二戶，后来戴存又加入了进来，这便成了二十三戶。”

“你趕車出过远門嗎？”

“很远的地方沒出过，就是到过唐山。”

“拉什么？”

“拉果木，那是社里的副业股，組織了四辆大車。經常外出。”

“啥算場头呢？”

“那时候社里分六个队，在一个大場里分摊打場，我的总管。照料着不让糟蹋东西。”

“你觉得入社后怎么样？”

“那还不是天上地下，过去跟人家扛长活，租种地，吃了上頓沒下頓的。你就算这两年吧！我起不了炕，她隔长不短的閑病，要不是入社，早把孩子卖着吃啦！”

“你就这俩孩子嗎？”

“就这一男一女呀，大的十一啦，跟社同岁。起了个大名叫杜振喜。”

“早先生了七个呀，一个也沒成！”这时候沉默在一旁的老伴突然发了言。

“生了七个？”

“可不！大儿子活着，这会二十五岁啦！”

“那可不！大闺女活着，也十八啦呢！”

“都是害啥病死的？”

“唉！”老伴叹了口气說，“大儿子活了八岁，生疹子死

的；大閨妮肚子疼，老三，老四，得的四六瘋……”

“咱福薄水淺，养不住喲！”

“这会儿怎么养住啦？”

杜春两腮一动，笑了：“那是封建話。要不是入社，这两个孩子也保不住喲！”

“那可不！那时候連吃的都沒有，嘴有錢給孩子請先生！”

我沉默了。誰能想象呢？在过去他們生了七个孩子，都一个一个被疾病吞噬了，不，应当說被旧社会吞噬了。只有當他們入了社，才保住了這一男一女。这还不是鮮明的对照嗎？

我告別时，杜春热情地送我到大門口。我握住他的手，劝他回去休息。他又悄悄地跟在我身后，送到我下坡。我走了一段路，扭回身看时，他仍然立在那里，目送着我。在这个五十七岁的农民心里，埋藏着多少热情啊！

草 窩 窩

——記 杜 亮

杜亮是老三，和杜春隔着一条道。他門前有一道水沟，沟上架着一座小桥。我到他家訪問时，杜亮正携着孩子在街上耍。一听說我要找他，便隨后跟了进来。这是新蓋的三間平房，西里間的隔山牆還沒有刷抹。他媳妇是一个和他差不多年紀的中年人，正扒着鍋台合面。

“怎么，你們還沒吃晚飯？”

“吃啦，赶明天，老娘子过来呀！給她发点面。”媳妇回答着，又找补了一句：“赶明儿到我家吃飯吧！”

这一番話使我想起杜春說过的，他弟兄仨抬着一个老娘子，一个一天管着飯。看来，儿媳妇要想法給婆婆改善一下生活呢！

媳妇干净利落地拌好面，盖在鍋里。伸手接过孩子来坐在东里屋的門檻上和我們拉起呱來。

“你們几个孩子？”

“四个呢！头大的是个閨妮，十一啦！跟社一般大！”

“也跟社同岁？”

“那可不！打入了社才添的孩子呀！下边是三个小子。一家大小六口人呢！”

正說着，两个小子都从街里跑回来了，活蹦乱跳的活象两只小老虎。

我把老大拉到我的跟前問道：“放猪去来嗎？”

他母亲却回答道：

“就那么一只猪，老二就放啦！他拾柴禾拾粪。大閨妮会做飯啦！下学回来做做饭。”

“噢，大大小小都能帮忙啦！”

“嘿，指着他們还行！”坐在我身旁的杜亮笑了。他今年三十一岁了。少言寡語的，露着一身酱紫色的筋肉。是一个好劳动力。

“几年，你这把子人就起来啦！”

“要不是蓋這几間房子，哪用着他們婆！”

“蓋這房子花多少錢？”

“八百多塊呢！”接着他又找補道，“嘿，要不是入社，可蓋不起這房子呢！”

“可不唄！你沒見俺那間草窩窩呢，一下雨漏得站都站不住的！”媳婦補充着說。

一提新房，兩口子喜上眉梢。從言談話語里，流露出來自內心的喜悅。

我們要去訪問杜星。杜亮自告奮勇領我們去。媳婦抱着孩子送過了小橋。兩個“小老虎”也跟了出來。在月光下，他們揚着小手：

“大爺，再見！”

“大爺，趕明兒還上我們家來呀！”

孩子的感情是珍貴的。因為他們是貧農的儿子。

下放干部

——記杜星

山村的夏夜，顯得格外寧靜。月光照在街頭，只有三三兩兩的人在路旁乘涼。杜亮領我們大踏步地在街上走着，突然停住了脚步，對着迎面走來的一個人喊道：

“二哥，他們正要到你家去呢！”

這就是杜星嗎？我聽說杜星是個下放干部。也許是干部這個字眼，在我的頭腦中僵化了。我總覺着他不該

是目前这个样子。他光着头，赤着脚。穿着一条半截裤子，肩上披着那件制服褂子，就象过去老和尚穿的那“百家衣”一样，补着各式各样的补钉。我不禁对他画了个问号，他回来后劳动不好吗？生活有困难吗？

他本来是到队里开会去，听说我们要访问他，扭转身来，就往回走。光脚板打在地上，叭达叭达的，两只半截袖子随着身子晃荡着。

进了家，媳妇已经躺在炕上睡了。屋里的电灯还亮着。三个孩子分躺在母亲的两边，发出了甜蜜的鼾声。为了礼貌的关系，媳妇坐起来躲到院里乘凉去了。

“这房子原来是吴秀英家的。我那房子小队里借住着。”

“你多会回来的？”

“回来两个年头了！”

“多会出去的？”

“头办社出去的！在公路运输局工作。先在唐山，后来分配到昌黎、滦县。我打滦县回来的。”

“入社时跟你商量来吗？”

“商量来呀，那还不正好。正愁那些地没法种的。”

“回来后过的咋样？”

“不錯呀！”

我沉默了。又拐着弯问道：

“你们哥仨谁过的好点？”

“哼！这会儿还属看我过的好呢。老大闢了两年病，

老三新盖了房子，我去年掙了三百多劳动日，家里的掙了二十多个。除了吃的、穿的、花的，还存着五十多块！”

我审视着他屋里的摆设，暖瓶、水壶和蹲在小柜上的那个的的答答的馬蹄表。的确日子过的不錯。

“我一天工不脫呀！”在回来的路上，他主动地向我們介紹道，“今年我又掙了二千多分啦！我沒下地劳动呀！我掏大糞呢！別人不願意干，我干！”

我忽的一下子全明白了。我仿佛看見他穿着那件“百家衣”，光着头，赤着足，挑着一挑子大糞在街里走着，我对他肃然起敬了。

他不愧是二十三戶的老社員。他不愧是党培养的好干部。

杜同也是个下放干部，他比杜星早回来一年，現在也在社里参加劳动。

佟家叔侄

烈士的儿子

——記 佟 印

佟印是烈士佟瑞明（景文）的儿子。今年三十八岁，家中六口人，有母亲、妻子和三个女儿，大女儿十三岁了，在上中学。

佟印十四岁上就到遵化城里粮店里跟人家当伙计。一直干了八年，直到遵化城解放前，才从城里回来。

父亲在抗日战争时候，是村里的办事员，汉奸王树仁告密，一九四一年旧历腊月初三，被日本鬼子抓去杀害后，扔到河里，到现在连尸首都没找到。那时佟印二十一岁。

汉奸的心是黑的。他梦想斩草除根，在害死爹爹后，又逮捕了佟印，把正在炕上养病的佟瑞恒（佟印的三叔）也吓死了。

佟印靠着有城里当伙计时的身份证，才脱了险。可是不久，在被服厂工作的二叔又牺牲在芦家峪了。

佟家，只剩下佟瑞芝（他四叔）和佟印叔侄两人了。

佟印的母亲，经受住了这个打击。她控告了汉奸王树仁。王树仁被人民政府逮捕，未来得及法办，便碰死在白薯窖里了。

土地改革后，他四叔佟瑞芝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一直打到广西。一九五一年转业回来，组织了一个互助组，佟印、佟启、佟春都参加了。一九五三年佟印、佟瑞芝、佟启、佟春都参加了“穷棒子社”。如果说佟春在技术革命当中大显身手，那么佟印在文化革命当中却立下了一番功劳：

二十三户农民当中，有个要了多年饭的王生，他媳妇在扫盲当中，认识了一千多字，一年，给公社团书记写了一封信，还编了几句快板，表达自己的身世：——

飄飄蕩蕩象走船，饥寒二字最艰难。
人要无食无主張，更怕数九下雪天。
盼望一天又一年，和梦方醒一样般。
翻身解放住新房，毛主席来了見青天。

这些成績是和佟印分不开的。进了他的屋子，在他的墙壁上貼着兩張醒目的奖狀。一張写着：

佟印同志在扫盲工作中积极負責，获得了显著成績，
被評为扫盲模范，特发給奖狀給以奖励。

另一張写着：

奖給

扫盲积极分子 佟印。

他还告訴我，他們得过很多奖旗。就是桌子上放着的那个馬蹄表，也是那时候的奖品呢。也就在一九五六年，佟印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轉業軍人

——記佟瑞芝

在瓜鋪里，我們遇到六队副队长佟瑞芝。
这个轉業軍人，是村中最早成立互助組的发起人。
他們的互助組一共有十几戶，上山打柴、磨豆片、养猪积肥。这一年他們組里的庄稼特別强。
一九五二年底他們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穷棒子社”，在社里担任組长，一九五四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

社里担任队长，一直到現在，說起来也算个老队长了。

“整風时，我让大伙儿跟我提个意見，大伙說，对你提啥意見呢？你不摆队长架子，起早貪黑，一样的跟大家一起干，要提，就有一样，下地扣的大家太紧，歇畔歇的小……歇畔歇的小，还不是为了让大家多干会儿活。”

他双足蹲在地上，吸了一口烟，額上的皺紋一閃一閃的。

蓋房的故事

——記范玉林

一提起范玉林来，人們都傳誦着他蓋房子的故事。

第一次訪問他时，他下地劳动去了。王国藩同志指着他院里的一段斷牆說：“你看，这就是他原来的屋子，进门时，还得弯着腰钻进去，到了里边連个轉身的地方都沒有……”

可是現在范玉林住着的，却是临街三間大穿堂屋。墙壁刷得白白的，屋子里安着电灯，我迫切知道他这一轉变的經過。

第二次訪問他时，他到大队开代表会剛回来。原来他还是个六队的貧下中农代表。

他今年四十七岁了。身体还很硬朗。全家六口人，一个七十七岁的父亲，一个老婆，三个孩子。

父亲范春扛了三十多年活。范玉林十八岁上下过一

年金場，二十二岁上下关东去修铁路，一直修了三年。平分时，全家分了十三亩地。一九五三年参加了“穷棒子社”。提起他盖房子的事来，他兴奋地说：

“嗨，那真跟吹气似的。那还是入社头一年，一伙子人在‘出’（刨）落花生，拉起了䦆篇。国藩说：‘范玉林，你现在没有不遂心的事了吧？’我说：‘就是那间房子不遂心，进门出門先弯腰，屋里连个酱菜缸也放不下，象一个“圈”似的。’

“‘那你重盖几間呀！’

“‘嗨，我连棵树毛毛都没有，还盖得起房了！’

“‘嗨，你没有，别人还没有？树不够大伙凑！’

“王国藩这么一说，大伙儿乱说：‘我给你凑两棵，我给你凑两棵。’

“国藩又接着说：‘也不能白让凑，多少得让他出个钱。’

“上午說的話，下午就号树去了。号了杜春两棵，温自礼几棵，梁近田几棵，我自己又找了几棵。那时候还迷信哩，看了个好日，九月二十九上梁。

“一說盖房，甭說街坊，連家里人們也不相信。等社里的大車拉来了木头，石头，才轰嚷动了。秫秸、草都是社里的，牲口車又不要錢。还借给了三十块錢买椽子。从九道沟邀来了木匠。木匠一进村就打听：‘你们西鋪有个叫范玉林的？’

“‘你找他做啥？’

“‘听说他要盖几间房子！’

“‘嘿！他穷着个棒棒子，连个树毛都没有，能盖上房子！’

“‘那，人家捐讯让来的嘛！’

“‘那，不信你就看看去。’”

.....

房子就这么盖成了。转成了高级社，范玉林又把三间草房改成平房。一九六一年找了个老伴，还带着两个小子、一个姑娘。

有人问：“范玉林，你这会儿遂心了吧？”

他说：“嗨！要不是入社，一辈子也遂不了心！”

搬到南山

——记王金平

(5)

王金平在南山和尚沟住。

他为啥搬到南山去呢？原来有这么一段故事。

南山是个好地方，高山上种满松树，山坡上布满了核桃、栗子、黄梨。梯田里还栽了千把棵苹果树。满沟庄稼满坡树，南山是个宝地。

去和尚沟要过一个小梁，小梁上有个瓜铺。瓜铺里有个小姑娘在看瓜。有人说，她是王金平的女儿。

“你是王金平家的人吗？”

“嗯的！”

“你叫啥?”

“我叫刘××。”

“你怎么姓刘?”

“我爸爸不是死了嗎？他搬到俺家來的……”

我恍然大悟，原来王金平也和梁延田一样，是被招到女家去的。

第二天，我在瓜鋪上看到一个三十多岁的媳妇。梳着黑油油的头，坐在窩棚的床上做針線。我想，这大概是小姑娘的母亲了。

“你是王金平家的人吧？”

“是啊！”她笑了。笑的那么甜蜜。“你們到我家去吧！到我家去，燒口水喝。王金平，在大队里开代表会哩！”

我找到了大队部哩，會議还没开始。三三两两在門口蹲着說閑話。

“王金平在这儿嗎？”

王荣老汉拍着一个中年汉子的光脊背开玩笑說：“王金平不在这儿！”

原来那个中年汉子就是王金平。

他今年三十八岁了，但从額上的皺紋來看，他好象还要年紀大点。

他十岁上，父亲就死了。一个兄弟也死了。母亲急瞎了眼。他拉着母亲討飯吃。

家里仅有的一間房子塌了，被治安軍拆着燒了。他

長到十四歲，連穿的衣服都沒有，一冬一春囚在炕上不敢出屋。後來他到魚兒岩金礦上背毛，晚上只蓋一條麻袋。平分時，他分了一間半房，五畝地。一九五三年和邵氏弟兄一起加入了“窮棒子社”。

一九六一年，王金平帶着老母親搬到南山那個寡婦家去了。那個寡婦拉扯着四個孩子，頂大的才九歲。他們合在一块一共七口人，又蓋了三間新房。

“你分的那房子呢？‘出’了？”

“哪能‘出’了！房子現在免費借給隊里用着呢！”他好象受了很大侮辱，連忙分辯着說：“政府分給我的房子，我要是出了，那我還對不起誰了？怎麼對得起共產黨。唉！要不是共產黨，我這一輩子哪還敢想有老婆孩子！”

一杆秤

——記溫自禮

溫自禮是個共產黨員。他死了。

人們念念不忘的是他的忠誠老实。

他在村里擔任稅務委員，誰想偷稅漏稅那算不中。過年時，他叔叔殺了豬，找到他來商量，他說：“過年，咱認豬不認人！”就這樣，他工作積極，大公無私。

他雖然死了，人們仍念念不忘他的忠誠老实。

王生家史

張朴

旧社会，有錢的地主立家譜，为的是“光宗耀祖”。新社会，我們要為受苦的穷人寫家譜。穷苦人的家譜分兩段，一段是黃連鋪成的路，一段是蜂蜜寫成的書。

昨天

——昨天是黑夜漫漫

王生是二十三戶“窮棒子”的苦頭頭。王生怎么样苦？有人說：他的苦處象山澗的流水，彎彎曲曲說不到頭。王生怎么样穷？有人說：他窮得象荒山河灘的一塊石，全身光溜溜，啥也沒有。在旧社会，人們說穷是王生的命，苦是王生的身，穷苦纏着王生家四代人。

三条活命

王生的祖父叫王玉，是个受苦的庄稼人。所生三男一女，王生的父亲王凤山排行第二。全家十口人过生活，

日子虽然困苦，倒也过得去。到了光緒二十一年，剛交头伏，天下起連阴雨，一連四十七天沒开晴。山洪暴发了，庄稼冲跑了，河滩里的大水翻着白花，村里的茅屋漏的漏倒的倒。受苦的穷人藏沒处藏，躲无处躲，做工沒人雇，討飯沒人給。王玉老汉家十口人病倒了七口。旧話說：“穷人生病閻王討債”，糊口尚且不行，哪有錢来治病。就这样，七个病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热热闹闹的一家人，一場天灾家破人亡，只剩下王玉老汉和两个儿子三条活命。

父儿仨忍饥挨餓，熬过了殘冬，盼来了春天。山坡上露出了野草，树枝上钻出了綠芽。王玉老汉决心要重整家园。父子們打短工、做零活，白天上山割草，夜晚在村拾糞。沒黑天沒白日地苦扒苦曳。

这样挨过了許多年。

这一天，本村地主王家老掌柜的，看見王玉老汉家的糞堆，心眼里乐了。他慢悠悠走进王玉老汉家，这看看，那瞧瞧，对王玉老汉說：

“老玉呀，你們家这么多的糞肥，不想租点地种嗎？”

土是庄稼人的根，地是庄稼人的命，王玉老汉早就有租地的念头，只是担心家里太穷，沒人租給。今几个老掌柜一說租地，他心里通地一跳，可又一轉念說：

“想是想呀，可誰又租給咱？”

“那好說呀，”老掌柜嘿嘿地笑着，“亲不亲老乡亲。我租給你一点吧。”

“真的，老掌柜？”王玉老汉赶紧问。

“我什么时候说过笑話！可就是……”老掌柜更仔细打量着院里的东西，“你拿什么作抵押呢？”

王玉老汉一下子泄了气，他垂下头，蹲在院子里，说：“是呀，要錢沒錢，要东西沒东西，还是租不起呀！”

老掌柜嘿嘿一笑，两眼盯着王玉老汉的三間茅屋，说：“咱们乡里乡亲，好說話。用你这三間房子作抵押吧！”

王玉老汉突然抬起头来，两眼直呆呆地看着茅屋，说不出一句話来。

老掌柜說：“这也是咱们这一带的老規章，租地总得押点东西。其实，你不願意也就算啦，房子是你的，地是我的，两不相干。”他看着那堆粪肥点着头又說：“可惜这堆好东西！”完了，迈开方步子向門外走去。

王玉老汉突然站起身來說：“地，我租下了！”

只因为租下了地主的地，又惹来一身災禍。王玉老汉过日子的心胜，决定让两个儿子在家經營租来的土地，自己給地主去当长工。

这一年，秋庄稼快熟的时候，地主怕穷人偷庄稼，让王玉老汉睡在地里看守。这一带常常鬧土匪，王玉老汉总是战战兢兢的。这一天，天剛摸黑，王玉老汉在窩鋪里升起一堆柴火，燒他那当晚飯吃的两个窝头，这时山头上忽然响起枪来，有人喊道：“土匪来了！”王玉老汉钻出窩鋪撒腿就跑。跑了一程，忽然想起自己的被子还在窩鋪里。

一条被子对于穷人來說，可非同小可。他拚着性命又奔回窩鋪，这时柴火已經把窩鋪燒着，他心里一急，一头扎进窩鋪，窩鋪倒塌了，把王玉老汉压在下面。他抱着被子，掙扎着钻出来，就昏迷过去。直到第二天下午，东家不見他回来取飯，打发人一看，原来他被火燒得躺在地里，才派人把他送回家去。

王玉老汉回到家里，昏昏迷迷躺了几个月，他舍不得叫儿子拿一个錢为他治伤。临死的时候，他还对儿子們說：“地是根，沒有地……就会死在……財主……手里……”話沒說完就咽了最后一口气。

爷爷王玉死后，日子更加困难。这一年王生已經八岁，赶上夏旱，热風吹得天象个干鍋一样，几十天沒下一个雨点。租种地主家的沙滩地，正好种的打瓜，瓜秧被太阳晒焦了，王生父亲的臉色也象是晒焦了似的。他不怕辛苦，又赶种上了晚豆子。幸好赶上了一場小雨，豆子出来了；可是到了阴历八月初，又下了一場早霜，豆子被打死了。辛辛苦苦的一年劳动落了一場空。王生父亲正焦虑一家人的生活，突然飞来一場橫禍，大安庄舅家二妗子在王生家服毒自杀，舅舅是恶棍，被蛮不讲理地訛去了一筆錢。地主又来收租。地里顆粒未收，哪有粮食交租。就这样，地主收了地，又把王生家的四間茅屋（后来又接了一間）頂了租子。王生父亲一气之下，得了气結病，臥床二年就死去了。

两个苦命人

王生的父亲死后，家里的全部财产，除了发送父亲，一无所剩。当父亲入土之后，母亲哭着說：

“孩子們，你媽沒有能耐，再也养活不起你們了，你們各自逃命去吧。”

全家抱头痛哭，难舍难离。

王生給地主扛活掙一点錢，帮助母亲养活两个弟弟。这一年王生整二十岁，个子虽然不高，长得却像个铁打的汉子，再加上他为人忠厚，少言寡語，干活牢靠，不怕受苦，周围的人都很喜欢他。有些人常和他开玩笑說：

“王生，二十岁的大人了，該成家立业娶媳妇了。”

王生有时笑笑，有时就回答一句：“誰肯把閨女往火坑里送。”

天下真有这样奇巧的事，正当人們这样开玩笑的时候，有一个姓樊的“花子”，願意把閨女送给王生作媳妇。人們笑着說：“这可真是門當戶對。”是呀，除了王生这样的人，誰又願意討要飯吃的閨女作媳妇呢。

常言說：不爱金，不爱銀，穷爱穷心內亲。樊家的閨女是个有心人，一定要亲眼看看王生。王生剃了剃头，洗了洗脚，走进一座破庙里去相亲。樊家的姑娘一見王生，看了看头，瞅了瞅脚，把头一低，打心眼里喜欢上他。可是王生头不敢抬，眼不敢看，活象个泥胎站在那里。樊家

的姑娘心里想：

“你說句話呀！只要你說句話，我就跟着你走，就是天涯海角我也不怕，只要是离开这人罵狗咬的日子。”

王生心里想：

“只要你不嫌我穷，我保險对你好，就是把我这身力气使尽了，也让你受不了屈。”

姑娘心里想：

“怎么他不說話？莫非是个哑巴？”

王生心里想：

“一切都由你决定，你說中就成，你說不中咱就走。”

姑娘实在憋不住了，心內着急，可一个姑娘家又不好問什么，只好說：“你老站着干啥？坐下吧。”

王生說：“庄稼人站慣啦，不累。”

就这样一句話，這門亲事就定了。

王生要結婚了。有錢人結婚有酒席，有鼓乐，有洞房。王生結婚連个住处也找不到。難道說新婚夫妇还象花子似的去住破庙？娘家的姑娘堅決反对，她說：“我住破庙住了十几年，从嘎啦一声住到这么大，結婚出門子——人家都說这是人生大事，就不能換個地方嗎？”說着滾下泪来。王生想来想去，忽然想起西鋪西头有个大車店，王生夫妇就在这个大車店里入了洞房。

按王生当时的說法是，人不該死总有救。过了些日子，东鋪的地主要找个看院場的，院場里有一間破茅屋，茅屋的草頂实在是太破烂了，地主答應只要院場看得好，

轉年給換一個新草頂。王生夫妻就搬進這間破茅屋。誰知道，這間破茅屋就成了王生全家悲慘生活的开端，就成了多年討要生活、一件一件血淚史的“見證人”。

王生夫妻盡心盡力地替地主看院場，出力賣命地為地主干活，可是換屋頂的事地主再也不提起。一年、二年过去了，王生夫妻生下第一個孩子，頭頂上還是那堆破爛草。王生夫妻又生下第二個孩子，那正是陰曆五月間，刮着急風下着暴雨，屋頂漏着水，有的地方眼看着往下塌，王生用樹枝棍子頂住架住，可是風越刮越大，雨越下越急，閃電雷雨震得茅屋直搖晃。忽然，有一塊屋頂塌下來，風雨一下子扑進茅屋，王生的大兒子哭叫着，王生急忙抱着茅草去堵窟窿，雨水、泥土、爛草順着王生的頭頂滾下來，爛草泥水糊住了他的眼睛，……

一場暴風雨躲過了，第二天，王生的眼睛腫起來。他以為鬧一兩天就會過去，誰知道越鬧越厉害。想治治沒有錢，地主却催着上工，孩子老婆又需要人伺候，王生心里火燒火燎地着急。眼睛越腫越厉害，直到鬧了一個多月，才漸漸地消下腫來。王生睜開眼睛一看，啊！天地怎麼變了樣？到處是一片昏暗，看不見南山，看不見樹木；只聽見鳥叫，看不見鳥飛；河里的流水嘩嘩響，看不見河水往哪邊流。他伸手揉了揉眼，用力把眼睛睜大，可是什么也看不見。“難道？難道……”他不敢想下去，一屁股坐在地上，閉起眼睛，只覺得天旋地轉，一切心事都涌上心头：上有老母，兄弟年幼，下有老婆，孩子更小，都需要他養活。

他不能瞎！他不相信自己会瞎，站起身来，磕磕绊绊地奔到河滩，摸到小河旁，他捧起水来洗呀洗呀，直洗得眼睛发酸，睁开眼睛一看，眼前还是一片昏暗。山在哪？树在哪？村在哪？河在哪？他分辨不清楚。王生一下倒在河里。从此，这个铁打金不换的汉子，再也看不见这个世界了。

王生瞎了眼睛，全家哭得象泪人儿。母亲可怜儿子，就拉起棍子，带着两个兄弟沿村讨要起来。这五十多岁的老人，怎么经得起跋山涉水，东村跑西庄奔，人罵狗咬，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整天价唉声叹气，泪水洗面。有人见她可怜，就劝说她：“趁着不算太老，往前走一步吧，也救救两个孩子的命。”起初，王生母亲听了这话只是摇摇头，当作耳旁风。后来日子长了，眼看着儿子的眼睛没有指望，再不愿意给儿子添更多的烦恼，年纪又一天比一天老了，讨要也一天比一天难啦，就起了嫁人的念头；可是一想起另归别姓，心里就象刀搅。这一天，王生的母亲奔跑一天，没要到一点东西，小儿子哭着叫着喊饿，王生媽心一横，就把王生叫到面前说：

“孩子，不是媽心狠，是媽的命不好。世界上千条道，万条道，哪条道媽也走不通。別怨恨媽，媽知道对不起你爸，对不起你們，可老天要媽这样作，媽又有啥办法？将来死在九泉，你能在爸面前替媽說句話，证实一下媽的心，就算媽沒有白养活你一場。媽……要……”

王生媽再也說不下去。

王生跪在媽面前哭着說：
“只要媽不走，儿子就討着要着也要讓媽吃飽……。”
媽低下頭，再也沒有說什么。

活，活不成！死，死不得！

媽媽改嫁，媳妇生病，孩子要吃，家里无粮。几根绳把王生的心絞得象条麻花。无奈何只有自己拉起棍子去討要。可是一想，自己乍瞎夫明，路不平，脚无根，山有多高？水有多深？庄在哪方？門在何处？如何要法？左思右想，愁思千万，无路可走。忽然儿子跑來說：“爸，我領你去打水。”這句話提醒了王生，要是让儿子坐在自己肩上，他的眼我的腿，不是可以出去討要嗎？儿子听说和爸出門，高兴得跳起来；王生却不觉落下泪来，心想：“小孩家，怎知道这样出門的難处！”父儿俩拉着棍子走出庄来。碰到高崗，儿子就喊上坡，碰到坑洼石头，儿子就喊繞路。就这样，走村串庄，东西要的倒是不少，直到日平西，儿子要回家，王生也結記家里的病人，就肩起儿子奔家走來。一天奔波，儿子劳累了，坐在父亲肩上直打瞌睡。王生不見兒子說話，以为是路好。可是觉得脚下坑坑坷坷不平，剛想問兒子，脚下一空，父儿俩順着陡坡栽下去。儿子大声地哭叫，王生双手和磕膝盖流着血，父儿俩抱在一起痛哭起来。王生心里想：“天呀，你叫人怎么活下去！人到了这一步，不如死了好。”可是孩子一面哭一面喊：

“爸爸回家，想媽媽。”

王生心如刀絞，只好爬起来拉着孩子奔了家。

儿子再也不願意跟王生出門討要，一家人只好餓肚腸。

这一天，天下着小雪，到了中午一家四口还水米沒沾牙。大人还可忍耐，孩子却不停地哭叫。正在这个时候，要飯的老徐珍搖搖晃晃地走進門來。老徐珍也是靠討要過活的，這幾天臥病在床，今天實在忍受不住飢餓，才勉強爬起來。他問明了王生家為什麼哭叫，叹口氣，搖搖頭說：

“唉！一样的命呀。好，我也正想出門要口吃，我領着你，你扶着我，一块去吧！”

雪已經把山路蓋住，北風卷着雪絲在山坳里尖叫旋轉，山路凜滑，行人稀少，在灰蒙蒙白茫茫的山路上，只走着一老一瞎两个要飯的。

常言說，下雪要飯最不是時候，有的人家關門閉戶，圍爐取暖；就是不关门閉戶的，任你再喊再叫，他也不肯冒着風寒給你送出一點東西來。老徐珍領着王生奔走了一天，只要到几口冷湯，几把猪食。肚內無食，身上寒冷，北風越刮，大雪越下。眼看着天氣漸漸地灰暗下來，老徐珍搖搖頭說：

“看來，今個這根腸子又得閑起來。好，這近處有個破廟，我領你去過夜。”

兩個人走進破廟，覺得比外面暖和多了。老徐珍哈

哈手，把庙门关上，怕风开，搬过供桌来顶上门，两个人背靠着供桌坐下，谁也不说话。过了一会，老徐珍因为由冷乍暖，突然咳嗽起来，王生赶紧给他捶背。一阵咳嗽过后，两个人又默默地坐起来。忽然王生叹了口气，心想：老婆孩子不知这一天是怎么过去的？老徐珍好象看见王生心事似的，就对他說：

“睡吧，别瞎想啦，老天给咱穷人安排的就是这样的命。”

饥饿烧肠，千思万虑，加上身上越来越冷——才进来时那点温暖也不知道跑到哪去了。怎么能睡得着！老徐珍又咳嗽起来，王生不断地为他捶着。老徐珍喘过一口气來說：

“既然睡不着，咱爷儿俩說一会儿話吧。”

“中！”王生急忙答应着。可是心里想，有什么話好說呢？

老徐珍說：

“我小时常听奶奶說，南山有个仙人会种葫芦，葫芦种在最高的山顶上，每天日头出来第一个照见它，葫芦要长一百零九天，要用一百零九眼泉水来浇它，少一眼也不行。仙人养着一对金鸽子，每天夜間，下山舍水浇葫芦。浇到一百零九天上，不要等日头出来，就要把葫芦摘下来，这个葫芦就成了宝葫芦，要什么只要一拍它，就来什么……”

“大爷，你說这个干什么？”王生奇怪地問。

“孩子，你不知道，”老徐珍停了一下說，“今个白天咱們路过燒餅鋪的時候，你可沒能看見那油炸的麻花，我已經三十年沒吃过那玩艺了，要是有个宝葫芦，能要个麻花来吃吃，我就是死了，也心滿意足了。”

王生心里一陣难过，赶紧說：

“大爷，明天咱想法去买一个麻花。你干什么老說死呢？”

“不，孩子，我是吃不上麻花了！”說着又是一陣剧烈的咳嗽，王生赶紧替他捶背。老徐珍繼續說：“聽說死了比活着好混，不用吃东西。不过还得穿衣服，还得要有錢，聽說三十六道鬼門关，关关給錢才能过得去……”

奔跑了一天，王生不知跌了多少跟斗，已經够劳累的了，虽然身上寒冷，可还是漸漸睡去了。等他醒来，天已經亮了。他觉得身上有个东西，一摸是老徐珍的破棉袄。再摸摸徐珍，他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渾身冰凉，早已經死了多时啦。王生哭着从村里喊了人来。村里人問明了徐珍家里沒人，就对王生說：“你走吧，我們把他埋掉。”王生一定要等着埋了再走，村里人怕他再死在这里，两个人架着把他送出村去。

王生一路走着，徐珍的影子老在他眼前晃，徐珍的話老在他耳旁响，好象这些話句句是在說他，将来他老了就是徐珍这样下場。想到这里不觉渾身打了一个冷战，直觉得天轉地旋，心內一陣酸痛。他忘了朝哪个方向走，也忘了走的是什么样的路，磕磕绊绊，高一步低一脚，忽然

脚下一滑，整个身子直栽下去，咚的一声，被水呛了一口。他急忙抓挠着爬起身来，用手摸了摸，有溜腰深的水，周围是圆的砖墙，他这才明白是掉在井里。他大声喊着：“救命呀！有人掉到井里啦！”喊了几声不見有人来。他慢慢地靠在井边上想：“喊人干啥呢？这不是死的好机会嗎，把头一扎，人不知鬼不觉地就完了。”他剛要把头扎下去，忽然想起老婆孩子：“我死了，他們怎么办呢？誰來照管他們？他們怎么活下去？不能死，为了孩子，說什么也不能死！”他抬起头，大声喊着：“救命呀！救命呀，有人掉到井里啦！”他一面喊，一面圍着井帮轉，用手摸索着，想找到一点什么东西攀登上去。可是井帮上长滿蘚苔，非常光滑，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

他喊得筋疲力尽了，就站下来休息。水浸湿了他全身的衣裳，陣陣冷風从井口吹来，冻得他瑟瑟打战。他心里想：“完啦，看来今天是非死在井里不行了！”这样一想反倒安心起来。觉得这样死了倒对得起孩子們，他自己叨叨念念地說：

“孩子們，孩他媽，別怨我，不是我心狠，拋下你們不管，是我命該如此。以后你們怎么活下去，全靠你們自己啦，一百斤的担子，你們自己去担吧！”說到这里，泪珠刷刷地滚下来。

正在这个时候，傳来了脚步声，咚地一声，两只笤筒頓在井台上，王生急忙喊：

“救命吧，有人掉到水里啦！”

“你是什么人？”是一个年輕人的声音。

“要飯吃的！”

“要飯吃的沒長眼，为什么单往井里掉？”

“我是瞎子，看不見。”

“瞎要飯的，你把整个井都弄髒了，还叫人救你！”說着担起簍筒走了。

王生急忙喊：“行行好，救救命吧！”

可是脚步声越来越远，已經听不見了。

王生一陣心酸，說不出是什么滋味。

过了一会，又来了几个人，他們系下一只筐，把王生拉上去。一到上边，北風一吹，王生渾身的衣服馬上冻得硬梆梆，象铁板一样，冻得他得得打战。这时候那个年轻人大站在旁边大声对王生喊道：

“你个臭要飯的，把整个井都弄髒了，你不給掏井你走不了！”

一个老汉对年轻人大說：

“也不能怪他，他是个瞎子，願意自个儿掉在井里？”

“你們都是一类貨！臭要飯的。”

老汉急忙把王生扶到自己家里，一进家門，老汉啐了一口，罵道：

“有錢的崽子，說話也不怕缺德！”

老汉生上一盆火，让王生烤着衣裳，又問他吃了飯沒有，王生說：

“不吃啦，哪还有心火！”

老汉給王生端来一碗高粱米饭，澆了一点热水，让他吃。王生吃了一点饭，觉得身上暖和一点，衣裳也烤干了，就趴在地上給老汉磕了个头，說，

“你老人家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老汉急忙拉着他說：

“別說这话，我也要过饭，唉！这要饭——受罪、挨罵，一句話，比死了强点。別說了，你赶紧回家吧。”

老汉把王生送到村外，指給他路，王生又再三謝过老汉，就順着山路走下去。

离开猪狗生活，过着牛馬日子

一九三五年，大汉奸殷汝耕把冀东二十二个县出卖給日本帝国主义。随着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开始，日本人的軍帽、皮鞋和刺刀也来到遵化县一带。人們到处傳說着，八路軍中有个叫老包的（当时冀东軍区的副司令員包森同志），帶着一支神兵，到处打击日本鬼子和偽治安軍，吓得鬼子和治安軍修起崗樓，蹲在窩里准备挨打。

四十里鋪也来了八路軍，收了地主王維平的枪，王維平全家老小收拾东西夹着尾巴，跑到遵化城里去了。

这一天，王生出門討飯，被偽治安軍捉住，硬說他是八路軍的探子，把他打得死去活来。王生渾身血糊淋淋地闖进家門，一头扎在炕上。老婆問他是怎么回事，他只說了一句話：

“不打走鬼子汉奸，連飯也要不成了。”

王生在家养伤，老婆带着孩子出門討要；在閻屯村小儿子又被地主家的狗咬伤，娘儿俩哭哭啼啼轉回村来。村里人們看着他們娘儿俩可怜，就紛紛地議論起來：

“看，这媳妇年輕輕的多可怜！”

“是呀，跟着瞎子要飯吃，还不如自己走个主呢。”

这时候有个叫王兴的走过来，对王生媳妇說：

“这样兵荒馬乱的年头，怎么能要着东西，还不如找地方侍候侍候人，混碗飽飯吃。”

王生媳妇叹口气，說：

“哪有那样地方，就是有，人家也不願要咱这要飯吃的。”

“遵化城里有，就怕你不去。”

“能带孩子嗎？”王生媳妇是离不开孩子的，再說，帶出孩子，就帶去一張嘴。

王兴想了想說：

“带一个孩子，自己吃飯，不掙錢。你回家跟王生商量商量。”

晚上，王生媳妇把这话一說，王生想了想，叹口气說：“你們娘儿俩逃活命去吧！”

王生媳妇来到遵化城里，王兴把她領到一家。进门一看，原来是四十里鋪地主王維平家。王維平自从离开四十里鋪跑到城里，就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区团长。王維平的媽得了尿痨（慢性腸胃炎），全家人誰也不願意

走近她一步，在城里雇人侍候，人家一听說是这种病，沒人願干，这才把王生媳妇找了来。

王生媳妇一看是地主王維平家，从心眼里不高兴，可是事已至此，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王維平的母亲是个尖嘴猴腮的老婆子，因为长期拉肚，臉色发青，两腮深陷，脑袋活象个落干了的瓢葫芦。她整天象猪似的哼哼，怨天恨地，不住声地罵着人。不住气地拉着屎，說拉就拉，一时盆子拿不到，不管被上炕上，一拉就是一大片。可是她吃起飯来，还能頂个小伙子。王生媳妇每天要为她刷五六次被褥、六七次炕席。因为王維平家买水吃，不准用家里的水，刷被褥得跑到城外护城河边去。刷炕席只給一点点水，却要刷得非常干淨，不准留下一点味。每次刷完，老婆子都哼哼着象狗一样，把鼻子伸到炕席上嗅起来，要有一点味，就抓起拐棍，不管脊背脑袋一顿乱打，祖宗三代地一顿臭罵。王生媳妇过的就是这种日子。

王生媳妇每一次到城外护城河边刷洗被褥的时候，眼望着家乡的山巒，总会滚下泪来，心想：“躲开了猪狗的日子，过上了牛馬的生活！”

母子俩每天吃的不是橡子面就是豆腐渣；偶尔吃一次玉米面窩窩，还有限制，母亲两个，孩子一个。就这样王維平的老婆还常常罵街，“吃，吃，吃！象猪一样，就是知道吃！吃起来沒完。”

大人挨餓尚可忍耐，孩子可怎么受得了。小儿子整

天圍着母亲哭着喊餓。媽媽只好把東西給了兒子吃，自己餓着。

有一天，王維平的兒子拿着一個白饅頭在院里玩，王生的兒子吃着手指頭，不停眼地看。王維平的兒子撇撇嘴，掰下了一塊饅頭，喂了他家的小狗。王生的兒子使勁咽一口唾沫。王維平的兒子又掰下了一塊饅頭，丟在地上，對王生的兒子說：

“你來學狗爬，就讓你吃了那塊饅頭。”

王生的兒子越想越惱，就抓起饅頭，投在王維平兒子的臉上。王維平的兒子哭叫起來，說王生的兒子打了他。這一下可闖了大禍，王維平的老婆闖出屋來，千花子、万窮鬼地罵着，硬逼着王生媳婦打孩子。王生媳婦被逼不過，就舉起手來，輕輕打了兒子兩下。這一下可惹火了王維平的老婆，她轉身走進屋去，提出王維平的馬鞭子，沒頭沒腦地抽打王生媳婦。抽得她自己沒勁了，才把鞭子拋在王生媳婦面前說：

“我看着你，你給我打這個小臭要飯的！”

王生媳婦无奈，拾起鞭子，一看兒子——兒子兩眼射着哀求的光，手象提着千斤的石头。

“打！打！”王維平老婆逼迫着，吼叫着。

王生媳婦把眼一闔，舉鞭向兒子抽去，每抽一鞭，比抽在自己心上還痛，兒子每哭一声，就象錐子扎她的心……

沒娘管的孩子

母子俩离开家，王生心里难过得不行，可一想他們能吃上飽飯，也就心平气和下来。

这几天王生的伤势漸漸地好起来，就带着大儿子出門討要。他們走一庄过一村，天到晌午的时候，来到小寨。时令已是中伏，天气炙热。王生直觉得头晕脑脹，老想嘔吐。就对儿子說：

“我們在樹蔭里歇歇脚，睡一會，等涼快一点了再进村討要吧。”

王生躺在树下，不一会就睡着了。

等他一觉醒来，用手一摸，不見了儿子，叫了两声，也沒有回答；正在納悶，一班孩子領着个六十来岁的老奶子，气汹汹地走过来。說：

“你們要飯吃的怎么也禍害人？我家剛做好的一鍋黍米粥，你的孩子把一个黎鸡窩給捅在鍋里，叫我們那些受苦的回来喝西北風？”

王生赶紧赔礼道歉，說一定好好管教他，抓住他要狠狠地揍他一顿。

本来老奶子气头很大，見王生瞎目失明的，帶着孩子討要，也怪可怜，又一个勁地向她說好話，气也就消下去了。她叹口气說：

“你知道这鍋粥的米，来的多么不容易呀！”

王生央求走了老奶子，就到处找儿子，东喊一声，西叫一句。其实儿子就在旁边一棵树上，他听父亲說，要狠狠地揍他，不敢下来。

日头平西了，听不見儿子回答一声，王生心里有些焦急，他想也許是他自己跑回家去了。摸到家一找，沒有儿子。这下他可急了，閨着村到处喊起来。

这时太阳早已經下了山，鳥儿入了林，家家都吃过了晚饭，有的在院里乘凉，有的已經入睡。村庄山谷靜悄悄地傳蕩着王生喊儿子的回声：

“大……有……子……”

不知是因为夜靜，还是因为他声音的哀伤，使人听了非常淒凉。老人們磕磕烟袋說：

“沒娘管的孩子，多可怜！”

黎明的时候，西鋪的武委会主任杜奎同志出差回來，走在村边上，看見一个树窟窿里有个人影一晃，他怕是坏人或敌人的密探，就举起枪来，对准树窟窿喊道：

“什么人，赶紧出来，不出来开枪了！”

一个小脑袋探出来晃晃說：

“是我。”

杜奎一看是大有子，就問：

“你怎么在这儿？”

大有子眨眨眼，不敢說實話。杜奎說：

“走，回家吧。”

王生一見儿子，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从心眼里感謝杜

奎。把杜奎送出門去，待轉回屋來，兒子又不在了。他心想：“這次走不遠，過一會他自己就會回來。”可是，一天，兩天过去了，兒子踪影皆無。他吃不下坐不穩，圍着村到處找着。後來，聽村里傳說，有人在雞鳴村看見大有子放豬。他就趕緊奔到了雞鳴村。

雞鳴村有個叫賈廣發的，是個比較富裕的戶。這天傍晚在村邊樹下看見躺着一小要飯的，面黃肌瘦怪可憐的。賈廣發問他是什麼村的，為什麼不回家？小要飯的說怕爸打。賈廣發說：

“你給我家放豬吧，讓你吃得飽飽的，比要飯強。你願意嗎？”

小要飯的跳起來說：

“願意。”

這就是大有子。

王生看見兒子很好，心想：放豬比要飯強，反正能吃飽。就高高兴興地回了家。

過了一些時候，一天中午賈廣發慌里慌張地走進門來，見了王生，為難地說：

“大有子出了事。”

王生象晴天霹雷，趕緊問：

“出了什么事？”

“摔壞了。”

“怎麼摔的？”

“他去放豬，”賈廣發摘下草帽一面擦着一面說，“我

們村的治安軍正在修崗樓，被狗日的駒子撞下山去，頭和腿都摔破啦。”

王生一听不知如何是好，在屋里轉了两个圈，抄起要飯棍子，拉着賈廣發說：

“走，我去看一看。”

兒子的頭和腿都摔傷了，血糊淋淋地躺在炕上，昏迷不醒。王生用手摸着兒子，連聲地叫着，他睜了一下眼，馬上又闔上了。急得王生沒抓沒撓的，扎撒着两只手連連地說：

“怎麼辦？這怎麼和他媽交代，他媽要看見孩子摔成這個樣，要心疼死了。”

這句話提醒了賈廣發，他叹口气說：

“王生大哥，咱是有啥說啥，孩子摔成這個樣，我看還是把他媽叫來好，萬一要有个好歹哩。”

王生說：

“我馬上去叫，”說着他摸起要飯吃的棍子向門外走去。賈廣發從後面趕來塞給他兩個餅子。

王生來到遵化城里王維平家，把孩子摔傷的事和老婆一說，老婆馬上落下淚來。兩個人去和王維平老婆請假。王維平老婆手夾着煙卷，眼望着窗戶，听完他們的話，又吸了一口煙，慢慢地吐着說：

“你走了，誰侍候老太太？”

王生是個老實人，遇事沒主意沒辦法，只會心里着急。王生媳婦和他可不一样，是個能說會道、办事利落

的人。她一听王維平老婆的話，氣得臉都白了：

“太太，叫你這一說，我們孩子的命還不如老太太的屎要緊呢唄？”

王維平老婆一聽王生媳婦話里有刺，氣得把眼一瞪，把烟头往地上一丟，說：

“一個臭要飯的，死一口子兩口子的算得了什麼！”

“是呀，”王生媳婦氣得嘴唇打着顫，“窮人的命，路上土，任人踏來任人踩，誰叫他們窮呢？可太太你也有孩子、也有老人呀！……”

“什麼？……”王維平老婆氣得說不上話來。

王生怕老婆說出更難聽的話來，就趕緊拉着她，向王維平老婆哀求說：

“太太，你行行好吧，就算你積了陰德，孩子好了一定來給你磕頭。”

“給我磕頭！”王維平老婆用鼻子哼了一聲，“我還不見呢。一句話，你不能走，吃了我們家的飯，就是我們家的人，叫走，你走；不叫走，你老老實實地給呆着。”

王生老婆氣得眼直冒金花，轉臉對王生說：

“好，你帶着這個孩子回家吧，孩子死了，是他的命。你國家要好好地照看着這個孩子，千萬別……一定要叫他長大成人……”說着掉下淚來，“他們既然不讓我的孩子活，我也要在这兒死給他們個樣兒看看！”

正在這個時候，王維平瞪着虾蟆眼走進門來。王生媳婦的話他聽了一清二楚。這個煞神在這些小地方是慣

会要弄手段的。他一面脱衣服，一面张口说：

“既然孩子病啦，就回去看看吧！”

王生赶紧转过身来说：

“谢谢王先生，谢谢王先生。”

“谢什么，咱们一村一庄的。”他脱下衣服，点着一支烟继续说：“王生呀，现在我是困难呀，等我闹好了，亏待不了你们。让你媳妇回家看看，就叫她很快地回来。”

“好吧王先生，只要孩子好了，就叫她回来。”

王生媳妇一句话没说，转身走出屋去。

当他俩领着孩子出门的时候，上房传出王维平和他老婆顶嘴的声音：

“你叫那穷婆子走了，谁侍候你媽！”

“你他媽的，眼睛光看到鼻子尖，眼下是什么时候？咱对穷鬼不两面三刀行嗎？”

王生携着孩子，老婆领着王生，一路跌跌撞撞地来到鸡鸣村，鸡已经叫了。王生媳妇进门去看，孩子已经好多啦，也睁眼啦，也说话啦，虽然她落下泪来，可是心眼里安稳多啦。

贾广发给王生夫妇做了饭吃，天已经明了。王生媳妇说：

“还是让孩子回家养伤去吧，我再也不回遵化啦，在家守着孩子。”

贾广发也怕再出事，就赶紧说：

“好呀，亲媽守着比誰也强。家里困难，在我这携斗

糧食去。唉！我家的日子也是困难，在这人死鬼活的年月，有什么办法，要不他撞了咱的孩子，甭說你們，我也和他拉倒不了。这会，你不找他，他还想找你呢。唉，熬着吧。”

死，也要死在一起

一斗粮四个人吃，能吃几天。王生只好出門去討要。

这一天，天摸黑了王生还没有回来。王生媳妇心里焦急，孩子們不住連声地喊餓。王生媳妇只好到本村去要点。她走进屈福亭的家里（屈福亭是本村地主賊六子的狗腿子，过去凭着地主的勢力，想尽办法欺侮老百姓），屈福亭的媳妇見她領着孩子进来，就赶紧說：

“咱们本村本土的这是干什么，来，快坐下。”她把王生的儿子領过来，上下仔細地打量着說：“这孩子多精神，看餓得这样子。”說着由籃子里拿出一个餅子，塞給孩子說：“吃吧。”

她让王生媳妇坐在板凳上，說：

“唉，这个年头可真不好混呀！”說着她用眼瞟着王生媳妇。

“唉，誰家也比我家强。”王生媳妇低下头。

屈福亭媳妇眼珠轉了三轉說：

“我說大有媽，現在的年月是自己的道自己走呀，你不能太死心眼了，放着鮮菜不挑，光溜着道边走。”

“唉，我可有什么办法！”王生媳妇叹口气說，“守着一个瞎子，两个不懂事的孩子。”

屈福亭媳妇瞪了瞪吃餵餵的孩子說：

“咱们乡里乡亲，我說句不系外的話，这样下去大人受罪是小事，要把孩子糟蹋了。就說你們老大吧，要真摔个腿断胳膊折，你們能要着吃养他一辈子嗎？”

“是呀，那可有什么办法呢？”王生媳妇觉得這話說的也对。

“办法是有呀，就看你走不走。”屈福亭媳妇緊接着話茬說，“要我說……算了吧，這話說出來叫你伤心，还是不说好。”屈福亭老婆故意把話头停住。

“你說吧，我不伤心。”王生媳妇平时也常为这些事伤心，今个有个人說說，心里也敞亮敞亮。

“要我說……咱们亲近我才說這話，要系外的我才不管呢。”

“你說吧，我不怪。”王生媳妇急于要听她的話。

屈福亭老婆故意把声音放低：

“叫我說，你們把二小子出給人，让他逃条活命，你們的日子也緩緩肩。”

王生老婆吃惊地瞪着两眼，說不出一句話。

“要是不对你的心思，就当我沒說。”屈福亭老婆用眼瞟瞟王生媳妇，見她沒怪罪的意思，又补充說：“你想想，这世界上卖儿出女的多着呢，想不开是个难受事，想开了是条活路。你想他将来长大了，还能忘了你們是他的生

身爹娘？还能亏待了你們？这又是一个靠山！”

王生媳妇虽然心里难过，可生活逼得她无路可走，觉得这话也有点道理。就抬起头來說：

“这事我自己也拿不了主意，等他爸爸回来，我們商量商量再說。你的好意我領情。”

屈福亭老婆見有活口話，滿臉噴笑地說：

“这个事你可得拿定了主意，他們瞎的瞎小的小，全靠你养活他們呢，你不救他們誰救他們！”

王生媳妇告辭了。屈福亭老婆滿心高兴，觉得今儿个这个事真凑巧，正想找她，自己送上门来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屈福亭有个朋友想买个孩子，出的价钱不小，屈福亭夫妇就把这笔买卖攬过来。那个朋友来过几次，曾看见过王生的二小子，說象这样的就行。

王生回来，媳妇把出孩子的事和他一說。王生听媳妇的口語并不反对，就叹口气說：

“我瞎目失眼的，全家就靠你养活，孩子也是你拉大的，你如果願意，我不拦擋。”

王生虽然这么说，心眼里可非常难受，晚饭他一口也没有吃。王生媳妇也象失魂掉魄似的唉声叹气。有心不卖，怕养活不成孩子；有心卖了，这心头肉真难割呀！

第二天屈福亭老婆来催她，王生媳妇說：

“我們還沒商量好，商量好了去找你吧。”

其实有什么可商量的呢！王生倒在炕上唉声叹气，他明明是不同意，可不愿意说出来。自己又拿不定主意，

可真难呀！王生媳妇趴在炕上痛哭起来。哭着哭着，她忽然想起大嫂子——王荣家的，去和她商量商量，也許大嫂子会給拿个主意。

王荣家的把王生媳妇让在炕上，王生媳妇未曾說就先落下泪来。她把卖孩子的事先先后后說了一遍，最后說：

“大嫂，你替妹妹拿个主意，这也是咱王家的骨血。”

王荣家的想了想，說：

“家貧、路窄、日子不好过，这是真的。可儿到底是儿，他是娘身上的一块肉，怀胎十个月不容易，一把屎一把尿，費了多少心血才拉扯这么大。为了一时的方便，就把他卖了。文书一写，更名改姓，任人家罵，任人家打呀，到那个时候，你心疼你难过，你有多少眼泪流不完呀，你就是抬个銀山去也換不回来啦！……嬸子，你还是死了这个心吧，咱王家再穷、再苦，也不能把亲骨肉往火坑里送呀。”

王生媳妇一面听着一面嗚嗚咽咽地哭起来，等王荣家的把話說完，她一头扎在王荣家的怀里說：

“嫂子，是我一时糊塗，你算是救了你侄子的命；就是死，我們也要死在一起！”

屈福亭老婆的买卖沒做成，就咬牙切齒地在街上咒罵：“王生这家穷鬼，不依好，放着活路不走，再要飯誰也別給他，餓死这窩穷鬼！”

今 天

——今天是阳光普照

王生沒有餓死，他不会餓死。要按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人不該死总有救。不过，过去是从這一个火坑中被救出，又走进另一个火坑；今天，是永远地跳出火坑，是受苦人自己救自己，是受苦人組織起队伍，在共产党、毛主席的率领下，打下了天下，彻底地翻了身。

春雷第一声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解放区响起了第一声春雷——土地改革开始了，千年的封建制度要消灭，受苦人的穷根要拔掉。遵化县四十里鋪也象其他解放区的村庄一样，敲起春雷般的大鼓。这鼓声召喚着人們，鼓舞着人們，受苦的人站起来，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夺回祖祖輩輩的劳动果实。

王生这个被旧世界压倒的人，在鼓声中抬起了头，挺起了胸，站在自己的阶级队伍里振臂高呼，“打倒封建地主！”王生的眼睛是瞎的，可是他的心突然亮起来，他好象看見，受苦人的黑夜过去了，东方升起一輪紅日。

在全村訴苦大会上，人們要王生訴苦，可是他站在台上却說不出一句話來。他的苦处太多了，是語言所表达

不出来的，他只有痛哭流涕，人們就跟着痛哭；他只有热泪双流，人們就跟着他流泪。王生的眼泪，不完全是悲痛的眼泪，是悲痛和欢乐混合起来的，是告别昨天迎接今天的眼泪。就在这种眼泪和欢笑声中，他家分得了七亩八分土地和一些家具。家具他并不怎么喜欢，可是土地，当日宣布这七亩八分土地属于王生的时候，他止不住热泪盈眶，滚滚流下。土地呀土地，爷爷不是为你而死的嗎？爸爸不是为你而亡的嗎？全家人不是因为你才流离失所、东奔西跑地討要嗎？今天你到底回来了！

王生有了土地，就計劃着生产。一想起生产，他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自己到底种上了自己的地；难过的是：自己是个瞎子，孩子又小，光靠老婆一个女人家，能把地种好嗎？

这一天，王生和老婆来到自己地里。老婆看看这么一大片地，又沒有牲口又沒有农具，怎么个种法呢？就又悲又喜禁不住落下泪来。王生說：

“哭什么，有了媽媽还怕生不出孩子来！毛主席既然把地分給我們，我們就是用手刨，也要把它种上，就是用眼泪澆，也要让苗长起来。”

王生就是抱着这样的决心种上了第一年的土地。苗儿出来了，长得还不错，他乐得闔不上嘴。可是到七月間，蔣介石匪軍由长城退下来，路过四十里鋪的时候，把他的苗子割去喂了馬。王生媳妇为这大哭了一場。

第二年种地就更加困难了。一方面天旱，再加上缺

勞力少肥料，这一年王生的七亩八分地並沒有打多少糧食，日子还是不好过。这个时候王生才明白，光有土地，沒有勞力肥料，还是打不出糧食来呀！加上这年秋后，村里出卖土地的很多，他心里慌慌的想：“这还了家的土地，真个的就保不住了？”

这一天，村里有个叫張让的到王生家来串門，說了几句閑話之后，就对王生說：

“聽說了嗎？咱村好多人出地啦，你有意思嗎？白馬峪有人想要你的地，出的價錢可不少呀。”

王生一听，頭頂轰地一下，就象天塌下来一样。他驀地站起來說：

“我的地是毛主席分給的，是窮人翻身的地，是打倒地主的站腳地，是窮人的心，是窮人的命，他就是給我万兩黃金我也不賣，想買我的地是瞎了心，瞎了眼！告訴他們吧，讓他們黑天白日想着去吧！”

王生躺在炕上，心里比燒上一把火还煩躁，左思右想，觉得过去的日子又在眼前晃哩。正在这时，王国藩走进門来，見王生愁眉不展，就問：

“二哥，有什么发愁事？眉头上結着疙瘩？”

王生叹口气說：

“唉，甭提啦，國藩呀，有人想買我的地。”

王国藩說：

“是呀，聽說了嗎？咱村出地的可不少呀。”

“聽說啦，這得請上級想個办法呀。”王生着急地說。

王国藩嘿嘿笑起来。

“上级早想出办法来了。”

“什么办法？”

“互助合作，组织互助组。”

“什么是互助组？”

“就是大家在一块干活，你少农具，我缺牲口，互相帮助，就能克服困难多打粮食。”

王生高兴地喊：

“那太好了！”

“好，你愿意参加吗？”王国藩问。

“那还用问，只要是共产党、毛主席提出来的办法，我都干！”

“问还是要问，”国藩笑哈哈地说，“因为这互助是自愿的！”

“我举双手自愿。”

从此王生参加了互助组。

参加了二年互助组，粮食比过去打得多了，可是还不够生活。王生每年除了领取国家的救济粮救济款和寒衣之外，有时还不得不拿起他的讨饭棍子和破铁筒，到远的地方去要一些。

最后一次讨要

到了一九五二年，村里出卖土地的更多了。互助组

虽然好，可是抗不住天災人禍。

这一天王生由外面回来，王国藩和杜奎正在家里等着他。王生一进门，王国藩就说：

“我們組織农业社，你参加不参加？”

“这农业社是干什么？”王生问。

“农业社就是把土地归在一起，牲口車辆是大伙的，大伙在一块种地，打了粮食地一半劳一半。”

王生想了想说：

“这农业社能叫大伙不卖地吗？”

杜奎一听哈哈大笑着说：

“哥呀，农业社这个药正是治卖地这个病的，不信你吃付看看，保險你这辈子再也卖不了地。”

王国藩也笑着说：

“不但保你这辈子，它能保子孙万代。”

王生说：

“要是能保不卖地，就是跟着农业社要饭吃，我也走在前头。”

逗的王国藩和杜奎又笑起来。国藩说：“这农业社是引导大家走向幸福，再不受穷的道路，怎么能要饭吃呢？”

王生也笑了：

“我是打比方，表表我这心。”

就在这一年，王生参加了全国聞名的“穷棒子社”。

晚上，“穷棒子社”在王荣家开全体社員大会，大家討論了土地、牲口和农具問題。計算來計算去，二十三家只

有三条驴腿，最后大家討論明年种地的种子，有人說：

“咱們办起了农业社，国家还不貸給咱們种子呀！”

王国藩說：

“咱不向国家伸手。我打个比方，咱办社好比一家子过日子，日子剛一过就向人借錢，那样的日子能过好嗎？”

又有人說：

“可咱們这二十三家是全庄最穷的，大家拿不出种子来呀。”

杜奎說：

“头年大家是怎么种的地，种子是哪来的？”

大家嚷嚷着說：

“那还不是亲戚家要点，朋友家借点，湊合着种上啦。”

有人說：

“有的还是討要来的呢！”

王国藩說：

“对，我們就是討要，也要把种子弄来。要沒有这种精神我看社办不好。有人不是罵我們是穷棒子嗎？我們就是要让他看看这点穷棒子勁。”

王生心里想：“着，要按这样办社，这样过日子，社还能办不好？明天我就去要种子。”

第二天王生起来，換了一身干淨一点的衣服，拿起要飯棍子，提起铁筒，对媳妇說：

“我去替咱社要种子去啦！”

王生媳妇笑着說：

“哪有要种子的？”

王生說：

“看，要來千家糧，種咱社里的地，這是個吉慶事儿。舊社會那嬌生的孩子，不是要穿百家衣，長命百歲嗎？咱社里種上千家糧，幸福萬年！”

說的王生媳妇也笑了。

王生今天出門討要，和以往二十幾年的討要心情完全不一样。過去是飢寒交迫，如赴法場；今天象是趕廟會，走亲戚，總覺得象有點喜慶事在等他。他在山坡上不知不覺地哼哼起“皮影”來。

傍晚，王生回到村里，他要來了不少的種子，其中最多的是瓜子。那年建明社種了不少的瓜，每逢社員吃瓜的時候，都說：“這還是王生要來的瓜子呢。”說着大家哈哈笑個不止，此是後話。

吃过晚飯，王生拿着要來的種子，找到王國藩和杜奎，他把種子往地上一放說：

“這是我要來的種子，交給你們。”

王國藩和杜奎一看各種種子都有，就哈哈地笑起來，笑得王生不知道咋回事，就問：

“怎麼，太少呀？”

杜奎說：

“我的哥喲，你真去要種子去啦？”

“你們不是說就是要種子，也要把咱社里的地種上

嗎？”

“那是我們办社的精神，不向国家伸手的决心，不是真让你去要种子。你可好，給你个棒錘，你就当‘針’认。”

国藩也說：

“你入了社，就是社里的人啦，出門討要走陡坡过山梁，要出个差錯，咱社里要担心，外人也笑話咱。”

王生說：

“看，我要了半天种子，倒受起批評来了。”說完他哈哈大笑起来，又接着說，“国藩，杜奎，你俩知道，我要了二十多年飯，以为我还沒要够嗎？可是为了咱的社，你叫我干什么，我都干。不过話又說回來了，这次討要，是我此生此世最后一次討要了。”

討种子这件事，直到現在，在建明社还傳为笑談。

第一年丰收

春天到了，社里开始种地，这可愁坏了王生。“自己瞎目失明，能干什么活呢？王生已經二十多年沒正式干过庄稼活了，在互助組的时候，組里的人都不要他換工，一方面是可怜他，再一方面怕他把苗子糟蹋了。現在入了社，还不是和在互助組里一样？

街上人喊牛叫，下地的人們象赶庙会，好象是故意向王生示威似的。他在屋子里唉声叹气，愁眉不展，象是丢了魂一样，坐下站起来，站起来又坐下。正在这个时候，

杜奎走进門来：

“二哥喲，社里給你分配活啦。”

王生驀地一下站起来，結結巴巴地說：“給……給我分……分配了活啦？”他好象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接着問，“我……我能干什么呢？”

杜奎說：

“別問啦，到地方你就知道啦。”說着把他拉起就走。他們来到一个羊圈的旁边，杜奎交給他一把铁鍬說：

“这是一把铁鍬，这是除出来的羊糞，”他拿着王生手中的鍬拍拍，“这是筐，”他让王生用手搖搖，“你把糞裝在筐里，我們就往山上担。”

王生本来就是干庄稼出身，裝糞这活又算不了什么，虽然他眼睛瞎，他的耳朵和感觉是灵敏的，他裝得非常好，就是有一点半点撒在地上，他都听得見，等筐挑走了以后，他再用鍬撥拉回来。

一筐筐的糞挑走了，只剩下王生一个人。他双手拉着铁鍬，心里想：“我到底又能干活啦，我到底又回到大家的生活当中啦，大家干活我也干活，大家說笑我也說笑，这有多好，多叫人高兴！人們不是常說幸福嗎，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

王生激动地流下泪来。

送糞的人們回來了，他們担来上圈的垫脚，倒在羊圈旁边。王生又为他們裝上。人們又挑着走了。王生剛想坐下来休息一下，他忽然想起来，我要是把垫脚撒在圈

里，不省得他們再垫嗎？他攢着羊圈門，走进圈去，用脚摸着量量羊圈多寬多長，就站在羊圈外面撒起垫脚來，他撒得非常均勻。

王生的活路越來越寬，他不但能裝糞上圈，还能出圈、鋤草，不過這些都是家里的活，他總想干地里的活。這一天，他找到國藩和杜奎說：

“二位主任，你們看地里的活这么多，大伙都忙不過來，能分給我一點嗎？”

國藩向杜奎挤挤眼，意思是說：你看這沒眼的人干勁都这么大。就對王生說，

“地里的活杜奎是總管，讓他給你分配吧。”

杜奎想了想說，

“對，咱們正在耕地，咱們那‘三条驴腿’拉轆，還需要一個傍轆的，你要駕轆，讓驥拉套，這不省下一個傍轆的嗎，你看行不行？”

王生駕着轆，凭他的感覺和精心走得非常直，如果後面一喊停，他馬上把套一拉，驥馬上就站住；這樣他們配合的非常好，拿轆把的說：“比有人傍轆還好呢。”王生聽了非常高兴，他覺得自己象是飛出籠的鳥，能隨便地在廣闊的天空中飛翔了。

晚上回到家里，王生拿過扫帚來扫院子，整理整理柴火，這些活做得非常利落快當，好象他的眼睛根本不瞎似的。王生媳妇有點奇怪地說，

“這老頭子怎麼啦，真象是越活越年輕啦。”

不錯，王生的青春正在恢复着。

經過一年的苦战，建明社得到了大丰收，平均每亩产量二百五十四斤。全村轰动了。这是四十里鋪的坡地从来没有过的最高产量，全社所有的人都象晚鳥闌林似的議論着，異口同声地說：“这农庄社總是比互助組优越！”

这一年王生全家做了二千八百多工分，共分現款八十多元，分粮三千二百斤。各种各样的粮食都有，破茅屋里盛不下，就堆在院子里，王生象喝醉了酒似的，守着粮食坐着。晚饭做熟了，老婆叫他吃饭，他说：

“不知为什么，我不想吃。”

王生老婆也笑着說：

“我也是吃不下去。过去要饭吃的时候，一天价肚子餓；現在有了粮食，倒吃不下去了。”

月亮升起来，孩子們都睡了，王生还是舍不得离开。过一会，他抓起碎石般的白馬牙玉米，从这个手里倒在那个手里；过一会，又抓起大粒黃豆，从这个手里倒在那个手里。他总是喜欢不够，总舍不得离开它們，心里想：

“过去全家的粮食就盛在要饭吃的破铁筒里，破铁筒就是全家的仓库。全家人的生活，要看铁筒。铁筒滿着，全家一天的日子好过；铁筒不满，一家就要餓肚子。如今社里的地，从南山到庄西，从北河滩到庄东，面积是这么大，收的粮食是这么多，光我一家就分了几千斤，要用那个破铁筒来量，那得量多少筒。过去唯一能保护全家的

是那条要飯吃的棍子，那条棍也不过能擋一擋地主家的狗。如今保护全家的，是全社，是全国，是社会主义！”想到这里，他微笑着滾下眼泪，眼泪落在白馬牙玉米上，映着月亮，閃发着光亮。他又想到过去常听见人們說：受苦人的眼泪是苦的，享福人的眼泪是甜的。他趴下尝了尝自己的眼泪，笑着說：

“我的眼泪是甜的，我渾身上下都是甜的，我全家，我們全社都是甜的。”

重見光明

近来王生的眼睛总是发着光亮。人們都这样說，王生自己也这样感觉。

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日子好过啦？还是因为生活痛快啦？恐怕这两样都有。有的时候，突然一下王生觉得眼睛亮起来，眼前的人影、树木，社的牛馬、羊群、車輛，都在他眼前晃动起来；然而，就是那末一下，馬上又模糊起来。他心里想：“这大概是自己太想看看社里的东西了吧！脑袋里想出来的，不是真的看見的。”

这天清早，他起身时天还不甚亮，他要到南山去办一点事。走到山坡上天漸漸亮起来，他无心地抬起头来，啊！在他眼前出現了綠油油的庄稼，河滩的楊树閃着白光，弯弯曲曲流水的小河……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举起双手揉了揉，庄稼、树林、小河仍然顯現在眼前。他靜大

了眼睛，可勁的看着，可是这些东西越来越模糊，最后完全消失了。

王生回到家里，把这情况对老婆一說，老婆劝他說，“你到医院去看看吧，万一要能治好呢？”

王生一笑說：

“治什么，都快五十岁的人啦。”

“看你这个人，”他老婆有点不满意地說，“你平常不是常說，我們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們越活越年輕，怎么今儿个倒卖起老來啦？”

王生搖搖头說：

“我不是卖老，我总觉得是我的心看見了，不是我的眼看見了。治也治不好，何必費那个事。”

“有枣沒枣打一杆子，治得好治不好去試試。馬上去，和社里說說去。”

在老婆的督促下，王生找到国藩，把治眼的事一說，国藩說：

“前两天我們在村委会上也議論了一下这个事，准备放你的假，让你去治眼，医药費由咱們社担负。去，让佟启先給你开个介紹信，到区卫生院去檢查一下。”

王生来到鸡鳴村区卫生院，把介紹信交給張院长。張院长一看是建明社的王生，知道他在旧社会受了不少的苦，就特別关心仔細地为他檢查了眼睛。檢查过后，張院长說：

“你这眼睛要动手术，需要住院。”

王生一听要动手术，心里想：“眼睛怎么能动手术呢，弄不好会瞎得更厉害。再说，社里的活正多，过一陣再說吧。”于是就对張院长說：“我回去商量商量，要是治我就再来。”

王生走的时候，張院长再三嘱咐他，不能再耽誤，一定要很快地回来。

可是王生一去再沒有回来。

又过了一些时候，卫生院搬到四十里鋪；張院长专门到他家去动员他治眼睛。王生只是笑笑，既不說治，也不拒絕。他媳妇和張院长也熟，就打趣地說：

“你这治病的先生，都找上門拉买卖来了。我們治病沒錢呀！”

張院长笑着說：

“國藩主任早說啦，社里包起来，不用你們拿錢。”

王生媳妇也笑了。又說：

“你三趟兩遭动员我們治眼，你能保好嗎？”

“你看，”張院长說，“我們都找上門来了，还不想治好嗎？”說的大家都笑起来。張院长又說：“这次治眼，你不用住院，把你送回家来，我每天來給你換藥。”

王国藩和杜奎也几次劝說王生，就在大家督促之下，他的眼睛动了手术。他躺在家里，張院长每天到家里來給他換藥。一个星期过去了，張院长取下他眼上的紗布，让他試一試，看看能不能看見东西。王生睜开眼睛一看，眼前一片明亮。人、房屋、窗外远处的山峰，都清清楚楚

楚顯現在眼前。可是他不相信這是真的，用手揉揉眼再看，這些東西越來越清楚，再也沒有消失。他感動地抓住張院長的手說：

“舊社會讓好人變成瞎子，新社會讓瞎子又長出眼睛來。”

一次現身說法的宣傳

一九五五年秋末。地淨場光，王生媳婦要帶着二兒子到薩河橋去看王生的三弟。

清早起來，娘兒倆換上了新衣服，穿上了新鞋袜，收拾得渾身新鮮，上下光亮，真象個走亲戚的客人。他們又提着一個籃子，籃子里裝上點心、白饅頭，就動身了。

薩河橋在遷西縣內，離四十里鋪四十五里。娘兒倆走過幾條河灘，爬過几道山梁，來到一個三岔路口的地方，正不知道走哪條路對，那邊走過來一個賣泥娃娃的。王生媳婦問：

“借光問一聲，上薩河橋走哪條道對呀？”

賣泥人的一看這娘兒倆穿得這麼新鮮，就說，

“你們上薩河橋呀！同路，搭伴走吧。”

三個人一路走，就拉起話來。王生媳婦問，

“你是哪莊的？”

賣泥人的說：“我是遷西縣人。”

“你們村成立農業社了嗎？”

“成是成立了，我還沒參加。”卖泥人的怕問，自己先說了。他接着問：“你們是哪庄上的人？”

“我們是遵化縣四十里鋪的。”

“四十里鋪的？”卖泥人的重新打量一下娘兒倆，“你們庄的農業社出名呀，你們的主任王國藩，不是還進過北京，見過毛主席嗎？是真的吧？”

“是真的。”王生媳婦笑着回答。

“好，正好。”卖泥人的換一下肩說，“我正想問你一件事，你們村有個叫王生的吧？”

王生媳婦笑了，心里說：“你算問着了。”就馬上回答：“是有个叫王生的。”

“聽說他要了許多年飯，家里苦得不行，还是個瞎子。入了農業社第一年就分了幾千斤糧食。這是真的呀是假呀？”

“是真的，第一年分三千二百斤，第二年分了三千七百斤。”

“我不信，農業社再好，一個瞎要飯的，一年就能分几千斤糧食，那除非是作夢，要不就是吹牛說大話。”

“是真的，不是吹大話……”王生的儿子想和卖泥人的爭辯，媽媽向他擺擺手，兒子還有點不高兴。王生媳婦說：

“這一說你不信，是吧？”

“我不信。”卖泥人的搖着頭，“几千斤糧食，那得多大一堆，得多少布袋盛？要叫我一個人吃，得吃好几年。”卖

泥人的羨慕地搖着头。

“怎么样才能叫你信了呢？”王生媳妇問。

“除非我亲眼看見。本来我想到四十里鋪去看看，因为道远，最近身子骨也不結实，就沒去了。”

王生媳妇笑了笑說：

“叫你亲眼看見也不难，咱可要賭点东西。”

“你說賭什么吧？”

“不用賭別的，你要看見了，就把你这泥人給我們兩個，我們拿回家去給孩子玩。”

“那还不容易，大的小的你隨便挑。”

“一言为定。”王生媳妇低头笑了笑，用手撣了撣衣服上的尘土說：“那么先請你看看我們娘儿俩这个穿着打扮，还有我們走亲戚拿的这些东西，”王生媳妇說着，掀开籃子上面的毛巾，让他看看点心和白饅头。“我們家象个什么主呀？”

卖泥人的不解其意，更仔細地打量着他們娘儿俩。王生的儿子抿着嘴不敢笑出来，站直身子让他看着。卖泥人的說：

“你們家呀，最少也得种它个二三十亩地，养着一头牛，也許还有个小毛驴子，十几只羊。”

“要按成份俺象个什么农？”王生媳妇問。

卖泥人的想了想，說：

“中农吧，新社会中农比过去也高啦。”

“不再高点嗎？”

“高不了啦！”

王生媳妇噗哧一笑說：

“現在就让你亲眼看看吧，我就是王生的媳妇，这就是王生的儿子。”

卖泥人的惊得站住脚步，上上下下地看着娘儿俩。忽然噗哧一声笑了。

“你真能逗呀，这样的事还能开玩笑！”

王生媳妇郑重地说：

“开玩笑有願作人家媳妇当人家儿子的嗎？”

卖泥人的一想，也是呀，就問：

“你們真的和王生是一家子？”

王生的儿子驕傲地說：

“真的是一家子，王生是我爸爸。”

卖泥人的順手把挑子放下說：

“好，我信了！我认輸了！你們挑泥人吧。”

王生媳妇說：

“那只是說說笑話，哪能真要你的泥人。”

卖泥人的拣了两个最大的泥人放在地上，挑起挑子就走。王生媳妇赶紧說：

“我們不要你的泥人，赶快挑着卖去吧。”

卖泥人的回过头來說：“我不卖泥人啦，回村参加农业社去，泥人算我送给建明社啦。”

新房旧屋

四十里鋪分東西二鋪，中間相隔一條道。這條道，南去上長峪山谷，北來下河灘樹林，是東西二鋪的中心。全村有什么集會、娛樂、慶祝的事，都在這裡集合。這裡常常停放着社里的拖拉機、膠輪車，或其他的新式農具。東西二鋪的社員們，每天上山收拾果樹，下地拾掇莊稼，都從這裡走過。去建明公社參觀的人，也必須經過這裡。

就在這樣一個顯要地方的東北角上，有一間破茅屋。那真是破得不象樣子——屋頂的茅草，好多年以前就發了朽，有的地方凹下去，有的地方凸出來，茅草變成醬黑色，活象多年的陳馬糞，如果走近了，還會嗅到一股朽酸的霉味。再看那牆壁，簡直象亂石堆，有些地方還有點牆壁樣，有些地方窟窿窿的，用亂石堆堵着。整個茅屋活象個干癟的狗尿台，上面濺着稀泥。這樣的茅屋不用說人住，連豬狗都不讓進去，隨時都有倒塌的危險。這就是伴隨着王生全家要了多年飯的那間破茅屋。

就在这間破茅屋的西北面，也不過相隔十步遠，蓋起了五間寬大的石頭新房。這房真是又堅固又漂亮，青石壘的根基，白石作的牆壁，白灰灌漿，青灰抹縫，石頭的楞角對得非常巧妙，構成了自然的花紋，遠遠看去就象古代的圖案。屋頂是石灰抹的，三年五載也別擔心會漏。就連屋頂的烟囱，也是亭樓式的，烟不是從上面冒，而是向

四面出。再看看那焦黃的窗戶，已經上過兩遍油，閃閃發亮，衬得窗上的玻璃都分外清亮。屋裏面的牆壁是白灰塗過的，鏡明雪白，尤其是太陽照在窗上，屋內顯得又豁亮又寬敞。這就是王生參加農業社四年后蓋的新石房。

那間破茅屋和新石房並排地站在那裡，顯得它那麼縮氣，那麼難看，石房是那麼高大，那麼雄偉有氣魄。對比之下是那麼不相稱。路过這里的人，都會這樣想：在這樣漂亮的房子旁邊，為什麼非留着這樣一間又破爛又陳舊的東西呢？拆了它，垒上一道新牆，再種點瓜瓜菜菜的，不是更好看更合適嗎？對，這新房舊屋的主人——王生也是這麼想的。

新房蓋好的那一天，王生讓老婆做了頓肉餃子，外加二兩燒酒。吃完餃子，王生驀地跳下炕去，伸手抄起一把鐵鎬，對老婆和兩個兒子說：

“走，拆那間傷心的破茅屋去！”

茅屋沒拆了。為什麼？咱們話分兩頭說。

近來王國藩看到一些現象，使他很傷腦筋。比如，有些青年人過上了好日子，却不知道好日子是怎麼來的。一年，全村有二十幾對結婚的，這是很大的喜事，可是這些年輕人結婚后，不說好好鬧生產，讓地里出產更多的糧食，却都擺起闊氣，講究起穿戴來。今天這一對請假趕集，明天那一對請假进城。下地晚，收工早，隊長教育他們好好干活，他們却說：“忙什麼，有吃有穿，銀行里存着錢，少做點沒啥。”就連戴存這個受苦的孤兒，也穿起买的千層

底鞋上山干活計。这些事总是在王国藩脑子里轉游。

那天，开了个支委会，决定对这些年輕人进行一次新旧生活对比的社会主义教育，請区委选一些教材。区委来信說：“光书本上的教材还不够，最好是活的真人真事，西舖这样的教材是不少的。”

王国藩和杜奎一个个地盤算着，看看哪个最合适。这个时候正赶上王生的新房剛盖好，王国藩看看石房，再看看破茅屋，灵机一动，手拍大腿，心想：“这不就是最現成最好的教材嗎？这不就是新旧生活最好的对比嗎？”

說來也巧，就在这个工夫，王生夫妇带着两个儿子，拿着鍬鎬走來。王国藩一看，赶紧迎过去問：“你們干什么？”

王生說：“拆了这个伤心的东西！跟着它受了一輩子罪。”說着叭嚓就是一鎬。

王国藩上前抓住鎬把說：

“这間茅屋可不能拆！”

“为什么？新房盖成了，出来进去的看着它，就想起过去，想起过去就伤心，不如拆了心淨，把过去的苦日子忘它个一干二淨！”

王国藩笑了，說：

“嗨，就是为了你說的这个，才不能拆它。”

王生眨眨眼，不明白王国藩話里的意思。

王国藩看看那間破茅屋，說：

“咱们上了几岁年紀的人，吃过旧社会的苦，尝过苦

日子的味，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才懂得今天的好日子来的不容易。那些年輕人，吃水不知道井怎么挖。不知道过去就不懂得現在，忘了过去就是忘了根，忘了本。天长日久，就象沒根沒本的树，風一刮雨一打就倒下了。这間破茅屋就是过去，这五間新石房就是現在，讓他們看看茅屋，讲讲过去，想想現在，这样他們就会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你說这間破茅屋拆得嗎？”

王生听了这一番話，感动得把鎬一扔，說：

“好，叫你这一說，不只年轻人，我們上了岁数的人也不應該忘了过去。我把它留着，出門看看它，进屋想想它，閑着沒事說說它，让子孙万代記住它，知道我們的日子是由什么道上走过来的。”

說得王国藩笑了，王生夫妇和儿子也笑起来。

过了几天，上海电影制片厂来拍建明社的紀錄影片，正好拍到王生夫妇过去討飯这一段生活。拍电影这是个新鲜事，全村男女老少，尤其是年轻的小伙子、姑娘和媳妇都来看热闹。王生家的院子里鬧鬧嚷嚷，風雨不透。这时候王生夫妇穿着过去討飯的衣服，拿着破铁筒和棍子（这些东西是特为保存下来的），走出屋来。大家一看，挺新鲜，都哈哈笑起来。这时拍摄工作还没有准备停当，王国藩看看是个机会，就把王生夫妇叫到破茅屋跟前，指着破茅屋問一个小伙子：

“笑半天，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嗎？”

小伙子撇嘴一笑，說：

“誰不知道，這是王生叔過去要飯時的房子。”

王國藩又問：“他們是怎么要的飯，为什么要飯？跟這間破茅屋有什么關係？他又是怎麼瞎的？”

小伙子被問住了，直楞着兩眼答不上來。

其他年輕的小伙子和姑娘們也直了眼，他們心想：“是呀，過去只知道王生叔他們要飯吃住這間茅屋，王生叔他們是怎么要的飯，又是怎麼瞎的眼？跟這間破茅屋有什么關係？象也聽老人講過，當時沒仔細聽，日子長了，模模糊糊地也記不清了。”

有些才過門的新媳婦，根本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就心急地問：

“是怎麼回事，主任，你給講講吧。”

“還是讓他自己講吧！”王國藩指着王生說。

王生就把他們夫婦如何結婚，如何瞎了眼，怎麼討飯，從頭至尾講了一遍。

有些人聽呆了，年輕人的臉上表現出憤怒。

這時王生臉上兩行熱淚，刷刷地滾下來。他是為過去的苦日子傷心呢？還是為今天的幸福生活所感動呢？恐怕兩者都有吧。

就這一天起，新舊生活對比的社會主義教育開始了，課堂上講，實生活里看，王生的“新房舊屋”就成了有力的活教材。

直到現在，全西鋪的人每逢走過這間破茅屋的時候，總是看它兩眼，想想過去的苦日子。他們把這間破茅屋，

当成新旧生活的标志，每逢看見它，就想起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无形中身上增添了新力量，不管干什么活，勁头都好象用不完。

尾　　声

《王生家史》写到这里應該結束了，也許有人要問：王生家現在的生活怎么样？我可以簡短告訴大家：一步比一步好。因為他們正沿着人民公社这条康庄大道，一步一步走向幸福，走向人類的希望——共产主义。但是，王生深切地知道，幸福的取得是多么不容易，需要付出多少痛苦、眼泪、斗争和劳动呀！王生全家現在常說这样一句話：“要不是共产党，我們哪有今天。”這句話听起来很平常，然而出于王生之口，这其中包含着多濃厚的感情和切身体会呀！新社会旧社会，一字之差，生死之別。有誰比王生全家体会更深刻呢？

王生不会讲理論，但对新旧社会的深刻体会，使他的話总是能让人信服、尊敬。他常說：“过去的日子里过去了，可給我們留下的痛苦要永远記在心上，永远不能忘本。”

王 荣 家 史

古 草

王荣是一九五二年秋王國藩和杜奎組織的二十三戶
穷棒子社里边的一戶。但入社前后生活变化很大；走上
这条新路很不容易；在建明社、在西鋪村、在二十三戶里，
他成了个典型戶。这里記下的，就是王荣一家的过去和
現在……

排 行 老 大

王荣排行老大，老二王生，老三王福，老四叫十丫头。
父亲王凤山，祖父王玉，都是扛活出身。他家祖祖輩輩受
苦。光緒二十一年，一場水災，十口人餓死七口。后来家
中劳力慢慢增多，扛了多少年活，才混上了五六亩地，六
間草房。不久，王荣又娶上了媳妇，得了小子来泉，又租
上東鋪地主王瑞清三十亩地，一年中借借找找，日子还能
勉强着过去。

一九三〇年春，王荣二十四岁时，家中婆媳不和，时
常發生爭吵。王荣心想：“单过比伙过上算。”就領着老婆

和来泉分出另过。这一年他粮食打的不少，除交租子，足够三口人吃喝。再加上起早睡晚，倒弄小买卖，拼着命去割荆棵，还有点剩余。父亲王凤山早看出：老大最奸，和外人来往从不吃亏，是过日子能手。他离不开老大，托人說合，死乞白賴把王荣又叫回来伙过。从此王荣在家庭中占了重要地位，一切都由他掌管，代替父亲理家。他打发老二下林西矿，叫老三去打短工，自己和父亲經營那点地、磨豆腐、养猪、卖粉……王凤山想：“有老大，就放心了，不下十年，日子就会变样。”沒成想，第二年，災禍却来了。

祸 从 天 降

王荣舅家日子过的挺旺，时常放債，王荣家一时倒不开，就常跟他們借些錢。王荣二十五岁那年，借的大部还清，只剩个零头五十吊。这天上午王荣正耪地，看見二妗子一扭一扭朝西鋪这股道走来，王荣好納悶：我媽在大安庄住娘家，二妗子为啥一人来了，莫非出了什么事？兴許又来要眼……，就走上前問：“二妗子來啦？”二妗子笑嘻嘻的，像沒事似地說：“你爸爸在家嗎？”王荣一看不是正常笑，就說：“二妗子有事跟我說吧！”二妗子还是往前走，他就放下鋤，把她領到家。一进家，她就放起賴：“他大姑夫，我活不成啦，你給我們扫門坎子去吧，我活不成啦……”話還沒說完，就打摆。这才知道：她吃了信子①。

① 信子，是一种极毒的药。

王凤山着了急，赶紧去大安庄問究竟。王荣見二妗子摆过来摆过去，像要死，就想：“不管为啥，人要是死在我家，事情就大了，别的不算，光請人說合吃飯，就得不少化銷……”他赶紧找人硬把二妗子往大安庄抬，抬到大安庄，就死了。

二舅叫苗进治，在大安庄是个恶棍，他的日子就是靠放債、雇活、要无賴发起来的，是新起的一戶富农。这次原是儿媳妇媽家想借錢，沒借給，媳妇就恨上了二妗子，說二妗子养汉，家里的日子是靠她脊梁骨賺來的。并說這是由王荣媽嘴說出來的。二妗子心路窄，听到这些，吃不住，就服了毒，发生了这件事。苗进治想：如果追王荣媽那句話，不清不白，傳出去名声不好听。他思謀了一会，就打了个歹毒的主意，編了一片謊話說王凤山欠他家一百一十五元，連本帶利二百三十块。这回他叫家里去要賬，因为不給，打架、被侮，才吃信子死的。这样王凤山爷儿三个就被他們扣起来了。

动了很多說合，不中；求了很多情，也不中。王荣代他父亲分爭：“你說欠一百一十五块，都是啥呢？”苗进治說：“借的錢，糧食錢，……哪月哪日借的这都有。”王荣上前把眼一立，大声說：“我們原来就欠你二十八块零五十吊，今年春上給你两駄子缸，三百斤花生，七百斤蘿蔔，二十八块都还清了，就差这五十吊，你就不认賬了？”苗进治說：“你們有恩不報，反来为仇，欠錢不还，反倒跟我們打架，害了我們家的人，还敢强嘴？”說完，伙同一批流氓，不

分青紅皂白，把王榮媽綁在上門坎上，把王榮爷倆吊在枣树上……王凤山服軟了，說认了吧，王榮劝他爸爸：“不能认，至死不能认！他这里讹人！……”但不过两个小时，王荣就被打昏过去了。他們把王凤山解下来，叫他按了手印，承认欠他們一百一十五元，本利二百三十块，答应很快出地还上，写了单据，这才了事。

那五亩半地就这样沒了。王荣爸爸王凤山一下就病倒了。

仇 恨

老人倒在炕上，一病不起。王荣总是劝：“爸爸你把心路放宽些，別为这件事把自己命白搭了。这个仇反正咱们得报，今个报不了，明个报，明个报不了，后天报，今年报不了，明年报……整天愁，憋这口气，顶啥呢，管啥用呢。咱们地沒了，可是地也是挣来的。有我們哥几个，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能挣回来，你整天这样，我們当小的該咋好呢……”不管怎样劝，老人还是順不过，总說：“我活不下去了，活不久了，我咽不下这口气，长这么大，沒挨过綁沒挨过讹呀。”王荣說：“他綁人，他讹人，那是他的罪，反正咱们沒偷人家，沒騙人家，丢人的不是咱们，是他們。他們得受报应啊。”就这样劝，老人还是不見好，病一天天重，也不吃也不喝了。王荣一看不好，就从衣袋里摸出一把票子，送到老人跟前：

“爸爸，我这有錢，咱們還可以买驴，可以跟腳，再租點地呀……”

老人一看是五十塊錢，就笑了，問：

“你哪還有錢呢？”

王榮說：

“這五十塊錢是我自己單過時積攢的。”

老人一听又難過了，落着淚，說：

“我不該叫你回來，要是單獨過，你也落不到這地步，那二畝地也白搭不了。”

王榮心勁却挺大，第二天就買了一頭驴，滿心想翻個身。不料這年秋天，又飛來一桩橫禍。原來他家租種着東鋪地主王瑞清三十畝地，因為年年交不夠租子，欠下一百九十多塊，王瑞清就把三十畝地收回，把王鳳山六間草房也給圈去了。

地沒了，房子也沒了；王榮家一下變成赤貧。王鳳山病勢越來越重，不過兩個月，恨恨連聲地死了。那年王榮二十七歲，老人死的那天晚上，驴也被人家偷了去。

謀 生

吃沒有，燒沒有，住沒有，日子實在不好過。不久，母親帶着十丫头出了門子，到斗嶺子改了嫁。一家人四分五碎。王榮心愛的儿子來泉也餓死了。好在第二年又添了個小子，起名叫慶海。王榮抱着還上飢荒（債）恢復家

业的希望，又开始租种另一家地主的地。头一年，一下租了十几亩，打算种花生，收入大。同时，还计划和别人合股赶脚，又计划打荆棵，以此收入做为生产垫本，来支持着种那十几亩花生。但到秋后，这希望完全落空。这年秋旱，年景不好，花生打的有限，粮食也沒剩多少，赶脚割荆棵赚的那六十多块錢都搭进去，还不够，反倒又拉下三十块饥荒，赔了二十多块。这一下王荣情緒低落了。

但他还不死心。秋后，他又找了个門路：借錢做小买卖，由白馬峪村拉栗子，驮到破城去卖。破城栗子是七分錢一斤，他估摸着一趟可以赚两块多錢。那天他起了个大早上路了。誰知头一天就不順利，走到接官厅村东边那个土崗子上，就被人給截住了，有三个穿官服模样很凶的人要他起稅。王荣說不給，穿官服的不让他走。王荣說：“我凭什么上稅？我是头一天做买卖。”穿官服的說：“做买卖就得上稅。”王荣說：“我就是不上。”穿官服的說：“不上就是不行，赶一驮栗子两毛錢，我們在早就看上你了，今个才把你截住，你說头一天做买卖，誰信呢。”王荣急了，說：“我不管你們相信不相信，反正我不給。誰知道你們是干啥的？起稅还有在这起的？你們这純粹是打杠子的！”越說越火，最后还是沒給，打了一架走了。到了破城，已晌午歪。先到的都卖七块錢一百斤，赶王荣到了，奸商一看是杀价的好机会，硬說栗子不好，給五块錢一百斤，其实栗子都是一样的。王荣把栗子都倒出来，分爭。奸商不得已加到五块五，六块，王荣还不答应，并且爭竞

說：“七塊錢一百斤。少一個也不行，還得給腳錢，……”鬧得很晚，奸商不收了，王榮也不賣了。他一肚子氣又馱着栗子往回走，剛出破城，就變天，下了一場大雨，混身給淋透，栗子也澆壞了。

剛到家，村里就打發人來傳他，說是稅務局來人，叫他去。王榮被推着到村公所，一看，還是早晨那三個穿官服的人，正在喝酒。他們拉著架子橫着眼，問：“你為什麼不交稅？”王榮分辯道：“我頭一天收买卖，栗子還沒賣，凭啥就交稅？”穿官服的說：“誰知道你是頭一天，還是做一年买卖了，今個得罰你一回，你把這一年的稅補齊，交四塊錢！”王榮火了：“凭啥？還講理不？”穿官服的說：“官家就是理！”胳膊擰不过大腿，刀棒在人家手里，末了王榮只得拿了四塊錢的稅。栗子全賠進去了。

氣、急、又被雨淋，混身不好受。可是當村里有人來聯絡他到遵化城去趕腳，給商號馱紅高粱時，他還是爬起來去了。他在路上走一段，就在地里躺一會，還沒到遵化城，就發高燒，病倒，抬回家來，一病躺了三個月。

又向几處借了外債。債上加債，越來越多。從此一年不如一年，景況一直倒下去，越窮越翻不過來。這當中，他曾給一家地主扛過活，因為得了傷寒，被辭退了；也曾搞過副業，磨豆腐，因為死豬，一年工本都白搭了。王榮冲天長叹說：“我哪輩子沒修好，倒楣的事都讓我摊上了。”又對慶海說：“不是你爸爸沒能耐，你爸爸不傻啊，這是命啊，是時運不好啊。”

他再也想不出門道來。租地，怕种不起；做买卖，又沒有本錢；生活逼得他无路可走，每天只好扛着个鋤，去給人家做“工夫”。

一 把 鋤

給財主家做一天工夫，除去管一天飯外，还給一升紅高粱。三口人，再加上点野菜，也能活下去。但王榮还有一屁股外債，同时他又得了个小子庆河；隔了几年，又相继得了两个閨女：珠子，庆齡，六口人靠一口人，生活就緊上加紧了。

这当中，王榮曾和范永祿、范永如、范永义一起，联合上七十多个穷人，自发地向西鋪的地主阶级做过斗争——吃大鍋粥；但这并沒解决什么問題；由于沒有党的领导，斗争結果也只能是失敗了。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逐步侵入华北，抗日战争爆发了，阶级压迫又加上民族压迫，王榮一家的生活更加困难。庆海稍大以后，虽然能帮替点，还是經常揭不开鍋，三天两天沒吃的。

王榮扛着一把鋤，整天帶着庆海到西鋪庄东大槐树下——“工夫”市上去等，但做工夫的人一年比一年多，經常有几百人扛着鋤等在那里；人越多，叫工夫的人越刻薄，被叫上的可能性就越小了，三天五天也碰不上一天。生活越来越难，几乎天天靠吃野菜活着。

有一回，餓的实在沒办法了，王榮在“工夫”市上等了好几天也沒人叫，就对庆海說：

“走，咱們爷倆到外邊轉轉去。”

两人一人背着一把鋤，夾着个破被（做工夫的标记），起了个大早，到大寨去了。到大寨时天還沒亮。但在大寨一直等了半天也沒人叫。本来从昨天就沒吃上飯，这天早晨連口水也沒喝，又等了这半天，实在不行了。怎么办呢？这么等着也不行啊，王榮爷倆又把鋤一扛，往西轉，一直又奔到遵化城南西溜村。到这村一找，有个要叫工夫的，可是这戶詭詐他們說：“你們要做工夫可以，不过爷倆做一天只給一升紅高粱。”王榮說：“两人應該是两升紅高粱嘛。”那家地主說：“我不管別人，我这里一升，做不做由你。”王榮求告半天，左說右說不行，后退一步想：“既走到这，认了吧。”但庆海却不同意：“給一升紅高粱，連媽也养活不过来，更不用說还賬，不行……”王榮又一想：“是呀，一升紅高粱够做啥呢……”他听了庆海的話，沒有做，就又沿着村往北轉、往回走。走一个村，不行；走一个村，又不行。走到后半晌三四点，快到西小寨时，就走不动了。王榮看見眼前有片树行，就倒在那儿歇着。庆海在他旁边坐了一会，見离家还有三十里地，說：“总歇着也不行啊，走吧，爸爸！……”連叫了几声，王榮才坐起来，一坐就昏了，說：“这是啥回事？我啥悟迷三道的？眼前觉得直晃搖、发黑……”庆海見他爸爸臉色都变了，扶了一会，說：“这不是别的，就是餓的啊！”庆海見十几步远有

一眼泉水，就去弄了点水来，給王榮喝了，清涼了一会，这才好些了。爷俩起来又走。

赶走到高各庄莊西，到一个坡底下，就又走不动了。歇了一会，王榮說：“这离你姨家不远了，到你姨家看看去吧！”庆海說：“做啥去呀？”王榮說：“我們两天沒吃飯了，得吃点飯呀。”庆海說：“跟人家要着吃去？”王榮說：“过去他也吃过咱們啊，就算要着吃去——”庆海說：“我不去，人家現在过好了，咱不伸那个手，我嫌寒偷，走吧！”虽这样說，王榮还是不动。他抬头看見道那边有几疙瘩曲曲菜，說：“二头^①，你到那边擰把曲曲菜来。”庆海說：“这时候曲曲菜老了，麻嘴，又扎的慌，吃不得了。”但王榮还叫庆海去采。庆海到那边采了一大把，先放在自己嘴里一棵，嚼了嚼，說：“吃不得，老了，又麻又苦又扎嘴。”王榮好像沒听见二头这话，接过来，一大口一大口的連泥带上边的刺都吃了。吃了，爷俩起来就又走。

但走不远，就听见西北方向枪响，而且枪声越来越密，从那边逃过来的人說：最近出現了一股新軍队，与过去一切旧軍队都不同，抗日很积极，这回就是他們在城东和鬼子开火了……

王榮原想从木家庄那边往回轉，听到这消息，就只好由庆海搀着，紧一步、慢一步的由庄戶沟直接回到家，到家已大黑了。

家里人盼了一天，一看爷俩餓的这样，紅高粱也沒賺

① 王榮为了紀念死去的大儿子來泉，給庆海起名叫二头。

来，庆海媽就抽抽嗒嗒哭起来，她已三天沒吃东西了。

没办法，庆海媽拿着个瓢，到已要上飯的老二王生那里，借来了半升紅高粱糠。借回到家就做，从开鍋起，一家子圍着鍋就喝——实在等不得了。一直喝到熟，熟了，也喝完了。

喝完糠粥，六口人躺在炕上，伙盖着一条被子，都在想：“完了，怎么办啊，明个怎么办？完了……”

第二天，爷俩又白跑了一天。

到第三天，王荣沒办法，才忍无可忍，第一次偷偷地开始向老二王生学习——要上飯了。

賸

这以后，王荣就每天扛着一个鋤出去，遇上有人叫工夫，就給人家做工夫；遇不上，就要飯。虽然当別人問他时，他总說做工夫去着，但实际上他常常是扛着一个鋤，要了一天飯回來了。

但做工夫也好，要飯也好，仍然不能維持一家六口的起碼生活，更不用說還賬。賬——过去因为給父亲治病，自己治病；因为发送父亲；桑吃的；做买卖；租房子……已經达到三百五十多块。从父亲死后这十多年中，他經常在借賸、還賸、又借賸、又還賸的日子中滾过。結果不是越滾越少，而是越滾越多。

王荣算了一下，三年本利平，如果不想別的办法，照

这样下去，过不去三年，就得达到七百块。可怕呀。

他翻来复去，做了各种設想。首先，他想托人把庆海庆河打发出去，庆海可以做小活，庆河可以放猪。这样，不仅减少家中吃饭人口，还可增加收入，最低两人一年也可交他十来块。其次，他自己除去做工夫和偷着要点饭以外，整个夏季可以打荆棵，冬季可以打柴，同时秋后可以抓着跑点小买卖——对此营生，他虽赔过錢，吃过亏，但生活逼迫他还得从这上面打主意。做工夫、要饭、打荆棵、打柴、做小买卖，这些办法一齐来，一年至少可以收入百来块。这比給地主扛长活上算。

决定后，他就这样做。他里外又一算：用自己赚来的除养活四口人外，剩下可交利錢。两个儿子赚来的，可以还本。三五年后，两个儿子长大，工錢一长，七八年就可以翻过来。

但事与願違，王荣这套賬又算錯了。

首先，虽然把庆海庆河打发出去，但庆海一年工資只得一小斗棒子，合四十二斤，不到两块錢。庆河人家只答应用饭，沒工資。其次，他自己折腾了半年多，所得收入只能維持四口人生活；后来他眼睛在一次打荆棵时受伤，躺了多日，連四口人生活也不能維持了。刮風下雨，天災病痛，处处不順利。他汗滿流水倒弄了一回燒瓜卖，两天賺的錢才合一升紅高粱，还不如做工夫上算，还不如要两天饭来的多。

这还不算。紧接着，旧历九月初一屈福亭又替人要

賬來了。一年半以前，王榮托他从遵化城一商号借了十五块。去年九月初一和今年三月初一，屈福亭来要了两回，王榮都沒給。現在，又來要，一天來三回，非給不行。而且最使王榮想不到的是：這十五块利錢的算法很特別，去年九月初一沒還上，把本利加在一起算，今年三月初一沒還上，又把本利加在一起算……，一般三年本利平，而這十五块錢，一年滾三回，一年半本利三十一块零四毛。

怎么办？王榮愁的一天沒吃飯——實際也沒飯，家里又一天沒揭鍋了。天黑后，他在窗戶跟前蹲了一会，想：這筆賬無論如何得想办法還上，否則這樣滾下去，這一筆就得要他命。

他起來，到西头找屈福去了。一進屋，正赶上人家吃晚飯，一家子圍一桌，是小米大爬豆粥，熬豆腐，稠稠糊糊，熱氣騰騰的。屈福見王榮進來，就說：“還沒吃吧？”王榮說：“還沒吃。”屈福說：“那就上炕在我這吃吧。”王榮說不，屈福却給他盛了滿滿一大碗，硬揣給他，說：“今個你要不吃，咱們就不是哥們，這碗飯就是藥死你，你也得吃了。”這一說，王榮更不吃了，屈福原來和王榮家是一樣的日子，可是現在人家過的这么好，他却到了這份上，難過得要掉淚了。但王榮硬憋住淚說：“這飯我不能吃……我只求你一件事，你想法給我借三十块錢……我王榮早晚還上……”屈福說：“啊，……你是想借三十块錢？做啥用？”“還賬，屈福亭幫我借的那十五块，一年滾三回利，一年半本利三十一块四，我欠不起了……”屈福一聽，發沉

了，半天才說：“眼下借錢实在為難，找保也不行，你去找王鳳春試試。”

王榮從屈福家出來，又去找王鳳春，不行；又去找了三四家，都不行。半夜時，他回到家，這才跟老伴商量，咬着牙，忍着心，把七歲的大女兒珠子送到西山，給老伴家當了童養媳，換來兩石棒子，對付着把這筆賬還上了。

珠子走後，來要賬的並沒停止，一進腊月，接二連三的又都上來了。王榮這時覺得他欠的飢荒，象泥虫似的，都末了脖子，忽拉不开了。為了躲賬，他不敢再進家……

歷史的轉折

春去秋來，燕子飛去又飛回，又過了好多年，突然霹靂一声，冰河解凍了。在共产黨的領導下，這個地區經過艱苦的戰鬥，打退了日本鬼子的侵略，又擊敗了國民黨反動軍隊的進攻，終於在一九四八年進行土地改革。

王榮站起來了。在土改中，他擔任了貧農團委員，和王家地主進行了積極的鬥爭。土改以後，不但舊債廢除，還分了十一畝半地，三間草房。日子就完全變樣了。

開初兩年，王榮仍然走的舊路。和懷抱着曾經破滅了的希望，靠他自己單干，靠他兒子的努力，要這個家業過好。現在，不是又和二十年前父親在世時一樣了么？那年他和父親分家另過，不是弄的很好么？現在兒子媳女都長大了，有共產黨保護着，凭他王榮，日子沒有過

不好。

但实现这愿望并不容易。一九四九年，一场大水，把他的庄稼冲去了四五亩。其他在山坡子上种的，产量也不高。一年的收成不够维持一家全年的生活，更谈不上养猪和买牲畜了。而且旧债废掉，新债又有了一——借了十几块钱买下几个月吃的。一九五〇年，由于底薄，没牲口，地没整过来；同时由于没猪，粪少，大部分种的白点地，这年产量也不高。还了十几块，不够，又借了十几块。再加上给庆海娶了一个媳妇，生活还是很紧巴。一九五一年，王荣采取了一个措施：叫庆海和庆河出外做短工——这时一些老富裕中农又开始雇工了；他自己带着闺女、儿媳、老伴种这十一亩半地。王荣计划：这十一亩半地维持他们五口人生活，积攒庆海、庆河的工资将来买驴买猪。头两年，虽然不顺利，但往前看，还是满有信心啊。

这年春天党支部号召组织互助组。国藩杜奎一次再次找王荣参加。王荣对这互助组兴趣不高，碍于面子，同时又是共产党的号召，他是老翻身户，不好意思拒绝，勉强参加了。不过，身虽参加，心却在外面。与王荣一个组的组长常找国藩杜奎反映：

“王荣不讲理呀！”

“怎么回事？”

“别人帮他干活，他没意见；轮到他帮别人干活了，老是推三阻四。说什么‘管饭不管饭？’别人说大伙一样都

不管飯，他就說：‘不管飯那等以后再說吧，我今个還沒吃的呢！’末了他不是出去打短工，就是到自己地里干活去了……”

國藩听了，一笑說：“老王榮就是這樣，慢慢來嘛。”

結果，由於王榮三心二意，左右打算；又由於這年春澇秋旱，所以產量也不高。到一九五二年王榮正想找理由退出，國藩杜奎就找他來了：

“王榮大哥，咱們成立一個土地社怎麼樣？”

王榮開始不通。國藩和杜奎兩個就勸：“共產黨領導咱們翻了身，分了地，咱們不能忘本，這回走合作化，是黨的號召，是光明大道，過去為啥受窮，就是因為土地私有，小農經濟，階級分化，出現了地主富農，剝削咱們。現在雖實行了土改，分了土地，原來的地主富農沒有了，但這並沒解決根本問題。如果不走合作化道路，還會出現新的地主富農，還會走上過去受壓迫受剝削的老路。”並聯繫西鋪村的具體情況，說：“實際也是這樣，土改後，咱們村的貧雇農，很多人日子沒有過好。你也是一樣。這兩年就有十几戶賣地的。現在有些被打倒了的地主富農又興風作浪，諷刺咱們，說咱們嘵啦一生，就是窮命鬼，靠割別人的肉貼在自己身上，胖不了；一些富裕中農還叫嚷要買咱們的地——連炕頭都給買去。你想想，咱們是這樣單干下去，變成和過去一樣；還是長志氣，走集體，把社办好，靠大伙的力量，共同富裕？”

一片話，反復講了半天。王榮似乎聽了一半，耳旁風

給刮走了一半。他說：“共產黨領導穷人平分土地，平分完了，又归社，要回去——”杜奎說：“这不是要回去，共產黨要这干啥？这是咱們自己成立社，归集体，也是咱們自己的。”國藩說：“入社自願，出社自由。以后你觉得不合适，还可以出去嘛。”王榮松动了一下，說：“你們說了半天，到底这土地社政策是怎么回事，我还不明白哩！”國藩說：“土地社就是土地归集体，大家集体劳动，地五劳五。比如打一百斤粮食，土地分五十斤，劳动力分五十斤。”王榮一算計，自己不吃亏，也不会占便宜。最后沒办法了，便說：“你們哥俩对我素来不錯，叫我入社，我可以入，可是話得先說在头里，尽我們四口人入，最多加上庆河，我大儿子庆海还得去扛长工，我們还欠十几块饥荒。”國藩說：“入社了，儿子还扛活？”王榮說：“要是不扛活，比如到明年二三月社散了，到那时我們这活找不出去，以后賬怎么还？我們一大家子生活怎么办啊？”杜奎說：“咱們这社也不会散啊。”國藩說：“既然入社，最好还是不出外扛活，要是将来你們有困难，沒吃的，我們給你想办法解决。”这样又劝了半晌，王榮才无可奈何答应了。

一 条 新 路

清明节过后，二十三戶社員开始种地。这时王榮因为生活开始紧巴，又动摇了。他心里嘀咕：“不入社时，庆海庆河可以給人家扛活，虽说一年才掙一石多粮食，可連

嘴帶出去了，現在一顆米粒也沒人給，還得張着嘴吃家里的。到大秋還有五個月，這以後吃的可怎麼辦？”他進一步又想：“這玩意兒……生說要組織，親哥弟兄親爺倆還分家呢，這回把好幾十戶湊在一起，哪能干好。地都得荒了，非餓倒不行。”他想來想去，想出一個結論：“這社維持不長。”

一天上午，國藩杜奎領着大伙到南山去種玉米，有人提議把地界石扔了，他立刻嚷嚷反對：

“別動吧，動了將來是麻煩，秋後這社還不知怎樣呢，要是一散，各找各的地邊，得打亂仗。”

把地種完後，社里為了發展養豬積肥賺點錢，國藩杜奎叫他搞副業給社磨豆腐片（因為他過去磨過），他都沒信心。多次動員，才勉強答應了。

但出乎他意料之外，這五個月他們不但沒有餓倒，而且地始終收拾得很好。過去單干，一到莊稼正需要人工的時候，沒吃的了，就得先顧眼前糊口，去做短工、割荊棵，換點糧食。這樣地就受病，莊稼就受了影響。可是現在社里有組織有計劃了，開始沒吃的，大家就互助互濟，你的吃完了，吃我的；我的吃完了，吃他的。大家的糧食都吃完了，就專門組織一部分勞力去割荊棵，賣成錢給大家換糧食；另一部分勞力仍然照常經營莊稼。同時，過去單干，一到青黃不接又無處去割荊棵時，一般都吃青，這樣損失就大了；現在他們正在吃緊之際，區委給貸了點款，集體買了糧食，一棵青棒子也沒吃，一块白薯也沒刨。

所以，这年他們二十三戶不但同舟共濟，把最艰难最困苦的日子渡过来了；而且还以一种穷棒子精神，管理庄稼，二百三十亩地一塊沒扔。各种作物均及时描粪，及时鋤耪，有的甚至耪到五六遍。夏季地里一株杂草也沒有……。副业生产在大伙的帮助下，也搞出了成績。起初他們这家一升、那家半升共湊了二斗豆子、六口猪，交王荣經管。他一个人破豆子、磨豆汁、做豆腐片，带卖、带喂猪。今天磨，明天卖，后天又磨，大后天又卖。总是这二斗豆子来回倒。結果，不到三个月時間，猪由六口发展到十八口，錢也赚了不少，粪也积了不少。……

王荣一个人干这些活儿，再加上做猪食、垫圈，本是够紧张的了，但他还經常抽空到地里去看看，甚至抓弄着干点活。看一回，出他所料，很好。看一回，又出他所料，很好。庄稼长得一片油綠。以他自己南山那五亩半地为例，单干时，种啥啥不收；現在那棒子长得真叫好，到秋后，眼瞅着整整拉了七大車。这样的大丰收，他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了。

而且他更沒想到的是：秋后一分配，国藩杜奎跟大伙一样分，沒一点多占；对他却有照顾，別人每天一般都記八分，单給他記九分。再加上他家劳力多，一家大小都出工，結果这头一年他分的粮食最多。屋里、屋外、箱子、柜、盆、罐、大小口袋、地下、炕上、房上……一堆一堆的都盛不下了。盛不下了，門外还一口袋一口袋往他家扛：

“大嬸子，还有地方嗎？”

“有……”

王荣大娘連飯也顾不得吃，顛着个小脚，急忙的滿处找家具。她半輩子也沒見到过这么多粮食。一家子兴奋得彻夜睡不着觉。

到末了，分得差不多时，王荣暗算了一笔賬：已經分到手的，純糧食二十八石，花生六百多斤，錢一百多块，外加棉花、柴禾……如果把物都折成錢，大約九百多块，如果把錢都折成糧食，整合四十一石，超过在单干和互助組时的五倍。

“兴得听了两个主任的話，沒让庆海庆河去扛活，”王荣一边算，一边后怕，“要是扛上活，庆海一年最多一石七，庆河一石三，折成工錢不过三十多块，比在社里劳动就差多了。”

他把欠的饥荒都还清了，还买了十一个土布，做了三条新被褥、几身新衣服，一下就翻过身来。

秋后墾地，王荣对两个主任說：

“把界石刨了吧，留着又擋道又占地，碍手碍脚的，沒用。”

两个主任故意打趣地說：

“別动吧，动了将来麻烦，以后这社还不定怎么样呢！”

王荣臉一紅，知道主任跟他开玩笑，說：“別提啦，这回我一輩子也不出社了。”

扩社前后

丰收以后，社里又扩大了公有财产，新买了牲畜和农具，社外很多农民看到社的优越性，纷纷要求入社。但要求几次，二十三户社员谁也不同意，最不同意的就是王荣。

他說：“这玩儿，头一年真叫苦啊，一年就顶十年过，当时那样困难，紧着褲腰带干活，他們社外的不但不说好話，不帮助不助威，反而看笑話、諷刺——甚至打击；这回咱们苦干了一年，弄好了，把江山打下来了，家业治下了，叫他們享现成的？高低不行，一戶也不吸收，誰也不发展，咱们就关着門、悶着头，干他十年八年再說！”

当时国藩和杜奎两个虽也有这思想，但不好明說；王荣就沒顾虑了，他不怕这个那个的，可以横推車，擋着不叫吸收。有一次国藩杜奎召集开小会，王荣說：“以后他們再要求，你們两个主任不好答对时，就讓他們找社員，找我。”結果，有一个上下月，一戶也沒吸收。

正这时，县委召开三級干部扩大会，国藩去一听报告，是传达党中央的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批判关门主义。散会后，县委曹寿山同志带着許多人，連同区委赵涌兴书记、李继增书记都到西鋪这穷棒子社来了。王荣一看來了一大帮人，出出进进，听说来的任务是貫彻总路綫，帮助扩大社，解决思想問題，心里就結了个疙瘩。

会开了好几天。开始二十三户社员谁也不同意扩社。大伙都看王荣，王荣就代表大家把不同意的理由跟曹书记说了。

曹书记一听，就笑了，说：“你们还怕人多？扩社是件好事嘛，人多力量大，越多越好办事。你们土改以后分了房子分了地，为啥单干时没弄好，入社头一年就干好了？——就因为是集体化的优越性嘛。现在你们把社扩大，以你们二十三户为基础，再吸收一批新的力量，有啥不好呢，这既对你们有利，也对大家有利。你们二十三户头一年干的是不错，新衣服新被子做上了，兄妹团圆了，旧债还清了，一年生活不发愁了，你们说：这就满足了吗？这就到头了吗？就不能更好了吗？咱们革命是无止境的，说老实话现在这样距离真正的幸福生活还远的很呢！你们现在穿的是啥？吃的是啥？使的用的是啥？你们这二十三户初级社也不过就是一辆铁轮车、一辆花轱辘车、二头驴、一头牛，又新买了一匹马，……将来我们还要使拖拉机嘛，使汽车嘛，还要电气化嘛，吃的不但要饱，还要好，穿的住的还要讲究嘛……路还远的很呢。你们刚办了一年初级社就想停下来，这对不对？关门主义应该不应该？”

曹书记这一片话，说得大家心窍大开，于是不通也就通了。

这以后王荣就处处留意，看他们怎么登记，怎么作价。当时二十三户把来年的种子、肥料、家具、牲口车辆、

飼草飼料……，一切都准备得足足的，留的种子两年也种不了，飼草飼料一年半也够吃了，特別是那一堆糞——在社址那个大院积攢着，更是充足。王榮估摸着有二百車，如果使在二十三戶的地土上，糧食管保比一九五三年打的还多！

那天王榮照往常一样，正看豆腐片房，听见院子里有一个人說：“这堆糞不过五十車。”

王榮一看，来了一撥人，給那糞堆做价登記来了。說話的是高明成——新入社的社員代表，財產處理委員會委員。他正洋洋得意，指手划脚。

王榮又恼火了，就把柴火填了滿滿一灶，走出去，問高明成：

“你說这堆糞有多少？”

“五十車！”

“五十車？二百車我也不給你。”

“光我說你說不中啊，还有大家呢！”高明成还是洋洋得意的。

“这么着，”王榮橫在人群当中說，“这堆糞要是不到二百車，我把眼珠子挖出来，踩个泡，給你頂上！”

底下大家就噜咕起来了。說多少的都有。噜咕了半天，县里有一个干部就給估了个数：一百五十車。

“一百五十車也不中，”王榮始終沒离开这人群，“不信你們就用車拉起試試；再不这堆糞就种在我們二十三戶的地土上，你們新入进来的戶，自己帶糞，咱們各種各的

地，个使个的粪！”

大伙說：“那样还行？既然是一个社，还能分着使粪。”

最后李继增書記說話了：“王榮大爷你得明白：咱们做价、估数，只是大体合理，差不多就行。不管估多少，这里也有你的一份，估五十車也是你們的，二百車也是你們的……，你說的那两个办法都不合适，既然扩社，成为一个社，就不能你种你的，我种我的；你使你的粪，我使我的粪；要合，就都合起来。同时，用車一車車拉，也不是办法，也沒那个工。……我大体說个数，算一百八十車，你們看中不中，錢是两块七毛一車，怎么样？……”

李继增同志是区委副書記，区委分工是由他負責領導和帮助穷棒子社的，半年多的体验，王榮最佩服这个李書記。他一看，既然李書記說話了，还說啥，也就不再坚持了。

等到这場爭論結束，王榮回到豆腐片房，一看，坏了，因为时候大，火也大，豆汁都流出来了，把一鍋豆腐片糟蹋了——末了只好落价卖了十几斤。

事后国藩看見王榮說：“看看，你脱离职位，本行不管，这耽誤多大事，多大浪费，賠多少錢！”

王榮理直气壮地说：“賠多少錢——也不过是一車多粪，最多不到两車粪錢，由五十車粪变一百八十車粪这是多少咧！”話虽这样說，但他心里还是很难受的。

結果后来实际一拉，这堆粪是二百七十多車。

扩社一报名，一下增加了六十戶，連原来的共八十三

戶。王榮當時心里不大痛快，可是見干部們這樣高興，也不好再提出別的。末了他還是往前看，在一次會上，向縣委保證說：“以後領導上放心吧，我們心里亮堂了，保證把新社員團結好。原來是二十三戶，這回是八十三戶，零兒還是三，行，二十三戶干好了，八十三戶也一定能干好，咱們還得發揚窮棒子這股勁呀。”

王榮這一說，大伙都笑了。

後來有人提出社的名稱：“咱們社擴大了，車輛牲口也有了，也丰收了，總叫窮棒子社也不中啊，總得起個名啊！”

大家異口同聲的說：“對，是得起個名。”

王榮思謀了一會，說：“我看咱們這個社叫党中央總路線的燈塔一照耀，就照亮了，咱們要建設社會主義，前途越照越亮，越走越好，就叫建亮社吧。”

大伙說：“好，這個名字很適合，也對大伙的心意。”

會計佟啟這時插言了：“我也提個意見，依我看，得改個字，‘亮’不順耳，‘明’字好聽，就叫建明社吧。明也當亮講。”

大伙說：“中，還是‘明’好。”

王榮一半認真一半开玩笑的說：“這個‘明’字要不當亮講，佟啟你得負責任。”

佟啟說：“行，到啥時候我也敢負責任。”

從此，就叫建明社。

榮 門 喜

由初級社到高級社，生产年年发展，社員的收入也年年增加。老王榮笑得合不上嘴。这一年，秋收分配又下来了。六百五十块里扣去三个劳动力生产垫本——應該交納的股份基金二百五十元，王榮純拿到手的是四百多块。两口子乐得躺在炕上睡不着觉。老伴說：

“三头還沒媳妇呢。”

王榮說：“是呀，該給庆河說媳妇了。”

第二天，他就托这个托那个：“給我們庆河保个媒呀！”但別人提了几处，王榮都沒相成。一九五七年正月，屈文又給介紹了强庄子高凤的閨女高玉芝，貧农成份，品貌年龄也相当。这回是庆河自己相的，双方一見面，就成了。王榮虽然不大遂心，但在大伙的說劝下，也答应了，于是他带上礼品到强庄子下了礼，回来就看日子，准备旧历三月初八娶媳妇。

王榮想：自己苦了半輩子，結婚时連腥味都沒动过，我爸爸娶我媽、我爷爷娶我奶奶时更不用說——連小米干飯都沒吃上，这回共产党領導翻了身，入了社，日子过好了，庆河是最小的儿子，虽然現在享了福，但在旧社会里也熬克过，这回手里有了錢，还有一口肥猪，不如趁这机会让全家人欢乐欢乐，賀賀喜，也叫別人看看我王榮現在到了什么份上了……

他算了一笔，分到手的錢和糧食，除了維持一家全年生活外，娶個媳婦——即使坐上一二十桌也足夠。計劃好以後，他就去找國藩和杜奎。一進社址，見鄉里張書記正和國藩杜奎研究事。

“大爺有事嗎？”張書記先開口了。

王榮說：“我請示點事，想給三頭——慶河娶媳婦，定在三月初八。”

國藩說：“娶呀，這是喜事。”

王榮說：“可是，我家里的大米不夠了。”

杜奎說：“國家不是有供應嘛，娶媳婦供五十斤大米。”

王榮說：“五十斤不夠啊。”

張書記國藩杜奎同聲說：“五十斤还不够，你想怎么办啊？”

王榮說：“我想坐個十桌二十桌呢，——我苦了半輩子，这是最小的儿子娶媳妇，現在入了社，弄好了，我想让亲戚朋友們也替我高兴高兴，也請請乡亲們。”

國藩杜奎說：“那不用！要打算娶媳妇，你就打上一斤酒、称上半斤糖疙瘩，买几盒烟卷，再买上一張毛主席像，晚上大伙給你一道喜，一哈哈就中了。”

王榮說：“那不中，咱不是軍隊，若是軍隊就中了。”

張書記說：“不是軍隊也不應該闊大羅，还是新事新办吧！現在上級正貫彻勤儉持家，我們這正研究呢，咱們是建明社，你又是二十三戶的，更应注意勤儉节约。國藩

杜奎他們說的有道理啊。”

王榮說：“咱勤儉節約，咱有道理，可是娘家的人來了，也得坐上几桌啊。”

國藩說：“就是娘家的人來了，坐上几桌，五十斤精米也够了。”

王榮還是堅持：“那不中，我爸爸娶我媽、我娶我媳婦、我二兒子娶我二兒媳婦，都沒办过，这回娶三头媳妇，怎么着也得坐几桌。”

國藩杜奎还是不答应：“那不能照你这么办。咱們是建明社，得勤儉節約，現在正往下貫彻这精神呢，你应当带头。”

說不到一起，王榮只好暫時放下了。

正好这时县里一个負責同志到西鋪來，國藩杜奎把這事一汇报，这个負責同志說：“坐两桌就坐两桌吧，几輩子受穷，这回弄好了，也有意义，別鬧大了就中。”王榮听到这消息，就大准备起来了。他怕自己喂的那口肥猪不够，又买了一口；除买来国家供应的五十斤大米以外，又从市場上花四毛錢一斤买来二百斤，共二百五十斤大米；还买了四十一斤白酒，三十一块錢的烟卷，糖、粉……搭了席棚，找了两个會計（管收禮錢和記賬），买了不少紅紙，在王生家王广家号的房子，向亲友們也都送了信，还准备了其他的一切……

响門那天（娶的头日、三月初七），把猪一杀，女客都到了，三月初八那天早晨，男客也陆續續不断的来了，

两天内先后到的有：庆河的斗岭子村四叔家、奶奶，洒河桥的三叔家，高各庄大妹子家，迴龙峪村叔伯姑姑家，鸡鸣村大姑家，附馬寨村二姑家，安乐庄的三姑家，东旧寨村的老姑太太家，缺庄姥姥家（来了四家子），破城的四姑家，丁家岭的大姨家，曲福村二姨家，許儿庄的表姐家，另外还有好多家……，王荣没来得及一个个去数，但粗看一看，就知道来的客人比他原来估计的要多得多，有些没有给送信的，亲戚一串亲戚，听到消息，也都赶来了。而且每一门亲戚，都不止来一个，至少都是两三个甚至六七个、七八个。王荣这次没算吃饭的细账。他带着礼帽，满脸闪着红光，穿着崭新的黑华达呢衣裳，里里外外，远亲近邻，分别把这些来客安置在自己家、王生家、王广家、王林家、王海家……，然后就去照看烟酒、茶水、酒席，和几个劳忙的商量事，并且一次再次的去请干部、请书记、请国藩和杜奎。本村相好的，沾亲的，也都来了，另外，一个队还来一个队长，一个社员代表。里三层外三层，贺喜的，看热闹的，足有几百人，把王荣小院都挤满啦。

上午十一点，只听得外边一片呐喊和响声，夹杂着几发鞭炮，一辆带篷的新胶皮车，把媳妇接来了。随着媳妇来的，还有聚门客、介绍人、送门客、娘家的人。媳妇穿着一身红红绿绿花衣服，胸前带着一朵大红花，被搀下车来后，和新郎庆河并排站在一起，按新旧结合的办法，简单举行了仪式，给毛主席像鞠了躬，就开始入席。

入席，更是热闹，让了这个让那个，坐了这桌坐那桌。

从厨房来的掌勺的声音，从席上来的划拳的声音，从妇女桌上来笑闹的声音，……这真是王荣有生以来第一次啊。

到下午三四点，席才坐完了。末了一算，庄上的和外村客人共坐了二十七桌，本村家里的也不下四桌，共計三十多桌。

第二天是回門，媽家派車來接閨女和姑爺。按理說，這天外客都應該走了。但這些外客都是什么人呢，不是老姑奶奶，就是少姑奶奶，再不就是姨娘，亲姐姐亲妹妹的，多少年不見面，這回团圆了，不願走了，她們愛圖個熱鬧，恋個伴兒。除去趕上紅白喜事這個好機會以外，平時不容易碰到一起呀。“你們是建明社，鬧好了，有糧食。”有許多女客說着都自動留下來，只走了少一半人。王榮見這些人不走，也不好攆，想：這是看得起我，都是窮亲戚，入社都翻身了，在一起乐乐吧，頂多也不過兩天。他沒說啥，一看肉不夠了，就又叫勞忙的去集上買來几十斤肉。這天又坐了十好几桌，光媳妇媽家來隨禮的就坐了好几桌。

庆河随媳妇在丈人家住了一夜，到第三天，丈人就跟車來送。但沒成想這天忽然變天，從早晨就開始陰，到中午正坐着桌吃着飯的時候，就連雨帶雪刷刷地下起來了。下着雨雪，又坐了十几桌。這回王榮可真着急了。見雨雪還不停，他一會出去望望天，一會出去望望天，但越望天越陰沉，雨雪下的越大。最後沿照老例，媽家的連人帶車頂着雨雪，都回去了（不能過夜）；但其他外客，却都給

截住了。而且由于气候反常，这次雨雪下的又大又持久，一连就下了七八天，把外客截了七八天。那些老少姑奶奶和表姐表妹们这回可高兴极了，她们理直气壮地吃了七八天，住了七八天。她们不挑剔，大米、肉吃完了，就吃粗粮……，到第九天，客人最后走的时候，还坐了四桌，有三十三个人呢。

王荣这下苦了，末了他一算：收賀喜錢总共不到四十块（一家有给四毛的，有给六毛的，还有不给的），但支出却花了五百多块。不但分红钱都赔进去了，原来在信用社存的那点款也都搭进去了。末了，还缺两个月吃的。

到青黄不接时，王荣没办法，找国藩杜奎去了：

“我借点粮食。”

国藩杜奎说：“没有。”

王荣为难了：“没有也得想法给我弄点啊，我沒吃的了。”

国藩说：“沒吃的也沒法解决。你娶儿媳妇要铺张嘛。你把粮食、钱都糟去了，这时候伸手要那有啊，当初那么劝你，你都不听，现下找我们，我们没办法啊。”国藩还生着气呢。

底下杜奎也批评：“咱们是勤俭办社，你又是二十三户的，你想想，你那样做，影响多不好啊，真不应该！”

正说着，张书记进来了。他一听，也插嘴说：“这件事大爷办的不妥当，以后可得注意呀。”但末了他又把话拉回来，对国藩杜奎说：“王荣大爷既认错了，我看你们就先

給他解决点吧。”

国藩还带点气的說：“咱们这儿正貫彻勤儉持家，你却把粮食給浪费了，起了不好的影响。現在有几户娶媳妇的，也要求了几次，想跟你学呢。你想要粮食，那好办，可有一宗：你得給我做做勤儉持家的工作，做好了，我就給你解决粮食。”

王荣一听有门，就說：“那怎么做呀？”

国藩說：“开群众大会，你当着大伙給我讲讲节约，宣傳宣傳勤儉，把你娶儿媳妇当个教訓。”

王荣說：“中。”

于是当天晚上，就开群众大会。王荣在大会上就說他过去怎么怎么苦，他爷爷他爸爸結婚怎么样，他結婚怎么样，这回在共产党领导下，入了社，觉得日子弄好了，給庆河娶媳妇，就想大鬧一鬧。当时两个主任叫簡办，他怎么也不听，买了多少大米多少肉，多少烟多少酒，来了多少客人，坐了多少桌，后来沒成想又下雨，八九天糟了五百多块，末了差两个月吃的……。他足足讲了一个多钟头，最后他說：“以后大家誰要办喜事，千万别跟我学，咱们是建明社，要勤儉，要注意对外影响，要細水长流，日子要往长远里过……”讲完了，他这才心里明白过来：“这哪是叫我做宣傳来呢，这明明是叫我当众檢討来了。”国藩看王荣是真的认錯了，气也就消了。那几户要娶媳妇想大鬧一鬧的，也簡办了。第二天，国藩就給王荣解决了一石棒子。

人民公社社員

王榮从主任那里解决来一石棒子，这才对付着接上大秋。一九五七年，王榮分紅又不少，經過給庚河娶媳妇这件事，他很知道勤儉持家的重要了。这以后，不但勤，而且儉，不怕拿自己当鏡子，总在大会小会上宣傳。只要思想一通，他走的又很稳。

但到一九五八年秋，王榮情緒又波动了。

这时正当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左近几十个高級社要联合起来，以西鋪建明高級社为基础，成立一个人民公社。开始王榮聞風打听：“轉人民公社是怎么回事？”后来在一次會議上，听说要把他們原高級社四个村的公共財產全部归入公社，他心里一下凉了半截。

他又算了笔賬：他們四个村的高級社，除去土地和果树不算，其他公积金、公益金和社有财产就是四十七万，光胶皮車就有十四辆。而别的高級社，哪个也不如他們积累多，有的还欠着国家貸款。他想：“要是各高級社的公共財產大体差不多，那也沒啥說的；可是現在他們的財產比我們的財產差太多了，跟这些社合并起来，这不是拿我們的錢去給別人還賬么。”

他嚮往嚮不通，不通又去找主任。一进社址，見国藩正在屋，就說：“国藩哪，咱們今个也勤儉，明个也勤儉，勤儉了这些年，鬧半天白給別人勤儉了唄，早知道这个样，

咱們为啥还少分多扣呢。——咱們还是把那現款分了吧！”

国藩問：“这是你的意見还是大家的意見？”

王榮看出國藩不同意，估摸着說：“也是我的意見，也是大伙的意見——大伙都願意这样。”

國藩說：“不見得吧，还是再听听吧！这件事也不由你，也不由我。”

从社址出来，王榮就不由自主地去到各戶串連，找了佟启，找戴寬，找邵庆昌……，社員里有的同意分，有的不同意分，經王榮一“商量”，同意分的比不同意分的就多了。王榮这时勁更足了，他打定主意想再和國藩杜奎說說，只要他俩一同意，就好办。

这天早晨，王榮還沒有去找國藩，國藩找他来了。一进屋，國藩就說：“老王榮，这两天活動的怎么样啊？同意分的多还是不同意分的多？”

王榮一听有門兒，赶紧回答道：“同意分的多。”

國藩說：“你說說，都同意怎么分？”

王榮說：“大伙是这么个意見：咱們的胶皮車、驃子馬……都不动，頂咱們的數入公社，這比別的高級社也不算少；可是那十几萬塊錢現款，不如走筆賬，給大伙分了。”

國藩說：“理由是啥呢？”

王榮說：“理由就是咱們的积累多，分了，給社員寬裕寬裕，也說的过去，這也不算剝削別人，是咱們流血流汗

掙來的。要不，就給人家還了飢荒，這些年白勤儉了。”

國藩一聽，笑了，說：“老王榮啊，你還是當初辦社的二十三戶中的一個哩，你不帶動群眾起积极作用向前走，怎麼今天比別人還落後了？辦人民公社是黨中央和毛主席根據群眾的要求提出來的，分掉公共財產是你串通少數社員提出來的，是你說的對還是毛主席說的對呢？”

這一說，打到老王榮心坎上了。

“我是擁護毛主席擁護人民公社的呀！”

國藩說：“可是你這種打算卻是在反對人民公社哩。你想想：如果別人都照你這種想法，他為他，我為我，你為你，人人計較個人私利，把公社財產一分，咱這公社還辦成辦不成？”

老王榮臉紅了。

國藩又接着說：“再說公社是咱們自己的組織，參加公社的積累多少總有不齊——就如同當初二十三戶入社時，有的有地有的沒地一樣。但參加了，就是一個集體，怎麼能說把財產給別人還了飢荒呢？”

一片道理，王榮無話對答了。底下國藩又對他講了不少，末了見王榮低着頭好象轉過一點來了，就給了他一個任務：“這麼辦吧：這工作是你開始做的，你還得再回去給大伙解釋。誰同意分，你就去說服誰，告訴他：咱們是建明社的社員，是毛主席表揚過的社，咱們應該走在頭里，積累不能分，還要把生產搞好，財物愛護好。”

國藩走後，有幾天王榮坐立不安。他想：“莫非我又

錯了。”他想了過去又想現在，“……從二十三戶到八十三戶，從全村到高級社，每次我都擔心別人分走我們的東西，可是每次社擴大以後，我的收入都增加了。每次我都沒想對。這回轉人民公社，莫非我又錯了。我想的怎麼和毛主席指示的不一样了？……”最後按照國藩給他的任務，他就去做工作，找了佟啟，找戴寬，又找邵慶昌……一個個去說服：“咱們不能分，咱們想的和毛主席指示的不一样了。”

結果公社成立後，一大二公的優越性，充分顯示出來了，生產大幅度增長了，不到一年半時間，他們增置了幾部汽車，新添了不少拖拉機和各種農業機具，並且電燈也有了，粉碎機、吹風機、鋤草機、電動機也使上了。在水利方面，除建明水庫以外，還修建了揚水機站、三泉合一、南北干渠。也有了自己的社辦工業。同時，經過了各種嚴重的艱苦鬥爭和考驗，公社逐步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組織日益完備，經驗日益豐富，制度日益健全。從王榮個人來說，這時不但自己買上了收音機，給慶河買上了自行車，而且到一九六一年春，又蓋上了第二層新房，秋天又分了三千多斤糧食（平均每人得六百多斤），年終又得五百多塊紅錢。王榮高興地說：“這還差不離！”對公社也就更通了。

以後他講到這一段思想發展過程時，不怕拿自己做例子，在黨的幫助下，在一次群眾大會上，他还做了回檢討。聯繫到自己的病根，他說：“入社這麼多年了，為啥每

一次社会向前发展，我都老怕吃亏不敢迈步呢？——原因就是我在旧社会里过穷日子过怕了。在旧社会，人不为己，就要吃亏上当。凡是和别人来往，就先得算计一下吃亏不吃亏。其实，那时候，任凭怎么算计，总是穷人越过越穷，富人越过越富。我这遇事为自己打算的毛病，就是从那时候养成的。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有社会主义思想，我为大家，大家为我，不应再打个人小算盘。要是大伙一心一意，按照党的政策，把社办好了，我个人自然也就好了。我的毛病就出在这‘我’字上。”

新老队长

西铺大队原来是两个生产队，每队八十多户。王荣是二队副队长，搞生产一向风里雨里，带头苦干，种地耪地就象绣花一样，群众是信得过他的。只是因为队过大，生产管理都不方便，领导上经过研究，决定划为六个生产队，每队三十上下户。一划队，社员就争着挑选好队长。原来两个队的八九个正副队长再加上大队下放的几个干部，适当搭配，变为六个队的正副队长候选人。一二四五六队社员大体都满意，但三队社员却有意见了。

一天晚上，有十几个社员自动凑在一起，私下议论：“咱们队两个队长比别的队都弱啊。”“杜金太主观，王凤雨也拿不起来。”“队长当一半家，生产领导不好，别人吃干的，咱们得喝稀的啊。”有的社员想跳一队——屈环那

队，有的社員想跳二队——王榮那隊。情緒很不穩。

這時屈福常也在場，他說話了：“跳隊那就打亂了，不是個辦法，我倒有个主意，不知中不中。”

別人說：“你說說，啥主意。”

屈福常說：“咱們可以眼睛朝下，從社員里选拔选拔，再補個新隊長啊。杜金、王鳳雨年歲都大了，也應該培养培养新人。”

“這倒是。选拔誰呢？”

屈福常說：“依我看，王榮的兒子王慶海不錯，只要大伙把他選上就中。慶海大公无私，對生產也有經驗，人又細心又有魄力，還知道勤儉過日子，從早我就看上他了。”

大伙一聽，說：“對呀，慶海不錯嘛。”

“又是二十三戶的。”

“中。慶海當過生產組長，還當過模範。”

“人確實公正无私，辦食堂時，他當過一年多炊事員，一個糧食粒沒往家拿，社員都願意，就是他爸他媽去打飯，也一樣看待。他還知道節約，咱們食堂從沒虧過。”

“不僅過去在食堂，這回人家領導那組墳地，那叫多好啊，起早貪黑，工分多少一點不計較。”

“慶海立場還穩，遇事也不愛動搖。入社這十年，人家在哪个关口都跟黨走在前面。”

“行，補選個新隊長是個方兒，慶海合適，說實在的，他比他爸爸強，我也打早相上他了。”

經屈福常一提，大家發現了一個新人，很高興，都議

論起庆海的好处来……

第二天杜金、王风雨把三队社員召集在一起，正式选举队干部。一投票，王庆海就当选了。出席二十一名劳力，庆海得二十票（自己沒选自己），王风雨得十八票，杜金得十七票。庆海本来提出几次說：“选别人吧，我干不了。”但一真当选，也就不再推辞，但坚持一点：“正队长还得是杜金，王风雨和我年青，先当助手吧。”大家也就同意了。

庆海一当上队长，不是在地里，就是在队里，再不就去开会，忙得連飯也吃不好，觉也睡不好。而庆海爸爸——王荣老大爷这时也更加忙了，因为他当选为二队正队长，队里大小問題他要管；二十三戶开会、参加座谈、到外边做报告、应酬参观訪問的……也都要占去一些时间。父子两个在會議上、在大队里見面的次数，比在家里見面次数还要多。

庆海是新队长，他很虛心。在經驗方面，他很注意向各队老队长們学习；也很注意倾听社員意見；对于公社和大队布置下来的工作，他一絲不苟，小心謹慎地按政策办事。

但庆海爸爸——王荣老大爷却不同了。他是老队长，凭着老資格，不大虛心，也不大征求社員意見。很多事，他常常离开了原則，个人說了算。

有一天，庆海发觉他爸爸那队的粮食分配有問題：縮

小了照顧部分，加大了按勞部分，以勞七人三比例往下分，使有的戶沒有達到最低標準。慶海知道這都是他爸爸的主意，吃过晌午飯，就勸他爸爸：“你們那隊這樣分糧食不符合政策，還是應掌握原則，按大隊布置辦事，別光由着個人。”

王榮說：“什么地方不符合政策呀，這又不是我一個人的意見，有好幾戶社員提出的。”

“提意見的都是勞力多的戶，我看最多也不過三家。”

說了一會，王榮不聽，慶海就把這件事向大隊匯報了。

杜奎就跟國藩商量，決定召開個隊長會，解決二隊的糧食分配問題。

晚飯後，別人都到齊了，就只缺王榮。大伙等了半天，也不見他來。國藩很着急：“他到哪去啦？他不來這會怎麼開呢？”

有人說：“供銷社送來獎售品，他必是又不放心唄！”

國藩說：“慶海，找找你爸爸去，叫他快來。”

慶海一進二隊隊部，看見他爸爸——王榮老大爺正坐在炕當中，兩只胳膊和兩只大腿弓着，摟着一大堆獎售品呢，什麼：糖、膠鞋、布頭、絨衣、手巾……花花綠綠，一色新貨。會計屈祥坐在地下桌子旁邊，在看賬。只聽王榮在問：

“屈祥，看看，趙鳳祥多少分啊？”

屈祥說：“八百四十分。”

王榮說：“不行，他不够三千分，沒有他的。再看看，杜亮多少分啊？”

屈祥說：“一千八百分。”

王榮說：“还不行，他也分不到。再看看，我多少分啊？”

屈祥說：“五千二百分。”

王榮伸手拿了一双胶鞋，放在旁边說：“这是我的！”又回过头来問：“屈祥，再看看，張鎖子多少分啊？”

屈祥說：“还不到五百分呢。”

王榮說：“更不行，他不用指望。再看看，屈保成多少分啊？”

“两千二百一十八分。”

王榮說：“还不行，再看看，我多少分啊？”

屈祥說：“你还是五千二百分嘛。”

王榮又伸手拿了一包糖，說：“这是我的！”放在旁边后，又繼續問：“屈祥，再往下看，杜衡多少分啊？”

正說到这，庆海就插进来，以队长对队长的口气大声說：“別亂出主意亂分啦，这叫啥分配方案啊，你这样規定不合理，照这样分，都成你的了。”

王榮一看是他儿子，很沒好气的說：“啥分配方案？这是根据上級指示，按劳分配！”

庆海說：“你这样既不是按劳分，也談不上照顾，上級不是这样指示的。别的队都是先把这些东西交给队委会，根据政策在队委会上先討論出个原則：按劳分多少，

按人分多少，定出个比例来。你規定三千分以上才分，这叫啥按劳分配呢。”

这一下扫了王荣的兴。儿子一說，爸爸一想，也明白过来自己实在沒了理，这确实不是按劳分配，更沒“加照顾”，因为三千分以下的一点也沒有。

庆海又說：“把这双鞋和这包糖都归到一堆吧，粮食你們分的就不符合規定，奖售品这样分更出圈了。这样做，社員对你更得有意見，明个你支配生产就支配不动罗。你要不听，就拿到大队去討論——大队正等着你开会，正要討論你們队的分配問題呢。王主任是让我叫你来了。”

王荣这才想起晚饭前通知他开会这碼事。

王荣父子先后进了大队部。

會議一开始，庆海不仅把二队的粮食分配，連剛才見到的奖售品的分配，全給搁出来了。庆海一說，大伙都笑了。

一队队长說：“依我看，王荣老大爷对按劳分配政策还缺乏全面認識。公社不是傳达了嘛：咱們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不是絕對按劳分配，这就得有‘加照顾’，得保证大家富裕啊。”

六队队长說：“当队长的就得照顾整个队，不能光考慮个人。要是考慮个人，庆海只一个小孩，絕對按劳分对他也有利，可是庆海那队沒这样做。”

庆海說：“依我看，二队的分配不合理，要怪我爸爸。

他淨打个人眼前小算盘。”說到这儿，他面向他爸：“你現在劳力多，可是将来你动彈不了时，庆河再养活几个孩子，你也会变成劳力少的戶；反过来，現在人家劳力少，可是将来人家孩子都长大了，也会变成劳力多的戶；那时要都象你现在这样，都不要‘加照顾’，你会怎样呢？現在你照顧別人，別人将来也照顧你，这里外是一样嘛！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是保证大伙富裕，你总打个人小算盘，那是算不清的。当队长的，別光看自己合适不合适，咱們應听听大家意見，看到全面，掌握政策啊！”

庆海这一說，大家又哄哄笑了。

杜宝說：“別人不敢这样批評王荣老大爺呀，还得王庆海呀！”底下你一言我一語，都同意庆海的，把王荣的分配方案給否了。

第二天，王荣就开始糾正自己的錯誤。思想通了以后，他又愉快了。他不怕拿自己当例子，为了教育那些劳力多的戶，在一次社員会上，他还做了回檢討：“这个‘我’字要是不丢掉，的确不中啊！”逗的大伙又笑了。

戴存家史

葛文

一

孤儿戴存入社以前叫二滿。二滿上有哥哥，下有弟弟，本是張德峪村貧農溫福魁的孩子。不幸，这一年爸爸得了重病，去世了。

三个兒子貼在身邊，只要有一分活路，當媽媽的哪裏肯舍下兒們走哩！娘兒們生着法兒過活呀！哥兒仨數殿保歲數大，那時已經九岁，經人說合，去給地主放牛。放牛的空兒，殿保便拾些柴禾背回家來。東家看見了，伸手擋住說：“吃的是我家的飯，拾柴禾却往自家拿，是啥理！”聽着這些蠻話，九岁的殿保敢怒不敢言，回得家來，望着媽哭。媽有什么法子呢！一家四口，統共只有炕大來塊地，娘兒幾個用糴子糴，不到一早晨就糴拉完了，能打几顆糧食呀！莫非真的攜兒帶女的討要着過活嗎？夏天好過，秋冬也好胡弄，到春天，日子長，滿坡白草，娘兒孩娃們真是度日如年呵！到三月，實在熬不下去了，媽媽便把殿保留給本家，小三送給官廳村一戶窮人，自己帶着五岁的二滿來在西鋪村戴老八家。戴老八是誰呢？二滿依偎

在媽媽身边，轉动着黑眼珠，怯生生地望着立在面前的这位高大的汉子。

“二，叫！这是你爸爸。”媽媽輕推着二滿。

“爸！”二滿怯生生地走过来。不想这位高大的陌生人一下抱起自己，高高举起，又輕輕放回地上，撫摸着自己的头說：

“我戴老八命穷，几个儿女全沒养活住。往后，你就是我戴老八的一根苗呵！”

戴老八又抱起一个光脚的小閨女，送在媽怀里，高兴地說：

“来，咱这娃和咱們一样命穷。她爸叫王凤德，本是西鋪村人，房缺地少孩們多，靠打短工、做月工糊不住口，看咱缺孩，就把刁儿送給咱。咱就是她的爸媽！”

戴老八和叔伯弟兄排行，共是弟兄八个。和戴老七、戴老五是亲弟兄。哥儿仨一样，从父亲戴貴手里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穷”字。穷逼着戴貴打短工，找月工，日子是不好过，学会了杀猪的手艺。輪到戴老八这輩，老五穷的沒法过活，出关当了半輩子兵，临了从东北带回一个女人来，人家一看他啥也沒有，不肯跟他，走咧！戴老七和戴老八哥俩，也和他父亲一样，靠打短工、找月工掙扎过活。戴老八从小跟父亲学会了杀猪。可是，在那种年头，西鋪村常年討吃的就有三十四戶，能維持生活的只有十四戶，一年四季除王家地主外，誰家有猪可杀呢！

戴老八缺吃少穿，沒有女人願意跟他。有一年，一个

瞎眼的女人跟了他。戴老八欢喜的了不得。那女人能燒火做飯，补补洗洗，虽说生了几个儿女沒养活成人，有王凤德的閨女刁儿补了这个缺，戴老八也很滿意了。誰知一天黃昏，戴老八怀抱刁儿回家来，見屋里黑洞洞的沒声音，便朝着炕里的黑影子說：

“咋不点灯呢？”

沒回答。

戴老八又問：“咋不点灯呢？”仍沒回答。戴老八放下刁儿，摸出火儿点上灯。哎呀！苦命人臉朝墙角吊死了！她活着，跟着戴老八吃糠咽菜，她死了，沒有留下一句話。

如今戴老八的小草屋里，又是孩子又是女人，又成一家人了。知根的亲戚們都說二滿和媽跟上杀猪的戴老八，別看一碗糊涂面吃三天，也比在張德峪那头强！过日子就是过的人，有人就有指望呵！

二

一九四八年，西鋪村进行土地平分。戴老八这一戶貧农，已經是个七口之家了，戴二滿又多了三个妹妹，和刁儿共总是姐妹五个。望着这一伙子孩娃，戴老八欢喜地說：“嗯，咱过的就是人么！”戴老八分下土地十七亩、草房三間，心高气盛地指望着过好日子。春天，土地剛一化冻，就帶上十四岁的二滿下了地。东借西凑，好歹借够了籽种，播在土里，戴老八便病倒了，整天价昏昏沉沉，糊言

乱語。請个先生来治吧！几十里請上来，他进门不說看病，倒背起手往当地一站，四下里一望，說：“窗户对着門，哪能不死人！宅子蓋得不好，克人，得先改造宅子。”这样的先生，哪里是治病救人，明是坑害人嘛！媽哭着，不知該怎么办。另打听下一位先生，問需價錢，說是打一个药針，要五斗玉米。一家七口人，一頓玉米面糊喝三天，五斗玉米，哪里來呢？那年月，穷人有病，就得拿命抗，抗过去活啦，抗不过去死咧！

十来天的病，戴老八死了。死时四十九岁，留下五个孩娃，女人愁楚不过，不几天也病倒了，病势一天比一天沉重。

戴二滿守着媽一个勁儿抹泪。对門杜奎来了，看了看病人的神色，叫出侍候病人的王秀深媳妇，低声吩咐她：“不中呵！不能等死呵！再去抓付药去吧！”

王秀深急急忙忙去抓药，二滿陪伴着媽。

“媽，你喝口水不？”

媽不言語，也不睜眼。又等了好久，一个极其微弱的声音从枕边傳了出来：

“你妹子呢？”

“玩哩！”

“去，出去看看她，好好照看着你妹子！”

二滿巴巴望着媽那副蜡黃臉，眼窝里存着泪水，掉头走了出去。

二滿再走进草屋时，媽已經咽了气，直挺挺躺在破炕

席上，一块破被单遮住她的臉面，土炕上放着一包沒解绳的草药。

爸死后不到百天，媽也死了。拿啥埋葬死人呢？戴老八的亲哥，戴老七来了，和几位当家人商量来商量去，只有走出房当地这条道儿。十七亩地，十一亩地留给妹妹，各人带着地份找活路去。余下五亩半地当給白馬峪一家富农，三間草房当出間半去，共合佃当下二石五斗玉米。还完爸爸死时拉下的饥荒，埋葬埋葬媽媽，一顆粮食沒剩，只剩下五張小口，大張着唧唧呀呀等食吃。

三

戴家草屋里冷冷清清，已經有三天沒揭鍋了。五个孩子痴呆呆地团在土炕上。戴老八的哥哥，戴七大爺抹把泪坐在炕沿边說：

“二呵！生法兒吧！別等着往死里餓呀！”

戴二滿有气无力地抬起头来，企求地望着七大爺。爸媽都死了，靠誰呀？七大爺也是穷汉子，靠着給地主做活过日子，怎能拉扯起自己姐妹們呢！

七大爺又說：“你姐妹几个都来，大爷是养活不起。我和乡亲們合計了一下，小三留給我，刁儿归她爸王凤德。你戴滿哥^①說养活上二闺女！”

① 戴滿是戴老大的儿子。

二滿眨巴着細長眼睛，就象犯人听候发落似的，聚精会神地听着，不知道自己被发落到哪一方。

七大爺伸手摸摸团在土炕上光脚睡着的小四，慢悠悠地說：

“城北白家园有一戶人家，想要她，就送她去吧！跟着人家好歹有口飯吃，興許成人哩！”

戴二滿点点头說：“中呵！”

七大爺又說：“你比她們大几岁，又是个男孩，不难活！”

不难活，誰知道好活呀难活！一顆粮食沒有，十七亩地当的当，隨着妹妹帶出去的帶走了，活沒活干，飯沒飯吃，咋活呀？二滿拔起腿过了河，投到五間房舅舅家去了。

舅舅叫魏长胜。也是穷的有上頓飯吃沒下頓飯吃。不管咋困难，吃糠吧，咽菜吧，沒依沒靠沒爸沒媽的亲外甥來了，舅舅端碗，外甥也端碗。日子一長，舅舅担不起了，說了話：

“二滿，你想个法儿吧！你看，我这也是瞎混哩，有今日，沒明日的！”

二滿眨巴眨巴眼睛，点头說：“中呵！”

身上破衣裳，肚里稀菜湯，一个人說走就走，牵挂誰哩，二滿拔起腿从五間房舅舅家出来，无目的地走着。

四

此时，已經是严冬了。北边，連綿起伏的大山，山巒上罩着白雪。树木落尽了叶子，光禿禿的迎着寒風呼呼。小二滿穿着政府救濟的旧軍衣，光着脚丫，順着河槽的大路朝西走，不知不觉来到一个热闹去处。他想找人問問，見人家不理不睬，只得又朝前走。忽然看見街心有一座高樓台，樓台下有个小飯鋪，心里这才明白过来了：这大概是遵化城吧！

飯香吸引着二滿，他慢慢走近飯鋪。只見飯鋪的大炉灶迎着街，火苗苗子呼呼地，着的挺旺。二滿裹裏身上的旧軍衣，想靠近炉灶暖和暖和，猛听得头顶上铁勺子敲的叮叮当当地响，一个人大声地吆喝着：

“远着点！远着点！”

戴二滿抬起头来，看那人肥头大耳的好厉害，扭轉头，悄悄地一旁蹲着去了。蹲了陣子，觉得身上嗦嗦的冷，肚里咕咕的叫，又立起身来，慢慢走近門边，靠着門板立着。座上吃飯的人，有人就把剩菜剩飯倒給他吃。夜晚，戴二滿身貼热炉灶，呼噜呼噜睡了。有时，戴二滿从飯鋪里討不到剩飯，便忽閃着綠色的旧軍衣，光着脚丫，在城里向人家要着吃。夜晚，仍然回到炉灶那里贴着身子过夜。过了一个来月，慢慢的邻近的人們也都认得穿救济衣討吃的这个小孩子了，可怜他沒家沒業的，便劝說

飯鋪宋掌柜收留下他，給他口飯吃，支使他干些雜活。宋掌柜也就答應了。

一上來，宋掌柜分派戴二滿掃地，洗碗，挑鹽水，担淨水。從早到晚，腳手不閑。干多少反正戴二滿也不爭竟，只要給飯吃就足了。晚上，熱灶台上一躺够了。哪知好日子沒幾天，發生了問題。

戴二滿因為身個小，挑水打不起桶來，桶底常常碰着地。不幾天，水桶漏了。

掌柜的提起水桶，反轉過來察看着，生氣地責問：

“你就不能往起挑挑嗎？”

掌柜的腆起大肚，坐在長凳上，拍着飯桌生氣說：

“正經八輩的養活你個閑人！不夠飯錢哪！”

又湊合了幾天，掌柜的把小二滿叫在跟前，不勝厌恶地說：

“干一月不夠水桶錢，算了吧，我這兒養活不起你，你另尋飯碗子吧！”

“中呵！”戴二滿只有這一句話，從來不反駁，從來不愁苦，叫走嘛，一個光人從鋪里走在鋪外不就完了！

數九寒天，戴二滿光着腳丫，走出城來，踩着雪地轉游在鄰近的村子里。見村里場上有个大草垛，便在草垛里扒個窩窩住，比貼着爐灶過夜既避風又暖和。餓了便進村要口飯吃，人們總是把剩飯和鄙視的眼光一起扔給二滿：

“那麼大個小子啦，要着吃？懶貨！”

鄙視和責備，戴二滿都能忍受，心想：又不是我不干活，是沒人叫我干么！他只是不能容忍孩子們的无情的戏耍。

走在街上，孩子們一伙伙圍住，逗他：“小人！小人！”他憤怒了，掄起拳头打他們，孩子們逗的更凶了，四面包圍上来。戴二滿逃不脫了，便施展本領，一溜烟爬上一棵几丈高的楊樹，坐在树枝上，晃悠着一双細小的腿子，哈哈大笑。

一九五〇年夏天，戴二滿討吃走在遵化縣沙河边上，这正是雨季，剛剛下过一場暴雨，河水漲大了，一浪趕一浪地流的挺急。戴二滿坐在河边上扔石头玩。后边几位赶路的人过来了，站在河边上，搖着头說水急过不去。

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二滿說：“不怕哪，我先給你們試巴試巴去！”說着，就扑通一声下了河，一个浪头打的不見影儿了。幸好其中有一人会水，立即把他救了起来。

小二滿不服气，心里盘算：“冻沒咋我，餓也沒咋我，莫非我倒怕你水不成！”从此，只要看見水坑，他就跳下水练习，終於学会了游水。

五

一九五三年初春，大地解冻，河里的冰块已經溶化，河滩里的淺水潺潺流着。戴二滿的脚上，冬天冻裂的口子，一道道，一道道的，張着血紅的口，走路时，小石子灌

进去，热辣辣的疼。他就把脚放在沙石洼里冰着，一会儿痛麻了，又站起来赶路。从一九四九年起到现在，他有四年没有摸着鞋穿了，无论是暑伏热天，沙石地烫的象热锅，无论是数九寒天，冰雪盖地，脚踩着冰块如刀割，戴二满都是光着脚。这哪里是脚？脚底上磨起的厚茧比鞋底也不薄呵！

有一天，戴二满拐着脚，走到一个庄子外面。这里生长着大片小叶杨，树尖上，微微地刚放青。戴二满实在走倦了，就靠着树睡着了。醒来一看，日已偏西，四下里望望，不见一个人影，只看见景忠山高高的立在不远处。“这是什么庄子？”戴二满心里一惊，翻身立起，站在进村的大道上细细了望。庄子东头那瓦窑似的一排一排瓦房，不是地主王家大院吗？那些瓦房在一九四八年土地平分时全分给穷人了。顺着往下看，戴二满看见街南台上属于自己的那间半草房。那草房，他一家人在这里生离死别，自己离开它流浪又流浪，眼看已经几年了。他怕见西铺，怕见那伤心的草房，怕见自己的乡亲……劳动有饭吃，他相信这理儿，可是上哪儿劳动呢？地是当出去了，给人家干活谁要呢？索性流浪着混吧，他想着，心里一横，扭头离开西铺村，顺着往南山的道儿，慢悠悠地走着……

南山的毛栗子树勾引着他，他记起他怎样在粗壮的栗树枝上跳来跳去，逗得妹妹欢喜大笑，没提防，招引得爸爸生气了，拿镰刀要拍自己，自己一个鹞子翻身从栗树上翻下来，几步便不见影儿了。

二滿尽量想找寻当年欢乐的栗树，可是栗树一棵棵长大了，变样儿了，沒有留下欢乐的痕迹。二滿失望地走着，走着，在猫儿莖的一块地里，看見一大伙人在干活，这是干啥哩？二滿好奇地站在地楞邊上看。好多人不是过去的討吃戶嗎？为什么一下子变得这样精神抖擞热气騰騰起来？他懦怯地問：

“喂！你們這是打伙干活呀？”

“你，你是……”

一个細高个子的人，应着声儿朝二滿走来，二滿认得他，是西舖村一位好干部名叫王国藩。王国藩盯着看了一会，长方臉上露出了笑容，惊喜地說：

“哈！这不是戴二滿嗎？”

“是呀！”二滿說。

一听說是戴二滿，一伙子做活的人全拥上来，团团圍住。有人問：

“二滿，你这几年都在哪儿咧？”

“二滿呀！个儿还是沒長高呀！”

长高不长高，戴二滿觉得沒啥新鮮，吃不飽自然长不高。新鮮的是大伙在一块地里干活。

戴二滿又問：“你們這是打伙計干活嗎，还是給地主干活？”

“地主打倒了还能还阳嗎？我們这叫土地合作社。”

溫自礼說，“就是土地合伙一块儿种，一块儿收！”

“一块儿干活就叫土地合作社？”戴二滿一个一个地

看着这伙人，有王生，王荣，邵家弟兄，心里盘算：“你们这里头讨吃的也不少呵！”就问：“我也入社成不成？”

人群里站出一个人来说：“你入社咋算？你啥也没有，土地没一分，农具没一件！光不溜的比河槽的石头还光。”说话这人，戴二满认得他叫王荣，也是穷的光溜溜地，就对他說：

“没地是没地，可是我有一双手，能干活！”

“不一定，个儿那末点大！还没咱那三条驴腿的驴高呢！”

“成年讨吃在外，也不一定会干活！”

“按理说，也该要上他！”

一时间众人議論紛紛，有說要的，也有說不要的。社主任国藩拦住大家說：

“这么着吧！咱先干活。二满入社的事，晚上到社里，咱开会討論討論！”

晚上，草棚屋里，二十二户社員全到齐了。二满也挤在人們中間坐下来。

社主任王国藩主持會議。他說：“共产党毛主席号召咱种地人成立社，是为的咱穷人过好日子。戴二满是咱穷人里头的穷人，他爸爸穷，他妈妈穷，他姥姥家穷，几輩子穷，穷的他讨吃在外。咱大伙考慮考慮，是让他入进来和咱们一块儿往好里过呀，还是叫他讨吃在外？”

国藩話巴儿一落，杜奎立刻表示态度。他通的一下子立起身来，揚起一双濃眉，眼珠儿一轉說，

“中呵！天下穷人是一家！何况他本是咱西鋪村人呢！咱要看着他受苦不管，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咱心里难受！”

杜奎一席話，說得人們悶声不言。是呀，掂掂两位主任的話，理直難駁。穷人的苦，穷人体會得深。悶了一陣子，王生說：

“入就入吧，啥叫乐意不乐意呢！”

王榮思謀了一陣子說：“十个和尚里头还夹不出个禿子来嗎？有他就当沒他，叫他入吧！”

“对！叫他入，咱千說百說有些人还不肯入，戴二滿千里百乡的回来入社，咱們欢喜！”又有人这样說。

國藩收起大家的話，痛快地說：“好啦，从今日起，戴二滿算咱社里一个后續戶哪！”

“中呵！中呵！”人們欢喜地喊着走散了。國藩拍着巴掌喊：

“哎！回来，別走哪！咱再商量个事儿！”

人們又坐了下来，悄沒声的听國藩說啥。

國藩望着二滿說：“得啦，这回留在咱西鋪算是走不了啦！我看呀，你就改个名字，叫戴存吧，存就是社把你存留住了！”

“中呵！中呵！戴存这名字好！”人們乐哈哈地望着二滿，二滿笑了。

六

孤儿戴存，做为一个后續戶，在一九五三年的初春，参加了王国藩带头办的“穷棒子社”，二十二戶社員，誰也不外看他，无论走在誰家，只要遇上飯时，自己不吃，也总得让戴存先吃饱。此时戴存已經十九岁了，人情道理也懂得些了，社員們越是拉着扯着的叫尽飽的吃，他就越不肯吃了。

春天，点种棉花的时候，戴存跟上大伙，在地里干了半天活，回到家来，揭开鍋看看，鍋里盛着早上添进去的凉水，沒煮啥东西。国藩来了，見此情景，便說：“戴存呀！走吧，到我那里喝口粥得了，喝完你給咱招呼人去，咱得忙着下地去！”

对着社主任作假也不中。戴存踏一双破鞋，踢踢踏踏跟上国藩喝了几碗玉米糁粥，吆喝人去了。

清早，国藩家喝的粥，中午被杜奎拉家喝粥，晚上，杜奎又来叫，戴存推說在王荣家吃过了，不肯再去。心里盘算，他孩子多，也沒富裕哪！再一看他那黃瘦的臉，戴存心里不好过，想着自己不去吃，兴許他还能多喝点粥。他这个带头人，千万不能累垮呀！戴存勒勒褲帶，趴炕上睡下了。

第二天，二十三戶社員，男女老少，一齐出动，在岭下地里点种棉花。年輕人有王庆河領头，从河沟里往上坎

地里挑水。水桶叮当乱响，人們有說有笑的，庆河担上水桶跑的飞快，戴存长的个儿小，身子弱，挑不起桶，不是洒少了，就是水桶碰在石头上。庆河看他力气不支了，忙迎上去，接住水桶說：

“戴存，去，一边歇会子去！”

“中呵！”戴存强挺起腰，不把水桶給庆河，反而跑得更欢了。

“戴存哪！咱干活不能舍命哪！日子还长着哪！”国藩接着說。

杜奎看他挑副水桶，脚步上显着虛軟，心痛地想：“是从小沒吃过飽飯的哪！这力气活儿，不能叫他多干！”想着，他便朝戴存走过去，想命令他休息。戴存机灵，繞着道儿又下河沟挑水去了。杜奎立在道边上等候他，看他挑副水桶，哼吃哼吃上来了，青黃的臉上，浸着汗珠，腿脚哆哆嗦嗦，几乎迈不开步。

杜奎伸过手去，說：“来，換給我挑！”

“中啊！”戴存一面回答，一面又想閃开。杜奎一把抓住扁担就挑。誰知这么一抓，戴存扑通一声，跌倒在地。

一霎时，老老小小全圍上来。摸摸戴存的头，不燒，摸摸肚子，呵呀！扁的前心貼着后心。

戴存慢慢睁开眼來，說：

“不碍的！”

国藩心痛地扶起戴存，难过地說：“是我的不是哪！快到我家吃口飯去！”

“干脆，往后就我那儿吃吧！”杜奎說。

“你們都不富裕哪！”戴存扑簌簌掉下几滴泪来。

王荣走过來說：“走吧！上我家吃口去，我还有两碗紅高粱哪！”

王生女人也赶过来，說：“上我家吃口去！我还有二升棒子呢！”

梁老汉乐哈哈地說：“走！上我那儿去！別看咱社眼下困难，到秋后，糧食打的堆成山，那就又該叫你們发愁了，愁糧食沒处儿放！”

老汉一番話說的人們又乐了。于是，水桶連着水桶，叮叮当当又响了起来。梁老汉悄声对戴存說：“他們干他們的，咱走咱的！咱吃饱肚子再上陣！”

七

一九五三年秋天，西鋪村“穷棒子社”二十三戶用自己的双手，贏得了第一个丰收！他們創造了西鋪村亩产最高紀錄，平均亩产达二百五十四斤（比当地的中等戶多出三四十斤）。二十三戶社員，每戶分紅所得糧食，都是仓滿囤流。戴存既沒仓又沒囤的，只有土炕一盘，怎能放得下他分紅所得的二千五百八十九斤糧食呢？往日是沒糧食吃发愁。今日糧食多了，戴存又不知道該咋办了。說实在，也真发愁哩！

国藩笑哈哈地走來說：

“戴存，別愁！咱一样一样安排，先贖房子地，后接妹妹大团圆！”

戴存也乐了，說：“王主任，全山社安排吧！社就是我孤儿戴存的家，共产党就是我的娘！”

国藩帮戴存找来缸缸罐罐，座上席圆。村里人听说討吃的孤儿戴存分下小山似的一堆粮食，多少人跑来参观。这可真是个奇闻，穷棒子們一翻翻到天上去。

依着国藩的安排，当出去的五亩半地，間半草房全贖了回来。寄养在戴七大爺家的小三，和戴滿家的小二也先后接了回来。

秋尽冬来，天气一天天冷了，河湾里那片楊树，叶子快落光了。社里也不忙啥活了，国藩帮着戴存买下几匹小布，做棉衣，制棉被，一切备办的差不多了，国藩說：

“戴存哪，拉着咱們那‘三条腿’，到城北白家园村，把小四闺女接家来吧！”

戴存拉着驴，驴背上搭着新被子，串村过店，朝城北白家园走去。邻近村庄的人，差不多都认得他。可是，仅仅多半年，叫化子变样儿了，变得叫人难以相信了。这能是那个光脚丫穿破軍衣的叫化子嗎？不，他現在紅光滿面，穿的齐齐楚楚。是誰养活了他呢？铁的事实活的人，替农业合作化做了有力的宣传。組織起来的穷棒子社給孤儿戴存撑了腰。戴存来到白家园，人家一看他这气派，就把小四让他領回了。

小四快七岁了，騎在驴背上，泪眼汪汪。

“回咱家吧，家去了給你做衣裳！”戴存把自己的新褂子給妹妹披身上，哄她。

“家在哪儿呀？誰給做新衣裳呀？”小妹妹轉着黑眼珠問。

“家就是社！”戴存拉着驴，邊走邊哄妹妹。

“社是什么呀？”小四騎在驴背上，望着那瓦藍瓦藍的天空問。

“社就是毛主席給咱穷人挂的一盞紅燈！”

“紅灯比星星亮嗎？”天已經墨黑了。小四看見天空中有一顆大星星忽忽閃閃。高兴地叫着：“对了，毛主席我見过的！”

“你在哪里見過？”

“白家园我爸爸牆上挂着有毛主席的象！爸爸說他是穷人的救命恩人！”

“是呵！是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咱才能回老家哩！”戴存哄着妹妹，不知不覺地進了西鋪村，走到自家門口，立住脚，指着台阶上的草棚屋對妹妹說：“到了，这就是咱的家！”

听见街門口戴存說話，屋里候着的两个妹妹和一些社員一齊迎了出来。二妹淑蘭这时已經十三岁了，看見小四，一招攏起，不知道說什么好，对着小油灯，不由得想起自己那苦命的爸爸媽媽，竟嗚嗚咽咽地哭了起来。三妹淑琴也跟着哭，戴存忍也忍不住，一把把抹泪。招惹得那些先后来祝賀的社員也都跟着掉泪。一个个感叹

着說：

“咳！這一家人，亏得共产党的好主張，办土地合作社哪！不的話，怎能团圆呢！”

“是呵！办社只有一年，光景就翻过来了！新被、新褥、三面新的棉衣。戴老八活一辈子，不准穿过一件三新的袄！”一位年老的人不胜贊叹地說。

“哼，別說他戴老八，就是老杀猪的戴貴，他也不准穿过呀！看来，人还是长寿好，福全在后头哪！”

人們正这么贊美着，国藩进来了，他睜眼一看，姐儿几个眼紅紅的还在抹泪，只有小四淑华睜一双大眼，怯生生地望着。心想：姐妹久別重逢，哭哭啼啼也难免，只是兄妹几个年岁都还不大，戴存更不会过光景，往后的日子还得社里多操些心。

第二天，戴存又牵上驴，去接大妹刁儿。刁儿是經她亲爸王凤德童养給大余家沟的一个农民的，此时已經結了婚，听说姐妹三个都在家团聚等她哩，也忙赶回西鋪来，帮弟妹安排过光景。

八

一九五五年秋天，由杜奎等介紹，戴存被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在红旗面前，戴存举手向党宣誓。他說：以前我是孤儿，現在我是党的儿女了，党是我的爹媽！以前我流浪，討吃，受欺侮，我沒有理想，沒有希望，爬高上树，

钻山捉蛇，头发不剃，手臉不洗，不知道啥叫冷，不知道啥叫热！我单知道一点，人活着要吃饭！一九五三年我回到西鋪，經過党的实际教育，我心里亮了，我看見我們穷人只有一条道——那就是革命，往共产主义走！

九

西鋪河湾有一条六里长的防洪林，钻天楊长的密密麻麻。远看象一座綠色的长城，把西鋪村擋了个严严实实。这个林子，是一九四九年遭水冲以后造起来的。有了这个样版，党支部年年号召青年植树造林。戴存担任着团支委，每至春秋便和一伙青年，上南山植树，东一坡，西一片的，种树不少，几乎全都成活了。

一九五六年，戴存被派去張家口，參加华北五省青年植树造林模范大会，會議上，戴存听了許多植树模范的故事，心里由不得一阵阵慚愧，觉得自己还做得太少。

这一年秋天，戴存約了杜振炎、杜振煥、王庆賀、王玉兰、屈桂清等五位团员，在南山坡种树三天，下了八十斤松籽。小松树綠油油的长起来了，遮盖住秃山坡。西鋪村的社員，坐在炕上，端着飯碗，便可望見青葱濃郁的南山坡，人变了，山也变了。

穷山变成了宝山。

一九五九年，戴存被派去迁西，出席唐山地区的植树造林會議。这一次，全国知名的植树模范袁士珍也去了。

袁士珍家住遵化县君子口。君子口是唐山至遵化一条必經的道口。戴存来来回回走过几次，記得君子口道边那两座青山，一山青松，一山花果，人家的院墙用青松筑起，村庄被花果遮住。

“四十年前，这里也是荒山秃岭来着！”袁士珍总爱拿过去和現在相比。他慢慢告訴戴存，說：有一年，他背一口袋核桃上了山，爹媽說他是糟害东西，……

“你种够有多少棵树呢？”戴存敬仰地望着这位老人，想起这两大山的树木，密密森森地数不清。

袁士珍一笑說：“我不过是起了个头，后来都是生产队集体栽种的！”

“起了一个头！”袁士珍老人的話，戴存掂来掂去，永不能忘。

十

一九六〇年，唐山建筑公司請戴存和他妹妹淑琴去給青年工人讲讲他的翻身史。經過党支部批准，兄妹俩去了。

兄妹俩坐在一间屋子里，感觉到任务重大而又光荣。戴存思謀着問妹妹：

“沒有带笔嗎？”

“沒有！”妹妹淑琴說。

“去，到办公室借支笔来，再要上張紙！”

妹妹淑琴借來了筆和紙，瞪眼問哥哥：

“咋！寫啥？”

“我說，你到這兒做啥來啦？”戴存問。

“做啥？不是叫咱做報告嗎？”淑琴為難地說。

“報告啥呢？”戴存又反問着妹妹說，“要是想着自己去做‘報告’，准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來，我說，你記！”

戴存說，妹妹記，不大会兒，一張紙上，寫滿了字。戴存拿起紙來看了又看，說：

“去，送到黨委會去，請書記審查！記住，走到哪兒，黨委也是咱的領導。聽黨的話，當好黨的助手，是咱們的光榮任務！”

十一

新的房，新的人，新的家庭成立了。孤兒戴存在集體的大家庭中，完全變了樣，土改時分下的三間草房，在一九六三年春，已經翻蓋成洋灰瓦的屋頂，高高的立在西鋪大街南階台上。屋內院牆粉刷一新。屋內擺着一对大紅油漆板櫃、鏡子、壺碗、電燈，一個人家应有的應用物件全有了。一九五八年，經人介紹，戴存和雞鳴村的高小畢業生賈桂芝結了婚。

四个妹妹，除大妹刁兒因結婚早沒有回來念上書，三個妹妹，都先後在本村小學畢業。二妹淑蘭自由對象，出嫁在余家溝。三妹淑琴，一九六〇年和齊兒庄的一位社

員結了婚。四妹淑華，今夏考入初中。戴存說：“如今念書，花錢不多，只要妹妹考得中，就讓她念！不管你在哪兒，聽從黨的分配是頭一條！”

返回來，咱再說留在張德峪的戴存那位溫殿保哥哥。自媽媽改嫁在西鋪後，殿保因為無人扶養，也曾流落城鄉。後來在城里一個小飯鋪里端盤子，挑泔水，侍候人。那孩子也乖巧，聰明，手腳利索，慢慢地學會了廚師的手藝。先在遵化飯店打雜。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建明公社擴大，溫殿保下放在雞鳴村公社飯食鋪當大師傅。一九六〇年飯食鋪結業，溫殿保便來在西鋪村落了戶，成為西鋪大队一戶社員。今年，溫殿保蓋下洋灰瓦屋三大間，前後大窗戶，孩娃女人，成家立業了。

1963年9月改于西鋪

佟印家史

刘真

生活，每年每年都給人留下新的記憶，有些事，永远站在你記憶的最高处，不管什么新鮮事来了，不知不觉，你总和它去联系。

佟印最小的女儿，今年也上三年級了。大女儿燕秋，今年是初中二年級，每天騎着新买的自行車，到十五里外的鸡鳴村上中学去。望着女儿活潑的身影，听着她們快乐的声音，三十八岁的佟印，今年特別怀念自己的父亲。父亲就是在三十八岁的这个年紀，在西鋪村最早的一場斗争里，被敌人杀害了，尸首被扔进了河里的。每到清明节，別人給亲人坟上添上几銳土的时候，佟印只能深深地怀念着自己的父亲。

佟印和六十多岁的母亲，包下了小队的副业、磨豆腐。国庆节前几天，在队部的小南屋里，这劳作特別紧张，两个节都一起来到了，社員們都在等着吃豆腐哩。小毛驴拉着石磨，精神勃勃地一圈圈走，走。那笨重的石磨，掺着水的豆儿倒上去，不发出声音，只是默默地轉，轉。雪白的豆汁流下来，一桶又一桶。在这母与子的面前，那

磨碎了的，仅仅是豆儿嗎？那流下来的，仅仅是豆汁嗎？不！不！这平凡的劳动，却告訴我們多少不平凡的事情。

佟印六岁那一年，穷得沒法儿过，父母亲就租种了地主的十五亩地。有一天，他們夫妇俩在地里薅草，小佟印跟在他們身后面哭一面說：“餓咧，餓咧！”

餓咧家里也沒有餽餽，有什么办法呢？父亲佟瑞明抬头一看，旁边有块甜瓜地，就对孩子說：“你去要个瓜吃吧，爸爸以后想法給人家錢。”

佟印去了，可是那看瓜的，是个十二岁的女孩子。她一看見佟印从高粱地里钻出来，那样子又黃又黑又瘦，肚子很大，胳膊和腿却細得怕人。那女孩子慌忙跑到佟印的父母面前，害怕的哭着說：“死孩子精來咧，跑到我們瓜地里去咧，吓死我咧！”

那女孩子哭着跑回家去，佟印却摘来两个大瓜，坐在地下，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恨不得一口把整个瓜都吞下肚去。父亲望着他那样子，想起“死孩子精”四个字，一串串的泪珠，撒在土里去。真的，这活孩子比死孩子还难看呢。

父母亲苦掙苦熬，买了一套做豆腐的工具，磨起豆腐来。卖了豆腐，一家三口吃豆渣，摻野菜，勉强餓不死。

佟印九岁的时候，有錢人家的孩子正在念书，任意玩耍、打鬧。瘦弱的小佟印，天天抱着个大木棍，推着笨重的石磨，一圈圈的轉，轉。他心跳，流汗，困难地喘着气，多么沉重的脚步哇。这愁悶的磨道，什么时候才能轉完？

走到哪里算一站？什么时候也能有一头小毛驴呢？

这小小的孩儿，迈着艰难的脚步，一直在磨道里走了五六年，抗日战争的枪声响了，父亲才有了笑模样儿。有一天，悄悄对他說：“孩子，再使一把勁儿，困苦的日子有头了，共产党八路軍来了。”

一九三九年，在这四十里鋪，父亲第一个当了八路軍的办事員，作起抗日工作来。这磨豆腐的日子，也就暫時停止了。

有一天夜里，父亲領着人去破坏公路，被敌人捉住了，他藏起铁銑，硬說是走亲戚从这儿路过的。敌人不信，一連打了他几个死，勉强回到家，他躺在炕上不能动了。佟印从南山拾柴回来，一看父亲渾身肿了，臉也肿了，还有一道道的血印，他扑在父亲怀里，痛哭起来。父亲抱着他的头說：“孩子，別哭，这算不了什么，不受苦中苦，甜日子就不能来。”

佟印和母亲懂了这个意思，都帮助父亲作起工作来。

部队上东西要得急了，等不到夜間，白天就得送，母亲就去担任这种工作，她送粮送鞋送信。有一次，敌人查住了她，翻了半天，什么也沒翻出来，她騎上小毛驴儿，又高兴地走着。那許多的錢票子，在棉鞋里装着呢，她特意借了双大棉鞋。敌人翻遍了各处，就是沒叫她脫那大棉鞋。等送到了，包森司令的队伍接过錢，都高兴地圍着她说：“大娘！你真勇敢，真有办法，可辛苦了。”

这时候，十四五岁的佟印，在城里一个大地主家当长

工，城里的伪警长，是他东家的干儿子。就为了这一点，别人出城进城都要受到严格检查，只有这一家的人，包括长工在内，出城进城不受检查。也就为了这个方便，父亲不叫佟印回家，他经常拿些钱去，买大批的胶皮底鞋，布匹，药品，手电，叫佟印送出城来。佟印问：“这是给谁买的？”父亲说：“是给人捎的，你什么也不要问，不要问。”

有一次，佟印回到家，家里有很多拿枪的人。一个个都那么可爱可亲，又唱歌又看书本。佟印问父亲：“这就是八路军吧？”父亲说：“对咧！咱买的那些东西，就是给他们的。”佟印噘起嘴说：“爸爸！我不扛活咧，我也要当这个兵去。”父亲说：“不行，现在还不能离开城里，以后，我一定送你去。”

佟印笑了，天天盼着，等着，奴隶牛马的日子，可有个头了。

在佟瑞明的心里，虽然苦日子有了盼头，可是穷苦弟兄眼前的苦难，他怎么也看不下去了。有一次去送公粮，他问区长：“我们村有几户很贫的人，几乎要饿死了，能不能用公粮救济他们一下？”

区长说：“当然可以。”

佟瑞明回到家，就背上十斤小米，给要了多年饭的王生家送来了。这时候，王生的妻子正在炕上生病，半月起不来了。那双眼睛的丈夫，每天要来一点可怜的东西，再放上些水和野菜，煮一煮一家四口人吃。孩子和大人都饿得不像样子。王生媳妇一看佟瑞明送来了小米，这是

从来没有过的事，她又难过又感激立刻哭起来。佟瑞明也含着满眼的泪说：“这是共产党和抗日政府照顾你的，吃吧，好好的养身子，等咱们胜利了，这苦日子就过去了。”

佟瑞明走出王生的家，半天还激动得流着泪，他觉得，他第一次有权利照顾自己的苦弟兄了，就是死，也要沿着这条路干下去，走下去。

八路军要的钱粮和军鞋，都是按地亩派的，那些地主富农，当然要的多一些，这就大大得罪了他们。这时，村里王家大院这一伙地主，大部分都逃到遵化去了，只有个别留下来。有一次，老地主交来三双军鞋，佟瑞明用手轻轻一弯，那鞋底就断成两段了。佟瑞明又气又恨地说：“你们家那么多财产，把鞋做成这个样子，人家在前线不顾死活地抗日，你们就没有一点人心？不行！重做。”

那地主老头横鼻子竖眼地说：“你叫我重做，咱就上城里。”王家大院的狼崽子王维平在城里当伪团长呢。

佟瑞明是个强悍的人，象桑木扁担宁折不弯。为了他的信仰，他死都不怕，还怕谁？他一把抓住老地主，一定拉他见抗日区长去。那老头子也拉着他，叫他上城里。两个人又拉又推，打到大街上来。街上的人一听，个个气红了眼，都说老地主不对，叫他重做军鞋。这时候，八路军的势力很强，那老地主怀着恶毒的仇恨，不得不重做军鞋。

到了一九四一年，敌人更猖狂起来。有一天，从破城

来的鬼子汉奸，突然把村子围住了，佟瑞明家的前门后门，都架上了机关枪，谁不指出佟瑞明，就把谁打死。

佟瑞明自己站出来，说：“不要打别人，我就是佟瑞明。”

“你是八路军的办事员吗？”

“对！我是八路军的办事员。”

呼噜上来一群敌人，把他捆起来。没有来得及向家人说出一句告别的話，他穿着一身稀破的单衣，从此就永别了这四十里铺村。

佟印的母亲——我们的佟大娘，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只眼睛也哭得完全瞎了。从十七岁来到佟家，她和丈夫泪一把汗一把地苦熬，还没有看見丈夫有过一天的好日子呢。他给人当长工的时候，自己不敢吃饱，偷偷拿块馍馍回来，给孩子吃。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小女儿，就是因为有了病没錢治，眼看着孩子死去了。实指望，她和丈夫共同革命，早一天把苦日子熬过去。現在，她只有一条路，求村里的老办事人員把丈夫保出来。

富农王树仁，是多年旧村政权的秘书，他滿臉笑容，滿口答应，說是一定想法把佟瑞明保出来。其实，就是这个笑面虎，受了黑心地主王維平的唆使，一再向敌人密报情况，陷害了佟瑞明。

这天傍晚，佟大娘坐立不安，只好跑到大门口站着，好象能看見什么希望。忽然，王树仁从一家门口探出头来，一看見她，又急忙把头縮回去了。佟大娘的心，好象

被一只冰寒的手挖出来，扔到烈火里去，她想：“不对，这情况不好，一定有坏点子。”

这时候，天也黑下来，她紧紧跟踪，在一家的墙头外边，她听见屋里王树仁的声音说：

“谁去保他！快写黑呈子，这一次，一定不能叫他活着回来。共产党要是胜利了，就没有我们活的了。只要把他弄死，就是挖了共产党的眼睛，割了共产党的耳朵。”

另一个人的声音问：“这黑呈子上写什么呢？”

王树仁的声音：“写他给八路军送粮送钱，写他破公路埋地雷，再造他一条，活埋过五条人命……”

亲人的生命啊，被这些人紧紧抓在手心里了。不！佟大娘抹去了满脸的泪，要死全家人一起死，要活一起活，就是有一个会喘气的，也要跟他们斗到底。

佟大娘一阵小跑跨过了院子，嗤啦一声關开门，伸出她有力的胳膊说：

“拿来，把你们那黑呈子拿出来！”

那几个家伙目瞪口呆，知道自己的秘密被她听去了，谁也说不出一句话。

佟大娘高声嚷着说：“八路军的眼睛和耳朵，可不在瑞明一个人身上长着，佟瑞明要是死了，你们谁也别想活。”

有一个被王树仁硬拉进来的富裕中农乖乖地把呈子递给了她。佟大娘举着那黑呈子说：

“我知道，你们可以再写，你们就再写吧！”她三步两

步跨出了門。

回到家，她才眞的明白过来，这一家三口人的生命，全放在刺刀尖上了。他們如果再告，就不会只告佟瑞明一个人，他們的心会更毒，他們会斬草除根。如果不是这样呢？他們就不怕八路軍？不管怎样，不能依靠他們，他們是不会把亲人給保出来的，再想些别的办法吧！

这样想着，佟大娘就不怕死活的来到了丈夫被押的地方。找到两次，敌人不让見面，第三次，她来到了破城。可是她举目无亲，沒有一个认识的人。她就問旅店里的人，看这城里能够找誰。旅店的人給她指出一个线索，叫她去找一个人。結果，那人回来对她說：“你們村已經递了五次黑呈子来了，你那人算是沒法保了。”

佟大娘又氣又恨，这沒有办法解开的仇恨，以后再給他們算賬吧。她整个身心都颤抖着，哭一陣，罵一陣，这又有什么用呢？她只好把自己所帶的一点錢，給丈夫买了两包点心，一条烟，他是爱抽烟的。往日，他只抽过自己种的烟叶儿，临死，让他尝尝紙烟吧。可是，沒有人敢給她去送这点东西。正好，給死囚犯送飯的一个老头儿来了，她給了人家最后的两块錢，人家接了东西，也让她跟进去了。

在牢獄的后面，他听见那老头喊：“誰叫佟瑞明？”

一个声音回答：“是我！”

啊！这亲人的声音，剧烈地震动了佟大娘的心，泪水一串串地涌出来。

那老头又說：“給你，有人給你捎來的東西。”

又是那親人的聲音：“誰捎來的？是什麼樣的人？”

佟大娘不顧死活地哭着回答：“是我！”

“是兒他媽嗎？”

“是啊！”

“這會兒，天有什麼時候？”

“中，中午了。”

“那你快回家去吧，別惦記我，好好拉着孩子過，記住這些日子，日後有了甜水吃，也永遠別忘挖井的人。”

佟大娘沒有答上話，她出來了。一路上，這母親的心，這妻子的心，全被傷痛、仇恨塞滿了。

回到家沒過三天，有個亲戚從破城回來說：“你那人，昨天下午三点，叫敵人槍殺了，連打了三槍，那人死了，尸首也不倒。是他們把他搬倒，拉到河里去的。”

沒過幾天，白馬峪有個人從破城出來了，他是和佟瑞明關在一個鐵蒺藜籠子里的，他又來告訴佟大娘說：“他死的時候，你給他買的東西他沒用完，都給我了。敵人一喊他的名字，他笑着說：明年這個時候，是我的周年了。他还說：你如果能回去，告訴我家里的人，就是有一個會喘氣的，也別忘了共產黨。”

佟大娘哭死過去幾次終於又活了。十六歲的佟印，從地主家扛活回來，母親在門口站着，他納悶地問：

“媽！你怎麼啦？你好象是哭過？”

“兒啊！怎麼不哭呢？你的爸爸沒有了。”

佟印一听，立刻躺在大街上，一面哭，一面喊：

“爸爸呀，爸爸……”

母亲說：“孩子，別哭咧，咱那禍害還沒有完呢！”

當真，沒过几天，敌人又圍了村庄，又来捉佟印和佟大娘。佟大娘沒讓他們捉住，一排人捉住小佟印，用枪把活活把他打死过去。病在炕上的三叔，也就这样心痛的死去了。

整整一年多，敌人一次次來圍，一次次來捉。佟大娘黑天白日躲在树林里，山洞中，挨冻挨餓，过着非人的生活。这时候，痛苦完全变成了仇恨，变成了复仇的力量。佟大娘天天去找八路軍，找抗日政府，終于，把王树仁逮捕法办了，别的坏人也害怕了，这母子俩才活过来了。

是啊，在最早的這場生死斗争中，我們失去了一个宝贵的生命。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們又失去了多少宝贵的生命。可是最后的胜利，永远的胜利，是我們的。

佟印的父亲死时三十八岁，現在佟印又是三十八岁，这整整二十二年，生活，有了多么大的变化呀。佟印已經是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了，他的童年完全消失在愁悶的磨道里，現在他的大女儿天天騎着自行車，那車輪在这光明的天地間，飞轉着。沒有上过学的佟印，可也是一个模范的民校教員了。那“穷棒子社”的二十三戶社員中，就有他們一家人的名字。只有三条驴腿的时候，他和母亲用那头驴，給社里搞副业，磨过豆腐。

現在，公社里有了汽車，有了磨粉机，压面条机，有了

多少的大車和牛馬，有了多少个小毛驴。可是，他和母亲还在搞副业，还在做豆腐。別人看起来，这是多么平凡的劳动。可是，在这母亲与儿子的心里，那磨碎了的，不只是黑豆和黃豆，那磨碎了的，是苦难，是眼泪，是那些永生难忘的仇恨。那成全了的，不只是快块的白豆腐，只是一張張的豆腐皮，而是老人的欢笑，青年的干勁，孩子們朗朗的讀书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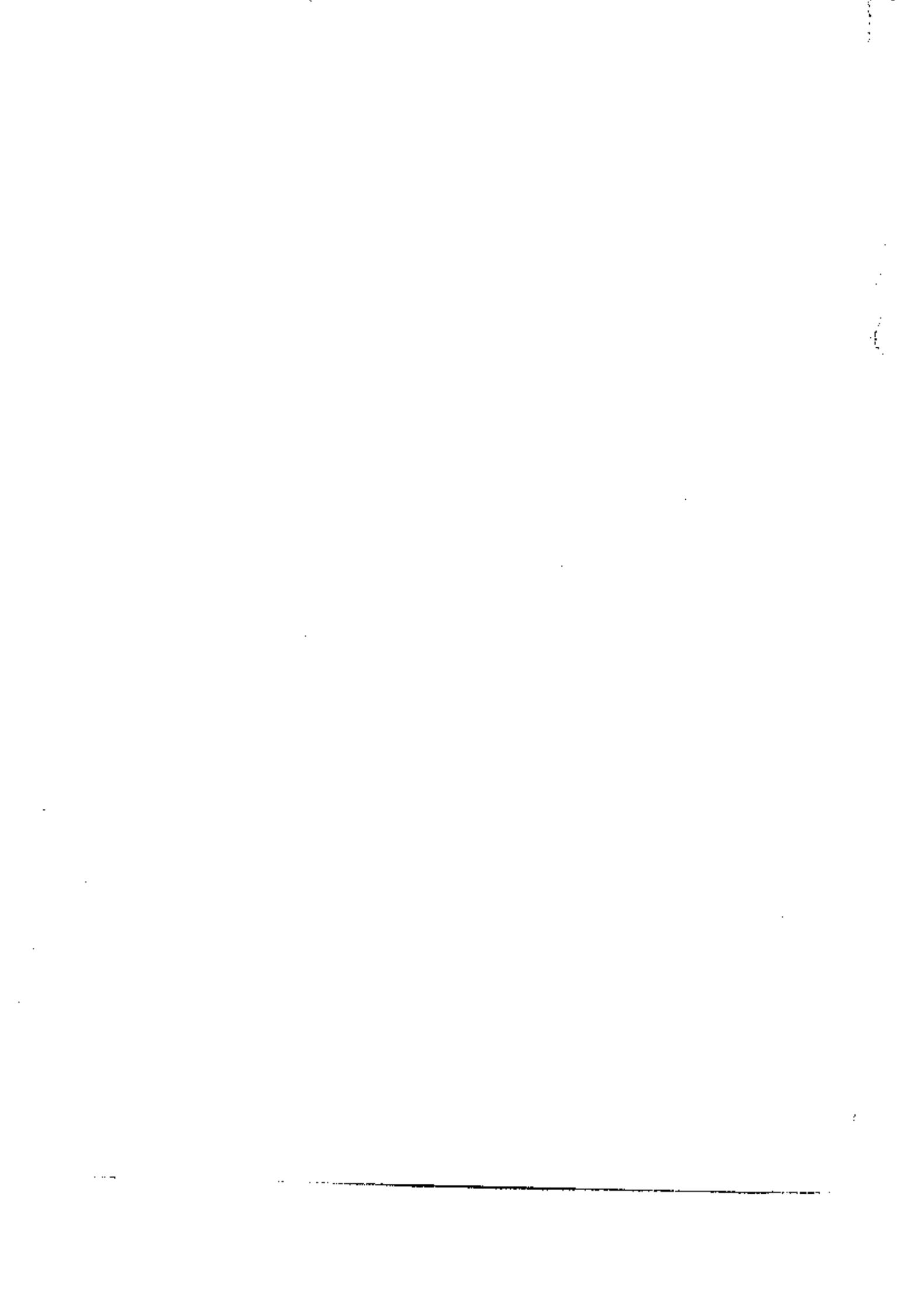
在后代更幸福的果实里，永远有那父亲的血，有那母子的眼泪，和他們滴滴的汗水。

在这长峪山下，水更多，树更密。往年剧烈的战斗，今日平凡的劳动，都是永远不朽的。



第三部分

王家大院



分 家

东 木

旧社会里，哪家地主不是靠穷人的血汗哺养大的？哪家地主不是忘恩负义把穷人踩到了脚底下？王家大院这伙牛鬼蛇神只是一个缩影。他们父子、兄弟、夫妇、妯娌之间，为了巴掌大的一丁点利益，象群狗一样大咬特咬，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因为这个阶级剥削成性，贪婪、残忍、刻毒、阴险，灵魂里已经没有什么好东西。

现在我们就把这伙黑心贼的画皮剥开来，让大伙来仔细瞧一瞧。

一九二〇年，王家大院的老爷子王思善已经快六十了。

老爷子“思善”思了这么多年，是大有收获的：首先，他认为“善门难开”，对穷棒子必须要狠，老话说骨头里熬髓，米糠里榨油都是有道理的。因此，他对收租放债什么的一向十分认真严肃。这个山乡偏僻地面，原来每亩地的租粮是七十斤到八十斤，在他手里就逐渐提高到八十斤到九十斤。而且交粮时升合不让，颗粒必争。放债原

来是按月二分到二分五的利錢，在他手里也逐漸提高到二分五到三分的利錢，還不起賬，圈房圈地片刻不延。窮人家被債迫得賣兒賣女，投河上吊，哭聲震天，老東西的心象石头一樣，一動不動。其次，他又認定“善門要開”，這個幌子是必須要裝的。這樣，不但衙門里吃得開，地方上兜得轉，就是在窮人面前，也好裝成笑面虎。因此，家里挂起了“樂善好施”的大匾，凡是和尚、道士、尼姑之流來化緣什麼的，多少要打發一星半點；叫化子上門，發餽的冷粥，也會拿出一碗半碗。

正因為老狐狸修出了這一身道行，他的日子象扯起滿篷帆，几十年里從二頃（每頃一百亩）來地，翻到四頃來地。王家大院前后三個四合院套在一起，整整占了一大截街的規模，也是在他手里定下來的。如今兒孫滿堂，五個兒子都是村里頭面人物，自己又是紳董，怎不舒心！

可是不舒心的事，偏偏跟着來。

第一件，里山肖士峪金礦上的股子，被一個姓耿的惡棍蠻不講理的吞沒了。打官司又打得大輸特輸。老爷子氣得三天沒吃飯。过后，他發現有錢無勢還是不行，因此，忍痛拿出一百元銀洋，托人在遵化城里為自己仪表出众的二兒子王文照，買了一個“巡警”的官。“巡警”，雖說是個芝麻綠豆的角色，但鄉下人哪分得清，兒子當官，老爷子自然更加煊赫了。誰知“二巡警”上任沒几个月，把辮子鉗了。這本不是大事，況且那時已經民國，不時興留辮子，但山鄉地面，舊風氣深得很，沒有辮子的人還是被

叫作“假洋鬼子”，是見不得人的。“假洋鬼子”一回家，他媳妇立即气青了臉，哭天抹泪地解下褲腰带就要上吊；上吊不成，披头散发又要跳井。二儿媳妇这样一鬧，老爷子急得团团轉；老婆子本来就有心口痛的病，一气一急，瘫在炕上起不来。

第二件是一块好坟地又被旁人外姓占了去。王家的祖坟，按照眉毛上有一撮白毛的張半仙的說法，叫做蓮花坟，发得快长得茂，可就是缺少富貴氣。老爷子越想越对，自己家吃亏，不正是吃在缺少一个“貴子”嗎？于是，他又狠心拿出三十元銀洋，托張半仙为自己另找一块好坟地，让下代能够“高官及第”。張半仙拾着罗盘攀山越岭找了个把月，終于找到了一块土饅头一样的地方，據說做了坟就成了“宝珠坟”。“宝珠”自然比“蓮花”要高貴了。老爷子心头痒痒的，一手就想占过来。誰知半路里忽然伸出一个張家地主的手，用高价搶先把“土饅头”买了去。老爷子这回气得三天沒下炕。他恨透了这个不讲信用的“張白毛”。

第三件是儿子大了，各家各戶已經开始拦門放賑，把有房有地抵押的借債戶，都拦了去；而把无房无地抵押的借債戶却推出来，让老份为难。这等于儿子喝肥湯，老子喝刷鍋水。老爷子怎不恼火！再說，儿子和儿子，儿媳妇和儿媳妇之間說不尽的罗嗦事，叫他操心也实在操不过来；而自己又年岁大了，腰背驼了，精力一天不如一天。

老爷子为这些事日夜焦思，象瘦猴一样的臉上漸漸

灰暗起来。一天，他坐在太师椅上不得不重重叹了口气說：“‘树大分杈，儿大分家’，还是分掉算啦！”就这样，老爷子积极筹备起分家的事来。

老爷子手下有个专跑“地渣子”的狗腿叫范泰；有个专管拉縴放債的女牙婆叫閻嘴嫂。老爷子要分家，狗腿子自然內外跑得更勤快了。

老六王繼亭，在王家是最小的儿子。他不但在长相上很象老爷子，瘦臉袋，尖下巴，就是在心地上，也大部分象老爷子。老爷子除去“善門難开”以外，有时还装点幌子，他呢，連这点幌子都舍不得装，为了多占一个銅子儿，是什么心計都使得出来的。他媳妇和他是一個半斤，一个八两。

一天，閻嘴嫂又进王家大院，老六就多了个心眼。他对他媳妇悄悄一囁嘴，他媳妇一笑全领会了。

一会儿，閻嘴嫂到老六家来了。

“六兄弟在家嗎？”閻嘴嫂口里象拌了蜜糖一样。

“在呀，請进坐会儿吧！”六媳妇口里也象調了糖蜜一样。

两个快嘴女人凑在一起，絮絮聒聒，真是用楔子都尖不进去。等到閻嘴嫂提到村东头有一家产妇难产以后，病得人事不知，想借三十块錢看病，願出月利三分，用房产抵押时，六媳妇忽然一反往常哭起穷来了：

“嫂子呀，本来嘛，救人一命也是行善，但眼下咱家自

己也是鸡皮包不过象腿呀！”

閻嘴嫂心里着实一楞：怎么回事呀？上次不是明明吐出口風，說有小份子錢要往外借嗎？如今又改口了！但閻嘴嫂毕竟老于世故，只稍一捉摸，就捉摸出其中原委来了。她于是赶紧繡起老臉，扁扁嘴說：“敢情是，咱王家大院这几家数起来，六兄弟还不是嫩水娃娃！人年輕，手头也紧巴些！”

六媳妇一看，老驴已經轉入磨道，于是步步进逼：“可咱老爷子手掌心不平哟，这回分家听说挺克扣咱那老六！”

閻嘴嫂这头老驴是没有便宜不走路的，她心里想：“你这个刁钻女人，想要我老嫂子在老爷子老婆子面前灌米湯哪！沒那么容易！”于是拿腔捏勢地主持公道：“六媳妇，話不能这么說，同是自己的亲骨肉，做老人的哪有偏袒哪一家的！十个手指有长有短，可咱还不是一样疼呀！”

六媳妇早看穿了眼前这头老驴的花招，于是很机灵地从身后取出一件青布短褂說：“老嫂子，天凉了，你身上也单，这件短褂你将就着穿吧！”完了，一下子就塞过去。

閻嘴嫂本来想装模作样推上三推的，可是东西都塞到怀里了，有啥法，只得客气一下算了：“六媳妇，都是自己人，你这是为的啥！真劳你費心了！”

于是，两个快嘴女人又絮絮聒聒起来。这回，中心明确了。最后，六媳妇低低而又急切地提示：“你和咱老爷子和老婆子說說，村西头河滩那边那四十亩黃土地，一定

分給咱老六！”

同一天晚上，老六把范泰也偷偷請到了家里。两人对坐在炕头上盅对盅喝起来。老六也是先哭穷：“咳，咱二哥三哥这几年都鬧得不錯呀！二哥当官，三哥在遵化‘德聚兴’粮店当掌柜，小日子都火紅……”

范泰外号“老牛皮”，爱捧爱吹，可心却有点粗。他并没有一下領会老六的意思，只是鼓起两个深凹进去的腮帮，翻动两片薄薄的嘴唇皮說：“六兄弟，不怕的，照我看，大院里論人才，論能力，論待人，还是要数小兄弟你！分了家，过不几年还不一样发起来！”

“老牛皮”的吹捧，并沒有使老六滿足，他只得再进一步点清主题：“咱老爷子这回分家，四只桌脚沒有放平，高的高、低的低哪！”这一下，范泰完全領会清了。他，这个跑“地渣子”的老手，是最懂得在紧要当口怎样掐住一个人的喉嚨口的。老六的奸，他虽然已領教过几次，但是象这样罕見的机会，怎肯輕易放过！他于是有意隨轡放馬地跟着扯：“平不平，要看怎么說罗，从这头看，高在那头；从那头看，高又在这头了！”这种說等于不說的混賬話，老六根本不願听。他心里一个轉磨，知道在这个当口不使点餌，是釣不住这条活泥鳅的，于是不得已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紅紙包。这个紅紙包，本来下午准备时是包了五元錢的，后来一想多了，抽出一块；在屋里轉了一圈，觉得还是多了，又抽出一块，只剩下三块。他还想再抽，考慮再三怕餌少了，不起作用，才算定了。紅紙也是包了一层又

一层，包儿大，他认为人家摸在手里心甜呀！

老六一手把紅紙包塞过去，一手装做加酒：“大哥，这点小意思你先領下，兄弟和你商量件事！”范泰这下受寵若惊了，慌慌忙忙的推辞，把拿在手里的酒都潑了，推辞是假的，最后还是收下了。

这个紅紙包，眼下象一座桥，把两个魔鬼的心接通了。他們开始吐出实情。老六提出，要范泰在老爷子跟前为自己多說好話，把村西河滩那邊四十亩黃土地写在自己名下；范泰表示，一定尽力照办。

过不几天，老爷子、老婆子的耳朵根，果然塞进了不少过去很少听到的話語：“老六家是困难些，分家时應該多照顧点！”“老黃牛还护小呢，哪一个老的不是这样！”

說实在的，老婆子对自己的刮肚子老六，一向就有点偏爱，更何况这些日子六媳妇不仅跑得勤，候得殷，而且特別听话。老婆子剛說了句脑袋瓜子痛，六媳妇轉眼間就把一条崭新的、軟綿綿的包头紗孝敬上了。“待上一分，待下十分”，老婆子暗下已拿定了这个主意。

这四十亩連片黃土地，在村里，不，就是在邻近也算是上好的地了。这回分家，老爷子本来是打算把它劈开的，但过后一想，好地劈得七零八碎，对儿子发家有影响，不如不劈，固定給一家，在别的方面搭配一下。正在二心不定的时候，屋里屋外的人全替老六說話了。老爷子想想也有理，就把这四十亩好地，写到老六名下，但又怕别的儿子有意見，清单还在自己手里把着，不肯一下公开。

老話說，隔牆有耳。老六和媳妇奸，老五早死不算，其他的兒子和媳妇難道傻嗎？不是的。他們也一樣是算盤精，對怎樣損人利己，剝削起家，全從老爷子那邊學會一套。他們在這個緊張的日子里，全是貓眼睛狗鼻子靈着呢！

老二媳妇首先覺察出來了。一天，老六媳妇剛從老爷子那邊晃出來，她就躡手躡腳摸進去，站在老爷子窗戶外偷聽。老婆子正在叨叨要給老六好处，老爷子不耐煩地表示，不用再操心了，已把那四十亩好地寫在老六名下了。

老二媳妇是有名的潑辣貨，她敢拿上吊和跳井把二巡警治得服服貼貼，對這号事豈能善罷甘休。她一回家，趕緊把正在午睡的老二從炕上轰起來，如此這般着实訓了一頓，說他是窩囊肝、窩囊肺；完了，又趕緊到院子里把几只雞婆子轂得咯咯亂飛。雞婆子一飛，她就潑口咒罵：“這娘子雞，成天飛，不知想尋占啥便宜！我打斷你這娘子雞腿！”

六媳妇一聽，就知道是咒自己。她心里的火苗立刻就往上冒，但人家在咒雞，自己又不好接茬，只得怨在肚里。一会儿，一只鬼雞咯咯咯飛到自己這邊來了，二媳妇跟着也咒過來。這一下，她忍无可忍，不得不回敬了：

“二娘子，說話干淨點，你不怕下世變啞巴！”

“干淨？這娘子雞還會干淨！”

“你打撞誰？”

“誰認就打撞誰！”

这一下，两个女人全豁出来了。一个針尖，一个麦芒；一个生姜，一个辣椒；一个粗嗓，一个細嗓；一个拍手，一个打掌，直吵得昏天黑地。

同一个时候，二巡警急急忙忙去煽动另外三个兄弟。

老三王凤宣新从遵化来，白白胖胖，正在一支接一支的抽着“强盜”牌紙烟。老二如此这般一說，老三带点感慨地表示：“老六真是奸滑！”但他心里想的是：算盘一响，黃金万两，何必为这点土疙瘩爭得面紅耳赤。眼下要紧的是如何拼凑王家哥儿們的財力，趁秋后粮价便宜，吃进几百石，开春以后，青黃不接，在穷鬼們身上杀上几刀，还不很快能翻上一番！“德聚兴”粮号里这点外股應該想法挤出去，自己独家来經營，逢一进一，岂不比二一添作五强！这样，第一步也不宜和兄弟們反目。所以，当老二提出要和老六爭时，他却象老练的射手一样，有意盤馬弯弓，不肯立即就射：“二哥，老話說‘和氣生財’，咱們找人对老六說一說，叫他不要这样斗心眼就是。”

老四王俊原是个大烟鬼，这时正躺在炕上吱啦吱啦抽大烟。他听老二一說，赶紧放下烟枪，瞪起眼睛表示：“这可不行，賊六子人小鬼大，这样分家咱們不认賬！”但因为烟瘾沒有过足，对这件事实在无法认真。再說，前几天二巡警家拦門放債，把原來說好由老四家放的四十元錢拦了去，債戶老佟有五亩好地抵押。这种挖墙脚的做法，大烟鬼气得摔烟枪。如今要他共同对付老六，他也有点不願意，于是說完仍躺下噴他的云吐他的雾了。

老大王玉书是有名的大棒子，一年四季手里提了根黑漆棍。老爷子生了气，要惩办佃户啥的，往往是他出面。他很会劈程咬金的三斧子。当有些佃户，由于歉收交不足租子，向王家求情时，老爷子照例摸胡子不吱声。大棒子却在一旁举起了黑漆棍，“他媽的，你也短，他也欠，咱王家一年到头喝西北風！”如果有些佃户不知进退，还要說情时，他的黑漆棍就会狠狠把石头敲得冒火星：“走，別罗嗦了，哪怕揭鍋出屋，也要限三天以內交清！”如果有些佃户实在家里空空，清湯淡水，他是不管什么远亲近邻的，立刻就会翻臉不认人：“这几亩地明年我另租了！”說完，一揚黑漆棍，头也不肯回一下。王家的发家，他是有汗馬功劳的。眼下他听老二这么一煽，立刻抖抖他那长子的威风說：“老爷子老糊塗了，能这样分家嗎？我去說去！”

就这样，老大和老二联合起来到老爷子那边提抗议了。

老爷子看到儿子們这样真刀真枪，有点心慌，只得說：“那么大家拈阄吧！”

分家那一天，四亲六眷都到了。

老爷子长袍馬褂，忙着应付客人。

狗腿子范泰顛着屁股跑东跑西，末了捧着闌盘，請五位兄弟拈阄。在这个节骨眼上，三元銀洋起作用了。范泰是預先知道哪个阄分哪笔产的，他走到賊六子身边，一个咧嘴，一个示意，賊六子伸手一拈，果然拈了个好阄，分到

了他日夜梦想的那四十亩连片好地，和别的三十来亩地。这一下，兄弟们自然没有话好说了，但是心里还是明白，这中间有鬼。

二巡警气虎虎的回到家，一看，老爷子为各家特意准备的一只大斗，一只小斗，一根大秤，一根小秤，齐整整的放在炕沿上。这也是王家剥削穷人的传家宝。大斗和小斗从表面上看，相差不大；其实一个板薄底深，一个板厚底浅，相差准有六、七合。小斗是官斗，卖出粮食和别的公开场合用的；大斗是私斗，向贫苦农民收租粮用的，收的时候加上狗腿子一摇晃，再冒个尖，准有一斗一升。小秤是十六两官秤，公开场合用的；大秤是二十两私秤，也是向农民收买什么东西用的。老爷子怕分家以后，各家规格不一，才想出了一个这么刻毒的绝招。二巡警正在火头上，一手拾起大斗，一看，口张得大大的，象对自己傻笑，生气地“扑簌”一声把它反扣在炕上；一手拾起小斗，一看，里面黑漆漆地象对自己瞪眼，生气地“扑簌”一声，也把它反扣在炕上。

贼六子回到家，一看大斗、小斗，大秤、小秤，更乐了。他拿起大斗左看右看，上量下量，总觉得哪儿好象还不够一些。末了，拿起一只小圆凿，在底边上又挖下一溜深坑。坑坑虽小，但贼六子已计算到它的大作用了。

二巡警父子

幼江

—

分家以后，王文照那巡警官也不当了，一意創家立业。可是人們还都叫他二巡警。

二巡警是个算盘精，吊在口头上的一句話是：“吃不穷，穿不穷，算計不到一世穷。”也就是：刮一分，是一分，不刮穷人不甘心。他家里有文房六宝，除去紙筆墨硯以外，还有一个烏黑发亮的十三档算盤，和一本青布面紅小格的賬本。每天晚上，他都坐在炕头上，就着煤油灯撥算盤，翻賬本，一直到深夜。

其实，二巡警还只是个外掌柜，光管要粮索款，記賬銷賬；大宗的銀元鈔票却归他的內掌柜——那个两头小中間大，象个“大枣核”的媳妇保管。“大枣核”有一只鎖着黃銅大鎖的紅漆小木箱，里面專門貯藏錢財文契。紅漆小木箱放在大板柜里，大板柜外面，又用一个特号的黃銅大鎖鎖着。所以，錢一落入內掌柜的手里，想再挖出来比登天还难。

有一年，又到腊月二十三了。这是灶王爷上天的日

子。灶王爷管人間烟火，按照旧風俗，人們要用粘米和糖稀做的“糖瓜”供獻他。为的是粘住他的嘴，让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穷人家自己的嘴都顾不上，哪有这笔“額外負擔”，只是花几个銅子买几个現成的糖瓜，在灶前供一供，应付一下。富人家則另是一种景象，他們对灶王爷除去使用糖瓜粘嘴这点强迫手段以外，还按照自己的猜度，用七碗八碟，糖果点心，上供賄賂。二巡警是当过官的，更懂得“賄賂”的重要，所以这一天，他家的“大枣核”里里外外，灶上灶下，忙得顾不上洗臉梳头。

腊月二十三日又是过小年，是催帳討債的緊張关头。二巡警翻开他的帳本，撥起他的算盤。他数着已經勒榨到手的錢財，暗暗为自己的催討有方感到高兴；也为好几笔帳連日追索不到，鎖起了眉头。

当二巡警翻到佃戶老山头一笔帳时，不由忆起了那天討債的情景：老山头病在炕上，臉象一張黃叶，上气吊不起下气，求他寬限；他粗声大嗓，紋絲不让。末了，老山头被逼无法，只得說：“树要皮，人要臉，我老山宁願冻死餓死，这笔帳也要我大小子出屋还你！”

猛然間外屋炒鍋里吱啦一声，油烟直冒，一股肉香扑鼻而来。不知怎的，这突然的响炸，使他心头怦怦乱跳。他探身向外看了看，喊道：“孩他媽，你来一下。”

“大枣核”扭着肥胖的腰肢，到了跟前，問：“什么事？”

“老山家还来的錢，你都清点过了嗎？”

“沒錯，本錢五十五块，两年的利息三十八块八角，一

共九十三块多点，我都放在柜里啦。”

“你沒听说他家今天出屋，搬到破牛棚里去住？”

“你問这干啥？穷鬼們生就風扫地月当灯的命，有破牛棚住还怎的？你可怜他們啦？他們是你爷爷？是你奶奶？老話說：桥归桥，路归路，貧富从来不一家，你管这些閑眼做什么？”

二巡警被搶白了一頓，直翻双眼。“大枣核”可还大抖雄威：“我事情忙着呢，佛沒拜，香沒点，哪有功夫陪你拉长扯短！”說完，一扭身走了。

外屋的炒菜声仍吱啦吱啦地响着，二巡警繼續翻他的帳本，当他看到还有好多筆欠租和欠賬，象屈福善家的，屈福榮家的，杜宝山家的……等，至今还没有追到，心里就着急起来。他扳起指头一算，过大年已經沒有几天了，于是再也坐不住，抓起錢褡子就准备出門勒榨。

猛然間，他想起了他那独生独养的歪脖子儿子王維藩。儿子平常很听话，这点他是滿意的；然而那种筒起双手，只管吃喝，不会算計的毛病，他可不喜欢。他想，这回要賬正該让儿子也去“鍛炼鍛炼”，于是高声吼着，把儿子叫到跟前：

“錢褡子你背着，咱俩要賬去！”

“歪脖子”在遵化进的是教会学校，念的是洋书，会几句洋文，所以乡下人都习惯称作洋学堂生。当时，南方的革命星火早已燃起，許多有識的青年都說要革命救国。他一听說“革命”，两条腿就哆嗦。他瞧不起劳动人民，认

为肩上挑点、手里提点东西都是有失体面。一心想作官經商，有錢有勢，光大他那地主祖宗的門楣。老子要他背錢褡子去要賬，他有点不願意。但他是个“屏头”，害怕和老子頂撞，只得采取了个軟拖的办法：“爹，我今天事情忙着呢！”

“什么事情？要賬不是事情！錢不要到手，你喝西北風！”二巡警生气得只差破口罵了。

“歪脖子”只好順从地背起錢褡子，不远不近地跟在老子后面。

这天北風很硬，黑云压压就要下雪。屈福善家的破草棚里，三五个穷佃戶擠在一堆閑扯。他們虽然家家鍋蓋長在鍋沿上，粥瓢子吊起来当鑼敲，但是一扯起来，也忘了东南西北。

一个說：“灶王爷也是偏心眼，年年上天不言咱們的好事，下界不保咱們的平安！”

一个說：“你还說呢，我他媽的今年連买糖瓜的錢都沒有，老伴愁得眉头打死結。我說，甭愁，干脆供上清水一碗，高香三支，灶王爷要是嫌棄，拉倒；反正是穷，还会冇别的！”

另一个忽然插进来：“你們知道灶王爷姓啥叫啥？哥儿几个？”

这一稀奇古怪的提問，把許多人都問呆了，誰也答不出来。最后还是他自己开宝：“要我看，灶王爷姓白名吃，哥儿六个。你們想，他吃了咱們的，喝了咱們的，道过謝

嗎？付過錢嗎？都沒有。這不叫白吃！咱村王家大院哥兒六個，年年要咱們糧租，道過謝嗎？付過錢嗎？都沒有。這不也是白吃！……”

“哈哈哈，”人們全都笑了。

正在這時，二巡警邁腿進來了，後面跟着“歪脖子”，肩上背着錢褡。

他們這一出現，談話自然被打斷了。大部分人借着站起來打招呼的機會，一拍屁股溜了，只有屈福善和屈福榮兩人被堵在門里。

二巡警翻開賬本一指，說：“福善，你租我十八畝地，去年欠租一石六斗，今年欠租二石，合起來三石六斗。當時說定要滾利行息，現在折成錢，算起來已三十元挂零了。這筆錢怎麼辦？过大年已沒有幾天了呢！”

屈福善一向心高氣硬，象根桑木扁担，寧折不彎。為了租這點地，一家人無冬無夏，拼死拼活地干，滿以為交了租子，總能落個糠菜半年糧。誰知去年遭了水災，今年又是春秋兩季都旱，收成大減，租子却是鐵帽子一頂，顆粒不減。為了交租，為了盼望明年，一家人勒緊褲腰帶，把收成十之八九都送進了二巡警的糧倉。想不到一點尾欠，又被他折成了錢滾利行息。他真是滿肚子的氣，但又不願低頭求情，末了硬朗地說：“好吧，我家還有自刨的几畝山坡地，賣了還清你這筆債！”

二巡警指着另一筆賬說：“福榮，你的欠租也差一石多沒有清呢！這回怎麼辦？要是滾利行息到明年，你更

要挑不动了！”

屈福荣心地老实，不会說話，像个沒嘴葫芦。他家人多，劳力少，担子由他一个人挑着。今年收成不好，粮食绝大部分交了租子，还欠一石多。前几天，他走着走着，就跌倒在家门口，那是因为沒有吃饱而饿的。人家把他扶回家里，他老伴想給他熬碗米湯喝，都是借了几家才借到。現在二巡警又逼着要收欠租，叫他有什么办法呢！他呆坐在炕沿上，說不出一句話來。

二巡警更是步步进逼：“要是这样，这八九亩地我可要抽回来另租了！”

地是穷人的命根子，有地还有个盼头，要是地都抽回去了，不更是死路一条！屈福荣急的憋出一句他自己也不相信的硬話：“好吧，你滾利行息吧，明年我一定全数还清！”

这两家子就这样被二巡警父子追債迫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其实，这一天，四十里鋪遭到同样命运的穷佃戶，又何止这两家呢！

傍晚，二巡警父子回到大院，錢褡里裝得飽鼓鼓的，里面有銅板，有銀角子，也有銀元。“歪脖子”把錢褡重重地往柜上一放，发出鏘鏘一声。这种金屬的、清脆的响声，“大枣核”是最喜欢听的。她眉开眼笑地慌忙从鍋里搬出了七碗八碟，热气騰騰，肉香扑鼻。

二巡警搓搓手，呵口气說：“嘿，外面太冷了，弄四两白干来暖和暖和！”

一会儿，热炕头上，一家人大吃大喝，又說又乐。

隔了几天，王家大院过年的气氛更濃了，二巡警家又宰猪又宰羊。越是离年近了，二巡警越是忙着到穷人家去死催硬迫。

二巡警家三个长工都回家过年去了，只留下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子杜钟給他家挑水、燒火、喂驴、推碾。“大枣核”是个不让手下人闲着的管家婆，分派活計就象流水一样不断头，一桩事沒完，另一桩早就派定等着了。手下人喘口气，伸个懒腰，她都瞪你几眼。这一天早起，杜钟挑了十多挑水，扫过院子，鋤好草，喂飽驴，劈碎了燒火用的老树疙瘩，正想歇一歇，“大枣核”就又吼上了：“咳，快把这两斗麦子抱去推碾！”

杜钟实在生气了，肚子餓得前腔貼后壁，哪还有勁！但又不能不去，只得慢吞吞地把麦子抱到碾棚里。他心想：反正驴也空着，就去把驴套起来。一会儿，驴在磨道上平稳地走动起来。

“大枣核”正在和面，一想，碾子不知推得怎样了，就把歪脖子儿子招呼过来，說：“小藩，你快去看看，小杂种說不定又偷懶呢！”

“歪脖子”到碾棚里一看，可不是，驴拉着碾，人在一旁站着呢！于是他也学着他爹的样子，說話前故意咳了一个响嗽：“唔，怎么人站着叫驴拉呢？”

“驴不是就为拉磨推碾、送粪赶脚养的嗎？”

“这驴昨天干了一天活，今天又干，退了膘怎么办？”

“人就不退膘了嗎？我餓得路都走不動了呢！”

“歪脖子”沒話好說了，只得狠狠瞪了几眼就去告訴他娘。“大枣核”吃惊地吼叫起來了：“小雜種真賤骨头，你爹不在，不用棒棒撲，他骨头就痒了，我去！”但她兩手一提起來，粘呼呼的面筋挂了半尺長，心想：要是洗掉，這點面就白搭了，於是立刻改變了主意：“小藩，你也大了，不學點顏色將來怎麼當家？窮人都是賤骨头，你不凶，他不怕；你不狠心，他不知情。這小雜種，你打他幾下怕什麼？去！你叫他卸下駝來，用人拉！”

“歪脖子”經他娘這一教導，果然大開心窩，渾身是勁，拳頭都痒起來了。他又走到碾棚里，歪着脖子，橫眉豎眼地高叫起來：“快把駝卸下來，用人拉！”

“我不卸，沒有勁！你有勁，你拉！”

杜鐘正囁嚅着，“歪脖子”跳過來劈劈就是兩巴掌。杜鐘這下也是火苗直冒，什麼都顧不得了，立刻也跳過去劈劈還了他兩巴掌。

這一下可闖了禍了。“大枣核”两只小腳象鼓點似的敲過來，又是罵又是鬧，象要吃人似的。一會兒二巡警回家了，他們把杜鐘捆起來好一頓揍。

过年了，鞭炮乒乓連声响。可是在四十里鋪这样一个山穷土薄、被地主阶级敲骨吸髓的农村里，能够尝到过年欢乐的，又有几家呢！

二

时间飞过了二十年。沙河套上的幼苗已长成了参天的白杨。

这是翻天复地的二十年。日本鬼子被打走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进攻被打退了，中国革命就要彻底胜利了。这个地区在一九四七年秋后陆续进行土地改革。

王家大院这伙牛鬼蛇神，已经五零十散。老一辈的地主大棒子、二巡警、三蛀虫、四烟鬼都先后离开人世，只有贼六子凭着他的奸滑，象贼一样潜逃他乡。新一辈的地主王维平和王维清在反动政权里卖命没有落网，王维藩和王维田被追押回来就要进行斗争了。

“歪脖子”王维藩这时早已当家立业了。他除了从巡警老爹那里学会一套刻毒地算计穷人的本领以外，又在遵化城里跟着他那六叔贼六子学会了一套投机倒把，火中取栗的本领。所以，从表面上看去，他还是不起眼，其实已经成为了一条不声不响就咬人的恶狗。

王家大院已换了主人。“歪脖子”一家住在大院左边的草屋里。就在这雷轰电闪狂风暴雨的前夜，“歪脖子”凭着他的鼻子，嗅到了我方队伍里的一点异味。原来这时村里正是杜志当权，王国藩和杜奎两个老干部受到无理的排挤和打击。杜志表面上是党员干部，其实暗中已和敌人唐山特务组织挂钩，手下搜罗的尽是他那

大佛教道徒中的三老四小。貧农团、妇女会也被他的勢力控制着。

“歪脖子”共养了四个閨女，大閨女已經出嫁，三閨女不在家，身边还有二閨女和四閨女。

一天夜里，天黑風大。“歪脖子”一家早早就裝做熄灯睡觉，他們擋严了窗戶密談起來。

“歪脖子”一声接一声地叹气，他那瘦驴一样的老伴一声接一声地喊怨。这一陣怨憤的教育，把坐在一旁的两个閨女的心弦繩得緊紧的。

“你們这两天在外面听到些啥？”“歪脖子”把談話轉入了正題。

“啥也沒听到，他們見到咱，眼睛就打橫了。”二閨女也有怨氣。

“你不好暗下找杜志大表哥問問嗎？”

“他会认咱们？”

“不认拉倒！照我看，他眼下正要用人。一回生，二回熟，三回亲，一个閨女家說話总要方便些。”

“哼，亏你想得出！”“大瘦驴”發現“歪脖子”想用自己的閨女當釣餌，火上来了。但只一会儿，她就明白过来，除此以外确实沒有旁的好計策，于是也不再說別的。

二閨女那年正滿二十，长得虽不算漂亮，但是風風騷騷，十八岁那年，就曾在“歪脖子”的暗示下，跟国民党里一个下級軍官逛过唐山。如今已是第二回要她显身露手。她低着头沒說別的，心里已有自己的算計了。

几天后，“歪脖子”和“大瘦驴”又积极活动，为十一二岁的四闺女在村西头认了一家贫农做干爹干媽。干爹是个老实得三天难說两句话的老头，干媽心眼好，就是爱贪点小便宜。四闺女早一声干爹，晚一声干媽，叫得亲亲热热。“大瘦驴”前半晌送过去一个小包袱，买住了干媽的心；黑夜間又寄进去一个大包袱，叫干爹不好对外張口。这家贫农就这样上了“歪脖子”的大当。

杜志这些日子正是野心勃勃，一意想当土皇帝，恨不得把王国藩和杜奎两人掀下井去。但是他群众基础差，几回想发动签名告状，都沒有搞起来。如今他正东門串西門，跑得脚不沾地。好几回，当他一个人从村口路过时，王家二闺女都送过去挑逗的眼神。开始他还不介意，但一而再，再而三，秋波终于送进了他的心坎里。有一回，杜志到西头那户贫农家商量事，刚在炕头上坐定，王家二闺女穿得漂漂亮亮的也进来了，故意羞羞答答地坐在对面。干媽燒好水，她就跟着捧茶，声音脆得象黃鸝叫：“看你們一天忙的——喝点暖和暖和吧！”随着送过去的，还有袖口的花露水香和臉上的雪花膏香。杜志这家伙本来就想沾花惹草，又受到二闺女的引誘，早已晕头晕脑的了，接茶时，一搖晃，半碗茶潑在二闺女的花短袄上。

“格格格——沒啥！格格格——沒啥！”笑声就象銀鈴一样。

二闺女的笑声把杜志撩撥得不知太阳是从哪方出了。

当杜志說到眼前工作難做，自己顧了東顧不了西時，二閨女隨着就表示，自己願意和地主家庭划清界線，可以幫着辦點事；當杜志說到眼下正缺少一個會寫報告做記錄的人時，二閨女又隨着表示，只要不嫌她成份不好，她願意學着做。總之，二閨女充分表示了自己的熱情和主動。

杜志却是要吃肉，不沾腥。他一方面會心地微笑着，肯定了對方的請求，另一方面也挂出了遮遮掩掩的牌子：“這個，這個咱們再研究一下吧！”

這天晚上，二閨女就被杜志派人找去抄填什麼表格了。一日長二日短，二閨女就這樣悄悄的成了杜志的私人秘書。

一天晚上，“歪脖子”和“大瘦驴”又坐在炕頭上，一个唉聲，一个叹氣。

這回，二閨女有話說了：“爹，他們正打算到縣里去告王國藩和杜奎哩！”

這個風聲“歪脖子”早聽到了，他打心眼里高興。但他還是假裝吃驚地問：“都告點啥？”

“告他們打人、罵人，還有賬目不清啥的！”

嘆地一声，“歪脖子”把豆油燈吹滅了，他趕忙叫“大瘦驴”到門外看了看，見確實沒有人了，才擋嚴了窗戶，又點起豆油燈，從一只板箱的角落里，摸出了一個黃布小包，裡面有一本灰扑扑的青布面賬本，和一本四四方方的小書。他先把賬本拿在手里翻了翻，只見許多紅小格上

一笔一筆記的尽是他家过去的地产房产和銀錢出入的眼目。有許多还是已死的老巡警的手笔，也有不少是他自己用蝇头小楷后加进去的。比如哪年哪月某戶租糧顆粒未交；哪年哪月某戶欠款本利，拒不归还……等等。他恨恨地想：哼，穷棒子們，不用看你們眼前抖得凶，一旦变了天，咱王家照样抽你們的筋，剥你們的皮。他翻了一陣，又把灰賬本放起来，随后撿起了一本四四方方的小书，就着灯光，“六法全书”四个字很显眼地突了出来。他歪着脖子，匆匆忙忙地翻起来。

“爹，你看这个干啥？眼下共产党不讲这个！”

“嘿，你閨女家不懂！你爷爷在世时，常恨我廢铁不成鋼，又訓又罵，这些我都忘了。有一句話我是死死記住了：‘打蛇要打在七寸上，打人要打在要害上。’王国藩和杜奎两人，一个能文一个能武，是村里共产党的两只臂膀。要是他們当权，卡得紧、管得严、斗得狠，咱們准沒有活路了。只有帮着你杜志大表哥把这两人狠狠掀下井去，才有咱的路。走一步看一步，这批穷棒子我就不信真个能坐天下。‘六法全书’是大书，咱們要掄刀动笔，就得傍着它。嘿，你杜志大表哥还是粗心，在紧要当口抓不准，咱們暗中要多提醒提醒他……”

“爹，听说区里还支持王国藩和杜奎哩！”

“不怕，只要咱們捏住‘七寸’打就行！什么打人罵人都是小事，要紧的是告他們貪污，告他們枉法，只要有影子，还可以告他們危害老百姓的生命財產……”

“歪脖子”說到這裡，氣粗了，聲也大了。“大瘦驴”趕緊用手肘碰他說：“這是什麼時候？咱說話還高聲！”

“歪脖子”只得又壓低聲音，繼續向坐在一旁的閨女指點吩咐。反動的毒焰在二閨女心里更加火旺旺地燒起來。

約摸過了半個多月，一天夜晚，二閨女回到家，滿臉放光地說：“爹，今天下午杜志等人把王國藩和杜奎兩人扣起來盤問啦！”

“喔！”“歪脖子”的灰臉也放光了，“問出啥來沒有？”

“啥也沒問出來！兩人還反駁呢！下午大表哥要我悄悄坐在人背后當記錄，你看，這不就是兩人的口供！”

“歪脖子”接過了兩張寫得密密麻麻的白光紙，從頭看到尾，臉孔又灰暗下去。這上面承認的哪有一句能成罪狀呢？只差一點就是起訴書了。但他只稍一思索，就有了新的陰謀：

“上次告王國藩和杜奎的，都有哪些條？”

“我不是對你說過了嗎，一共十二條，主要是貪污，耽誤公事……”

“老話說，‘筆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提醒提醒大表哥，王國藩、杜奎兩人的口供，咱們得改一改。”

“恩！……”

父女倆就這樣在陰暗的角落里，幕後參與了杜志這個叛徒一手掀起的變天活動。

鬥爭的矛頭一轉移，各種各樣的謠言都起來了，什么

“王家地主早已搬到遵化，家里哪还会有啥！”“人家‘歪脖子’是个‘雇头’，从小吃饭不管事，斗争他也是罪过！”“斗不出啥来，白费工，还不如上山摸柴火上算！”

“歪脖子”听到这些谣言，心里象蜜一样甜。他原来象死灰一样的脸上，这几天又发出了亮光，一家人进进出出也不再锁起眉头。

正当“歪脖子”做着好梦的时候，暴风骤雨来临了。不久，上级领导派来了干部，发动了群众，对“歪脖子”和他的兄弟王维田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他二闺女那“私人秘书”的职务，自然也被革掉了。只是这时候，杜志的漂亮外衣，一时还没被人们识破。直到隔了半年多，邻近高各庄等地由大佛教等反动会道门组织了“红眼队”的暴动，对人民进行残酷的烧杀，杜志等人也密谋响应暴动的阴谋暴露以后，才被逮捕。“歪脖子”煞费苦心想抓住的这根救命稻草，也被革命的浪涛淹没了。

三

时间又飞过了十五年。沙河套上的白杨，已长成绿色的长城。

“歪脖子”和“大瘦驴”都已经老了，但是心中的怨恨都没有消。

“歪脖子”变得越来越阴沉，每天垂着头、歪着脖、挎个粪筐，在大道上缓慢地走着，村里事不闻不管，见人不

打招呼，不串邻，不走亲，象死去一样。“大瘦驴”变得越来越多嘴，为一点小事就打鸡罵狗。

在这十五年里，“歪脖子”好几次預言要变天，而且作好了准备，結果一次一次全落空了。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时，他想：这是鸡蛋碰石头，准完蛋！一天晚上，他又抖抖索索地翻他那虫眼累虫眼的陈年老帳本，第二天借口拣粪，在自己的几块地上直晃悠，查看地界。誰知过不多久，全国展开了鎮压反革命运动，吓得他赶紧又低下头。他那个在伪軍里当过团长，債累累的堂兄弟王維平，被押回来枪毙了。一九五三年，王国藩和杜立领导办起了二十三戶农业生产合作社。他又想：穷棒子們不用抖，抖得欢、垮得快。但由于接受了上一回的經驗教訓，这一回，他更加謹慎了。王悅等反动分子千方百計企图把社搞垮时，他只冷眼站在一旁察看，未敢輕易沾手。誰知穷棒子們充分发挥了坚强勇敢、一勤二儉的精神，在共产党的领导，把社办好了。王悅等反倒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再一次使他大失所望。紧接着，生产一年一年的发展，生活一年一年的提高，山区面貌一天一天的改变，社的規模一天一天的扩展。在轉高級社的第二年，他也成了社員。当时，他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庆幸自己伪装得好，沒露馬脚；另一方面又十分悲哀地想到：变天的希望愈来愈少了。当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全国高举起来时，建明公社更是日夜沸騰。“歪脖子”眼花繚乱，簡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望望山前和山后，到处

滚动着歌声和笑声；望望村头和村尾，到处人喊马嘶，钢铁大军和水利大军正在日夜奋战。他感到这一切都象对自己示威，连粗气也不敢出了。

一九六二年夏天，“歪脖子”忽然感到他的预言这次真的要实现了。因为这两年碰到了自然灾害，市场上比较紧张，人民生活也比较困难。被中国人民赶到台湾去的蒋介石匪帮，看到有机可乘，吵吵嚷嚷要反攻大陆。“歪脖子”这时又一心想着：变天，变天，变天！天天晚上做着变天的好梦。他叫回了在外地闺女家的“大瘦驴”，又指定在遵化某行业工作的二闺女，经常回家传报消息。

一天清晨，“歪脖子”忽然早早起来，绕着王家大院，莫名其妙地察看起来。

“大瘦驴”在家看啥啥不顺眼，前门罵完了母鸡不生蛋，后门又罵葫芦不上架。一会儿，“歪脖子”回来了，鬼鬼祟祟地把“大瘦驴”招呼到屋角里說：“我昨夜梦见王家大院屋顶开红花，这是物还原主的大吉兆；今早还看見有红光紫气呢。这回变天是一定的了！”

“真的？”

“这哪会假！咱俩合计合计，眼前怎么办？”

“哼，照我看，把咱屋后那片菜园地先圈起来，谁也不让走！”

“你是眼光短小！”

“你大？你大？大得连个响屁也不敢放！”

“看你！你以为我真这么膜包嗎？嘿，咱是块老姜，

不到时候不显辣味！別看这批粗脚杆子抖得欢，又是队长，又是委员，头上长角，身上带刺，到时候，一个个还得倒地去啃泥丸。老实說，咱也不为别的，閨女們都成家了，跟前又沒小子，咱就为王家大院爭这口气！……”

“歪脖子”正这样满口白沫地嘟囔着，想不到“大瘦驴”偏偏扯起衣角擦眼泪了。“歪脖子”立刻感到自己失言，犯了老母驴的禁忌。要在平时提起“沒小子”的話，她准老尸首长、老尸首短地罵上三天三夜；如今幸好“喜事临門”，老母驴总算大赦了一回。但余怒仍在，只一会儿，她立即拼凑起臉上橫七豎八的皺紋虫，哭丧着臉回敬：“爭口气？你这老尸首有多大能耐？”

“大瘦驴”的眼泪和罵声，終於象冷雨一样，把“歪脖子”心里的一盆热炭澆退了火苗。他冷靜下来一考慮，老虎爪子要一点一点伸，先从圈地做起，也确实沒有什么不可。于是点点头說：“就依你，咱們先圈菜地！”

上午，他粪筐不擋，粪杈不拿，背了把鎬上菜园了。菜园后面是二队的队部，社員进进出出要走过他家菜园的一角。这本来早已習慣了，誰也不介意，他本人也沒有意見。可是今天，他的意見就大了，歪着脖，掄起鎬，一下一个深坑，很快把踏平了的一条小道全刨开了。接着，又用棘針密密麻麻地圍起籬笆来。这条道就这样堵死了。

中午收工时，队长老王荣看見了。他火苗八丈高地找上門說：“王維藩，你怎么路都不讓我們走？”

“歪脖子”开始不吭气，接着就反攻說：“你們學过政

策嗎？這算不算我的菜園地？”

“算又怎麼的？不算又怎麼的？”

“政策上不是明明白白說過，社員可以自己處理嗎？”

一句話把老王榮頂得張口結舌。他心里想：好！你他媽的尾巴又翹起來了！

大隊部研究了這個情況，明知這老東西又在磨牙練爪，等待變天，但既已被他佔了空子，也只得容忍一下。

試探性的進攻勝利以後，“歪脖子”臉上放光了，老兩口一天到晚唧唧噥噥，有說有笑。

夏末，汛期到了，山區沿河各村都忙着防汛。春天時，村里為了確保河西的一片保家好地，特意花了二千多個勞動日加固了一道河堤，堤外豎起了密密麻麻的柳樹桩子。

一天下午，“歪脖子”又沖着“大瘦驴”咬耳朵，末了只聽“大瘦驴”扁着嘴輕聲告誡說：“小心着點，窮鬼們長八只眼睛哩！”

太陽滑進了西山，社員們大部分都收工回家了。“歪脖子”還沿着河堤拣糞。拣着，拣着，河堤上再也看不到什么行人了。忽然，“歪脖子”緊張地東張西望起來，望了一陣，看不見人了，猛然丟下糞筐，跳下河堤，使勁搖起護堤桩來，一面搖，一面喃喃自語：“他媽的，丰收、丰收，我要你們丰收個屁！……”他動作敏捷，真不象是一向裝病的六十來歲的老頭子。只一会儿，就拔出了一棵樹桩，一下丟進了水里；又一会儿，又拔出了一棵樹桩，又丟進了

水里……

“你要干什么？”社員赵連春象豹子一样，从堤旁树林里冲了出来。

这一下，“歪脖子”没啥好說了，只得抖抖索索地强辯：“我，我寻思这些树桩子……沒有用了，想拔几棵生火……”

“你甭强辯，这些树桩子是沒有用的嗎？拔了它，河水冲垮了河堤咋办？你这不是存心破坏！跟我走吧……”

赵連春平时是个悶着头干活，不大爱管村里事的人。最近听了村支部关于目前形势的傳达报告，要广大社員提高警惕，当心阶级敌人的破坏，从这儿，他就多了个心眼。每次上工下工，人前人后，山头水边，他都睜大眼睛多看几眼，竖起耳朵多听一听。这天，他們小队里几个人耪地耪晚了，他又因有点事，收工更晚，正急匆匆地往回走着，猛抬头，見“歪脖子”背冲着自己象在干啥。他心想：怪呀，平常太阳两三丈高他就收工了，今天怎么这样积极？准是搞什么鬼把戏！于是，故意不走正道，繞到了“歪脖子”背后的楊树林子里，見他真是搞开了破坏，于是跑出来抓住了他。

赵連春把“歪脖子”带到了大队部。“歪脖子”立刻又裝出一副窝囊相，嘴扁着、头垂着、腰弯着，就象要倒下去似的。等到王国藩和杜奎一盘問，他結結巴巴檢討认錯了，并狠狠罵自己是老糊塗。

王国藩說：“你一点也不糊塗，清楚着呢！你是盼变

天盼得急眼了！”末了，他意味深长地提了个問題：“蔣介石要反攻大陸了，你有啥意見？”

一提到反攻大陸，“歪脖子”的六神七窍又还魂了。他抑制不住內心的高兴，不覺說出了：“我沒啥意見！”

“你當然沒啥意見！”杜奎吼上了，“蔣介石來，是抹我們的脖子，你們又可以騎到劳动人民头上喝血了！告訴你，天變不了！一生一世，再生再世都變不了！死了你這心吧！從今以後，不准你亂說亂動，由生產隊監督你劳动生產，再不老實就法办！”

“歪脖子”的臉又象死灰一樣了。

賊六子

陳青山

老六王繼亭，是有名的尖刻鬼，人們便都叫他賊六子。

賊六子和人共事，挖空心思占便宜，對待家里的長短工，更加吝嗇苛刻。人們提起他來都恨的咬牙切齒！

半碗炒倭瓜

這年夏天，兩個長工在南院的榆樹蔭涼下吃午飯。賊六子走過來，假笑一声說：“今天干的啥活呀？”

兩個伙計哼了一聲，暗罵道：“肏他媽的假裝親熱，哪天你不到地里偷瞅着我們！嗯，我們一不偷，二不摸，你白來這一套！”

賊六子的两只賊眼，早盯上了桌上的菜碗，用鼻子聞了聞，馬上皺起了眉头，生着氣，匆忙地走了。到屋里便大喝大叫地质問老婆：

“誰把炒倭瓜給他們吃啦？”

他老婆看了看炕上的飯菜，陪笑說：“大米飯燉肉不

想吃，又想吃炒倭瓜啦？”

“我不想吃就給了他們嗎？”

“嗨，那半碗炒倭瓜是昨天晚上剩的，都有味了，不給他們吃了，也得扔在泔水缸里喂豬，這還值得上这么大火。”他老婆解釋着。

賊六子一屁股坐在太師椅上，用力甩了一下胳膊，說：“真混賬！扔在泔水缸里喂了豬，不多長肉嗎！平白無故地給了伙計們，成什么體統！”

他老婆見他越說越氣粗，也瞪起眼睛，將腮幫子鼓了鼓，想同他吵一頓，但想起這碼事情的經過，却又胆小了。因為她把這半碗炒倭瓜給長工們吃，也並非慈心善舍，是她出于這樣一種打算。前些日子，他娘家的哥哥趕着車到三屯營集上去賣糧食，走在村東的大道上，濕住了。正在愁的不知咋好的時候，兩個長工遇上，幫她哥哥把車擋出來。她知道這事以後，甜言蜜語對長工們說了很多好話。她想：哥哥常年趕集賣糧，說不定還許遇上啥難處，若是再把車濕住了，來找頭爹時，他這翻臉不認人的東西，能幫忙嗎？免不了還得求伙計們去出力。在這種打算下，才把半碗炒倭瓜給的他們。今天她見賊六子氣得眼裏直冒火，就隨機應變地說：

“往年活忙時，你不也常給他們加點菜嗎？我給他們這半碗炒倭瓜，也是為了多讓他們干點活！”

“你這是胡說！”賊六子眼睛瞪得更大了，“現在既不是春種，又不是秋收，給他們加菜有啥用？”

他們在屋里这样吵鬧着，被做飯的費大娘聽見了，抽身走出去，告訴了長工們。長工老常，是個暴性子人，將筷子往桌上一摔，說：

“這是他們給的，又不是咱們要的！好，我找他們去！”

長工張老漢性子穩，擋住老常說：“先別着急……”

老常哪聽勸阻，光着油黑的脊梁，端起盛倭瓜的碗，便大步闖進賊六子的屋子，把碗往賊六子面前一墩，說道：

“我們是凭力气吃飯，不是凭臉色吃飯。這半碗烂倭瓜可是你們願意給的！”

賊六子嗖地站起來，撇着嘴問：“誰給你們的？”

“你家里人唄！”老常瞥了他老婆一眼，“這陣又不承認啦！你們嘴里几个舌头？”

賊六子立刻把鼠眼又盯向他老婆，想把氣恨出在她身上。但又一想，在長工面前鬧起來不大好，另外也不該使自己的老婆太難堪；于是把一肚子的氣又憋回去了，把威風轉向了老常：

“按規矩是不該給你們吃的，你們吃了，还不許說說嗎！”

老常挺了挺胸脯，又要開口，張老漢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插嘴道：

“就算我們不該吃，賠你們一個倭瓜还不中？”

“對，吃你們半碗，賠你們一個！”老常也賭氣地說。

“你們賠——”賊六子拉着長聲說，“說的倒好！菜是

用油炒的，賠我多少油？”

这一下可把老常老張兩個長工氣壞了，朝賊六子跟前湊了兩步，拉開了動武的架式。賊六子老婆一看事情不妙，便立刻裝出笑臉說：

“你們哥倆快消消氣，丫頭她爹的脾氣你們還不知道嗎？有嘴無心，說過轉身就忘了。咱們吃在一块，住在一起，就是一家人……”

賊六子的老婆假仁假義地，連推帶哄把老常他們倆勸走了。轉身回到屋里，對賊六子笑着說：“和臭長工們生什麼真氣！”忙着給賊六子端飯，直勁地說好聽的。

飯後，賊六子把孩子們和他老婆叫在一起，以事後勝利者的神态說：

“你們剛才都看見了吧！把菜給了他們，他們還不領你的情……”他狠勁地噴了兩口烟，旁若無人似地接着說：“我剛記事的時候，老人們就常說——財主和窮人，是水火不容的。這話不假啊！”

兩個閨女聽了爸爸這些治家銘言，不斷點頭敬佩。媽媽在這種情況下，自然也不示弱。她綻起臉，以教訓子女的口氣，但卻沖着賊六子，說：

“這些老道理誰不懂，可也不能叫人家用一勺換咱一鍋呀！春種秋收，都得經人家的手，惹激他們，到時候給咱們一手，也够咱們受的！”

賊六子眼角頓時揚起了幾道笑紋，稱贊他老婆的話有道理。

两缸酱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天上的月亮，照得賊六子家的南当院里明光光的。老常和張老汉正在吃晚饭。

賊六子坐在屋里的炕上，查看着他那藍皮的租糧賬。一边在賬本上写着，一边隔着窗戶玻璃看两个长工吃饭。这是他从那半碗倭瓜事件得到的启示，认为对待长工，不光在干活时要留心監視，在吃饭上也要注意。可巧，真的事情又来了，他見他們两个一边吃着饭，一边叨咕什么，吃完了还把筷子一摔，大声說：“餓死他媽的也不吃你們的东西！”賊六子一听楞了，忙放下笔走出来，一看桌上沒什么意外的东西，除了两双碗筷，仍是一碗咸菜一碗酱。他仔細查看了一下，那碗酱一点也沒有动，端起碗仔細一瞧，是他家的好酱，立刻又勾起了气火。因为他家的酱是两缸，一缸是粗酱，用杂八豆子和粳糠做的，专給长工們吃的；另一缸是細酱，是好黄豆和芝麻做的，专供自己家里人吃的。現在长工們竟然也吃上了好酱，这比上次吃炒倭瓜还不應該。想到这，又用鼻子嗅了嗅，便气呼呼地去找他老婆，指着酱碗問道：

“这酱又是你給的吧？”

“不是我！”他老婆臉一沉，“不信去找他們來問問。”

賊六子沒吱声，忙上厨房去找做飯的費大娘。

費大娘早已惶恐了。因为这酱是她偷着給老常他們

的。当时，老常老張不在，就放在桌上急着到后院去抱柴禾去了，忘了告訴他俩。老常老張呢，吃飯時見是好醬，認為又是賊六子的老婆來收買人心，便賭氣沒吃。

“這醬不是我故意給的。”費大娘見賊六子來問，便按已經想好的主意回答，“是我舀醬時記錯了缸，舀差了。”

賊六子呼哧呼哧地喘着氣，剛要開口，他二閨女趕上來嚷道：

“你這是胡說，你天天舀醬還不知道哪缸是啥醬？不說實話不饒你！”

“老費，”賊六子忽又轉變口氣反問道，“我問你，你在我家做飯給工錢不？”

“給。”費大娘不安地答應着。

“既然我們不白使你，為啥給我們糟蹋東西？”賊六子提高了嗓門，“你吃着我家濕的，又拿着我家干的，還禍害我，就是養條狗，還吃誰向誰呢！你們這群窮棒子，吃上三天飽飯就不知天高地厚了，照這樣明天給我滾！”

“爸爸，揍她！”賊六子的閨女一旁幫腔。

賊六子縮了縮袖子，真的上前要打，手還未落，他老婆趕來攔住，氣鼓着胸，哼了一聲，拿眼斜着費大娘說：

“老費，我們要你這個老婆子做飯，是為的可憐你，若單凭花錢雇人——嗯，比你好的还不是用鞭子趕嗎！這個年頭，三条腿的蛤蟆沒有，两条腿的窮人可有的是。我告訴你，不說實話今天不饒你！去，好好想想去吧！”

費大娘已五十多的人了，被他們全家這一咋唬，連害

怕带难过，心里就象刀剜一样难受。眼含着热泪，仄仄歪歪地走回自己住的厢房里。手握着嘴喔喔地哭了起来，越哭越伤心，眼泪把破炕席浸湿了一大片。

午夜已过，月亮西沉。老常起来喂牲口时，听见费大娘在屋里哭泣。走进屋问清原委，气得直咬牙。回到马棚里，便和张老汉商量起以后对待贼六子的办法来。

费大娘清早起来，照常做好饭，然后端着碗给贼六子他们去舀酱。她一走近两个不同的酱缸，不由地想起昨日的事，心里又难受起来，差一点没栽倒把碗摔了。她扶着门框，平静了好大一阵，当她把缸盖掀开一看，嘿！酱里有一大块猫屎。她愣了一下，解恨地说：“好，也叫你们地主尝尝猫屎什么滋味！”正要舀，心里又怕起来，心想：要叫他们吃了，以后知道，还饶的了我？无奈何，回到屋里实说了。

贼六子一听，气得绷起脸：“你是管什么的，为什么叫猫进去？”他大嚷大闹着，朝门外瞥了一眼，见没有人，便又低声地说：“去吧，把猫屎扔掉，把猫屎周围的酱都留在碗里！”

费大娘照办了。

过了一会，贼六子见老常他们从地里回来吃饭，便端着这碗沾有猫屎的酱，走到他们桌前，奸笑着说：

“嘿，上次为了半碗剩倭瓜，我不该和你们吵，惹你们生气，我的脾气你们知道，有嘴没心，闹过去就后悔，昨天我特意给你们舀的好酱，可是你们不吃，我寻想了半宿，

估摸着你們准是还生我的气，我看忘了过去的事吧！”說着把端的酱碗放在桌上，“我又給你們舀来一大碗，吃吧！”随后吩咐費大娘：“老費，把咸菜和粗酱端走，今天叫他們哥俩光吃好酱！”費大娘把咸菜端走，回来看看賊六子不在屋了，忙把这碗酱的原委告訴給他們。老常老張听了，并不惊慌，也不生气，一边大口地吃着酱，一边乐着說：

“我們比你知道的早，那不是猫屎。嘿！好香的酱！”說着每人又吃了一大口。

这一下把費大娘閑蒙了。

原来，那猫屎是假的。是老常和老張为了給費大娘報仇，夜里用粘泥做好，天亮前，偷偷放在醬缸里的。

“要不，凭咱們这样的怎么能吃上这么好的酱！”兩人吃着又乐起来。

費大娘噴地一声，也笑了。

买 和 卖

賊六子滿以为老常和張老汉吃了他那碗好酱，在干活上会有新的起色呢。可是一連觀察了好几天，也不見效果，并且連個領情的話都沒听见。心里很生气，不住地罵道：“他媽的，还不如把那碗酱喂了猪呢！”

这天早飯后，他想再到地里看看他們干活怎么样。剛下炕，二閨女慌忙地跑进来，說：

“爸爸，你不是爱吃瓜嗎？我給你买来啦，你看看好不好？”

說着把两个大香瓜放在炕上。

賊六子不光爱吃瓜，而且还很会辨认瓜。他拿起一个，用手指先彈了几下，又举到耳边用手捏着听了听，說道：

“这瓜不熟，快送回去！”

“你怎么知道？”閨女执拗地問。

“論办事你还差得远呢！”賊六子說，“若是熟瓜，捏着发脆，听着发空；这生瓜捏着棒硬，听着声死。快送回去另換換。”

他和閨女一同来到大街上。

正圍着买瓜的人們，一見他家父女来了，便都忙让开道，有的还忙打招呼。賊六子怠答不理地走到跟前，把手里的瓜往筐里一扔（差点沒摔裂了）說：

“瓜不熟就卖呀，我們要再挑一挑！”

大伙看他来挑瓜，便都不再买了。因为誰都知道賊六子挑瓜的办法，最少也得挑一袋烟的工夫，非把人家筐里的瓜全摸遍不可。卖瓜的是外村人，不知道底細，认为王家地主亲自来买瓜，还是个大主顧呢，滿臉逸笑地答应着把筐挪了过来。

賊六子把长衫往上提了提，蹲在瓜筐前。举起一个来，到耳边捏一捏，放下再拿另一个。一个一个的連捏带听，又搖又晃，把全筐里的瓜都挑完了，也沒挑妥一个。

于是直起腰，要挑另一个筐的。这一下卖瓜的可吃不住了，炸着胆子說：

“先生，你这样挑法，往下我怎么卖呀？”

“怎么，不許挑哇？”賊六子两手拍着泥土，歪着脖子說，“你做买卖得懂做买卖的規矩，常言說，‘褒貶是买主，喝彩是閑人’，我們花錢买生瓜呀！”

卖瓜人見他要翻臉，只好改口說：

“挑是可以挑，不过你这种挑法……”

狗腿子范泰一旁插了嘴：“你要把眼珠放亮点，抬眼看看是誰在买瓜！六先生城里开着‘德聚興’粮店，成百石的卖粮食还管挑管拣呢，別說你这挑子烂瓜！”說得四外的人們嘆地一声都笑了，因为“德聚興”粮店是賊六子三哥的，范泰为了帮虎吃食，瞎吓唬卖瓜的罢了。

賊六子繼續挑瓜，好半天挑了两个，正要走，范泰嘻皮笑臉地上前說道：

“六先生，王凤山家想求你借点粮食……”正說着，王凤山走来了，范泰瞪了他一眼，“还不快和六先生好好說說！”

賊六子一听說有人借粮，馬上就是另一副神气，瞥了王凤山一眼，随后掏出烟卷，給范泰一支，自己抽一支。这才慢絲絲地吐着白烟問道：

“借我的粮，指着啥还呀？”

“指着地中不？”王凤山害怕地回答。

“哪块地？”

“南山梁三亩坡地！”

賊六子哼了一声說：“就凭你那兔子不拉屎的地？白給我也不要！”

賊六子往外放賬，是要看对象的。你的房和地，他要看不中，死活不肯給你。王鳳山对这点是清楚的。他于是想了一下，轉口說：

“用东西換中不？”

“你拿啥換？”范泰一旁插問。

“用猪糞，俺家養着猪呢！”

賊六子不光对放粮放款精通，对种地也有一套，他知道地里要多打粮食全靠着多上粪，特別是猪糞，和金子一样宝贵。于是把烟卷头从嘴里拔出来，扔在地上，冷笑說：

“嘿嘿，你也知道，眼下离大秋还有两个月，缺粮戶多着的呢！我二斗紅高粱放給誰，秋后他不还我四斗！你說对不？”沉了一下說：“你既然找来了，就換給你二斗吧！可是得說清楚，怎么个換法呢？”

“按市价唄。”王鳳山說，“昨天三屯營集上，是一斗半紅高粱換一車糞。”

“怎么，按市价？”賊六子眨巴一下眼睛說，“常言說：救急如救火，你要換，咱就一斗紅高粱一車糞，不換就拉倒！”說完，抽身要走。王鳳山气得渾身发抖，真想說不換了；但想到眼前的困难，就又强把气勁压下去了。沒等他再开口，范泰早向前拉住賊六子，說：

“六先生，別走，王鳳山是求你的，还不是說了算！”回

头又大声吆喝王凤山：“你还发什么楞！快按六先生說的价答应了吧！”

凤山只好点头。贼六子这才站住，对范泰說：

“好吧！你到南山把老常找来，先把王凤山的糞拉出来！”扭头又对凤山說：

“你回去准备糞，跟着糞車取粮食。咱们是糞到粮走，手續要清。”

傍晚，家家正在吃晚饭的时候，凤山跟着拉糞的車到王家大院。贼六子叫范泰和老常卸糞車，他自己进了粮食屋。凤山站在門外等着他，他順贼六子的背影往里一看，嘿！一个挨一个的大糞筐，都頂着房頂，啥粮食看不見。只見筐脚前放着两个大籬筐，里边盛着滿滿的高粱。贼六子拿起一个木鍤，往籬筐里攪和什么。凤山想上前看个究竟，但贼六子拿了两个斗走了出来，把斗放在門前又进去了。凤山一見这斗，不由暗想：都說他家买粮食用大斗，卖粮食用小斗，莫非就是这两个斗？这时他顧不得再看糞筐了，只顾歪着脖子打量这两个斗，但看了半天看不出大小来。他奇怪：两斗的高、寬都一样，柳条的颜色，边沿上的木板也一样，上边都写着“德善堂”三个大字。难道人們說的那大小斗不是这两个？他正发疑，贼六子又走出来，弯腰提起一个斗，說：

“走，屋里过粮去！”

凤山不光是沒弄清斗的大小，屋里高粱的好坏，他也沒弄清。原来贼六子这两籬筐高粱，一籬筐是成实的，一

籬筐是粃粒的，那成实的是专在市場上卖的，那粃粒的是专准备村里缺粮戶来买粮时往成实高粱里搀的。剛才賊六子为給凤山換粃高粱，故意叫他认斗，避开他的注意。这时，他把粮食过好，将凤山領出来，还故意假装近乎地說道：

“若不是你，誰买粮食能到我粮房里来挑呀！……”

凤山背着粮食剛走出几步，迎头老常和范泰来了。老常心眼实在，最同情和自己一样的穷苦人。他上前小声問凤山：“剛才过粮食，你看清是用的哪个斗？”

賊六子正在鎖粮食屋的門，老常的話都听见了。他嘎叭一声，将門鎖好，回过身来答道：

“还用問嗎？給凤山过粮食，还能用小斗？剛才两个斗都让他看了，是他挑的。”

凤山本来就对賊六子信不住，一听这些話，就觉出有文章来了，忙問老常：“这大小斗，到底咋分辨？”

老常皺着眉头反問：“你沒看見斗邊是咋样嗎？”

凤山楞住了。因为他看斗时，光看的外表，其不知秘密却在里边哩：大斗沿薄，小斗沿厚，比大斗多一层板，……这些，不光凤山看不出来，村里好多人都摸不透底細呢！不想今天被长工老常說漏了，賊六子气得肚子崩崩脹，当下真想踢老常两脚。他拍拍身上的尘土，一手提着长衫大襟，一手叉腰，拉长声音說道：

“嗯——說明了也好，这二斗高粱是用小斗过的，你該把我怎么样吧？这大小斗是我家多年来的規矩，难道

因为过給你这二斗高粱就另改章程嗎？再說，是你趕着來求我的，嫌吃亏就放下！”說完擦了擦前額上的汗。

狗腿子范泰見主子擦汗，把脖子一歪，對王鳳山說：

“你老大不小的了，別不識抬舉！六先生為了周濟你，累得出了一身大汗，要算工錢的話，你該給多少？”

鳳山氣得青筋直跳，想放下口袋和他們拼命干一場。不過又一想，在人家掌管的天下過日子，胳膊擰不過大腿去。再說家里正等着吃糧食呢，无奈何憋着滿肚子的氣恨走了。

謀 田 記

傍年根是賊六子最忙的時候。債戶們有的交本，有的歸利；還不起債的托人來說情，過不了年的找人來求借。他們大院從早到晚總是人來人往。

一天，賊六子正在眨巴着眼皮，翻帳本，打算盤，思謀着如何吞占窮人家的產業，王玉老漢還錢來了。別人來還錢，他眉歡眼笑；王玉老漢來還錢，他心里可打了死結，頓時就同霜后的野草那樣蔫巴了。賊六子沒心拉腸地數着錢，不住追悔着這幾年在這塊地上所費的心機。自从把王玉老漢西大道這七畝好地的文書存放到柜里之後，雖然王玉老漢還種着，他却早已作好了種種打算：要把這七畝地和自己兩旁的二十多畝地連成大片，耕種方便，外人說來也排場闊氣。春天地里苗出不全時他暗中擔過心；

夏天雨后誰的大車从地头輦过去，他曾吩咐长工們平过車轍。想不到老汉一家沒命地苦熬苦掙，利錢年年清不說，如今連本錢也归还啦。但他的賊眼皮眨了一陣以后，立刻有一个阴險刻毒的賊主意出来了。

“好吧，你信用還不錯，往后缺錢时再来取，”說完就将数好的銀元和銅子“嘩啦”一声收起来。打开他那油漆堂亮的板柜，拿出那張借契递给王玉老汉。

王玉老汉用干硬的大手打开一看，吃惊地說：“六先生，这光是借契呀，我那地契文书呢？”

“嘿，王玉大叔，”賊六子湊到王玉老汉跟前，冷笑道，“我这几年事情忙亂，不小心給你丢了，等找着給你送去，好不好？”

“啊！”王玉老汉急了，挺了挺胸說：“这不中，我連利帶本如數不欠你的，你不給我文书，不中！”

賊六子被債戶这样的頂撞，大約从他生来还是第一次。可是人家为什么叫賊六子呢，就是因为这样狡猾。他不但不觉得难堪，反而裝得比剛才更老实了。他又低声下气地叫了声大叔，說：“这文书我是不該丟，可是常言說：‘杀人不过头沾地’，咱們是一个王字沒掰开，就算这地契文书找不見，我能亏待你嗎？我三頃多地的文书由你挑，可以不？”

賊六子这軟一套硬一套的办法，就把王玉老汉应付走了。他閨女惊惶失措的打听：

“爸爸，你怎把文书給他丟啦？”

“丢就丢唄，穷棒子他能把咱怎的？”

“不如賠他一块地，在他跟前說小話！”

他老婆心里可有底，一边往头上抹着桂花油，一边答茬說：“你們这群傻东西，心眼可倒实，”冲賊六子一撇嘴，“是真丢了嗎？”

賊六子得意地微笑着点点头，从一只精致的小木盒里把那張陳旧的地契文书拿出来，在子女們眼前晃了晃，高傲地說：“成事在天，謀事在人。天下有王繼亭在，西大道这块地是跑不了的，嗯，这文书嗎，它永远不能登他家的門口啦！”

年后的正月初五这天，賊六子就把狗腿范泰找来，商量謀算王玉老汉西大道这块地的办法。一是把王玉家欠錢的戶都串通好，一律縮短他还債期限；二是留意王玉家发生的事情，不論是天災人禍，凡是他借錢的时候就插手，宁可降低利息也要爭过来。可是王玉老汉一家呢，仍然是开荒的开荒，打柴的打柴，全家老少更加勤勞起來，很快就把外債还清了。生活上虽然缺吃少穿，可是吃糠咽菜也沒借外債。一晃过了三年。

这年时局很不稳定。长城一带，一会說归东三省管，一会又說归直隶省管。上边动荡，下边自然不安定，今天十村为一乡，明天八村为一保的乱改动。各村的地主虽然掌握着各村的大权，但他們怕时局的牵連，都不願出头了。賊六子就借这个机会，鼓动着把王玉的侄儿王凤岐用上当傀儡保长。为了进一步陷害王玉老汉，还叫王玉

当他侄儿的保人。然后又叫腿子范泰等同王凤歧鬼混，第二年冬就差了不少的官款。贼六子这回有机可乘了，立刻把狗腿范泰等一伙人找来商量。

李顺说：“按着差官款的罪过，准叫他蹲大狱。”

“光蹲大狱对咱有好处？还是叫他赔款！王凤歧是穷光蛋，王玉是保人，赔款得冲他要！”范泰给李顺解释。

“对，我看六先生明天你就进城！”李顺也赞同了。

贼六子连抽了好几袋烟，末后说：“事情不象你们说的这么容易，这事比不了收租放债，非经县衙门不可！”

“按六先生说，事还能办成吗？”

“嗯，”贼六子点点头，说：“当然能，光我办有难处，得求老爷子抄手，他老是全县的绅董，只要他给县长写封信，或者拿上张名片，管保易如反掌。”

他们正说着，贼六子他爸爸来了。一伙人立时都站起来，毕恭毕敬地打招呼。王思善这家伙坐在椅子上，捋捋花白的胡子，朝贼六子问道：

“刚才我听你们丫头妈说，你要同王玉他家打官司？这好说。一会我给县长写封信，明天叫范泰送去。不过……要闹就得闹个样子，无声无响地犯不上，事情不在王玉他那块地上，这有关咱王家的名声，知道不？”

“是，是……”贼六子连声答应着，他爸站起来又吩咐了几句，往外走了。

第二天早晨，范泰带上信骑驴上城里了。第三天，从城里来了两个班头。进村先打听王凤歧。有人说他和李

順趕集去了。两班头就直奔王玉老汉的家里。王玉老汉正在当院干活，一見两个班头来找，立刻吓得不知咋好，張口結舌地把人家让到屋，一面打发家人燒水，一面給人家裝烟。俩班头开口問道：

“你叫王玉嗎？”

“是。先生。”

“王凤歧當保長你是保人嗎？”

“是，他还是我的侄子。”

俩班头挤了挤眼，从腰掏出一条铁鏈，“噠啦”一声，套在王玉老汉的脖子上，“嘎”的一声鎖好，說：“王凤歧吞食官款應依法辦理，你是他的保人，走！”

王玉老汉立刻面如土色，嘴唇顫抖着說不出一句話，只好被班头牽走了。

王玉一家人有的哭叫，有的去找亲朋近邻帮忙說情。不大会院里就挤了个人山人海。帮忙的人担心王玉老汉胆小嘴笨，把官司打輸，所以就叫他另一个侄儿王凤明到县衙去帮王玉說話，随后又找說合人，准备进衙去保。

賊六子吃了早飯，听范秦叙說了进城的經過之后，早料到这一着。他高高兴兴地准备起第二步来了，穿上一件深灰色的长袍，外套一件黑馬褂，褲角上扎了一副黑色的新綵帶，脚上穿上一双沒沾尘的云子帮棉鞋，戴上他专为走南闖北戴的紅疙瘩綵帽盔。混身上下換好之后他手扶門框吩咐閨女：

“二丫头，你把狗叫到南当院，待会来人找我的話，先

告訴一声，再叫他們进来。”

賊六子一切准备好后，就守着炭火盆抽起烟来，不大会，他們的大黃狗汪汪地咬起来，一群人来找賊六子，被他閨女擋住在當院。半天賊六子才發話，叫大伙进去。

“六先生，庄上這老几位為王玉的事來求你啦。”范泰先開腔。

賊六子哼了一声，沒有回答，眼瞅着火盆“叭噠叭噠”抽烟。

大伙有点着急了。“老乡亲摊上事，還是六先生管管吧。”有的說。

“王玉這事，得經縣衙，非六先生出面怕不中。”有的补充。

“對，六先生帮一把吧。”末后又有人央求。

賊六子扭過臉來，朝大伙哼了一声，仍沒言語，两只鼠眼睛緊盯了會王鳳山，才說：“按眾位的請求，我當然要幫忙的，我王繼亭也是向來以助人为樂。不過……這事情是王玉他們家的，他家人不說話，別人說了算嗎？”

人們這才明白——他是嫌王鳳山沒有開口求他。几个人忙圓解說，“六先生，他年紀小，又沒處过事，我們臨來時他媽一再告訴，叫六先生看着办。”

“若这么說，還象話，不過……”賊六子仰臉瞅了會屋頂，接下去，“不過得糟一笔錢啦，他家认可嗎？”

人們又捅了捅王鳳山，王鳳山才叫了个六先生：

“只要我爸爸回来，花多少錢都中，或房子或地，众位

看着办。”

“好吧，”賊六子这才露出一副假笑，“事情既然这样，我立刻进城，就算踏火坑我也不辜負众位的情面。”

賊六子叫人套上車，帶着范泰、李順进城了。到城后先到他三哥“德聚興”糧店落腳。午飯后買了一些禮物就到縣衙去拜望縣長。縣長一見紳董的六兒子來了，又拿了禮物，自然親自出見，寒暄一陣之后，告訴他：王玉在獄押着，他侄王鳳明散押着，只要把官款算清，什么时候出去全可以。按這案子本可就此了結，可是賊六子有三個想法：一、案子若完的這樣快，花錢太少，王玉西道那塊地不能到手；二、今天來明天回去，庄里人們認為這官司好打，顯不出王家的威風；三、自己常年鑽在帳本里，來城里的時候不多，若趁這個機會逛蕩幾天不但花不着自己的錢，還顯得事情重要。他就根據這三個道理大干起來了。從縣衙出來的當天晚上，就聯絡一批狐朋狗友，有衙門里的，有商會上的，有左近村的，白天在北街“北平飯店”的小樓上，肉山酒海，划拳行令。晚間有的去看戲，有的去賭錢，有的抽大煙，有的去逛妓女院。賊六子因為和城根一個外號小白鞋的妓女有點旧交情，所以就住在那里。他這次由於不花自己的錢，手頭大，比過去住的更熱呼了。一連幾天，連屋都不出。腿子范泰催他，他推托事情沒完，叫李順先回家照料一下家務。

李順這個狗腿雖然壞水不少，但比起范泰來水平還是顯得很低。他回家見了賊六子老婆便大吹起來。他敘

說吃喝排場還不要緊，把賊六子住小白鞋也夸耀出來了。賊六子老婆呼地一下瞪起眼睛，冲李順的臉“啐”了一口，罵道：

“怪不得你們總不回來呀，原來讓那個女妖精迷住了，走，咱們找他去！”

李順鬧了一臉唾沫，又惹了一身禍，抽身就往外跑。“站住！”賊六子老婆喊住他，吩咐道：

“快把驴牽出來，跟我进城！”

李順沒辦法將驴收拾好，賊六子老婆騎上，他跟着，一同往城里去了。他們主僕二人走到半路，碰上了賊六子和范泰這主僕二人回來。他老婆二話沒說，見面和麻雀鉗架似的一陣亂吵亂鬧。賊六子見事不好，跳下車舉拳要打，抬头一看，來了很多過路人，不由暗想：在這場合打起來，有失自己的體面，於是便又跳上車一聲不吭地往家走。范泰和李順都你一言他一語地勸解，從半路一直勸到家，看了看日頭，已經平西了。

晚上，當人們都睡覺的時候，賊六子將門關緊，然後脫掉他的馬褂和長袍，換上貼身的小棉祆，鼠眼一立楞，說道：

“我為交朋友完事情，嫖娘兒們，你敢怎的？”

他老婆一看賊六子惡狠狠的凶相，立時把醋勁吓跑了半截，沉了半天，才小聲說：

“你為辦事和娘兒們好，我不嫌，可，我怕你……”沒說完便趴在柜上嗚嗚地哭起來了。

賊六子一見老婆哭聲不止，勁頭也小了，為難地咂了咂嘴，想上前去勸，剛走兩步，復又轉回來，打開剛從城里帶回的小布包，拿出一双粉紅色的女祫和一瓶長脖細嘴的香水精，往他老婆跟前一放，拉着長聲說：

“你看看，我走到天涯海角也惦着你！”

他老婆當即止住哭，慢慢直起腰，向兩樣東西瞥了一眼，又扭過臉，埋怨說：

“誰叫你買這個，不知道花錢？”

“嗨！要不說你糊塗，”賊六子湊近她耳旁，小聲說，“若花自己錢那還叫辦官事。”他老婆一把抓起祫子和香水，在燈前擺弄着小聲夸贊了一陣，醋氣也就消了。

這一夜下了挺厚的雪，第二天賊六子還在被窯里，范泰就領一群人來了。

賊六子老婆將人們讓到西屋之後，便到東屋來催賊六子起床。賊六子故意不慌不忙地洗好臉，吃好飯，才招呼人們來見。這仍是上次找他进城的那群人，所不同的就是少了个王鳳山，換了个王玉老漢。大家進屋後，先向賊六子道了一陣辛苦。接着還是范泰先說：

“六先生，今天王玉老叔親來向你致謝，另外也來算這次的花費。”

賊六子守着炭火盆，邊喝茶水邊說：“這官司，真叫棘手啊！差不多我把全縣的朋友都求遍了。”

這群人明知道賊六子奸滑，但人保出來了，總得說几句好話。有人贊道：

“哎，打官司就是玩命，沒听说官法如炉！”

“六先生的心意我家永远记着，不知这回花了多少钱，请算一算吧。”王玉老汉结记着钱的事，等不及，先提出来。

范泰上炕坐到贼六子旁边，拿起一张纸单念了起来。什么给县衙里这个官送礼，给那个官买东西，請这个紳士吃饭，請那个紳士打牌，还有什么說合人洗澡、抽大烟、看戏，再加上賠官款等等，最后大声說：“共花大洋二百元。”

王玉老汉长出了一口气，耳旁“轰”的一声，头就昏了，身子晃了晃就要摔倒，大家忙扶住他，劝道：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财是死的，人是活的，财去人安嘛！”

“.....”

贼六子說：“你們看，当初我就怕有这难处，你們一定叫我去办，結果他还是怕花钱吧！”

王玉老汉强打精神往前走了一步，对大家說：“諸位看着办，我有房有地！”說完，老泪花花地涌出来。

“你打算先卖哪块地？”范泰問。

“哪块都中。”王玉老汉答。

贼六子伪善地又叫了声大叔，說：“你別上火，咱既然站在一个王字上，我还能叫你餓着。你卖地或者卖房由你的便，这二百元錢得尽快归上，因为这是我从城里‘德聚兴’摘借的，不过，你西大道那七亩地，最好还是給我。一来我不少給你錢，二来前几年你借我的錢时我把地契

文书給你丢了，为这事我觉得怪对不住你。你看咋样？”

大伙又說了一陣，王玉老汉不同意也只得同意了。王保仁写好了文书，又叫王玉老汉在贼六子这黑紅明亮的炕桌上，捺上了手印。事情就这样算办妥了。王玉老汉搖搖晃晃走出王家大院时，大雪被橫風卷得到处乱飞乱滾，嗆得人出不过气来。

贼六子見人們都走了，便从柜里找出四年前王玉那地契文书，連新写的文书一起压进小木箱里，对着窗外茫茫的大雪，伸了个懶腰道：“啊，真是瑞雪兆丰年！”

烟 酒 宴

贼六子通过这次进城，更觉得出人一头高人一等，认为我王继亭不仅是守着算盘子发家治业的能手，对于进县衙混官面也不落下风了。这个阴險狡猾的家伙，办完这碼事，得意非凡，到他父亲那边討好去了。

他老婆通过这一夜追根問底，知道贼六子并沒有真正的喜欢小白鞋，醋勁便一消而散，美勁便增加了，拿起她那脂粉和香水，重又装扮起来。她正对着大鏡子左擦右抹哩，他大嫂来了，撇嘴长声地訕笑說：

“汉子剛买来就擦起来了啊？”

“哦，嗯……”贼六子老婆扭过臉，“誰擦呐，我是試一試！”

“咋不好呀，我有这么个好汉子的話，也擦。”

“得啦，你那汉子賴？”

“唉，別提啦。”

賊六子老婆見他大嫂說的不愉快，便郑重地問：“我大哥又惹你啦？”

大棒子的老婆先落了坐，沉着臉說：“前天有東村老王家托人來賣地，你那大烟鬼哥哩唧噥地不緊辦，結果鬧的人情也遠啦，地價也高啦。”

“你說了半天，這是什麼呀？”賊六子老婆問。

大棒子老婆又說：“你這快嘴娘們耳朵這麼聰明啊，東村老王家在咱們村西不是有四十畝地嗎，因為和我們的地挨邊，說賣給我們二十畝。你說這有多好，可是你那廢物大哥沒有上緊，叫咱們老二知道了，他也沒和你大哥商量，暗中給人家每畝加了十元，誰知事情都沒辦妥呢，老三又從城里派人來，又給人家每畝加了十元。人家賣地的戶一看咱搶着要這地，就開口閉口要賣高价。按理說這地我們就不應再買了，可是你那烟鬼大哥也上火，認為他們不仁我們也不義，說啥也要買。六嬌，你看鬧得這象話嗎？唉！”

賊六子老婆邊聽邊着急，我們為王玉西大道這七畝地，費了多麼大周折，又打官司又告狀，連漢子險些都被別的臭娘們粘住了。他們却不聲不響得了個二十畝地的賣主。她把腮幫子鼓了几鼓，想要插嘴，但一想賊六子主意比自己多，就不敢過分逞能，只說了句：

“嘿，大嫂，可甭生這份氣，發家置產的大事情，還是

多听男人們的好，再說亲哥們爭斗也不應該。”

大棒子老婆还以为是老六家同情懂理，又扯两句別的，走了。她出去不大会，賊六子气冲冲地回來了。到屋噘着嘴說：

“糟啦，咱这趟門出的喪氣。”說完“咕咚”一声躺在炕上。

“你这是又生誰的氣？”他老婆問。

“听爹說，东村老王家要卖地二十亩，大哥二哥和三哥都要买，唉，这样咱們沒指望了。”

他老婆一听他是为这事懊喪，故意在柜上拾掇了会东西，然后坐到炕沿上，把他大嫂剛才說的話，全倒了出来。賊六子原以为这二十亩地非落在他大哥手下不可，但听老婆这一說，知道自己还大有指望，嗖的坐起来，吩咐他老婆：

“你赶快操办一桌酒菜，我去請客人。”他老婆还在楞神，他匆忙地跑了。

他老婆只得同两个閨女和作飯的老費，立时張罗开了，一直忙到晌午，酒菜总算备好。賊六子領着大棒子哥哥和东村卖地的破落戶老王来了。賊六子让客人落了上坐，自己坐在側手，把着大底細脖的錫酒壺作陪。大棒子是烟鬼又是酒簍，东村这卖地的老王更是吃抽如命。这三个湊在一起，真是狐狗相会，他們既沒划拳，也沒行令，推杯換盞地死喝起來。喝到八分醉的时候，賊六子有意先說起他这次进城，遇到有的朋友怎样愛抽大烟，抽足大

烟后又怎样肯慷慨帮忙别人等等。一下子把大棒子的勁头提起来了，他撇着大嘴說：

“老六，我当哥的可不是願叫你入大烟这个嗜好，不过抽大烟的人确有这个特性，只要为朋友，真敢說两肋插刀。”东村卖地这破落戶也勁头上来了，他端着酒杯朝他俩让了让，一飲而尽說：“我这次卖地，”用手指比了个抽大烟的手勢，“若不为这个，为啥先卖給大哥呢？”

賊六子抿嘴冷笑着又让了一杯后，便从腰中掏出他剛准备好的一个小紙包放在飯桌上，“格支”一声打开說：“大哥你們看，这是我这次从城里大烟館特意給你們买的。”

“啊，这是多少？”大棒子惊讶的問。

“小意思，二两。”賊六子又补充两句，“我是外行，好的話还有改日。”

大棒子同这卖地的破落戶忙放下酒杯和筷子，用舌头在大烟上舐了舐，滴着馋涎同声說：“嗯，純膏！純膏！”

賊六子見他俩拉出馋涎，便又发动了一陣劝酒的高潮，話就归正題了。他用为难的样子說：

“大哥，我地虽比你多，但大部分是山坡河套，真正土质肥壯的沒多少，老王既然要卖地，先給我怎么样？”

大棒子沒吱声，放下酒杯忙抽烟。卖地的破落戶忙显示說：

“村西我那是祖业四十亩，不管卖給你們哥俩誰，挑一半給我留一半就中。”

賊六子見這人總夸他的地好，大哥又沒慷慨地吐話
答應，從心里有點反感，但還不死心，隨口便說：

“你那地是不錯，可正因為好才賣給大哥婆，不過我
知道大哥你倆的脾氣，都是舍己為人的人。”說完又把三
個酒杯斟滿。

大棒子喝下這杯酒後，用手背擦了一下嘴巴，酒意
不清地說：“好，老六你——既——提出來了，就讓給你！”

賊六子心裏“咚”的跳了一下，又裝作鎮靜的樣子，
問：“大哥的性氣我知道，辦事是個急性人，今晚就寫文
書過錢，中不中？”

“可以，可以！”

這頓中午飯一直吃到日落西山，賊六子一面叫他老
婆繼續操辦晚飯，一面把大棒子的大烟家具端了上來，連
大烟帶茶水，就來了个車輪戰。賊六子又叫這倆烟鬼過
足了煙癮，便謹慎小心地先向賣地的破落戶試問：

“你那塊地共多少？”

“不多不少四十畝，賣給你二十畝，還剩二十畝。”

“你給我哪一半好哇？”

“南邊頂大道，北邊挨着你大哥的地，你要哪邊都
中。”

“是呀！”大棒子酒氣渾迷的說，“那地我——知道，沒
軟沒硬，很平，你挑哪邊——都一樣。”

賊六子一聳肩冷笑着想：抽大烟的人當賣家產，如開
春化冰，他這回賣這二十畝，早晚還得賣那二十畝。我若

要了南半块的話，北半块和我大哥的地挨着，下次他要卖，免不了还要麻烦。我这次若先要他北半块，就等于插在他俩的中間，他不論啥时候再卖，我可就近水楼台喽。想到这里，对他大棒子哥哥說：

“大哥，我还是要北半块吧，我好和大哥的地挨着，因为大哥素常的秉性我知道，一向对种地不爱过問，我呢，操心惯了，你的地經營的有个到不到的，我照料方便些。”說的大棒子呲着滿嘴的黑牙乐了。于是他又对卖地的破落户說：

“我虽和大哥的地挨着，可不是外道你啊，从今后咱俩就是隔壁啦，麻煩你的日子，嘿，往后还能少嗎？哈哈……”

賊六子說笑完之后，他們三人同声又笑了一陣。在这笑声中，狐狗分手了。

这一席烟酒宴花的錢，賊六子自然不肯自己掏腰包。当天晚上，他就着煤油灯，打着算盤，阴險地計劃着如何把糧增加，让穷仙戶加倍偿付这笔額外的支出。

“狼崽子”

幼江

—

老四王俊原象一头困在陷阱里的狼。当他一个人抽足大烟躺在炕上默想的时候，是可以咬鋼吃铁的。他会逐一的把几个兄弟都比得不值一文錢。老三算什么？米蛀虫！最多也只有一手投机倒把、高利盘剥的本領。分家以后十多年間买进了六、七頃地，成了这一带头号大地主实在不稀奇。要是換作自己，嘿，手段定还要高明。老六算什么？賊奸鬼滑，剔牙挖碎，实在小器。虽然买了三、四頃地，成了村里第一尊大佛，但毕竟是小和尚念經，道行欠到。老大和老二，自然更不在話下。可是等到大烟癮一上来，就什么都顧不得了。大烟枪屁股象个无底洞，每年四五十担租糧，被悄悄地、无声无息地裝了进去。正因为他家后面开了这个大口子，隨填隨泄，家业始終象老烏龟爬路，旺发不快，只有一頃多地。

狼窩里終于养出了狼崽。他的儿子王維平，眼看二十好几了。这东西橫眉豎眼，蛮干霸道，超过他爹；內藏奸詐，蓄意害人，胜过他爷。

这是从小惯出来的。

好多年前，王維平还小，有一回，他暗下从箱里把他爹好几块錢偷出去花了。大烟鬼一发觉，不分青紅皂白，就怀疑是家里的放猪娃小黑干的，把小黑剥光衣服，跪在石头磙子上，要他招认。小黑自然不认，尽管两膝盖上鮮血直淌，还是一口一个不知道。王維平站在一旁，瞪着小眼珠，忽然上去狠狠一脚，把小黑踢翻了。大烟鬼很欣賞儿子这一脚，认为踢得有力气。末了，小黑被赶走了，儿子却得到了加倍的信任。

又一回，老爷子請了一批和尚来念經，說是要超度什么上代人的亡魂。中午，这批老和尚正在張嘴咂舌大吃素斋时，想不到王維平溜到法坛里，举起鼓槌“蓬蓬”几下，把大鼓敲了个洞。等到老和尚聞声赶来时，人早跑了。有人指指点点說是他鬧的，他却歪着脑袋，叉着两手，蛮不讲理的說：“誰亲眼看見的？真是我敲破的嗎？胡說！”老爷子站在一旁，很欣賞儿子的霸气，末了摸摸胡子說：“我那維平看来是不会！”老和尚找不到禍主，只好自认晦气。

地主家的子弟長成以后，飽食无事，哪有不尋花問柳的。一天，王維平正在村口閑遛，看見有个年青俊俏的媳妇迎面走来。她虽然衣着破旧，头发蓬松，一脸哀怨，脚上还穿着替丈夫带孝的白鞋，可是就象山上的刺儿花一样鮮亮。王維平立即迷住了，心想：这娘們不錯，比咱家那黃臉婆强多呢！就不远不近跟在了后面。

这个年青寡妇姓張，在东村住。她前脚剛进门，王維平后脚也跨了进去。張寡妇善良軟弱，抹不开臉，明知道这头狼崽进来不会有好事，但还是笑笑打招呼：

“大兄弟今天有空来串門？”

“嗯！”說完，他連鞋也不脫就跳上炕去坐定了。

張寡妇有意冷淡他，拿起針綫納鞋底。可是王維平却沒事找事，东拉西扯，眼看天快黑下来了。張寡妇有点着急：“大兄弟，家里怕等你回去了！”

“不碍事，就在你这儿吃吧！”

“我这里啥也沒有呢！”

“吃啥都行！”

張寡妇还是磨磨蹭蹭不想动手。王維平忽然死皮賴臉地几步跨上前去，夺下她手里的鞋底說：“怎么？吃頓飯都舍不得？明天加倍还你还不行！”这种拿錢勢压人的話，立即象蝎子一样把她的心螫痛了。她呆呆地站着不知該怎么办。

王維平看到有机可乘，不管有人无人隨着就是个大摟腰：“不做飯，陪我坐会儿总可以吧！”

正在这时，他老爹王俊原掀动門帘进来了。大烟鬼正过足烟瘾，兴高致濃，一眼看見这个場面，鬼臉立即气青了：

“他媽的，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王維平开始的确有点尴尬。他真想不到这么一个标致寡妇，居然被他爹搶了先。他想走开，但不服輸，偏又

站住了：“吃頓飯都不行嗎？”

“吃飯？家里吃去！”他爹隨手在門后拿了根頂門棍，眼看就要打過來。

王維平平时虽说还有三分怕老子，但在这个时候，怕字早挪到一边。他搶先把一碗茶水潑了過去，潑得大烟鬼的新大褂上斑漬一片；跟着又把炕桌一掀，骨碌翻滾在地。等到大烟鬼神清志定真要動武時，小雜種早溜了。

這桩丑事過去不久，一個早晨，大烟鬼正在吱吱燒着烟泡，小雜種進來了。

“爹，前天賣谷子的一百二十元錢，你拿出來，兩頭老佟家二亩三分好地要出，說好由咱家買。”

大烟鬼不吱聲，因為這一百二十元錢里，他已經瞞着家里人買了四十多元錢的大烟，要全部拿出來不可能。同時他更知道這分明是小雜種故意找茬。

“爹，你拿不拿出來！”

“不用你管！”

“我偏要管！”小雜種已瞪起了虾蟆眼。

“他媽的，你真要管嗎？”大烟鬼說着就把放在大烟燈旁邊的一個水碗拿起擲了過去。

小雜種把頭一偏，水碗飛過頭頂，把放在立櫃上的玻璃鏡咣啷一声打個粉碎。

這一回，小雜種是有準備的。他趕緊退出去，一会儿就拿來一支大槍，咯嚓一声推上子彈，對準他爹：

“你拿不拿出來？說！不說就毙了你！”

大烟鬼这回可怔住了。他手里有啥呢？只有烟枪！烟枪怎么能和大枪对打呢！他原来就蜡黄的臉，立即变成了死灰；原来就有气喘的病，眼下更是上气吊不起下气，挺在炕上象段僵尸。

幸好大烟鬼那瘦得象干藤一样的老伴，和王維平的黃臉婆全聞声赶来了。婆媳俩一个拉一个劝。

“你这还象个人样嗎？对自己老爹能这样嗎？”“干藤”显然袒护着自己的老伴。

“你別生气，老人不对，咱有話要好好說呀！”黃臉婆显然袒护着自己的新伴。

一家人拉拉扯扯把王維平拉到了屋外，但是王維平用力一掙把他媽和他媳妇全掙到一边，又冲到门口，对着屋里大声吼叫：“告訴你，再迷着你那臭貨，家里掏空了，把你老骨头拿去喂狼！”

从这回以后，王維平更加得势，把他爹踩到了脚底下。一两年以后，他爹连病带气，老命归阴了。

二

死了老爹，王維平自然更抖了。他家原来除去吃租子以外，还自种六十多亩地，雇了两个扛长活的，直接从他們身上刮油榨水。他一当权，又雇来个十五六岁的小子叫小臭，燒火、做飯、割草、喂驴、放猪、推碾……有时自己排排場場地出去，还得跟在后面拿皮包当勤务兵。活

計排起队来，比他的岁数要多得多。每天从鸡叫忙到鬼叫，工錢是每年六元，几乎只是白吃饭。

他是一心一意想当官的，瞧不起六叔一个銅板攥在手里打三拳不放的熊样，也瞧不起同輩份几个叔伯兄弟王維藩、王維田等的碌碌无能。要当官，就要建立起“威信”，他在这一点上开动了脑筋。

那时候，四十里鋪村百几十户人家，除去少数富农、中农以外，绝大部分住的都是七倒八歪的茅草屋。只有王家大院灰楚楚的大瓦房蹲在中心，风不摇、雨不动，张嘴舔舌象只黑老虎。在它左边的一間破草屋里，住着王功一家。老两口都病着，三四个男孩女娃饿得哇哇叫。一天，王維平路过看到了。他脑子一轉，有了主意，一到家，放开粗嗓門，象打鑼一样吩咐长工打头：“老常，快把咱小米灌一斗，送给老王功家，老东西病得头浮脚肿不象人样了！”老常一向十分精明，主人家的一举一动，他都能察出要的是啥花招，这一回，也鬧迷糊了。但向自己的穷伙計送粮，总是好事情，他于是量了满满一斗，装了一口袋背在肩上就想出门。迎面被黄臉婆拦住了，“老常，你慢点！”

黄臉婆是滴水不漏的管家婆，平时待长工連园里拔根大葱都舍不得，过年过节给长工吃碗肉，象从自己身上割下一样痛。如今一袋小米扛出门，她怎能不急！但她怕男人，不敢当面頂撞，只得在屋里轉了几圈，悄悄凑上去問：“送人嗎？穷鬼們口象簸箕大，你能填得滿嗎？”王

維平却瞪起眼睛：“你知道什么！”說完，向正站在門口的老常一揮手，“送走！送走！”老常立即一迈大步走了。

王維平是有自己的打算的，面子要擰，實利不丟。送走了糧食，他大步跨到賊六子家：“六叔，老王功兩口子病得快咽氣了，咱們不能見死不救，我已送去一大斗糧，各戶均攤吧！”

賊六子瞇瞇眼皮，倒抽一口涼氣說：“我，我自己这几天都緊緊巴巴呢，哪有糧！”

“這鬼話騙不了我。你有，要攤；沒有，也要攤！”

他又跑到另外几家，嗓門拉得很大，調子也唱得很高。誰知另外几家也各有各的打算，都不願攤這筆“冤枉糧”。最後，他火了，站在當院，象訓賊一樣：

“你們這批王八蛋，操你媽，一個個只知道望自己腰包里裝，見死不救！”

那年，老爷子已七十多了，腰彎得象老虾公，孫兒一聲聲罵到他頭上，不能不出來說几句：“維平，為點啥？”

王維平自然理直氣壯地說了一遍。老爷子這點門面是不能不裝的，摸摸胡子說：“咳，小意思，別鬧啦，咱老份出！”就叫人灌了一斗糧，送了過去。

住在村東頭的茅屋裏有兩戶貧農，一戶叫佟瑞和，一戶叫佟瑞明，叔伯哥倆。

佟瑞和的老伴病在炕上已個把月了，為了治病實在急需錢用。兩人商量着向誰告借。

佟瑞和摇头叹气地说：“咳，明知是刀山也得爬，油锅也得跳。咱老辈传下陈家灣还有七亩地，用地契抵押向王家大院借吧！”完了，又补了句：“听说王維平最近给王功家送过去了一斗粮。看来，这人就是脾气暴些，高兴起来还是肯帮助穷人的。我想向他家借。”

佟瑞明比较老练，他想了想说：“大哥，借钱自然只好向王家大院借。但要说王維平高兴起来肯帮助穷人，我不信。东山老虎要吃人，西山老虎就不吃人吗？别的不说，单是前几天老范家挨罰的事，就叫人寒心。老范为了要脱坯换炕，自己没有半分土地，偷着在他家地里掘了半车黄土，被他看見，连铁鍬都夺走不算，末了还罰了两块錢，这不是做绝了？这样的人，哪会安好心！”

哥俩商量到半夜，仍然没有好主意。他们把王家大院几家地主逐一数下来，不是太奸，就是太滑，或者是又奸又滑。结果只得依着佟瑞明托人向王維平家告借。

这一天，雨后新晴，打头老常带了好几个短工薅苗除草去了。王維平也跟着去察看。一到地头，他就生气了。原来这块地紧挨着他六叔贼六子的地。贼六子一向有个贼脾气，凡是他的地，地边上的界石总要尽量踩得弯到人家地里去，今年踩三寸，明年踩五寸，两三年下来一尺多地皮就占过去了。地边上的一两行庄稼，他一定要自己点种留苗的，为的也是尽量向人家地边上扩展。这对王維平来说，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他是不管什么六叔不六叔的，立刻起了个歹主意。那时候，高粱苗都一尺多高了。

他沿着地边的一行走去，随手把賊六子的高粱苗的心一株一株都抽掉了。从东头抽到西头，看看还不解气，回过头来又从西头抽到东头毁掉了第二行。这才得胜的走了。

剛走回到村头，就見黑压压一堆人圍着瞧热闹。他分开众人挤了进去，只見一个小女孩牵着一个走江湖卖艺的瞎子，守着一个“号头戏”在唱（那时留声机很粗糙，上面装有一个很大的号头，所以群众叫它“号头戏”），咿咿嗚嗚的声音，就是从这里面傳出来的。他感到新奇就湊上前去，来势又猛又急，把瞎子挤得几乎栽个跟斗。“号头戏”里有个小盘，嗞嗞嗞轉得飞快，他越看越入迷，不覺說了句：“这盘怎么这样小哪？”

瞎子正生这个莽撞家伙的气，同时又看不見，也无須惧怕眼前站着的究竟是牛头还是馬面，就頂了句：“鍋蓋大，能唱戏嗎？”

“哈哈哈，”四周的群众全都大笑起来。

这一笑，把王維平笑恼了。他捋捋手臂想发作。可是一看四周这許多听众全憤怒地瞪着自己，就泄气了，只得又分开众人挤了出来。一路上，他越想越不是味，回过头来，又挤进了人圈。这一回，他是有意寻事了，站在“号头戏”前高声吩咐道：“声音太小，开得大一点！”

瞎子一听，又是剛才那个搗乱的家伙，心里也有气，就又頂道：“老黃牛叫声大，好听嗎？”

“哈哈哈，”四周的群众又都大笑起来。

这笑声象是示威，使王維平气得眼里噴火。但是，群

众密密麻麻围着象座城，他还是不敢发作，只得憋着气，冲出句：“好吧，你等着瞧！”就分开众人头也不回的走了。

其中有几个上了年纪的人，怕出事，冲着瞎子的耳朵如此这般说了一番，瞎子也吓住了，赶紧关了“号头戏”，叫小女孩牵起赶路。几个好打抱不平的小伙子主动护着他俩。

瞎子和小女孩刚走到村口，王维平手里提了支大枪赶来了。他举起枪想放，但看到前面有人保护，后面有人监视，手还是软下来，只得虚张声势的骂了句：“操你妈！”

这天晚饭后，王维平不断生着闷气，直到范泰领着佟瑞和来借钱，嘴角上才挂起了笑容。

老佟家要借钱，说完以后，他早已想好了一个歹主意。等到写好了借据，要过了七亩地抵押的文书，才从箱里取出一包钱交过去说：“老佟，你当面清点一下！”

佟瑞和抖抖索索的接过票子，一张一张点过去，只有七十二元，他急了：“少先生，我不是向你借八十元钱吗？”

“七十二元加上三个月的利息，不就是八十元钱了吗！”

“利息也要到期才能付呀！”

“预扣三个月，这是我家的新规定，这叫‘出門三声炮’。”

佟瑞和颤声说：“少先生，我求求你，这回不要这样扣我！”

“什么这回那回，不行！”

范泰这头老驴也插进来了：“三个月轉眼就到，先扣下不一样嗎？”

“这样……我……不借了！”佟瑞和知道上当了。

“借錢是开玩笑的嗎？現在你要不借也不行！”

范泰随即連拉带劝：“看，少先生生气了，錢拿到手就得了一唄，走吧，走吧！”說着，把佟瑞和推了出来。

就在这一年，佟瑞和老伴病过以后，自己又病，庄稼又遭灾，象碾盘压在身上翻轉不得。本錢沒法还，利錢清不了，本上生利，利上滾利，不上两年就变成了一笔大数目。他只好将这祖輩傳下的七亩地卖給了王維平家。

三

王維平又凶又霸，他媳妇又尖又刻，不上两年果然买了好几十亩地，家业比他老爹在世时迅速旺发了。可是好景不长，抗日战争起来了，在共产党的領導下，这里成了八路軍常来常往的游击区。王家大院这伙牛鬼蛇神立脚不住，全都决定搬到遵化去。

临走时，各家都挖空心思，对如何保住家业，继续剝削四十里鋪的穷人，作了阴險的布置。王維平看中了两个人。一个是他家的打头老常，一个是老实巴結的穷要饭王生。老常对庄稼活計是一員能打会算的閻將。王維平对他就体体面面的商量：“咱一东一伙这么些年了，鍋盆碗筷总有磕碰的地方，这些咱們一笔勾銷。今后我家

地里租子啥的，劳你多照应着点，秋后我一次来取。我不会亏待你。你家租种的几亩地，今年租子就免了，以后再说。我家有搬不动的东西，你只管用好了……”说着说着，还是露出了狼性：“嘿，他媽的，谁要是动王家一根毛，我可不客气！”

王生是个被穷困压得吐不出气的人，王维平对他就再欺压一番：“你眼下住的是咱王家的窝棚，看的是咱王家的场园。咱王家拔根毫毛也抵得上你一条粗腿。以后看管经心着点，如有损失，不来报告，唯你是问……嘿，你张眼看看，土八路成得了气候吗？”

王维平到了遵化以后，官瘾更大了。在伪政权下是魔鬼的天下。谁枪杆子硬，就站得住；谁能无耻叛国，就爬得上去。这正对了王维平的胃口。没有几年，果然爬上了伪治安军区团长的职位。

臭水缸里翻来滚去，都是陈渣烂滓。

王维平手下，不久就象个大臭水缸。邻近村里的反动地主、流氓、地痞、浪荡鬼、黑心贼，全都闻臭而至。他呢，只要来的人有狼形狗性，肯做日本鬼子的奴才，总是有求必应。反正区团里有的是名额，多补一名团丁，他当团长的就多一分油水。

但是他也有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就是叩头拜把，大讲反动的“义气”。

他自己有个最要好的把兄弟叫王汉臣。王汉臣是环庄的恶霸地主，和王维平家是故交。但他俩所以把兄长

把弟短，好得象同穿一条褲子，倒不是因为故交，而是臭味相投。王汉臣有一手很突出的舔屁股的本領。王維平要迎奉上級，他会体情察意早把礼物准备好；王維平要出去“扫蕩”，他会挖空心思提供情报；王維平要嫖女人，他会拉皮条；王維平要敲榨，他会当狗腿。一句話，他是王維平十分称心的侍从副官，加上他为人阴險奸詐，詭計多端，常常又是王維平得意的參謀。

一天，两人又在王維平的相好外号“白玉霜”的坏女人家喝酒。

王汉臣討好說：“大哥，咱要是想法拔去两顆眼中釘，往东的一路就会太平无事了。”

“哪两顆？”王維平因为狗肉吃多了，直打飽嗝。

“一顆是你們四十里鋪的辦事員佟瑞明；一顆是咱姚家峪的辦事員陳大有。这两顆八路軍的釘子，一个安在山北，一个安在山南，咱南北的通路就被掐死了。”

“唔，有理！你不提倒也罢了，一提起四十里鋪，我他妈的牙根都能咬碎。咱王家搬到遵化以后，开头一两年还好，租子什么的能收个差不离；土八路一来，搞起什么二五減租，合理負擔，穷鬼們就變心啦！如今更鬧起民兵武装，日窜夜扰，皇軍头痛不說，咱王家就倒了血霉，租子挂起，祖山上的树也被砍啦；过去見到咱連氣也不敢吭的长工、短工、穷看場、放猪娃，全都抖啦。我临走时这一番安排，心血全都白費啦。真正是他媽的……”

王汉臣这狗头一听，知道他那个团长大哥的气，全泄

在四十里鋪了。这不是他的目的。他日夜寻思要零刀碎割的，是曾經狠狠斗争过他的陈大有这一伙人。刚才同时提出来，不过想一箭双雕，既报了自己的私仇，又討得团长的欢心。如今眼看双雕不成，要变成单雕啦。他于是低头又一提摸，有了新的阴谋。

“大哥，……小弟倒有个好計……”王汉臣有意說得很詭秘。

“什么好計？”王維平酒喝多了，两眼血紅。

王汉臣于是凑上去，冲着耳朵：“这两人啊，咱都要干掉。咱们先把两人的罪状編得严重一点，就說他們活埋了咱多少团丁，破坏了咱多少公路，砍毀了咱多少电线等，向皇軍上告，皇軍一定会暴跳如雷。然后咱们秘密偵察好两人的行踪，报告皇軍出其不意前去‘清剿’，一定能够大功告成！”

“八路軍神通广大，这些办事的人也象长就順風耳、飞毛腿一样，怕不容易偵察吧！”

“这个，大哥你不用担心。四十里鋪的事，咱要王树仁偵察。这东西自从被划为富农以后，一直和穷小子們在騎駢看唱本——走着瞧，咱们花上笔錢拉一拉，事成以后又答应发给他几百元奖金，准能听咱調度。姚家峪的事，咱要地主楊玉沛偵察，这狗头挨过八路軍的斗，咱只要答应給他伸冤出气就是。”

“好，你真想得周到！那么暗下联络誰来担任呢？”

“这个，大哥，我也想好了。四十里鋪的联络找王凤

春，这小子到咱团里不久，回去几趟不显眼；姚家峪的联络，小弟我暗下注点意就是。”

“好，好！你老弟真是‘智多星’！来，咱俩再干上几杯！”

这时“白玉霜”穿着花旗袍，扭着腰肢进来了。她娇声细气的说：“唷，你俩怎么老喝闷酒？咱来几段小曲吧！”

“行！”王维平、王汉臣同时叫好。

留声机打开了，咿咿呜呜唱出了不堪入耳的黄色歌曲。

随着高低抑扬的歌声，王维平拿起筷子狠狠敲着盆沿打拍子；王汉臣用皮鞋后跟蹬着地板，灰尘扑扑乱飞。

歌声刚住，王维平喊道：“再来一个！”王汉臣却油腔滑调的说：“眼前有花，大哥怎么不赏？死唱片哪有咱白大妹子的嗓子甜？”

“白玉霜”故意扭扭捏捏的骂王汉臣道：“死鬼，就数你爱嚼舌头！”但末了她还是喝了半口酒，清了清嗓子唱起来。

刚唱完，王汉臣赶紧递上一蛊酒：“大妹子，慰劳，慰劳！”完了，他故意低头看了看戴在手上的破表，冲王维平嘻皮笑脸：“大哥，时间已经不早，我走了！花好，你俩的月也该圆了！”

三个月后的一个晚上，王维平在团部里为新来的伪遵化新民会张特派员接风。伪新民会是他起家的靠山，特派员前来哪有不恭敬奉候的道理。酒席是山珍海味，

应有尽有。这和敌占区人民吃糠嚥菜都难填饱肚子，恰成鲜明的对照。

这一群狐狗凑在一起，臭味更冲天了。王維平剛敬过酒，張特派員晃着扁脑袋也举起了酒杯：“兄弟这一次来，多謝王兄雅意。这一杯，祝王兄指日高升！王兄为皇軍立了大功啦！四十里鋪的八路軍辦事員佟瑞明，根据貴部密報，皇軍捉住以后，前几天已在城里枪决了。嘿嘿嘿，这是对当地八路軍的一次莫大的打击；敵会上下，还有令叔令弟等，在城里听到都非常的称快呀！嘿嘿嘿，干杯！干杯！”

正当杯盘交錯、划拳行令鬧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被派出去刺探消息的团丁王凤春回来了。这小子衣服扯得稀烂，據說是从山間小路連爬帶滾突出的。他几回晃到大厅前想找团长報告，又都不敢，及至酒散了，客人走了，才找了个机会。

“团，团长，大事不好了！”这小子到这时两条腿还在打顫。

“什么？”王維平酒被吓醒了，“你他妈的怎么这样着三不着两，詳細說說！”

“王，王汉臣大哥，被抓住，枪，枪毙了！还有四十里鋪的王树仁也被抓去，枪，枪毙了！四十里鋪新的辦事員王国藩，武装班长杜奎上，上台了！他們要为佟瑞明报仇。两人好，好厉害哪！我，我也差一点儿完，完蛋了！……”

这个怕死鬼几乎連話都說不成句了，鬧了半天，王維平才弄清事情的始末。

原来四十里鋪的王樹仁自从出卖了佟瑞明以后，立即被八路軍釘上了。他們在佟大嫂的協助下，終於破獲了這個案件，把王樹仁逮住法辦。王漢臣因為邀功心切，偷偷潛到了環庄、灰嶺子和姚家峪刺探，也終於被陳大有帶領民兵截獲。由於證據確凿，他抵賴不了，也被八路政府處決了。

王維平在屋裡轉了好幾圈，酒全吓醒了。他想來想去，四十里鋪的窮鬼無疑是他王家的死對頭，只是目前情況不明，無法再下手。叩頭拜把雖說是句空話，但王漢臣一死，自己象失去一條臂膀，也實在痛心。為了拉攏下屬，討好上級，這件事不大干一下無法交代。他於是象很決斷似地吩咐道：“你明天再化裝到姚家峪去，限三天內把陳大有的活動情況弄清楚，回來報告！”

到姚家峪去要經過四十里鋪。王鳳春今天出來時，幾乎被杜奎帶領的民兵截住。他魂靈一半已飛上西天。如今要他再去，豈不是向閻羅王拜客。但他一抬頭，團長的蝦蟆眼已瞪上了，推是推不了，只得想法滑過去：“報告團長，我實在肚子痛，不能去！”

“他媽的，怎麼剛才不痛，現在忽然痛起來了呢！爬着也要去，不去斃了你！”

這一回，王鳳春連姚家峪的邊也不肯沾，只站在遠遠的山上瞧了幾眼，就钻進一個破鞋家里濫賭了三天三夜。

完了回去，却謊話編了几籬筐，說自己如何如何深入去偵察，如何如何被民兵釘住，又如何如何機智地逃了出來等。結論是陳大有十天有九天不在家，要捉他難、難、難！王維平開始倒真信了，可是過後細細一分析，就覺得漏洞百出。他憤怒起來，把王鳳春狠狠抽了几十皮鞭，關了禁閉，另外又派了兩個狗腿，扮作小販去偵探。隔了幾天，終於探得了確實消息：那晚，陳大有因為老娘病重，在家。這回，王維平什麼也顧不得了，向遠在遵化的上級，胡編謊騙了一通，就決定自己領兵去“清剿”。

半夜出發，天明以前灰鬼子果然包圍了姚家峪。

天一亮，灰鬼子就砸門搗戶，搜捕搶掠。王維平亲自領人搗毀了陳大有的屋門，里里外外，全搜尋遍了，就是找不到陳大有。他一手提着盒子槍，一手拿着馬鞭子，虾蟆眼氣得血紅。看見陳大有只七八歲的小丫頭抖抖索索站在門邊，他上去狠狠一馬鞭子，抽得她嘴鼻流血，嗚哇直哭；看見陳大有的病老娘縮在炕頭，上去狠狠又一馬鞭子，抽得她昏死過去。陳大有的媳婦急了，冲上去說理，被他狠狠又是三馬鞭子。咯咯咯，老母雞被鬼子捉住宰了；蓬蓬蓬，酸菜罐子、豆醬缸子、煮飯鍋子全被搗碎了。只那麼一頃刻工夫，這個家就被毀得所剩無幾了。在同一時候，村里的其他各戶，也遭到了類似的洗劫。

原來陳大有這一晚倒的確是在家的，只是他警惕性高，早在後門布置了一條秘密退路。外面一有响动，他就逃走了。这时，正在村里一家貧農的地窖里藏著。

沒有捉住陳大有，王維平怎麼也不解氣。他要部下用刺刀比着，把村里男女老小驅集到村東的大坑里，四周架上機關槍，揚言不交出陳大有，要殺得一個都不留下。

這樣的場面，村里人已經歷過不止一次了。儘管王維平咆哮着說這說那，大家却全都憤怒地瞪着眼睛。看來，要從他們口里挖出陳大有，和村里民兵的實況，斷乎是不可能的。

這一招不靈驗，王維平真個下毒手了。他要部下把村東頭的好幾座草房點起來燒，揚言再不交出來，先燒房子，然後斬草除根，全部殺絕。

陳大有躲的地窖和外面是相通的，外面鬼子的活動，自有這家貧農的老大娘向他報告。當他聽到許多老乡被圈到東大坑受罪，心裡象針扎一樣難受；當他聽說鬼子已經開始燒房子，再也耽不住了。他立即爬了出來，老大娘怎麼勸都勸不住。只聽他斬釘截鐵地說：“我大有是共產黨員，不能叫人家代我死，不能叫人家為我弄得無家可歸……”說完，戴上頂破草帽，大步往東走了。一到村口，就被兩個灰鬼子攔住。

“干什么的？”

“我就是陳大有，怨有頭債有主，你們不是要找我算賬嗎？這和別的老鄉毫無干系，不能胡來！”

兩個鬼子被這種正義的吼聲怔住了，相互嘀咕了好一會，才把他帶去見王維平。王維平叫人一認，果然是陳大有，也怔住了。但只一會兒，他就發瘋般高喊：“捆起來！

捆起来！”

被圈住的老乡目睹了这件事，全都轰隆轰隆发出了怒吼，由于机枪和刺刀挡住冲不过来，末了还是被驱散了。但大家的悲愤却埋得更深了。

陈大有就在当天被王维平带到了伪军团部，受到了严刑的拷打；第二天又被押送遵化，受到了苦刑的折磨。但他始终表现了我八路军工作人员高尚的品质，不向敌人低头屈服，保住了党的机密。

过不久，陈大有就在遵化英勇就义了。

王维平就这样对人民再一次犯下血腥的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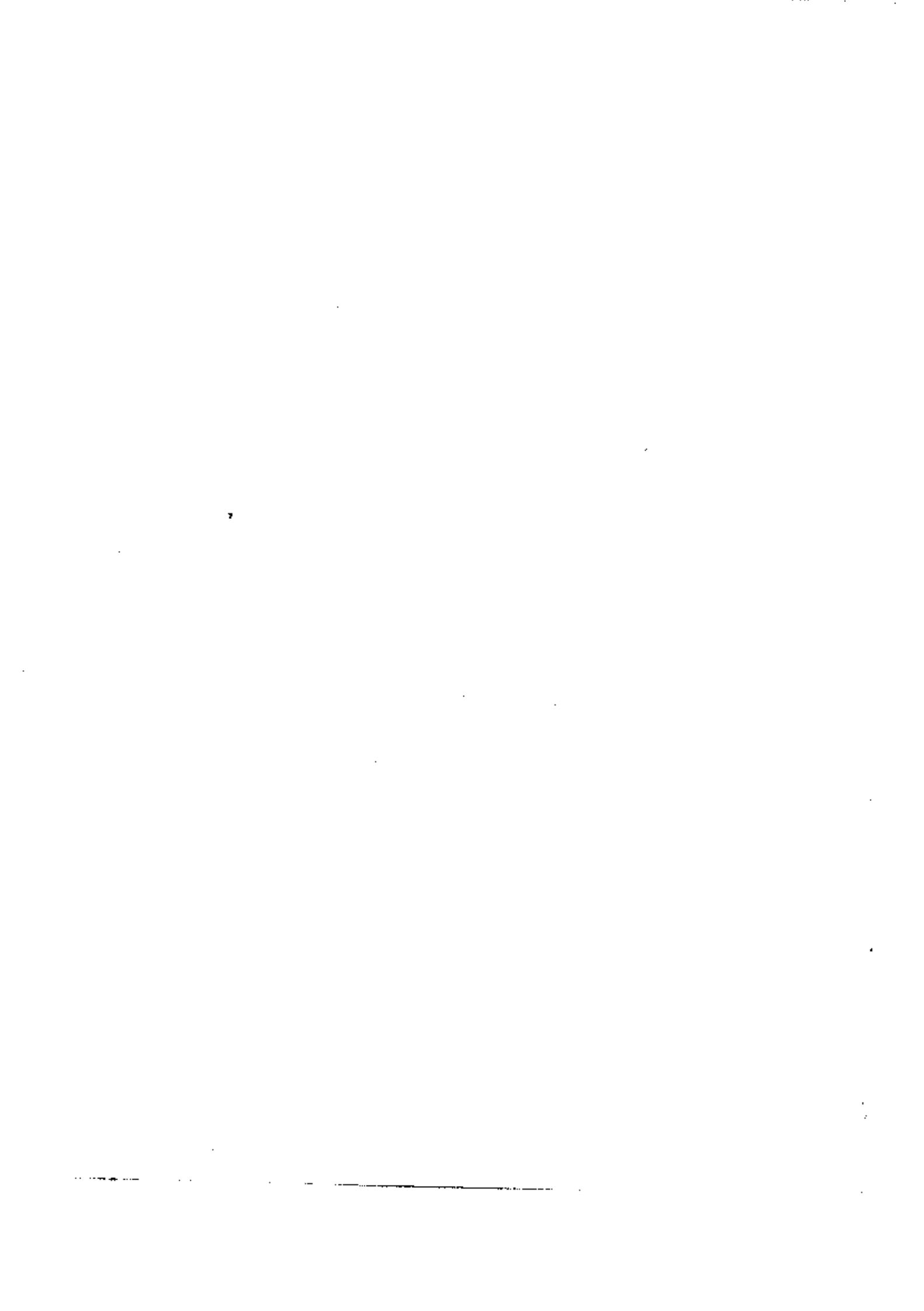
四

历史的车轮终于压碎了一切反动分子的梦幻。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由于国民党吞吃了胜利的果实，王维平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里的反动军官。直到遵化解放前夕，王家大院这伙牛鬼蛇神才都象热锅上的蚂蚁。王维平先逃到难民所，一看风头不对，又摇身一变变做商人逃到北京干起小买卖来。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污秽垃圾能藏得住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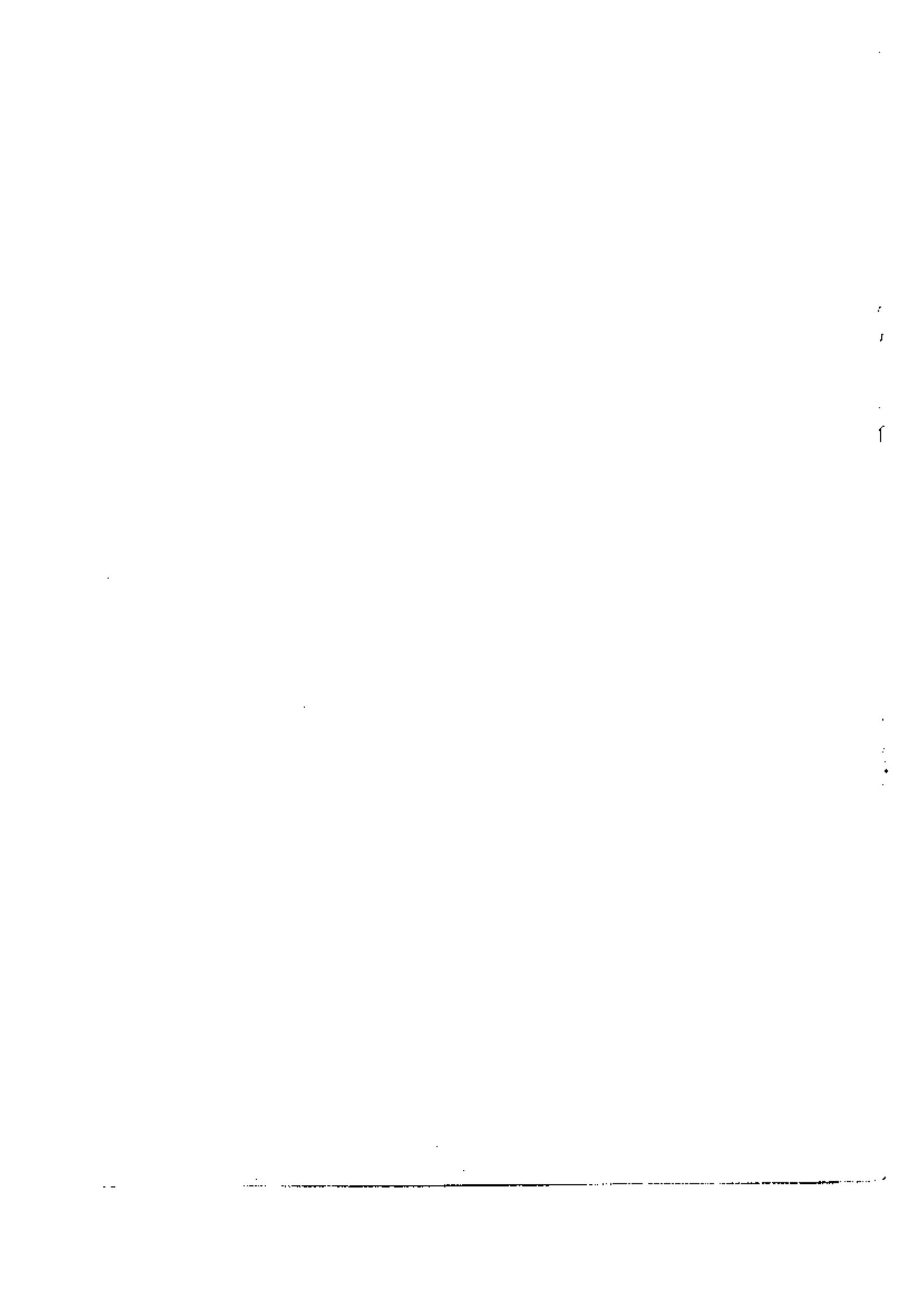
一九五三年，我严厉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由于烈士家属的告发，也由于群众的检举，终于把这条毒蛇掘了出来。

同年秋天押回村里当众枪决了。



第四部分

建明社頌



建明湖

——建明公社山水片断

田間

建明湖这条湖，又叫接官厅水库。它是在群山的中間，在半山的上面。远看象一片碧綠的树叶子，近看又象从天上抛下来的一面大镜子。

站在最高的峰頂，往下一看，这一面鏡子，又象是悬在半山。这一面鏡子，它不但反映出一部穷棒子社的历史，也反映出公社的未来，它不但可以看到群众的集体智慧，也可以看到党和公社不可磨灭的光輝。

一部穷棒子社的社史，充滿了多少斗争呵！正象湖中的波浪，此伏彼起，一串串，一朵朵，奔流不息，从烈士的胸中，到子孙的心窩，从忠士的手中，到后代的道路，因此，我为这建明湖写一小記。

这一小記，与其說是写湖，不如說是写山，与其說是写山，又不如說是写劳动者、建設者的汗花汗珠。一山、一石、一树、一湖，当它闪光的时候，当它穿过風雨的时候，总是山呼、石語、湖唱、树舞，在集体的道路上共同战斗下去。

这里有一条长长弯弯的小谷，峪口有个村子，有接官厅、有白馬峪。

过去白馬峪，傳說有一对金鵠子，这一对金鵠子，穷人可是沒有誰見過。自从公社化以后，有人說，金鵠子飞來啦，飞到了建明湖。过去白馬峪之所以叫作白馬峪，說是村邊的那座山，原来是一匹白馬，一直臥着不起，現在由于“三泉合一”（把山上的三条細泉，汇合成一条大的渠道），由于“引水过桥”（在山峽之間架起过水的木桥），由于“揚水站”（从山下“社会主义大井”引水上山），由于有了建明湖，我們看到，附近的群山，真的象白馬似的，仰着脖子想來飲水哩。

是的，山活啦，水活啦。緊靠在建明湖大壩前后的石头灘地，人們从远处担来土，要把它变为稻田。这不是空想，这是事实。峪上已有四十亩薄沙地种上了稻子。几千年的山区，种上稻子，可以說这是公社的产物，这是湖的貢獻。

白馬峪这个村子，有一戶要飯的，是村里第一戶蓋起新瓦房。亮堂堂的几面白牆，多么象春天开的梨花瓣，开在村子的中間。当新瓦房初盖起来的时候，村里有些人都很惊讶，甚至有說他在路上拾到金条了，否則一个穷棒子怎的能蓋上新瓦房。

这一切都說明：合作化、水利化的胜利；这一切又都說明：我們党的领导，以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项偉大的革命运动，在我們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閑言少叙，話歸正文。我們來簡單介紹一下建明湖建設過程中的一个片斷。

走进山谷的峪口，我們就看到，半坡上、石头灘上，有一片栗子樹，樹枝上挂着黃色的長絨花。從這個大栗樹林，再往上走几步，就是建明湖的一條大壩，橫立在兩山之間。大壩上有斗大的三個大字：“建明湖”。

這座山湖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到七月開始建的。第一期工程，已有一定的規模。一九六〇年又加工，最後完成。這個工程是幾個公社的一項大合作。中國歷史上，村與村之間，上游與下游之間，水利糾紛，歷年都有。如果不是人民公社，打破了邊界的死規道，為發展集體經濟開辟了大道，不用說興建水庫，就是上下水的糾紛，也不易徹底解決的。

今日的湖水，正從千家万户門前過，象大家自己身上的一條血脈，和自己的骨肉不分。因為它是一條大路，——一條集體的路。

一九六〇年，這裡的麥子很好，因為澆了兩遍水，小麥產量一百九十斤，比起那澆不上水的多一倍。其他的大秋作物和棉花產量，都提高不少。種稻田四十畝。下游一千四百多畝地免於水患，保證河道兩岸接官廳、王老莊等七八個村子的安全。

一九五八年，水庫興建最緊張的日子里，正當汛期雨季快要來到的時刻，當時大壩還沒有落成，庫里的水，就逐漸上升，由十四米三，漲到十五米六，三萬條麻袋堆在

大壩上。工程總指揮謝洪勇書記（當時是鷄鳴村區委第二書記），這時想，如果擋不了洪，問題就大啦，別的且不說，光是鄰近幾村就會被山洪掃平。

就這時，縣氣象站預報，將有大雨來到，要連下兩天。謝洪勇就和他的助手張正民說，溢洪道落後一步，沒趕上去，此刻要發動合理化建議，鼓起更大的干勁。就這時，在大雨之前，溢洪道完成計劃三分之二。天陰了。第三天的早上，大雨嘩嘩，河槽里積滿了洪水。

這時許多民工又都住在山口的接官廳村，被山洪阻擋了，過不來，河灘上，河溝里，幾十分鐘之內，水有三米深。有人提議，用一根大繩子拴到兩邊，好扶着繩子過河。可是流水太猛，也太涌，人怎麼能走過來呢？有一位年青的工人，是工地上的鍋駝機手，就這緊急關頭，他面對激流，他身擔風雨，他自報奮勇，恨不得一步跨過來，他第一個扶着繩子沖過激流走過來了。

水庫里的水，漲得更高了。瓢潑的大雨，從早上到中午一直沒有停過。大壩上，草袋堆到三層，並且還在繼續往上堆。

謝洪勇立在風雨里，大聲疾呼道：“不能停啊，繼續干。”又喊着：“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們要更勇敢，要保護接官廳村的生命財產。要不然，就前功盡棄。”這時他的助手張正民眼里激動得噙着淚珠說：“八百人的生命在我們手上，我們能不能保得住？”

“中。”工人們回答，“我們決不在困難前面後退，誓死

保卫大壩！”

草袋垛到六层。水庫里的水，漲到十四米三，多么緊張的一刻。几天以来，大雨昼夜不停，人們都筋疲力乏。大雨一連下了两天两夜。謝洪勇已通知接官厅群众搬了家，群众已搬到山上了。

就在这时，二十三戶的一戶，“穷棒子社”的好汉、得过多面紅旗的旗手——杜奎，帶領公社机关干部，东西四十里鋪、大于家沟村等来的一批精壯劳力，趕來增援，他們由炸糕店翻山越岭，及时赶到，突击开出溢洪道，大堤上，水已齐膝盖，人都站在水里，危險之极。他們来开出一米深、一米寬的泄水沟，水就沒有再往上涨了。

忽然之間，大壩塌了一块，有一米見方的窟窿。巡邏人一見，以为是決了口，馬上放了三声枪（事先規定的信号，如果大壩决口，就放三声枪）。群众一听見枪声，突然又緊張起來。謝洪勇以勇敢沉着聞名，这时他对他的助手說：“咱們俩亲自去看看。”一看，果然不是決口，而是塌方，原来是从侧面滲透出来的透水的地方，塌了一片。于是立即組織力量就把它堵住了。群众安定下来。

水庫的工程，一共是一百七十二天。謝洪勇一百五十天都在大壩上，未离过大壩，这些忠心耿耿、脚踏实地、身在前線、又肯动脑筋的指揮者，以及广大群众，終于筑成建明湖这座大壩，筑成一座新的銅牆鐵壁，使它沒有一个暗洞，不漏一滴水。人民公社移山倒海的奇迹，于此可見。由此也看到，“真正的銅牆鐵壁是群众”。

穷棒子精神——不穷！
长流不息的山湖——不穷！

一九五八年，我写过一首題名《贊穷棒子社》的小詩，
我又补写了几句，把它抄在下面，表示我对这个社、对这个集体的一点祝贺：

一

穷棒子社山不穷，
穷棒子社手不空。
柴山原来是宝山，
上山就能攀彩虹。
西铺山上摘果子，
社红果红心也红。

二

河有源山有峰，
穷棒子精神向前奔。
革命才有幸福种，
跃进才能攀高峰。
“蜜蜂”我托你捎一首歌，
把它送给不老松。

英勇奋战到最后一刻的人們，敢于承担了劈山造海的大业，在大山里，在公社里造了湖，“穷棒子”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一句話說来，他們是新愚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时代的新愚公，这些人物美好的形象，将永远映照在青山綠水之中。

有青山为证，有綠水为凭，青山洋洋，綠水盈盈。小船系在湖边，魚儿游在水心。

解放以前，这儿流行这两句歌：

穷人眼前路三条，
逃荒上吊坐监牢。

革命的激流，早已把穷人这三条路冲掉了。穷棒子们不但有了新的路，还有一座新的湖。

沒有上天摘星星的本事，
就別想赶上我們。

阶级敌人他们唱的这种“高调”，也被革命的激流冲跑了。并且我相信它还要被冲到建明湖，最后把它冲到湖底。

1963年8月記

“老打头”

刘哲

閻家屯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繆海山，外号人称“老打头”。

提起“老打头”，他往往联想起自己十五岁上給地主扛小活的一段事。說是“小活”，实际干的是大活的事。人家榜一塊，他不能少榜半根；人家割一亩，他不能少割一分。这哪嗰得了呀！累急了，他就小声嘟囔前边那个“老打头”：“这是搶喪呢！前边有你的棺材板呀？”可心里也知道这哪能怨“老打头”呀——你不見，老地主站在地头上，正贼眉六眼地瞪着长工們干活呢！就这样，他既恨透了抄着手不劳动的地主，也对那个“老打头”沒留下多少好印象。

到了新社会，他翻了身，当了干部：先是农会主任，后是村长；农业合作化以后，又当生产队长，又当村党支部书记；劳动，工作，处处走在前头。人們初呼他“老打头”，他还觉着怪扎耳，以后慣了，倒觉着挺順耳，心想：“当个人民的‘老打头’，不很光荣嗎！”

有一年夏天，正是榜二遍玉米的时候。那时，全村一

百几十户还是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分两个生产大队，老支书兼着一队的队长。有一天耪玉米，他听说近几天预报有雨，心想：“这要紧紧手，把地麻利耪出来，大雨一灌，粪一吃劲，玉米就能呼呼地往上长！”在这个紧要的当口，他清楚地知道书记必须带头，话说千遍，不如动手一千。于是，上工后，他头不抬，腰不直，气不喘，脚不乱，霎时间，象匹善走的快马，刷刷刷，窜向前去。老支书正耪在勁头上，忽然听到身后一片嚷叫声。他猛一惊，直起腰回头一看，嗬哟，地里象撒了羊群啦，东一个，西一个，把人们拉了一地。

“老支书，你长了飞毛腿啦！”

“今晚上不去炕，找你算账！”

“拉垮咱们，明个让你一个人来干！”

老支书瞪着人们嘻嘻一乐，粗声粗气地说：“紧把手干完，明个下雨，咱批准你们放假一天！”

“下雨还要你放假！”

老支书不管后面人们说着闹着，一头扎下去，再也不抬起头来了。年轻小伙子们也来劲了，喊一声“追！”呜噢喊叫地就追开了。

这一天，三十多亩玉米，就在老支书的带领下，全耪出来了。

人民公社化以后，整个圈家屯成了人民公社的一个大队，穆海山也就成了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这些年，不管工作多忙，多累，他从来没有脱离过劳动。

夏去秋来，百草結籽，正是割垫脚（即割荆梢）、压綠肥的好时候。长峪山这地方，沙多土少，石厚土薄，是出名的貧瘠地方。俗話說：“薄地怕富汉”，这里的庄稼，純粹是用糞堆堆起来的。每年，除靠猪、羊、大牲畜常年积肥外，夏末秋初割垫脚，就是肥料最主要的一个来源。

这年，春大旱，夏少雨，近处山上的荆梢都沒长起来，要割垫脚，就得要到二三十里地以外的什么秋花峪、馬蜂峪等远山里去割。生产大队早就开会作了布置，可是，各生产队总是迟迟沒有行动起来。

說起割垫脚，这确实是件苦差使。每逢上山的日子，半夜起来做飯，鸡叫就得起身，走上几十里地到了山上，天才放亮。沒有經驗的，在那高山陡岩上，一踩一溜，別說割，站住脚跟就算是好的。太阳一上来，那就更苦了。夹沟里沒有一絲絲風，整个山沟就象一架大蒸籠，又蒸又烤，死水汗流。却找不到一滴滴水喝。所以，提起割垫脚，壮小伙子都惧怕三分呢！

老支书想了又想，觉得吃苦在前是共产党员的本分，要迅速行动，不如自己挂帅。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上山的头一天晚上，老伴担心地說：“你这大年紀，老胳膊老腿的，上山能中呀？”儿媳妇也在一旁帮腔說：“爹，这样的重活，还是让年輕人去吧！”老支书扑擦扑擦眼睛，沒說什么，只是重复囑咐了一句：“你們快睡吧，明天还起早做飯呢！”老伴和儿媳妇一看，就知道再說也沒有用了。

第二天清晨，人們走在道上，大队干部和社員們又議

論开这事了。大队长說：“老支书，你留家照看照看家里，多动员些人上山，不比亲自出馬强呀？”

“你让我瘸子打圍——光坐着喊呀？”一句話把大队长頂得沒話說了。

有个年輕社員又搭腔了：“老支书，干別的你中，干这个怕不中婆！你嗆不住这累呀！”

“累？从前給地主扛活累不累呀？沒有享不了的福，也沒有受不了的苦！別看我老了，你們這伙小青年還不在我眼里呢！不信，咱們比試比試！”一片話把这伙青年人都說得膘上勁了。

这一次，沒有开会，也沒有動員，社員們呼呼地爭着搶着去上山割墊腳。沒有人喊累了，也沒有人再找各種理由不去了。他們說：“老支书能干的，我們为什么不能干？”这年，閻家屯生產大队是历来割墊腳最多的一年。

連年丰收，农村生活变好了，有些人慢慢也變得嬌貴起來：早晨总想睡会懶觉，不怎么願意早起干活。开会動員了五回，情況也不見好轉。老支书還是用老办法，就同少數干部带头起早劳动。一天两天，時間久了，起早干一氣活再吃飯，也就成了社員們普遍的习惯。

这天早晨，人們集合起来要下地的时候，有人突然發現老支书沒有來。

“等等老支书吧！”

“这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迟到了！”

“昨天白天割墊腳，晚上开会散得晚，怕还在圓夢

呢！”

一队队长李德貴說：“快別等他了，今天他准不会來了。”

这样，大伙就下地了。正走着，忽然有人喊：“那不是老支书嗎？”大伙往远处一看，可不是，老支书早就在道口等着呢。社員們很受感动。有的說：“老支书，你就沒睡过一天懶覺呀！”有的說：“別說睡懶覺，連白天开会回来一丁点功夫，还忘不了就近干一气呢！”也有的关切地說：“老支书，你累了，就歇一天吧！扛长活还有个阴天下雨呢！”老支书嗬嗬一乐，眼睛扑搨扑搨，什么話也沒說，跟大伙一块下地了。这一下，可把李德貴臊得臉上通紅。

李德貴这个窘勁，是另有原因的。

閻家屯最近一两年生产大队干部固定到各生产队參加劳动。原来老支书分工不是在一队。后来，听说一队問題很多：社員鬧不团结，生产情緒不高，有些人私下唧咕着要撤換李德貴的生产队长……。可是李德貴脾气大，象个刺蝟，支委們誰也不願分工去抓一队，怕扎手。老支书就自告奋勇，来一队参加劳动。現在，正是剛来一队的头几天。

老支书来到一队，照例是“老打头”。一开始，他既不責备社員思想落后，也不批評队长領導无力。他一天早晚走，跟大伙一块劳动，一块休息，一块讲故事。两眼看着队长的一举一动，两耳支楞起听着大伙向他亲热的談吐。

这可与李德貴成了个鮮明的对比。李德貴农活技术有一套，支派活計，有板有眼。队员們就因为看中了他这点，去年秋后把他选成生产队长。可是，他原是中农，私心重，仗着自己有点能耐，不願同队员們一起劳动。每天到地里指划一通，別人干起来，他就借名檢查庄稼，从东轉到西，从谷地轉到玉米地……蹣跚遲延，不成样子。赶到該歇歇了，他也回來了，同大伙一块歇着。歇起来，該干活了，他借口沒檢查完又走了。个别时候，还趁大伙瞧不見，捎带着干点私活。每天工分还不少挣。因此，队员們煩透了他，給他起个外号叫“查地邊”。

自从老支书来一队参加劳动，社員們个个眉飞眼笑，不吵嘴了，不打架了，干勁也起来了，干多累的活，也觉着痛快。李德貴却受到很大的拘束。他只得硬着头皮同大伙一块劳动，可是心里揣着一腔牢騷和委屈，觉着这是社員故意同他找別扭，老支书故意給他难看。不过，日子长了，慢慢也就習慣了。这时候，李德貴發現了一个奇怪的現象：人們对他的态度慢慢变得亲热起来，眼神变得柔和而溫暖；他支使旁人，旁人也听他指揮，再不那样別別扭扭了……这引起了他的深思。

一天晚上，老支书把李德貴叫到家里，长长地暢談了半宿。老支书狠狠地批評了李德貴的錯誤，指出他的病根子就是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这要在从前，李德貴准会冒火，准要以“不干了”来威胁。可是，这次，他服服貼貼地承认了自己的錯誤，表示以后一定要学习老支书的样

子，带头参加劳动。

转眼第二年春天来了。正是突击送粪的好时候。

有一天晚上，老支书刚放下碗筷，李德贵就气呼呼地进来了。

老支书问：“有事呀？”

“有一点！”

“啥事呢？”

“张福元这几天往村南拉粪，挺近便的道，两人一天才拉七趟。太不象话了！”

老支书说：“你批评他们啦？”

李德贵更生气了，说：“我熊了他一顿，他还不承认错误呢，说旁人连七趟也送不了。老支书，你得好好批评批评他。”

老支书笑模悠悠地问：“你说能送几趟呢？”

“我？……”一句话把李德贵问得张嘴结舌，回答不上来。半天才低低说了句：“没试过！”

“着呀！我批评他，不是一样不服吗？”

李德贵抓耳搔腮地说：“那……那就这样任着他啦？”

老支书这几天也发现各生产队的送粪进度快慢不一，悬殊挺大。今年送粪的任务又大，不及时解决这个问题，粪送不出去，就要影响及时春耕。他沉吟了半天，扑扇扑扇眼睛说：“这么吧，明天我来试试！”李德贵一听就乐了，“那敢情好！”就高高兴兴地走了。

第二天，老支书找了个老帮手。仍旧是那堆粪，那块

地，那套車馬。两个人从早晨套車，裝車同裝，卸車同卸，勻勻和和，不急不赶，該干就干，該歇就歇，人不累，馬不乏，車裝的還滿，糞堆倒得還大……到下午太阳还老高的时候，李德貴來了，問：“送多少呀？”

老支書說：“十三趟。”

“差这么多呀！”

因为牲口還要拉点飼料，所以就提前卸車了。老支書一边卸車，一边和顏悅色地說：“德貴，教育社員，不能光靠大話熊人，要有根有據，讓他心服口服呀！”

李德貴知道又說到自己的病根子上來了，慚愧地說，“我就是这脾氣！今个又向老支書學了一招！”

隨后，老支書找來張福元，指出他不該趕車不管裝車卸車，干活時候跑到樹行子里玩扑克，那一天能干多少活計呀！……張福元也是心服口服，表示一定改正錯誤。

有一天在地里劳动，老支書見貧農王永財愁眉苦臉，心里好象有多大的愁煩事。老支書問：“永財，你有啥難事？”王永財說：“房頂早就嘩嘩漏得不行了，想換個洋灰瓦頂子吧，一時半會又批不下洋灰呀！”老支書猛一驚，自責地想：“看我多官僚！人家屋頂漏得不行了，我還不知道呢！”他又一想：自个早就批下两千多張洋灰瓦，只是沒得空，始終沒有上頂。好在現在自个的房子比他的還強些，就說：“我那洋灰瓦還不忙用呢，先給你吧！”王永財感激地說：“那怎中，你的房子也不比我的強多少呀！”老支書假裝生氣地說：“給你你就用唄！”大伙也給老支書帮

腔，三說兩說就把王永財說通了。王永財很快就用这批洋灰瓦上了頂。

這樣的事，一時半會是說不完的……

繆海山是道道地地的“老打頭”。他打的是為群眾繕造幸福的頭，為社會主義開路的頭。

美好的青春

——記昆虫研究小組

張 庆 田

青春啊，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屬於这些永远力爭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的人，永远謙虛的人！

——这段《雷鋒日記》，是从一个回乡知識青年的日記本上抄下来的。她的名字叫張瑞琴，是建明公社刁庄子大队共青团支部委员。

一天上午，我跟随公社的一个同志到高庄子去参加一次除虫現場會議。到了高庄子，开会的人已經到齐了。会場就在大街上，人們坐在葫蘆架下的陰涼里，談天、打扑克和看书。

“我們來晚了！”公社的同志大踏步跨进了会場，突然向我介紹道：“这就是刁庄子張瑞琴同志。”

一个穿白衬衫的姑娘，立刻甩掉手中的扑克，跳起来和我握手。这是一个很大方的姑娘，束着两条又黑又粗的大辮子，閃着一双烏溜溜的大眼睛，鼻子微微向上翹着，說話时，嘴角旁的兩顆黑痣，顫顫跳動。

我們的會見，惊動了她身旁的一群姑娘，她們都束着双辮，穿着不同顏色的衣服，仰起青春的笑臉，向我們觀望。靠東邊坐着的，是一群男青年，在姑娘們面前，他們顯得很庄重，有的在看书，有的在拿着小本书写什么，有的在交头接耳地談論。但，一眼可以看出，他們和她們大部分是回鄉知識青年，個別的是下放干部，都有着一個美好的青春。

會議開始了，公社的同志用生動的語言講明了治虫子的重要，他特別提到刁庄子青年昆虫研究小組，如何用事實教育了村干部，教育了農民的實例，來鼓舞大家向科學進軍，战胜蟲害。這時候，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張瑞琴身上，張瑞琴低下了頭，一只手撫弄着發辮，偷偷地與她的伙伴交換着得意的目光。

他們的青年昆虫小組是一九六二年八月建立起來的。他們的成員是十一个回鄉知識青年和一個下放干部。十二個青年中有五個女青年，七個男青年；其中有十個共青團員。十二個人里除去兩個高中程度的外，都是初中畢業。最初，他們是從業余教育開始的。張瑞琴是團支部宣傳委員，組織青年學習，是她的首要任務。可是，任何工作都不是那麼一帆風順的，一九六一年，她剛從農業中學回來，她和團書記趙玉蘭去動員張翠花上民校。

張翠花的家長說：

“俺們不上了！”

“你怎的不上了？”

“閨女，我問你，你今年多大了？”

“十八了！”

“念了几年書？”

“念了九年！”

“念了九年書，还不是回家參加勞動！俺不念書的掙十分！你們念了書的掙七分！”

她連屋都沒有敢進人家的，靠着門框，滾下了几滴熱淚。

劳动关也不是容易闖的。她們第一次跟着老農民薅稈子，人家薅，她們也薅，薅過了一看，老農民囁道，

“這還中？”

“怎不中！”

“你們薅了稈子，留下稗子！”

她們在老農的教導下，又重新一棵一棵地薅。

“還是不中哪！把稗子薅了，留下了草梗！”

最後，她們一人手中拿着一棵草梗當樣子，邊薅邊比較，才漸漸地分清了哪是苗，哪是草；哪是稈子，哪是稗子。

困難是碰出來的，鋼鐵是煉出來的。她記住了一位公社領導同志的話：做工作要長着橡皮腦袋，不要怕碰釘子，要有頑強的革命精神，什麼困難也能战胜。

張瑞琴再不掉眼淚了，她在工作中，勞動中，特別在向科學進軍中，鍛煉得更加頑強。他們的青年昆蟲研究小組一成立，便面臨着新的困難。首先是一些青年本身

缺乏信心。有的說：“學了一天是一天，能用不能用再說。”還有的說：“光幾個青年起了啥調，干部不支持，群眾不信任，那還中？”還有人怕學用不一致，不結合實際，白搭工夫。

他們為了獲得干部和群眾的支持，便相繼召開了家長和老農座談會，虛心聽取了他們的意見，為了學與用相結合，他們先從危害性最大的地下害蟲學起。沒有教材，她和席瑞華、劉中青跑到離村二十五里的縣城去找參考書。

席瑞華是張瑞琴上農中時候的同學。一九五八年被公社保送到北京昆蟲研究所去學習，一九六二年重新回到自己的公社。有一分光，發一分熱，她被大家稱為老師，親自編纂教材，給大家講課。這是一個比較文雅的姑娘，當我跟隨着張瑞琴回到刁莊子時，同時會見她。她的身材比起張瑞琴略微高點，臉兒稍微長點，顯得兩只眼睛特別大，說話時，嘴角上微微挂着笑意。她是她們小組里的唯一沒有留着辮子的姑娘，從衣着和舉動上，稍微帶上了一種城市姑娘的風度。

“你們學習成績好嗎？”

“差不多。農作物害蟲部分，大體學完了。”她微笑着回答，接着又補充道：“大家的目標是三年達到中專水平。學習內容是政治、文化、技術。”

“政治課和文化課都由你擔任嗎？”

“不，政治課和民兵一塊學習，文化課由上過后師的

席坤担任。主要是学习語文。”

“学习当中还有什么困难嗎?”

“这会儿好多了，当初可不中。”張瑞琴接過來說。相對下，她比席瑞华显得愛說話，有魄力，她还保持着山村姑娘那种热情、純朴的性格，我到村以后，住宿，吃飯，怎样工作，都是由她安排。如果說席瑞华庄重(起碼在生人面前是这样)得象个老师，張瑞琴却具有政治風度，她的魄力，組織能力很象一个熟练的村干部。是呢！她是共青團的宣傳委員啊！她把搭在胸前的辮子向后一甩，干脆脆地說：

“当初一說研究农业技术，一个叫張為的老农說：技术，技术就是一陣風。那年，专署在小南庄搞試驗，种的玉米不結穗，末了当甜棒拔了，你們几个毛孩子还搞啥技术？”

“最有意思的是棉花浸种。”席瑞华接過來說，“过去他們都用溫水浸，涮一下，就赶紧捞出来。这一次，我按书本办事。队长洪宝山問：‘得多少度？’我說：‘七十度左右！’他說：‘那还中？’‘中！’我咬着牙，把种籽倒进去了。他又問：‘浸多长时间？’我說：‘半个钟头！’‘那不中，快捞出来吧！’我心中也敲着小鼓，硬坚持着浸了二十五分钟。”

“二队队长赵可俊，看了你們队的浸种，回去說：‘咱們別学一队，溫度太高，保險他們出不来！’”

“誰不担心呢？我們四队队长說：‘这要浸坏了，她有

責任!‘我負責!’棉花快出土的时候，我到地里看了三趟。头一趟碰上农民刘振雨，他問我：‘出来了沒有?’我搖了搖头。他的兩眼直勾勾地瞪着我。好象在追查責任。第二次我看时，有的棉花露了头，我心眼里真高兴。刨了刨那些沒出土的棉籽，看看它們也发了芽。第三次去看时，棉苗全出来了，就是一块低地，出得不好。”

刘振雨却向我解釋道：“那不是浸种的过，那是地勢不好。”……

談到用顆粒剂治玉米高粱的钻心虫时，更是一場風波。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农民看見他們做顆粒粉剂，便說：“嘿：棒子虫，年年有。你們做那个，白搭工!”第三队撒了半天，队长就跑去了：“咱不白搭工了，別的队上治，咱再治。燒毀了可讓你們賠!”一些社員更是七言八語。有的說：“你們想掙工分了，就送你們点工分，別費那个洋勁了!”还有的說：“那嫩嫩的尖，你們在上边撒药，还不活活地讓你們把它燒死?”这些風言風語直接冲击着技术研究員的家屬。刘中青的弟弟說：“三姐，你快別治了！不干活你在家呆着，干么挨大家的反映。”二队队长孙玉生趴在一队地里瞧，看見虫子真的死了，他才調撥了四个男劳力和两个“二不楞”(半大劳力)去配制顆粒剂。

农民是現實主义者。他們亲身看到了治虫的好处，对这些青年就另眼看待了。他們一發現虫害，便主动向他們報告：“你們快想办法治吧！眼看到了嘴的糧食，別让虫子都啃了！”

現在他們的二百亩玉米，已除治了一百七十亩，六十亩高粱也除治了一遍。在播种时，他們还用六六六处理土壤，用信石毒餌和滴滴涕拌种，毒杀和驅逐了地下害虫——蝼蛄和地蚕。

當天下午，席瑞華去帮助大队做定額種管理。張瑞琴陪我参观了他們的試驗田和留地。她滿內行地跟我讲解那是“一三八”、“四一七”紅薯，那是勝利百号，那是“五五三”號。那是农大四号玉米，那是英栗子玉米。在我的眼里却是一眼望不到邊的好庄稼。就象看天空的飛鳥一樣，沒有科學的眼光，怎能鑑別它們哪是公、母。她把我領到一块高粱地前面站下了。這块高粱如果說和別的高粱有些兩樣的話，那就是它的叶子比別的高粱叶子黃，叶子上的虫眼好象篩子底，象害了癆病的人一樣，那麼沒有生气。

“這就是三队剩下的那一块，沒有撒顆粒劑。”

“現在再撒不行嗎？”

“現在來不及了！蟲子已經钻到莖里去了。”說着她扳過一棵高粱，指給我看上面的虫眼：“留它當個反面教材吧！”

反面教材！這句話的意義多么深刻呀！

下面还是讓我摘录她日記本上的一段話吧！

一块好的木板，上面一个眼孔沒有。但釘子为什么能釘得进去呢？这就是靠壓力硬挤进去的，硬钻进去的。由此看来，釘子有两个长处，一个是挤勁，一个是钻勁！我們在學習

上也要提倡这种“钉子”的精神，善于挤和善于钻。我們办农村自学便是这样，坚持就是胜利。

要有“钉子”的精神，坚持就是胜利！这的确反映出这一代青年人的性格和意愿。青春呵，永远是美好的。青年們，願你們青春常在！

开 花 結 果

——記西鋪大队果林組

葛 文

—

长峪山的山坡上，长滿油松、栗树。长串的白色栗花落滿地，栗树上开始生长出毛茸茸的栗子。整个山坡是翠綠色的，只有一个突出的山崖，裸露出紫紅色的山石。这里搭着一个就地窩鋪，用松枝搭成，松枝經過風吹日晒，完全变成棕紅色的了。崖畔上生长着翠綠的油松，松枝象云堆一样飄浮在半空。是誰住在这窩鋪里？是一位老人嗎？不是。他們是西鋪村的几个青年人。他們年輕的就象苹果花儿那样，公社、祖国剛剛把他們培养成人，送出学校大門，便奔回故乡来，决心在故乡的土地上开花結果。

貧农女儿杜振兰，去年秋天在遵化念完高中，回到西鋪来，立即参加了秋收工作。等收完秋，一双手便磨起了血泡，滲出血来。媽媽看見这样，心疼得不行，便劝导女儿到城里找个工件干：“念书人拿不了鎌刀，找个工件干吧！”

“这不叫工作叫啥？还用出去找工作？”振兰笑着和妈妈辩驳。

“庄稼活儿苦哪！”妈妈叹着气说。

“什么活儿不苦？不苦哪来的甜？就说咱建明社，现在是三辆大汽车，还有许多胶皮轱辘车，可是当初也只有三条驴腿呀！”振兰一串话，把妈妈说的笑了起来。

妈妈说：“那就由你吧！”

振兰接过来说：“由我，我就决不当逃兵！”

振兰天天出工，在劳动中，她发现一九五六年在南山坡里栽种的一千多棵苹果树，至今八年了，只是空开花，不结果。社员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是地土薄的过，有的说是品种不好，也有的说凭咱这穷山坡能长出大苹果来？振兰想，不管怎样说，这活儿得有人做，果树得有人管理。于是她就向大队领导同志建议，应该成立个果树研究组。

国藩和杜奎也老早想到这件事，她一提出，就表示赞成。大队干部研究后，便选派下几位有文化的青年，成立一个果林专业队。这几位青年是杜振贺、魏长顺、温玉贵夫妇、杜振兰、王庆忠。

杜振贺细高个儿，一双卧蚕眉，眼珠黑而有神，不用人介绍，让识杜奎的人，必定一眼就能认出是他的儿子，不同的是杜振贺白嫩，杜奎黑瘦。杜奎黑瘦是因为从小打柴、种庄稼、打鬼子锻炼出来的；振贺白嫩，是因为从小念书，初中毕业后，又在家乡的农中教书，劳动少的缘故。

杜奎看見儿子这相，便語重心長地說：“別盡想着遠走高飛，定下心來做三年庄稼活兒，認認哪是稗子，哪是梗子再說。庄稼人的兒子不認庄稼能中？”他聽爸的話，種庄稼了。

王慶忠也是从小念書，念到二十一歲，去年在遵化師範畢了業，兜着一包包書回家來了。

老王林挺高興說：“好！咱祖輩窮，沒個識字長眼的，日子過到你這兒，這算是改朝換代了！可就是，庄稼活兒你得從頭學呀！”

過了幾天，老王林拿出一根扁擔，一條繩索，把兒子慶忠叫到身邊說：“明天跟上大隊長杜奎打柴去！”

上長峪山，上烟筒山打毛柴，慶忠从小是老手，打六歲起，哪天不背上花簍上南山割個一簍半簍呢！可是跟上杜奎到深山里去打柴，一去要個把月，聽說那荆條粗的象棍子，密的象谷子地，山陡的一腳站不穩就能滾下去，心里可犯了愁。慶忠皺起眉头，笑看着爸爸說：

“那不中哪！我扁擔不會使，繩子不會捆……”

“你……”老王林打量着兒子，板起臉：“我問你，你一進學校大門，就會寫字來？”

“不會哪！”

“怎麼又會來？”

“老師教哪！”

“着，這不对了！自個兒肯學，老師把着手教，會啦！哪個社員，天生是打柴能手，全靠後來一點一點學的。這

回去，有杜奎大队长领着，不用担心没人教你。”

“嗯，那我去！”庆忠说着扭身就要走。

“回来，不忙，”王林叫转了儿子，又补充了几句：“你听我把话说透。咱穷棒子社起家，跟哪儿起的呀？”

“打柴起的家！”

“对啦！这就是咱的穷棒子精神，以后要靠你们接续呢！”

从柴山回来，十一月初成立果林小组，庆忠便被派到小组干活。

果林小组除以上三人外，还有温玉贵夫妇，他们是从唐山果园下放回来的。还有魏长顺，这个精壮的小伙子一向是个技术迷。学开锅驼机，别人要两三个月，他只一个月就学会了。后来在唐山学烧蒸气锅炉，也常得到老师傅的夸奖。这回领导上一研究，说：“小魏，果林重要，你到果林组研究去吧！”他说：“行！”第二天就钻研起果木来了。

人员配备得差不多了，国藩想了想说：“中啊，再给你们派个领头的！”

于是，王秀峰老大爷就来领这个头。

二

秀峰老大爷和果林小组的青年人，在崖畔油松下，边收拾喷雾器，边说话儿。这时，苹果园里一片春光，果树

正在开花。秀峰大爷思謀着，对青年人說：“看，花儿开的不少，可就怕黃蓋子虫（金龟子）来咬，一咬又象去年一样空开花不长果。今年要再来个空的，咱們就对不起大伙了。”

正說着，杜振兰叫起來說：“大爷，你看，这几棵树上不是黃蓋子虫起來了？”

溫玉貴在这伙人中，是个小技师。他三脚两步跳过去一看，說：“不錯，起来了！咱們得赶快除治。”

秀峰大爷神情緊張地說：“这該死虫，說起就起，忽拉忽拉一大片，几天里就能把滿园苹果花的花芯咬得差不离……哎，真是……”

魏長順揮起有力的胳膊，插嘴說：“大爷，咱們多噴点药吧，把这該死虫全毒死！”

“不中！”溫玉貴真象老练的技师一样胸有成竹地搖头，“药噴得太多，会影响結果，再說黃蓋子虫外面有一个厚厚的硬盖，一星半点药它也不在乎。按照书上的办法，最有效的还是用人工捕捉。我在唐山果园时，就試驗过，捕捉最灵。”

“按照咱們老輩傳下的办法也是捉。只是那时一家种的是三棵五棵，現在是一千多棵……”

“这虫能捉得淨嗎？”杜振兰提出了疑問。

“能！容易捉！”溫玉貴又說上了，“每天早晨露水重的时候，这該死虫是不飞的，一受到突然的震动，就会掉在地上裝假死。咱們早晨捉就行。”

“对，就这么办！”秀峰大爷已經拿定了主意，“我这就找大队部去，明天一早多发动一批劳力，打个歼灭战。”

第二天一早，当东方剛閃出一絲魚肚白时，南山坡上已經人声喧鬧。杜奎大队长亲自指揮六个生产队的二百多男女劳力“圍剿”黃蓋子虫来了。他們按照事先的部署划片包干，只一会儿就各就各位动手捕捉起来。壮劳力用脚狠狠在树干上一蹬，刷拉拉“黃該死虫”果然成片成批掉下来。周围的劳力就象拣黃豆一样，紛紛拣起来往瓶瓶罐罐里装。

“唷，裝滿了怎么办呢？”一个女孩子尖叫起来。

“死丫头，誰叫你拿这么小的一个药水瓶，你以为是上山玩来啦？”一个妇女狠狠斥責。

“裝到我这瓶里吧！”佟大嫂子揚起了她手里拿的特号的白玻璃瓶。

“这是佟大哥的酒瓶吧！打破了，我看你准挨揍！”一个妇女小声开玩笑。

“他敢？打破了更好，省得他日夜寻思要买酒。”佟大嫂得意地乐了。

太阳从东方升起了，笑眯眯地把金光撒滿整个山头。

收工的哨子响了，人們都集中在一片空場上。

“咱们統計一下今天的战果！”杜奎站在高坎上，敞开怀，十足是他当年指揮民兵打鬼子的神气。

“我的手就是秤，大家把捉来的虫交給我一掂，准知道是几斤几两！”老高头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

“行！”許多人都鼓掌贊同。

于是，大家把捉来的虫，交給老高头一掂，他一面报了个数，一面就把虫倒了出来。几只穿了爬山鞋的大脚，象压路机一样压了过去。

这一天共捉虫二十一斤多。

接連又捉了几天，黃蓋子虫果然銷声灭迹了。

三

果林小組对这一千一百棵蘋果树，一心一意經營，至伏天，全部挂滿碗口大的苹果。最早成熟的是“伏花皮”，接着成熟的有“國光”、“紅玉”、“紅星”、“朝日”……

人們看到这紅紅的苹果，不住的笑着說：“看吧，結下这么多好苹果，这回王秀峰走路該騰云啦！”

一天，我到松枝窩鋪看秀峰大爷。他笑嘻嘻地領着我去參觀苹果园，順手摘下两个苹果給我，笑着說：“嘗尝，嘗尝，苹果和蘋果不一样，咱西鋪的苹果，甜！”

“就是甜！”我咬了一口，品出味儿不錯，便說：“你們还可以多栽植一些！”

“是要栽植呀！我們今年弄了一个苗圃，就在我房后头上坎。”

“秧苗也卖嗎？”

“不卖，也不买，咱是自給自足。”秀峰大爷傲气地立在崖头上，指指烟筒山，只見半山腰一片青松葱郁。他

說：“那也是这几年栽种的，青松下面的坡里已經栽下枣树。将来，那里是西鋪的枣园。再过去那个小山脑，起名叫做馒头山，前年已經栽种下核桃数千棵。这两处，現在都用石灰圈起，禁止放牧。”

掉轉身來，秀峰大爷又指着对面的长峪山說：“別看那边是青松滿坡，空地还是有，今年春天，杜奎領人栽上千多棵杜李，計劃明年再栽种千棵柿树和苹果树。再过十年你来看，这里又是一个样儿了。”

秀峰大爷說得自己都哈哈乐了。他望望长峪山，看看烟筒山說：“这山上的树木全归我們經管呀，就连河灣那边六里长的防洪林，也是！我們的任务，就是变穷山为宝山。”

“对，整治苹果园，这不过是我們工作中的一小部分。”杜振兰說。

“看吧，果树有开花，有結果，我們年青人也要在这儿开花結果哩！”王庆忠捲起胳膊說。

山村讀書聲

長 正

晚上，我到西鋪去找國藩同志。在大隊遇見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上身的白背心，緊緊地系在褲腰里，下身的舊黑布單褲，褲腿高高的綁過膝蓋，一雙家做的山崗子大鞋，毛邊往四外飛着。他高高的鼻子，沒留發，一对不大的眼睛眯縫着，兩嘴角往上翹起，一個勁兒瞧我憨笑。

“這小伙子是誰呢？”我一邊端詳他，一邊猜想。

國藩向我介紹說：“你不認識他？是王生的二兒子。”

啊！這是个生在黃連樹下，在苦海里跟着爹媽，抱瓢拉棍，東村討，西庄要，吃“百家飯”養大的苦疙瘩呀！

我緊緊地拉住他的手，問道：“你叫啥名字？”

“我！王慶宇！”他那雙又厚又硬的手滾熱。

“三橫一豎的王，慶祝的庆，下雨的雨，是嗎？”我恐怕記不結實這個名字，又釘問了一句。

“不！”他搖晃了一下光光的腦瓜兒，解釋說，“不是下雨的雨，是宇宙的宇，一個寶蓋，下邊一個子勾子；就是天地很大的意思！”

我說：“這名字起得好。你念過書吧？”

國藩同志接過去說：“敢情。他長在福窩哩嘛！”說着，向我伸出四个指頭，“初小畢業！過去從小要飯，他爹媽怕養不活他，差點兒沒把他送了人。要不是解放，上學識字，哪兒輪到他了哇！”

我問王慶宇：“是嘛？”

王慶宇低着腦瓜兒，嘿嘿傻笑了兩聲。這時，我見他腋肢窩里，夾着一本書，打開一看，是本小說《暴風驟雨》。我問他：“你能看下來嗎？”

他說：“對付着往下溜唄！”

第二天是个雨天，我到王生大爷家去串門，雖說進了二伏，可是大門上春節貼的對聯，字迹還清清楚楚的呢。

王生大爷沒出門，他的老伴正和兒媳婦，還有串門的老大娘，正在忙棉衣。王慶宇光着膀子，趴在炕上，黑汗白流地正查字典，原來是他講說《暴風驟雨》，遇上了“拦路虎”。

我見他嘴里不住地念叨，子、丑、寅、卯……“字典”東一本兒、西一本兒的摊了多半炕，這是一部古版“老康熙”。一問才知道，這是慶宇新近從集上花六塊錢買來的。我說：“你為啥不買本新式的呢？”

他抬起光光的腦瓜兒，說：“那種字典里邊的字兒，不如這個全啊！”

“你會使嗎？”我問。

“瞎捉摸唄！”他說着，两只眼睛又眯成了一條線，傻

呵呵地笑了。这双笑眯眯的眼睛里，透着伶俐和自信。

王生大娘缝着棉袄，斜了儿子一眼，对我說：“你看他笨得老雕似的，心气可大呢！”

王大娘这话，谁都听得出来，她是正話反說，把儿媳妇都逗得忍不住抿嘴笑了。她停下針綫，偷偷地瞟了一眼北墙。順着她的眼神，我才看見墙上，貼滿了一幅幅用紅、綠、黃、藍各色各样的油墨写的篆体民歌。字儿清秀、洒脫，看上去滿艺术。虽是小篆，我也认不大清，連蒙带猜的，費了好大力气，也沒认全一首。最后，还是經庆宇指点，才把一首民歌勉强溜下来。

从王大娘的嘴里，我得知这首民歌，是庆宇的新作，特抄录如下：

幸福人来幸福天，
幸福不忘搞生产。
建明公社幸福园，
雄心壮志劲冲天。
毛主席的好领导，
咱们生活美无边。

你見了这首民歌，一定以为是用毛笔或者画笔写的。不，这是沒經過师、沒学过艺的王庆宇，用高粱秸瓢儿，沾着油墨，按照《康熙字典》，东拉一横，西凑一竖儿，一笔一画地用心勁拼起来的。它使我想起建明社人，搞土改、打鬼子的那股狠勁儿，办組建社那股坚决勁儿，开山劈岭的

那股猛勁儿，植树造林那股心切勁儿。今天，我又在建明社人身上，看見学习文化这股钻勁儿。这不正是“穷棒子”精神的具体表現嗎？

我們的話題，很快就轉到学文化上面来了。王生大爷告訴我：他小时候，姥姥給他媽媽包了一包旱烟叶，叫他帶回来。日子不久，姥姥来追問：“我那張包烟紙呢？”

媽媽指着窗戶說：“我糊在那上头咧！”

“哎呀！我的活姑奶奶，这不要了我的老命了嗎？”

“怎嘛？”媽媽見姥姥急得滿头大汗，一时也吓呆了。

姥姥叭叭地拍打着炕沿說：“那是地契文书呀！”

后来，只好摆酒請人，另写文书，重新花錢“税契”。

王生大爷的故事，把滿屋人都逗乐了。他眨着那双不得力的眼睛說：“乐啥？这是实事呀！”

是呀！我早听国藩同志說过，解放前，西鋪一百多戶人家，識文斷字的只有几个富农、地主。穷人沒文化，开门过日子，为难受蹩甭提，就拿抗日时期办公來說，那时区里来个通知啥的，自己人不識字，只好藏起来，直到区上来人催，才知是叫人去开会，因为这个，沒少誤事。有一次武装班长杜奎接到一封由南边姚家峪轉来的鸡毛信，他立刻派人按照老規矩，照例往北送到王市庄，人家不收，說信是写給炸糕店的，送信人只好滿头大汗地跑回来。

王生大爷說：“成立农业社以后，庄里一办民校，我就說，咱们这一翻身入社，家里社里的事儿多了，非得学习

点字儿不行。如今毛主席、共产党給咱們办了大学堂，不花錢，不拿物，不用摆酒席請先生，再不能因为不識字受轄治了。我的眼不行了，你們一个不拉，全得去！家有家規，校有校章，到那兒要听老師的話，学习起来要一根腸子，不能三心二意。”

王大娘接过去說：“当时我問了他句：‘我呢？沒牙笨口的，头发都白啦！还去嗎？’你猜他說啥呢？”王大娘說着，学起王大爷的腔調來，“‘你耳不聾，眼不瞎，为啥不去呢？’你看他有多霸道？”說着，大笑起來。

“我那是为你好哇！”王大爷也笑了。

“这話不假，不叫人家王生催的緊，你能在全村报模范？”串門的老大娘也出来帮腔。

真的，如今这年过半百的王大娘，不但当了学习模范，还学会了作詩、写信、讀報、看书、記日記。我在她家，讀到她一九五九年記在袜底板儿上的一段日記，上边写的是：

今年过春节真好！各位党委书记，都到我家来拜年，成群結队，热闹非凡。沒有毛主席和共产党，我过不上这样春节。記得有一年三十（日）晚上，人家地主家鸡鸭魚肉，挂灯放炮，鑼鼓喧天；我家清鍋冷灶不冒烟，討飯都沒处去討。那年月再是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骨。如今毛主席来了，我們才过上幸福生活。

当她拿到扫盲毕业证书的第一天，她写了一封信，亲

自托咐一位从北京来的同志，帶給偉大領袖毛主席。這是她有生以來，頭一次越過千山萬水，用文字表達自己多 年來，一直埋藏在心裏的對黨、對領袖的熱愛和感激呀！

我發現屋里的瓶子上、罐子上、葫蘆頭上，都貼着小 紙條兒，上邊寫着：菠菜籽、窩苣籽、蘿卜籽……

· 我以為這是为了使用時好辨認，經王慶宇一說，我 才知道，這是“見物識字”。更新鮮的是，王大娘她不僅是兒 媳婦的婆婆，還是兒媳婦的文化教員哩！

扫盲工作結束快十年了，可是這一家人，在學習文化 上，不論老一輩的，還是少一輩的，都在一步一個腳印地前 進着，追求着。

一個人的一輩子，最難忘的是他的領路人。一個文 盲，摘掉帽子，睜開眼睛，怎會忘了她的啟蒙人呢？

我和王大娘談天的時候，曾幾次提到她的老師佟印。 佟印是什麼人呢？

有一天，我在街上遇見他，個頭不高，粗粗實實，一張 黑紅黑紅的長方臉，雖在二伏天，他還穿着祫子，這在鄉 間是很少見的；說起話來，嘻嘻哈哈，是個“樂天派”。 他父親被日寇殺害。佟印從十四歲就在遵化城裡給地主 扛長活，整整八年。土地改革以後，他和杜奎參加了互助 組，轉初級社時，他是二十三戶之一。入社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跟隨杜奎遠征過王寺峪，進山打過柴。這個貧苦的雇農，是個精明好學的人，庄稼活路、副業手藝 不論，單說看書識字，那真有點“魔氣”勁兒。解放初期，

他家厢房住着个小学教员，名叫李坤，佟印整天围着他屁股后头问天问地，问东问西。在上山打柴时，他成了这伙“穷棒子”里边的“土秀才”，学文化这一课，就由他来承担，连他叔父佟瑞芝（原来是他们互助组的大组长），也成了他的学生。

打柴下山以后，一九五四年政府号召扫除文盲，县里来了通知，叫西铺去人受训。国藩找到佟印，说：“佟印，要扫盲了，县里要训练教员，我看你去吧！”

这个突如其来消息，把佟印吓了一跳，他直眉瞪眼地说：“王主任！你可别拿我打哈哈，西铺谁不知道我这两下子呀？”

国藩说：“这可不是玩笑话！”

佟印说：“四条腿的兔子要能拉车，谁还买大骡子大马呀！”

国藩也知道佟印确实有他自己的难处，便开导他说：“人都是学而知之，哪有生而知之的呀？你不去，你看西铺谁中？”

佟印说：“没人去，我也不敢去！”

国藩说：“佟印啊！咱贫雇农不去，叫地主、富农去吗？”

佟印一听这话可急啦，他一把抓住国藩的手说：“那可不中！”

就这样，佟印到县里受了半月训，回村来担任起扫盲教师。

头天开学，见台下一百二十四名男女学员，都眼巴眼望地盯着他，他的心跳起来了，大脸憋得嫣紫，后脊梁热汗直滚，手里的粉笔，在黑板上跳起舞来。

当他从这一百二十四双眼睛里，看到的是对他的期望、鼓舞和热爱的时候，他想到从前坐在这里的是地主、富农的少爷小姐，今天坐在他面前的却是自己穷苦的伙伴——今后的江山，都要由这些人来保，来建設……觉得肩头上有点沉重，一颗狂跳的心，才慢慢地平静下来。

民校办起来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在整个西铺展开了。他们根据不同人的具体情况，办了集中班，干部班，小孩媽炕头組。采取了个别傳授，送字上门，包教包学，互教互学，見物識字等形式。在雄鸡三唱的清晨，在烈日炎炎的中午，直到星光满天的深夜，地头上、深山里、灶门前、井台旁、饲养处、果树下……朗朗的讀书声，响彻着整个西铺村。

人多了，笔、墨、紙張、书本、灯盏、煤油，开支越来越大，佟印找国藩想办法。国藩說：“花錢現成！”他往村外四周大山一指說：“这都是咱們的搖錢树！”

为了給民校筹办經費，男的拿上镰刀，扛起扁担，进了深山，去砍柴；妇女提上镐头，挎着花簍，爬上断崖峭壁，去挖药材。有名的省三八妇女紅旗手、共产党员赵美荣，那年刚刚結婚，听说有四个孩子的四嫂子韓玉珍，得了学习模范，一心要和她賽一賽，这个平川上来的姑娘，和小姐妹們一齐登上大长峪，去挖“知母”。头天晚上，村

里人就傳开了：“新媳妇的新鞋踩飞了，光着脚下了山。”这并沒把赵美荣吓倒，第二天，她又上了山。

三天以后的夜晚，男女学员們用自己的汗水，点亮了西鋪民校里的大汽灯。白花花的光芒，照得屋里院內，一片雪亮，连天上的星星都羞得合上了眼睛。从此，民校里的大汽灯，长明不息，永放光芒。

現在西鋪大队的六个生产队里，个个队长，都摘掉了文盲帽子；当时的学员們有的担任了党、团支部书记，有的当了拖拉机手，果树技术員。建明社的人們，掌握了印把子，枪杆子，現在又敲开了“文化”的大门。全国聞名的“穷棒子社”，从此成了文化乡。

1963年夏二伏于西鋪

老 管 家

司 丁

穷棒子社刚开办的时候，社办公室里炕上没个炕席，地下没条板凳，门旮旯里把条帚也没有。头一年办下来，天上地下地翻转过了。小戴存自个分下两千五百来斤粮食，房子、地赎回来，四个妹妹接回家来。“轰”的一下传遍了庄稼，‘组织起来’，这好比一步登天呀！大伙爱起这个农业社了，纷纷要求入社。一九五三年冬天，社扩大成八十三户，屈福常大爷进社里来了，这年他五十四岁。

这时候的社，不再穷得梆梆响了，社里已积累起了财富，院里院外，柴柴草草的，多起来了。

屈福常大爷干完活计，总爱一个人来到社里，和人说说话，看看社里有啥新鲜玩意儿。一来到社里，他总是拔不脱脚：眼前几绺麻绳头子，他弯腰拣起来；身后几根上了锈的铁钉子，他又弯腰拣起来；横七竖八的筐籃、簸箕，收拾起来挂在墙上；脚底下的毛柴碎草，归置到灶火洞里。每次来遛达，每次都不清闲，好象这些活儿单单留给他似的。

这些都被王主任（国藩）看在眼里。国藩心里思谋：

“咱們農業社正缺少这么個可靠人呢。”他就找到屈福常大爺跟前，對他說：“大叔，咱社里里外外滿眼的東西，得有個人經營才行哩，我看這事交給你辦吧，你就給咱經營起來吧。”

屈福常心想：“社信得過我，我就經營起來，東西損耗了是大伙的損失。”他嘆噓笑了，說：“你看我行嗎？經營得了嗎？”

國藩說：“中！”

從此，老漢就當上了社里的保管員，用他自己的話說，當時沒起這個名兒，不知道啥叫保管員。可是知道一樣：東西絲毫不能叫虧損了。哪怕是一根毫毛，也全是大伙的心血換來的。從此，他更是兢兢業業，認真負責。八十三戶的財富就是屈福常的財富。

老漢从小，家里沒有一間房，沒有一塊地，沒衣服，也沒鞋袜。餓得支撐不住的時候，就溜出村外，捋點高粱粒，拔几棵大葱，墊墊肚子。嬸子大娘瞧見了，心疼得不行，悄悄把他拽進屋去，給他點稀粥喝。他从小顧面子，第二次人家再讓他喝粥時，就使勁挺起肚囊鼓圓氣，挺着腰板，拍拍肚皮，對嬸子大娘們說：“看！我這是吃飽的架式吧，肚子有多大！”這一說，人家也就當他真吃过飯了。

有一回，屈福常爹被債主逼走了。家里過不了年，孩子娘拆倒一座隱壁牆賣了，買回來三升紅高粱。剛說要捏幾個大餃子給孩子們過過年，債主王鳳春他娘討賬來了，坐在炕上不走。屈福常他媽悄悄把三升紅高粱藏在雞窩

里，直到半夜三更，乡亲邻居们过来，好言好语把王凤春他娘央告走，才把这三升高粱拿出来。屈福常的妈一边捏饺子，一边掉着眼泪。

屈福常长到十九岁，给财主贼六子扛长工。扛了二十多年，越扛长工，越过不了。第二年的工资，头年就折成粮食吃没了，身后还跟着三分的利息钱。要不减租减息，他可是永辈子也喘不过气来呀！减租减息政策下来时，屈大爷心里多痛快呀！三百八十吊钱的饥荒，一下子就清还了。土地改革，又分下四亩三分好地，自个刨了几亩耩头地，光景缓过气来。一九五三年冬天，屈福常参加了农业合作社，第二年就分下三千多斤粮食。

“这，这不是做梦都梦不到的事呀！”老汉心里感激共产党和毛主席，全身上下长了劲儿。

屈福常大爷不识字，当保管员没文化困难真叫大，一天天经手的东西很多，光凭脑子记是有困难的。他不会写字，就在墙上画，借了一张犁，在墙上画个犁头；借走簸箕就画个簸箕，墙上满处画的圈圈道道。后来他不画了，就请人家写个“犁”字贴在犁把上，“簸箕”贴在簸箕上。他就这样天天写天天认，学起文化来。

社扩大以后，社部搬到贼六子的老式瓦房院。牲口棚、猪圈、羊圈，全在一块儿。羊倌、猪倌、饲养员、车把式，也都住在一块。屈福常大爷只要腾出空儿，他就帮饲养员铡草。有一回，他发现干草堆里夹杂着几棵谷穗穗，就仔细挑拣起来。日子长了，谷穗子攒下一大堆，上碾盘

上一軋，一簸箕！哈，不多不少，恰好是一斗，交給了队里。大家看着这一斗谷子，不住地贊揚起屈大爷来。

屈福常大爷憨厚地笑笑，說：“东西来的不容易，不能糟蹋呀。”

老汉不仅爱惜东西，手底下还特別勤快。他看見飼养員使坏了簪带，就悄悄拾起来，从中挑出还能用的，再一捆綁，就又当成一把新的使用了。

社里人多手稠，屈福常虽时常提醒大伙爱护財物，小心使用，但家具总免不了要损坏。他看見打水的铁桶子漏水了，不修理，坏大了，又得換新的，要花成笔錢。老汉就捉摸着自己修理，不会焊活，他就跑到铁匠炉子上学。然后就拿該收拾的铁桶子試驗，果然能成，还挺結实。老汉欢喜极了。往后，他就把全社所有漏水的铁桶子都修补好了。大伙夸奖，老汉却笑了：“这有啥？修修补补唄，穷家过日子，不能把东西不当东西。东西来得不易，心血呀！全是大伙的心血。”

牲口套坏了，屈大爷拿起一寸长的粗針縫补套包；麻袋破了洞，往外漏东西，老汉又把麻袋縫补好；羊圈門坏了，他学做木匠活儿，三斧两斧修成个柵栏門子；驴棚漏了，他爬上頂棚，堆泥砌磚，把頂棚拾掇好。对待庫房，那就更不用說，該抹的抹，該泥的泥，保管室一嶄如新，不冷不热，不潮不湿，不髒不乱，什么时候都是整整齐齐，有条不紊。

屈福常大爷經過刻苦钻研，工作上摸索出一套办法。

不論是保管籽种，还是保管粮食，他保证做到不霉不烂。玉米高粱入囤前，都是晒得干干的；他还向产麦区学来了經驗，把麦子晒得滚烫，然后入庫。为了节省，粮食囤的圍子不用席子，因为一領席子十几块錢，破費太大，他一律用秫秸圍子。为了避免潮湿和耗子咬，他在仓库地上先垫上一层細沙子，耗子爬起来滑脚；沙子上面再鋪上一层荆条，用秫秸把墙給隔开来，免得发潮，然后再編上圍子。

高級社那年，粮食堆成山，三十万斤交给屈大爷保管，沒損耗一顆粮食粒；梨、杏、核桃、栗子、鸡蛋，交给他多少，出来还是多少，从来沒霉过，也从来沒烂过。他說：“不要說交給我这么多粮食，这么多东西，哪怕是一顆粮食，一样东西，咱們来得不易，也不能叫它損耗了。”

除了保管，他还兼任喂猪喂羊。大老克（老母猪）下了十三只猪娃子，屈福常看管了三天三夜，恐怕老母猪瞌睡勁儿大，一奶头堵死猪娃子。第三天头上，他剛回家休息一下，忽然半夜里下起雨了。他赶紧摸黑起来，跑到猪圈里一看，雨水灌进猪圈了，猪娃淋得象水罐子。屈福常大爷一脚踩进水塘子里，一只一只把猪娃抱出来。深秋天气下的是冰流子雨，老汉冻得够嗆，但他心里想的只是猪娃子的安全。

有一次，羊倌抱回一只小羊羔，下生才五天，就把老羊折損了。羊羔餓得咩咩叫。屈福常大爷心疼起来：“想个啥法子能叫这羊羔子餓不死呢？”想来想去，想起到别的羊群找奶子喂小羊。下晚羊群回来，屈福常抱上小羊

羔，顛來跑去找奶子。這母羊有點私心，不是它養的，貴賤不喂。屈福常真有耐心，想方設法地哄的母羊肯喂奶了，小羊羔的性命保住了。這沒腦子的小羊羔也似乎有了腦子，不知是亲热还是感激，只要屈福常兩脚在羊圈里一站，它就湊上來趴在他的腳背上。老漢慈愛地摸着羊羔身上的細毛，自言自語道：“畜類物件，通着人性哩，”滋滋地樂起來。

屈福常大爷自从当上了保管員，寸步不离保管室。回家吃饭，临走时他总要到处查查看看，把一切安顿妥当了，才肯走。很多时候，黑夜他也睡在保管室里。有一回，家里老伴生了病，叫他回家去。他不放心晒在房上的一千来斤棉花，临走，他直起脖子看天，見是个晴天，沒一絲云彩，放心地走了。不料回家睡到半夜，猛雷猛雨鬧起天来了。他騰地一下坐起来，顧不得穿衣裳紧跑慢跑，跑到保管室，三爬两爬，爬上房頂，一趟一趟把棉花都抱下来放好后，嘴里才嘘出一口气：“老天！一千来斤棉花，是儿戏的嗎？”他把仓库門鎖上，才蹣跚地走回家。一进家門，老伴可就一指头指在老汉的腦門子上：“你心里只端着公家，家丟給誰呀？你看，咱家房上晾的白薯干全叫大雨淋坏了，我看你秋后吃啥。”

屈福常压着肚里的火气，不和她計較，心里話：“先公后私嘛，我不能撇开社里的棉花不管，先顾自个儿的白薯干。人心要知足，福中要知福，你过門那时光，家里有啥？現在熬到这步田地，还不是全仗着社嗎？分家时只分来

半截破缸碴子，再就是三百八十吊錢的饥荒，現在家里三間白光的新瓦房，紅漆躺柜，穿衣鏡，馬蹄表，儿媳妇穿上制服褲子，你还不知足嗎？七百斤白薯子算得了什么！再說天晴了，还可以晾嘛！”老汉看看天，已快亮了，一甩袖子，站起身，直端端又往社里来了。

第二天，他正忙着干活，大伙“忽”一下子把他圍严了，老汉歪着脖子問：“你們這是干啥？”

“开社員大会，表揚你哩。”

“我有啥表揚头？”

“你爱护公共財物，爱护社里的棉花，大公无私，應該受到表揚。”

屈福常張开嘴乐起来：“这点事情，值得表揚一場？昨晚差点沒把我急坏，你們知道，一千来斤棉花來得不易哩。”

有个調皮的青年接着他的話說：“是大伙的心血，对吧？”

說得全場子的人都乐起来，屈福常也乐起来。

大伙乐，乐的是屈福常当了模范，受了表揚。屈福常乐，乐的是社里一千来斤棉花沒有受到絲毫損失。

屈福常十年如一日，他愛社如家，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工作上从未出过差錯，遇到困难，就想法克服，做出成績，不驕傲，不自滿，他由文盲一变而成为西鋪村的文化人，成了模范保管員，被选为县人民代表，出席了人民代表會議。

新“伙計”

东木

“伙計”，是飼養員張珍對牲口亲热的称呼。

八、九年来，他一直和牲口打交道，彼此好得真象是称兄道弟的伙計。

他原来是西鋪大队的飼養員，这回下放到了二队，也是不改老行。看吧，他在飼養棚前一站，黃驥子、黑驥馬立即豎起耳朵，踢蹬着腿，昂头摆尾地听候吩咐；灰毛驴、老黃牛全都睜圓大眼，巴咂着嘴，恨不得一下圍上来。他罗罗一声叫喚，猪娃們象賽跑一样，望他跟前冲来。

說起怎样結識新“伙計”，他的話象綫团一样，是有得拉的。

—

扩大社那年，牲口棚里一下“伙計”增加了。

“老伙計”的品性脾气，他是一匹一匹全摸透了的；“新伙計”的品性脾气，却还是一匹一匹都陌生的。他提了一桶水，挨次先飲驥馬。飲到一匹毛色象黃綵似的儿馬，

它一埋头就咕嘟——咕嘟不歇气地喝起来。張珍想：“好家伙，这定是匹激辣貨，要象这样喝下去，不伤水才怪！”他用力一推，想把水桶推开。誰知儿馬“唿嘟”一个响鼻，双耳“唿而”一竖，右前蹄提起“拍塔”就踢。这个全面的抗議，使張珍吃了一惊，心想：“好，好，你这家伙还善要流氓呢！送你个渾号叫儿馬蛋子吧！”他赶紧用左手使劲一托馬嘴，右手使劲一挪水桶，才挪开了。接着是飲驴和牛。飲到一匹毛色象黑漆似的大驴，它埋下头喝几口就抬起头不喝了，嘴边却流着长长的涎水。这是为什么？張珍心里刻上个問号。飲过水，就給牲口开飯。新鮮的草料里，拌上了花生潤籽餅，又香又脆，抵不上小灶也該是中灶的标准了。一会儿，牲口棚里奏起了奇妙的音乐——一片“切嚓，切嚓”的牲口进料声。作为飼养員听到这种音乐，心里是蜜甜的。他竖起耳朵，細細欣賞着，辨別着。“嚓、嚓、嚓”吃得又快又急的，又是那匹儿馬蛋子；“切一嚓，切一嚓”吃得特別緩慢的，却是一匹青驥馬。馬吃料一向是武勢的，这一匹怎么这样斯文？他特意繞过去看了看，青灰色的毛油光閃亮，骨架匀称，膘肥肉厚，是匹壯馬，不会有病。拉出的屎却特別，一疙瘩一疙瘩就象驴糞球。这又是为什么？張珍心里又刻上了問号。

为了摸透新“伙計”的品性脾气，他决定先向老主人請教。儿馬蛋子原来是老桂家的。老桂听張珍一說，笑道：“对哇，对哇，我这匹小搗蛋就是这个德性，拉車走道是没有够的，喝水进料也是不要命的。平常它拉車回来，

我是不管它是饥是渴，先吊一袋烟时间，让它喘过气再说。饮水也是分三次饮，第一次少饮一点润润嗓子，第二次饮个七八分，第三次再补饮一点。不这样不中呀！一头牲口顶半拉日子，一闹病，多花钱不说，工也耽搁不起呀！”张珍说：“对，老桂，我也一定照你这样喂它、养它。”

黑走驴的主人是老佟。他家原来开了个豆腐房。他听张珍一说，裂开嘴笑道：“这个，我也不知啥原因哟。刚买来时，倒不是这样，后来不知怎的变呀变的，就变成这个流涎货。别的病倒是没有的，拉磨什么的，都挺壮健。”张珍说：“你平常都喂点什么呢？”老佟说：“还不是草料！渴了，就给它喝豆腐水和粉浆水，开始挺爱喝，后来慢慢就不大爱喝了。”张珍说：“这样，我回去另找原因！”在路上，他想呀想的，八九不离十，已想出其中道理来了。一定是喝多了变质的豆腐水或者粉浆水，有点伤了脾胃，所以到后来连这样有滋有味的东西，也不爱喝了！流涎就是这样引起的。他决心要针对这一点慢慢进行调治。

青驥馬原来是老祥家的。这几天，老祥出门了。他老伴听张珍一说，一口一个大叔，叫得亲亲热热：“咱这马，确实两样哪！听咱当家的说，这叫盘肠马，肠子细，所以吃食慢，屎拉起来一疙瘩一疙瘩象驴粪球。但是只要细草细料，一天多喂几遍，膘长得快，力气也可大着哪！你没见咱那当家的，一夜都要起来两三遍，喂这个馋嘴货。哟，大叔你也是有经验的人，一定知道马无夜草不肥的道理。听说你一夜都要起来三四遍，这，这比咱当家的

还要强哪……”張珍知道老祥家里的爱叨叨，如果让她一直說下去，就会从摘棉花說到卖估衣，沒完沒了，于是切斷她的話說：“大嬸子，你这一說很好，我也一定照着老祥叔的办法来喂养。”說完，就辭出来。

新“伙計”的情况摸清了，張珍就坐在炕头一面抽着旱烟，一面琢磨計劃：

社里提出的，明年要展开大生产运动，粮食作物等要增产一成半以上，这就需要再进一步精耕細作。具体拿咱喂牲口的來說，就需要把头头牲口都喂得膘肥力壮，才能支援春耕。老話說：“早喂喂腿，晚喂喂嘴”，如果今冬不精心飼养退了膘，开春以后哪怕天天用好料催，也不赶趟了。但是，牲口的粮食定量是有一定数目的，在这方面决不能大手大脚。相反的，今冬还要小手小脚节省下几百斤来，才能在开春大忙日子里給牲口开小灶。对，就这样办：从今天起，草料再切得細些，粮面扣下一点但拌得匀些，少喂勤添，让它们每回都吃得又香又脆。自己晚上多起来几遍沒啥，一定要让它们吃饱、喝足、休息好！那几头怪脾气的新“伙計”，嗯，不用說，一定要額外照顾！

二

第二年，果然又大丰收在望。中秋的一天下午，王國藩对張珍說：“县运输队有一匹病馬，在咱乡兽医站治疗，由于病得太久，瘦弱得很，回不去，咱帮他們飼养一段时

箇中不中？”張珍說：“中是中，但咱沒有經驗，飼養不好，給它病上添病，豈不笑話！”國藩說：“經驗是可以摸索出來的。你剛當飼養員時，哪有現在這樣的能耐。這回再鍛煉一下，說不定技術還可以往上提一步。再說，這也是咱社的對外關係問題，一定要把它搞好。”張珍聽國藩這樣一說，当场就表示：“那麼牽來吧，咱社主意就是！”

病馬抬來了，剩下骨头架子。

根據兽醫的介紹，這馬由於得了嚴重的寄生蟲病，胃已經穿孔。眼下寄生蟲雖說已打下來了，但胃腸的消化機能已十分衰弱，需要經心調治一兩個月才能復原。

張珍先在特辟的小屋里，鋪上一層細軟的谷草。病馬躺下後，他就扳開馬嘴灌進去半瓢微溫水。隔了半小時，又扶起它吃了點拌好的嫩草細料。社辦公室里有一只新買的小鬧鐘，他就去借來上足發條放在炕頭。每隔三小時小鬧鐘叮令令鬧一陣，他就趕快放下旁的活計去給病馬喂水喂料。有時還邊走邊叨咕：“瞧，要是沒有聽見，又該耽誤了。”每天上午，太陽好，又沒有風，他就在室外鋪上谷草，把病馬牽出來晒太陽。要是一起風，又趕快牽進去。這樣經心經意飼養了半個多月，病馬果然神氣好起來了，食量也逐漸增加，張珍一進去，它就啞嘴擺尾，表示歡迎。

張志文，也是社里飼養牲口有經驗的庄稼人。為了給病馬遛遛腿腳，吃點鮮嫩的草葉，張珍就和社里說好，要張志文把它牽出去放放。這個老實巴結的老頭，對放

馬实在认真，回回放的是头水好草。每次回来，从馬的神色上也可以看出吃得好，遛得够。

一天，上午是个晴明的好天气，張志文又放馬去了。誰知快中午时，突然雷轰电闪，阴云四合，眼看就要下雨。那时，張珍正在給一头老黃牛撓痒痒，只听他“啊——”的一声，就将撓到半路的撓笆子丢了。老黃牛惶惑不解地瞪着眼睛，噴着响鼻。他可顾不了这些，三脚两步跨进房，抱起一条破被子就往南山梁赶去。他不时用一只右手摑在嘴上大叫：“張——志——文——”

其实这时張志文已經抄小路把病馬快牵到附近了，但他是个半聾子，天上打雷还差一点沒听见，何况張珍这点儿叫声。他仍然按照自己不紧不慢的步伐，牽馬前进。身上穿的破褂子早已脫下盖在馬身上了。張珍先向远处了望，見沒个踪影；就回过头来看近处，发现張聾子已穿到身后了。他又好气又好笑，几步窜上去，重重喊了声：“聾子——”張志文才猛一回头，見是張珍，裂开嘴乐了。两人就把破棉被也蓋在馬身上，往回走了一阵，急雨已洒开了。好在离飼养处已經不远，紧走几步也到了。人挨了点澆，馬却一点也沒澆着。

这样精心飼养了近两个月，这匹白馬已經完全复原了。毛色象銀綵似的，油光水滑。一昂头一摆尾都显得神丰气滿。一天，运输队里一个同志来看这匹馬时，简直不敢认了，他十分感激地说：“真亏得你們，不然，这副骨头架子怕早入土了！”馬牵回去了，两方面兄弟般的情誼，

成了长流水，尽日欢唱。

約摸过了半个来月，一天，这匹儿馬蛋子忽然病了。平常那种威武抖擞、調皮搗蛋的神气全不見了，搭拉着头站着，渾身直哆嗦。兽医檢查說是肺炎，打了針还要灌药。張珍就象看护亲人似的，一直在旁边忙碌着。

这一天，正好是張珍生日。他老伴早就叨叨过了：“早先咱穷得梆梆响，嘴也糊不住，哪管什么你的生日，我的生日。如今分了地又入了社，生活一天天好，今年又是丰收，咱也喜庆喜庆，我給你弄点好吃的……咳，你这老鬼也早点回来嘛，牲口棚里一不屬金，二不屬銀，成天起早貪黑死守着为哪般？下地干活也有个时间，管牲口的就連吃頓飯都支使不开？天天要等，頓頓要候，真是煩死人了……”論口才張珍是比得过他老伴的，再說有些落后話认真駁起来也容易。但張珍也确实有两怕：一怕自己說一句，他老伴叨三句五句，沒个完；二怕爭端一开，劳神費力，自己吃不消。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他老伴一叨叨，他就抽烟、閉眼睛、打呼嚕，以簡制煩。今天要給自己做生日，这句話張珍是記住了的，而且还当面点过头，答应早回来。

他老伴破例地晚上也做了頓干飯，炒了一小盘粉条，还蒸了两个鸡蛋。太阳一衝山，她就准备好了，可是左等不来，右等不到，站在門外瞧了瞧，也是不見影子，而下地的早已回家了。她有点恼火了，決定亲自上飼养处去找，可是一出門，心里就敲起小鼓：飼养处里人一定很多，人

家要是問起，怎麼說呢？两只脚走着走着就慢下来了。迎面剛好碰上了調皮鬼李賀。她問道：“小李，你知道咱那老的，現在在干啥？”小李一向愛說俏皮話，沒正經的說了句，“抱了匹黃驥馬在亲嘴呢！”這一下，可把她氣慘了。趕緊回头，到家搬出鸡蛋炒粉，和小丫头兩人就稀里嘩啦吃了個光。

張珍給兒馬蛋子灌過藥，直到它發了汗，呼吸也逐漸勻稱了，才放下心來。他一看小鬧鐘已九點多了，一下忽然覺得自己肚子餓了，做生日的事也想起來了，向人交代了几句，就往家走。

一到家，黑燈瞎火，他老伴早睡了，叫了幾聲，也不見答話。他知道睡是假的，生氣是真的，为了避免麻煩，就自己动手掀鍋。見鍋里雖說沒有別的菜，但還留有干飯，就盛了起來狼吞虎咽扒了兩碗，又到飼養處看望兒馬蛋子去了。

三

因為牲口棚里的牲口一天比一天多，有幾頭還要下崽，社里經過考慮，就把劉占生也調來擔任飼養員。

劉占生的年歲比張珍輕，原來在生產隊干活。他有個毛病，是耳朵沉。對他說話不吊起喉嚨喊，簡直聽不見。兩人分了工，張珍管晚上，劉占生管白天。

飼養員這活計，甘苦滋味和在生產隊干活是不一样

的。寒冬腊月，早晨冰杖子象长枪短劍一样挂在屋檐头，遍地严霜雪雪白，一般社員还可以再在热炕头上猫一猫，飼養員却無論如何得起来为牲口服务。張珍每次看刘占生起来接班，总是上排牙齿喀喀敲着下排牙齿，心想：“大概他这件破棉袄不抵事，要不然就是不习惯。”他把这件事向溫支书汇报了。溫支书說：“咱们帮他鬧件新棉袄吧！”就想法湊了八尺布給他。不久，刘占生果然穿上了一件青布新棉袄。張珍又暗下注意，发现这个年輕人現在起来接班，牙齿虽然不敲打了，但是眉头还是打着疙瘩。他有意找个机会大声問：“老刘，早晨冷吧？”刘占生带点情緒地说：“有啥法，冷也要起来呀！”張珍一听話里的意思，还是有意見，就把自己值夜班的時間拉长，想让他多睡一会。可是刘占生却象头老倔牛，到时又非起来不可。張珍只好又把这件事和溫支书商量。溫支书說：“那么你和他对調一下，他晚班你白班。”張珍說：“我是怎么都好說，只怕晚班活計重，他吃不消。”溫支书說：“先試試吧！”这样两人的活計就倒了过来。刘占生的情緒，却还是不正常。

一天夜間，更深人靜以后，張珍正在矇矓睡着，猛听得牲口棚里好象有牲口的掙扎声，一下就惊醒了。这已經是他的习惯了，只要牲口棚里有响动，多沉的瞌睡也能揉碎，更何况这几晚还多操了个心。他睜眼看看刘占生，这个年轻人大概以为事情已經完毕，埋起头正坐在炕头打瞌睡。張珍怕把他惊醒，就輕手輕脚下了炕，望牲口棚

走去。

进去一看，这一惊非同小可。原来两头驴子的槽头绳拴得长了点，它们互相挤撞，你的绳子套进我的脖子，我的绳子套进你的脖子，又都是没脑子货，不知道互相松松，只知道你拉我扯。绳子已陷进老深，脖子已挺得老长，只差点就会全都倒下。张珍赶紧把绳子解下，彼此分开，然后又不长不短拴好。隔了一会儿，让它们喘过气，又喂了点水，清清嗓子。看看都没有什么了，然后又普遍喂了一回草料，才回转房里。这个年轻人还在打着呼噜哩！到这时，更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打岔了，张珍就又自管自上炕半醒半睡躺着，五更天才起来接班。

第二天，他找了个机会，连说带比划把这件事情对刘占生说了。这个实心眼的年轻人害怕了，主动提出又要干白班，不願干晚班。张珍也就再接受他的意见，又倒了过来。經過这样一个教训和周折，这个年轻人的态度轉变了。以后，敲开冰棱打水什么的，硬是乐呵呵的有說有笑。

一天晚上，张珍回家吃晚饭，他老伴忽然一反往常，满脸堆笑地迎上来。那个亲热劲，是他們結婚以来少有的。結婚那天究竟怎么样，因为年代久远，张珍已恍恍惚惚記不清了，但是眼前的笑脸，却象是霜后的菊花，特別照人眼睛。饭菜也是特別丰盛，除了干饭，还有一小盘炒粉条和两个蒸鸡蛋。张珍正想問个清楚，他老伴又叨叨开了：

“嗨，想不到咱們養牲口的也上電影啦！昨晚你沒有看电影吧？”

張珍說：“昨天晚上我們正忙着給一头老黃犍接崽子呢，哪有時間？”

“嗨，真有意思，電影里的駝呀馬呀就象活的一樣，飼養員一吆喝，個個都立起耳朵聽；一喂料，立即‘切嚙、切嚙’吃得挺歡騰……他們表揚咱們社啦，咳，你這老鬼也照上啦，一手提了个水桶，還樂呢！咳，人上照相，硬是會好看起來……”說着，說着，她又偷眼細看了一下这么多年就在一起过来的老伴。

張珍一面吃飯，一面問：“還有別的嗎？”

“還有嚴屯的飼養員苗——，名字咱忘啦，也照上啦，咳，這個老鬼也樂呵呵的，挺有意思……”

張珍立即切斷她的話說：“那是苗印大爷，他才是咱們飼養員里拔尖的呢！我和他比，不論經驗和干勁，就象筷子頭和筷子尖中間還差一截呢！”

“咳，管它筷子頭筷子尖，反正都是筷子，吃飯少不了。嗨，想不到飼養員還這麼受人重視哪！……”

“我早就對你說過，干啥活計都是一樣光榮，你還不信呢！”

老兩口越談越歡騰。

放在桌子旁的這盞小油燈，火苗子也忽突忽突跳得很歡騰。

老 羊 信

任 彦 芳

秋天，丰收的色彩是这样浓烈！梯田上的庄稼成熟了，高粱谷子，堆金砌玉；苹果园第一次结的果，分外红。山头上的羊群，好象滚动的珠子。放羊人焦脆的鞭子声，在山谷里迴响着，很挑逗人心。这是在抒发牧羊人驕傲的感情吧！

我顺着山路，一直望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想象着当年“穷棒子社”創業的情景：那二十三戶“穷棒子”，上山打柴，就是从这条山路走的吧？能够找到他們留下的脚印嗎？此刻，满山的白羊，顺着那山路下来了。我想去訪問一下放羊人，让他指給我那一条穷棒子創業走过的道路。

“这，我說不清，”年輕的放羊人說，“你得問屈恩，他是老二十三戶的放羊的。满山的路他最清楚。”

說完，他一揚胳膊，甩了一个响鞭。这鞭声震得我一惊。他对我一笑，攏着他的羊回村了，好象涌着白色的浪花。

我向西鋪生产大队长杜奎打听，他兴奋地说：“他可是个好放羊的。从打成立社到去年，他整整放了十年，沒有伤耗过一个羊羔子。一样放羊，他放的羊最壮最肥。最初我們只买了十九只羊，現在羊群滿山了！光西鋪就有四百只羊，全是經屈恩的手喂养出来的。”

我問道：“他有什么絕招妙法？”

“一句話：經心！他疼小羊，就跟疼自己的孩子一样。一九五三年冬天，在山上下了小羊，冻的不吃奶，他揣在怀里抱回家，放在自家炕头上让他媳妇給小羊奶吃……要不是有个爱社的心，誰办得到？那时候咱們社困难多，他什么也不向社里張口。后来，我們給他买了块雨布，他乐坏了。可到山上放羊，真遇上雨他甘願让雨澆，却用雨布包了小羊。人們問他：‘你就不怕淋出病来？’他笑着說：‘愈澆筋骨愈硬朗。’……”

这时，我心中浮现出一个忠心爱社的放羊人的形象，十年来，風風雨雨，日日夜夜，他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心，保护着社的羊，于是羊在他的身边长大了，愈变愈多……直到今天羊群滿山。

傍晚，我到屈恩家里，他不在家。

我說明来意。

“你快別問他！他丟三拉四的，什么也說不好，他就知道低着头傻干活。”他妻子有意贬他，“我看那放羊，有胳膊有腿就中，还有啥技术？”

“他說不好，那你告訴我吧！”我想从她的嘴里了解屈恩，“你說說，当初他放羊的时候，淨遇到过什么困难？”

“困难？叫我看，他沒碰上什么困难！”

她的回答，让我惊奇。停了一会儿，她接着說：“社乍成立，头三脚难踢。这就跟开門过日子似的，要啥沒啥呀！可我看，那也比我們自家种地的时候强多啦！……”

这几句话，是她对生活的总结。当我们今天去回想那为新生活创业的艰苦时，她用自己的生活告訴我：这艰苦比起干受貧困的折磨要幸福得多了。

这时，从外边跑进来了两个孩子，大的十一、二岁，小的有八九岁。她問大孩子：“你爸爸呢？下工了还不回家？”孩子說：“爸爸从地里回来，又跟三队放羊的看羊去了。”

“他就忘不了羊！”妻子話語里，埋怨中带着自豪，“要不看看羊，他吃饭不香。他今年不放羊了，比自己放羊还操心多！見着小羊，他更喜爱。”

“我也喜爱小羊。”那个大孩子說着从門后摘下一个放羊的鞭子来。这鞭子做得精致，叫做一条龙三挂穗的响鞭。女人望望我，說：“看，真是他爹的儿子。什么种什么苗，什么葫芦什么瓢。我看沒啥出息。可他爸爸从小就熏他們。讓他們大了放羊。我不管他們，放去吧！”

說完她爽朗地笑着。

“听說你也喜爱小羊，还給小羊吃过奶呢？”

“唉呀！这是誰告訴你的！”她大声地說，“怎么这事

也給我傳講！你忙別記在本本上，不值得。这有好多年啦，那时候正奶着我們大小子哩。……”

院子里有脚步声，把她的話打斷了。“他回來了。”說着迎出去，喊：“有同志在家等你哩！”

屈恩进屋来。他有五十来岁，中等身材，臉孔稍有一点清瘦，顴骨突出，紅銅臉色，是經過多年風雨吹打的证明。

“給三队扎了扎羊。”他洗着手說，“起瘋了。”

“要紧不？”女人着急地問。

“不碍事。”屈恩說，“這些小放羊的，你不說他們真不中！你說淺了，他不当回子事；說深了，他們不高兴。”看来，他有些生气了。

我一提起他照應小羊羔的事，他高兴了，“那全凭她支持，不然不中！”說完，看他妻子一眼，两眼一眯，象个孩子。

“他把羊羔抱的家来，让我給它奶吃，我說：‘它不咬我？’他說：‘不咬。你給它吃吃奶，就是救了一群羊。这小羊大了不是得給社生嗎！’”她說到这儿笑了，“我是什么都听他的。这老爷子呀，当初入社都沒跟我商量。……”

屈恩不好意思地笑笑向我声明道：“那是早先的事。”

原来，当初互助組开会商量办初級社，王国藩找到屈恩，問他怎么打算，他說：“入。”王国藩說：“这得爭取全家同意，回去和家里的商量商量。”屈恩心急，說：“我商量

了，写上吧！全家同意。”回到家，屈恩跟娘說：“媽呀，咱們入社了。”娘問：“什么叫入社呀？”屈恩說：“就是把地合到一块，咱們就伙种地分粮食。”娘一听很高兴：“那敢情好，咱們省得为种地发愁了。”屈恩給娘說的話，妻子在外屋全听到了，心里也滿乐意。她本想丈夫会把这件大事，“正式”地跟她說一下，誰知道屈恩竟沒有告訴她。是怕她不同意呢，还是馬虎忘記了呢？以后她常常提起这事，嫌沒和她商量，算是对丈夫的一种警告吧？

“这时候是妇女当家，”屈恩笑道，“我有什么事，就得跟她商量，要不，那臉就刷的一下——”

“你信他的話？”她問我。

我沒有回答，只微微一笑。从这儿感受到一种喜悦，这是只有在不愁吃穿，并相信自己劳动可以創造幸福的家庭才具有的。

“我要下地了，” 屈恩直爽地告訴我，“咱們有空再一聊吧！”

“那我晚上來？”

“中！”他干脆地說。我告辭出來。

我晚上來找他，他又不在。我以为他忘記了相約的話。誰知呆了会儿，他的孩子跑回家来給我送信，說他爸爸給队里看栗子了，派孩子來領我去找他。

在一棵栗子树下，望着他多年放羊爬过的大山，他說起放羊的历史：

“从我記事，家里只有三亩鬼子不拉屎的山坡地。我从小住姥姥家，十四岁給姥姥家放小羊羔子放了两年，姥爷說：你放大羊吧，也学点艺。那时放到六月就‘出山’，山里吃，山里宿。山南地北的放羊的聚到一处，好賽鞭子，一对一下的抽，看誰的焦脆。旧社会是給別人放羊，誰沒有一肚子苦水？这一抽鞭子，就把什么都忘了，这是放羊的‘乐事’。这鞭子还是个镇物，头把羊赶进山，先摔几声鞭子，有野牲口，就都吓跑了。……你不信問問这些小放羊的，要鞭子干什么，他們都說不上来喲！

“我那时候有心眼。我碰上过一个老放羊的，会看羊的毛病，我就想法跟他学。老輩子认师傅可不易哩。除了孔圣人不留一手，哪行都得留一手，放羊的更心独。开头我問他怎么治羊病，他說：‘你摔鞭子去吧，問这个有甚用？小小的年紀，还要放一辈子羊，受一辈子罪啊？’不肯告訴我。以后，我看他的鞋烂了，就把我的鞋脫給他；見他爱抽烟，可老采树叶子抽，我就从姥姥家給他帶了大叶烟来，慢慢地，我們俩好了。后来，我的羊出了毛病，我急得要哭，問他：‘这怎么办哪？’他长叹口气，‘唉——’這是說，告訴吧，不願意；不告訴吧，又这么好了……这才只得告訴我几样，他說：‘羊得摸腰瘋，扎三根肋巴骨；羊趨巴瘋，它东搖西晃，就在脑袋上扎六針；得搖头瘋，扎四針……’老师正跟我学說着，見別的放羊的来了，就沒有說全。我心想：告訴我几样了就不錯，剩下的不告訴就不告訴吧。看来，干什么都得用心哩！以后，慢慢的我自己

也捉摸会了几样。你看我們村的羊沒有一个破耳朵。羊火大了不吃草，叫‘慢草’，旁庄都是用刀子割耳朵，我是針扎耳边的小血管，血一出，准好。这是我的傳点。前些天，洪山口公社的羊‘慢草’，找了王主任来，王主任就領着找我，我就把这技术告訴了他們。

“在早先，可不行。老放羊的要扎針了，不让小放羊的看，一点本事也学不到。他要扎屁股，就說：‘来，你搬着脑袋。’他要扎脑袋，就让你揪羊屁股。不說別人，打入了社，要我傳授，我还有斗争哩。杜奎副主任說：‘老屈呀，你把技术掏出来吧！不然，死了还不都裝了去呀！’我嘴說：‘中啊！’心里可不通。我也不是要都裝了去，是想等我的儿子起来，让他放羊全告訴給他。哈哈！

“这时候，我是光想告訴了，可有些小放羊的倒不經心学了。你在那儿給羊扎針，把手亮給他，他不好好看，就会在一边呱呱地甩鞭子！一听这鞭子，我就想起在旧社会放羊的不易，鞭梢上都带过泪珠子呀！这时候生活好了他們可就知道摔个响鞭，美了！当初小社的时候，我沒用鞭子，也放好羊！”

屈恩望着对面，好象是用心和山头說話。这聲音在深夜山谷里，特別清晰。我不由得想起我見到的年輕放羊人。我想：應該告訴他山上的每一条道路！那条路上，有过去放羊人的血泪；我們走着那条路打柴創業的。我問屈恩：“十年前，咱們穷棒子买羊的事，你还記得吧？”

“这忘了还中？”屈恩兴奋了，在夜晚，也能看到他的

眼睛闪光，“那年冬天，我們打柴換了錢，大家都乐意买羊，叫誰放呢？我說：‘我放！’大家都說：‘中！’那时貧賤，多买几只，赶回来的羊全是一把骨头，大家都担心伤耗，我說：‘有骨头就不愁肉，你們下去两个月看，它們不全滾瓜肥，我一个工分不要！’我心里想：既說出‘我放’来，就得对得起大伙，这每只羊都是大伙的汗珠子換的呀！过了两个月，这羊都变样了，大伙也都乐了。”

屈恩笑了，笑得那样甜蜜，好象回到了十年前，重新体验了那种愉快。是怎样让这穷棒子社的第一群羊肥起来的，他沒有說。我想那一切，这长峪山会記得。在它的身上，踏遍了屈恩的脚迹，留下了一个貧农对社会主义热爱的感情。当望到公社的羊群在滿山吃草的时候，該想到，那是老放羊人的脚印在闪光吧！

明天，我再見到那个年輕的放羊人时，我願把屈恩的話告訴給他。

1963年9月25日